

黃花岡

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論戰

中共的十八騙（連載）

通向地獄之路

拋棄專制改良獻身共和革命的壯士－吳樾
康有為是聖人嗎

大中華民國正是一個中國

堂堂正正地掛中華民國國旗

蔣公三十年祭（還原蔣介石專題）

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記實（連載）

毛澤東重要歷史疑案考訂

仇漢－民族虛無主義態度不可取

中國歷史的文明價值

從宗教之比較看民族心靈的歸依和前途

新教宗請看：中共手上的宗教領袖

中華百年歌

歷史文化
季刊

2006 年第 1 期（總第 16 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紀念黃花崗舉義九十五週年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碑

方聲洞福建閩侯 林盛初廣東南海 徐佩猷廣東花縣 章樹勳廣東南海 徐禮剛廣東花縣 徐日培廣東花縣
李炳輝廣東肇慶 李晚廣廣東安 郭繼枚廣東增城 徐廣治廣東花縣 游壽廣東南海 徐臨福廣東花縣
李文松廣東清遠 周華廣東南海 陳春廣東南海 徐茂煊廣東花縣 徐松根廣東花縣 徐滿漢廣東花縣
龐雄廣東吳川 馮超廣東南海 李榮如廣東南海 江連復廣東花縣 徐昭良廣東花縣 徐居添廣東花縣
陳更新福建閩侯 秦炳四川雅安 徐應安廣東花縣 勞培廣東開平 曾日全廣東花縣 徐培成廣東花縣
杜鳳書廣東南海 陳興泰福建閩侯 余東雄廣東南海 徐保生廣東花縣 徐廣連廣東花縣 陳文良廣東花縣
章統鈴廣東南海 李文明廣東南海 章統淮廣東南海 徐容九廣東花縣 徐建昭廣東花縣 程良安廣東花縣
林覺民福建閩侯 宋玉琳安徽懷遠 馬侶廣東番禺 陳潮廣東海豐 陳清瑞福建連江 羅乃琳福建連江
李德山廣東瓊城 喻岳倫四川內江 羅仲奎廣東惠州 卓秋元福建連江 胡應祥福建連江 羅坤廣東南海
饒國樞四川大足 林尹民福建閩侯 黃鶴鳴廣東南海 黃惠炳福建連江 王燦登福建連江 林西惠福建連江
饒輔廷廣東梅縣 李雁南廣東開平 陳子均福建閩侯 石德寬安徽壽縣 陳炎興福建連江 周增廣東梅縣
林文福福建閩侯 劉六行福建連江 劉元棟福建閩侯 林修明廣東惠潮 趙金龍福建連江 張學齡廣東潮



仍現。華國卓娘新命革
當的義起備準在。在健
在坐，娘新裝化她，時
彈炸的裝滿護掩中橋花
○內城進拾被

參加黃花崗起義的革命新娘卓國華



七十二烈士英靈
四百兆國子熱看秋雨濕黃花
中華民國元年三月廿六拜題

檢校：庚戌之戰後，死戰或苦戰而後逃入黨在
今舉如（參閱）謝建清的回花崗於義舉具二十七烈士
（臺灣）（學清）（謝建清）（參閱）（參閱）（參閱）



冒著危險安葬黃花崗眾
烈士的潘達微一家。右
二為潘達微先生。



辛亥元勳中華革命黨領袖
獻身反袁復辟英雄陳其美



歷史文化季刊

2006 年第 1 期總第 16 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SN 1534-2662)

Issue No. 16

Published

March 27, 2006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New York
USA

website: <http://www.huanghuagang.org>
or <http://www.huanghuagang.com>
eMail: hgang2001@hotmail.com

Subscription Hot Line: 718-898-9100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Copyrigh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本刊請來電：718-898-9100

或來信：

《黃花崗》雜誌社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主辦者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者 黃花崗雜誌社

主編 辛灝年

副主編 李剛博士

主編助理 丁毅博士、曉黑博士

主編顧問兼編審 吳學燦、李勇

編審 魏紫丹、楊錚、蔣學敏

美術編輯 恆淨

名譽社長 鄭文英

社長 馬佩華

副社長 姚鑫華、易丹軒、賴可正

名譽董事長 周祥（已故）

董事長 周光亞

副董事長 周美娟、路人、孫雲（兼）

第二屆編委會名譽主任 孫國棟教授、丘宏達教授

編委：□	丁抒	丁毅	王友琴	宋子明	辛明	余建文
余大猷	呂易	吳倩	蔣學敏	李勇	李剛	高陽
周健	林牧晨	林才君	吳學燦	郭平	郭自生	陳志強
陳維健	陸耘	曉雲	莊思明	張育明	孫雲	易丹軒
秦晉	高優	寧仲康	葉寧	賴可正	楊杰倫	楊柳春
黃偉梯	傅申奇	李巨水	蔡萌	謝影峰	魏紫丹	魏玲
王樹一	李悅	胡峰迴	沈雪	宋雁軍	朱玉河	岳穆文
胡志偉	胡西山	胡峰迴	許秋山	昂藏秋	高廈	高沉賢
張玉華	張謙誠	章靜秋	趙蘇	趙增義	謝明明	蕭玉石
官平非	肖戎	朱執中	林斯	莫逢杰	樊星	黃永森

本刊顧問：向厚祿、趙增義、黃玉振、黃其柱、張學海
曾華漢、麥青芬、陳慶國、周勻之、張國威

黃花崗雜誌發言人：郭平博士

黃花崗 雜誌

2006 年第 1 期 總第 16 期 (增刊)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March 27, 2006



冰雁老師千古



讀者反饋黃花崗

革命改良自由主義 研討專欄

齊心協力為大中華民國的未來奮鬥

4

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論戰

袁紅冰 5

拋棄專制改良 獻身共和革命的壯士—吳樾

何彤 21

康有為是聖人嗎？

曉黑 26

康有為欺騙了中國人一個世紀

大陸網文 30

中共文革時期曾挖墳暴尸批鬥康有為

羅思義 31

評中共對待康有為的三副面孔

高山流 32

寶刀歌

秋瑾 25

中華百年歌

辛灝年 17

中共馬克思主義工程批判

通向地獄之路

葉寧 13

印共叛亂史載入教科書

台北中央社 16

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

還原蔣介石

蔣公三十年祭

雪原 34

北伐宣言

廣州國民政府 35

七七抗戰十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蔣中正 36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告全國同胞書”

蔣中正 40

蔣介石才是高尚的民族主義者

網上文選 42

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記實（中日決戰連載之三）

孫挺信 43

陸沉最後一將星（預告）

黎望復

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

中共的十八騙（連載之一）

馮騫編寫 66

國民黨軍人劉篪和李植榮之死

陳世忠 75

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毛澤東重要歷史疑案考訂 何晴蓀 79

仇漢——民族虛無主義態度不可取 曾節明 86

從宗教之比較看民族心靈的歸依和前途 王思漢 91

中國歷史的文明價值 陳致平 99

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

一對精緻和麻木的大師 伍國 104

靈岩山上，我向林昭訴說 尋找作者 108

抗戰初期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 辛明 110

寬松時期的成就 王若望 112

大躍進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魏子丹 119

時代與文學 專欄

抗日漫畫家麥非的命運（下篇） 辛然 120

也談走向共和 王伯年 126

悼孫文輓聯選 何彤選編 33

東家房頂上的烏鴉 楊春光 128

瀏陽故里杜鵑泣 陳少文 130

碎詩 聖兆 130

古稀抒懷 朱執中 119

旋風讚 古今 127

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大中華民國正是一個中國 子口 132

堂堂正正地掛中華民國國旗 李勇 133

龍應台的膽量 李勇 136

千古一江山 張儒和 139

新教宗請看：中共手上的宗教領袖 劍光 140

嗚呼，胡；嗚呼，雀躍的人們！ 國際流浪漢 141

王雍垚致徐文立 63

駁胡說八道的親共漢奸理論 徐永良 65

我崇尚真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郭永豐 142

民運人士信箱

黃花崗雜誌公告 欄

第16次財務公告 144

中國現代史海外研究中心公告 85

感謝捐款人和榮譽訂戶 12

雜誌訂單 144

敬告讀者 144

編後 143

讀者反饋黃花崗

黃花崗雜誌的勇士們：

你們好！我幾乎每天都在瀏覽黃花崗網站。今天發現終於可以網上直接捐款，高興可以盡微薄之力。雖有萬分欽佩之心，無奈年少清貧。待未來工作之後再為我們的雜誌出錢出力吧。我們的事業雖然艱辛，但目標太正確，以至於必然實現！希望我們齊心協力為大中華民國的未來奮鬥！有朝一日在南京高呼吾國萬歲！

黃花崗雜誌：

很高興認識您的網站。我是在國內 1998 年左右，開始接觸一些進步思想，由《現代化陷阱》開始思考人生和政治。在人大的英語角，認識幾個很有見解的老教授，後來經過幾年工作，發現國內的腐敗嚴重。

很欣賞黃花崗，是我見過的最好的民主思想。

我移民到加拿大，真的感謝這個制度和國家給我們這些 70 年代的大學生一個好的思考環境，痛恨我自己學問太少，不敢給貴網站投稿……

很想認識辛灝年先生，講的太好了！！！！

辛灝年先生：

我是大陸在歐洲的留學生。自從出國之後，沒有了中共的網路封鎖，看到了許多在國內看不到的東西，尤其是看到了您的黃花崗雜誌，頓有遇到知己之感覺。原來我在國內思想就比較反共，喜歡中華民國，喜歡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與您的想法簡直一模一樣！沒想到在自由世界還有跟我想法完全一致的，真是倍感歡欣鼓舞，您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我也看過了，完全同意書中的觀點，我並將這些傳給我的同學看。而且我還是南京人，是您的老鄉，作為中華民國首都的市民更加熱愛中華民國。我十分期盼您能來法國演講，祝願黃花崗雜誌越辦越好，反共復國定將成功！

黃花崗雜誌辛老師：

非常感激您對近現代史的剖析。是您把孫中山民主革命及現代革命融會貫通，一以貫之。此實使吾輩茅塞頓開，如夢初醒。中華民主革命成功之日，您

當……先生……唇槍舌劍，足可抵雄兵百萬，令中共喪膽矣！吾輩當謹遵先生之教誨，誓將中山先生未竟之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萬望先生不吝賜教！

祝先生春節愉快，全家幸福，萬事如意！

慕中山敬上 06、1、25

辛教授：

我馬上就要結婚了，現在覺得自己很幸福。可我知道，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象我一樣幸運，很多人生活都不太好。幸好我們還有象您這樣的人在關心我們的國家。

所有人都象您這樣關心國家，我們國家復興的日子就不遠了。

當初要不是看了您的書，我至今還在把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成自己的祖國。現在，一看到五星旗，我都覺得惡心。結婚登記的時候，公証的場景要攝影留念。背景就是五星旗和天安門「國徽」，還要收我一百五十塊錢。我馬上說不要，給我換成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我就買下來。錢再多也沒關係！

志勇

黃花崗雜誌：拜讀了辛灝年先生的誰是新中國這本著作，我非常激動，非常感慨。很多我心中想的（我一直的理想：推翻中共，恢復民國）但又不成系統的東西，在辛灝年先生這本書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詮釋。可能我的要求有些冒昧，但懇請能讓辛灝年先生收到這份郵件。

謝謝！

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還我民國——凝聚中華中國的國家認同

實行民權——確認中華立國的民主方向

愛我中華——追求民主中國的繁榮統一

大陸青年

祝黃花崗 2006 新年快樂，加油，願兩岸人民能記起黃花崗精神，共同推倒專制政權，為建立民主中華而努力。

大陸一青年

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論戰

——兼論當代中國政治改良主義的實質

袁紅冰

編者按：袁紅冰教授的力作——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論戰，值得認真一讀。該文有理有據地論證了當代中國所謂新自由主義和所謂新左派的歷史政治由來，以及兩者論戰的政治背景和利害關係所在。特別是通過對它們本是同根同生、同氣相求之政治本相的揭露，導證了當代中國政治改良主義的實質，並指出了這一政治改良主義的絕然沒有出路。從而為呼喚完成中國的共和革命，以建設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提供了理論和現實兩個方面的充分論據。

袁紅冰教授是近期才來到海外的中國著名學者。他對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有著準確而又深刻的理解。這無疑將有助於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對當代中國現狀的研究。



引言

中共為了強化專制政治而進行的經濟改革，日益明顯地裸露出深刻傷害大部分中國人根本利益的猙獰面目。中共官僚體制內部，以經濟改革方向為觸發點，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論戰也越來越激烈。

儘管爭論的雙方原則上都屬於官辦學者、御用文人的範疇，但每一方卻又都竭力想讓歷史相信，爭論的對方正試圖把中國的命運引入黑暗。而事實則在於，新自由主義參與製造了今日中國的苦難，新左派則是昨日中國苦難的思想之源的殘跡。

鑒於新自由主義和新左派都聲稱自己是真理的佔有者，並承擔著拯救中國於社會大危機之中的歷史責

任，因此，對他們的爭論作思想的審視，有助於人們認清中國走出社會大危機的正確道路。

一、概念的界定

自由，這是一個被眾多缺乏真正學術智慧的庸人學者模糊化的概念。所以，在討論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爭論之前，我們不得不費些精神，用盡可能簡捷的邏輯，明確各項與“自由”有關的概念。

以人類近代史的起點為界，自由主義首先是從文藝復興運動中湧現的生命哲學。自由的生命哲學抗爭中世紀神權政治對心靈的專制和奴役，確認以人為本的人文主義理念，從而創造出屬於自由人的人格。歷史是人格的展開，正是這種自由人格引導人類走出中世紀的專制鐵幕。直到今天，人類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運動，仍然在相當程度上體現著自由人格的生命哲學理念。

自由主義的生命哲學造就的思想家群體，又以天啟般的智慧，開拓出屬於自由主義的政治法律學說。自由主義政治法律學說的實踐，不僅為近現代民主政治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直接影響到經濟體制的形成，甚至最初的自由市場經濟就是以公民個人所有權、法律關係主體之間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契約自由三項法律原則為支撐點。

自由市場經濟運行百年，雖然以物質財富增長的狂飆突進論證了自己的價值，但同時也出現了兩項尖銳質疑其合理性的現象。一是不受限制的契約自由，導致對雇工群體的各種非人道待遇，而這種人道災難深深震撼了人類的良知；一是缺乏綜合協調的眾多個

別意志推動的經濟運作，週期性地導致予社會以巨大破壞力的經濟危機。

與最初的自由市場經濟伴生的人道災難和經濟危機告誡人們，自由的絕對性只能在精神領域實現，現實中的個人自由只有受到合理限定，才會與社會正義和社會運行必須的理性一致。

現實問題對初生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嚴峻挑戰引發了兩類思潮，一類思潮徹底否定自由市場經濟，以及與之相聯的政治制度；另一類則是改良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潮。

前一類思潮主要包括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基本沒有能力形成現實的社會運動，而共產主義運動為禍百年，現已淪落為精神的破落戶。

改良主義的思潮則生機盎然，結出豐碩的成功之果：通過各種勞動保障性立法，將契約自由限定在人道的範疇之內；通過維護公共利益之立法，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機制；通過金融和相關法律之手，國家權力適度協調經濟運作，極大降低了經濟危機的頻率和強度。

經過不斷改良後形成的成熟型的自由市場經濟，越來越顯示出其符合人類追求幸福要求的價值。不過，需要指出，這種價值只有在現代民主法治的政治法律制度背景中才能得到實現。

人類對幸福和正義的理解，如大海一樣起伏動盪。成熟型的自由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人們對國家權力干預經濟活動的適度性權衡，對強調自由競爭與強調社會利益適度性權衡，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那種更傾向於自由競爭、減少國家干預、降低社會福利程度的經濟學思潮，被歸類入稱作“自由主義”的或者“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範疇。

但是，無論“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還是反“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都屬於成熟型的自由市場經濟框架內的理論。因此，自由主義生命哲學與自由主義政治法律學的論戰物件是專制主義，但“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論戰物件卻不是專制主義，而是自由市場經濟價值體系內的另一種思想——這是理解作為經濟理論的“自由主義”的關鍵之點。

本文以下使用的“新自由主義”，除特別說明外，則專指一批中國經濟學專家上世紀九十年代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學來的經濟思想理論，這種中國式的

“新自由主義”是對外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不全面的模仿，或者說表面形式的模仿。

二、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做了什麼

時間本無意志，但人的意志經常深深刻在某些時間點上。一九八九年就是刻滿諸種意志的時間之柱。這一年因此在許多意義上成為歷史的分界，對於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如此。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趙紫陽主導的經濟改革具有明顯的超越經濟領域的趨向。那是一種可能帶動社會全面進步的經濟改革。但是，具有社會全面進步意義的改革溺死於“六四”血海。“六四”之後，鄧小平，這個犯下反人類罪行的獨裁者的意志主導的經濟改革，則有一個毫不含糊的最終目的——通過發展經濟，維護中共上層權貴集團的極權專制統治。

“六四”事件使中共用偽善的謊言構築起的政治道德基石徹底崩潰。政治道德的影響力喪失之後，專制政治便企圖、也只能用利益收買人心。鄧小平就是要通過經濟改革為收買人心創造物質基礎。

專制政治本質上是社會的天敵，權貴階層必然要以對社會的全面壓抑與掠奪，作為其特權存在的前提。因此，專制政治沒有能力真正收買天下蒼生。於是，鄧小平以老政客的詭詐與精明確定，為擁有知識和擁有資本的兩個最具能量的階層，知識份子和商人，打開進入權貴階層之門——專制權力將主要收買知識份子和商人。

歷史可悲地按照獨裁者的意志運行。由腐敗的官權、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或者說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御用文人構成的中共政治黑幫集團，是一隻極為貪婪的政治動物。它唯一的意志就在於，依託專制權力，借經濟改革之名，行攫取社會財富之實。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正適應了中共政治黑幫集團的意志取向。於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成為顯學，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成為專制權力的新寵，御用文人中的顯貴。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中共官僚特權階層駕馭的經濟改革，迅速建立起“完善”的權貴市場經濟體系。這個經濟體系以腐敗的專制權力為主軸，以腐敗

的權力、骯髒的金錢和無恥的知識之間的黑幕交易為動力，而它的天性就是要把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御用文人和官辦學者組成的“上層一萬家”，迅速地推上財富之巔。引領權貴市場經濟運作的“經濟改革”，則變成一支蘸著底層民眾的血淚，書寫不公正歷史的罪惡之筆。而新自由主義文人，則是握著這支筆的魔鬼之手。

“六四”之後，中共經濟改革惡跡如荼，現僅舉概要，以明其惡。

以新自由主義的所謂增強社會競爭性的理念為旗幟，中共廢止了原本就極其脆弱的社會福利保障系統。中國最貧困的群體——九億農民，因此被完全排除在一切現代社會福利保障體系之外。

尤其無法容忍之處在於，由於醫療費用是按照中國“上層一萬家”的生活水準為標的確定，就生活水準而言“上層一萬家”處於九天之上，農民淪於九地之下，所以，農村原有的簡陋不堪的醫療保障體系被新自由主義者借諸專制權力摧毀之後，農民根本無力承擔醫療費，而成為“非醫療”群體，許多年老農民生重病之後，只好以自殺來結束生命。

教育產業化是中共經濟改革的另一重大舉措，也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一項明確體現。產業化十年，中國教育光怪陸離。學術腐敗如雨後新竹，生機蓬勃；教學質量似黃果樹大瀑布，一落千尺。學費高昂，底層民眾多有賣血以籌子女學費；學術低迷，莘莘學子青春毀於大學。教授風流，常召妓以娛肥腹粗腰之身；學生無錢，不得不賣身青樓，以維持艱難之學業。

當歷史有一日冷峻審訊：中國教育何以墮落至此。必有答曰：“官辦學者為專制籌謀有功，教育產業化，便是官僚集團賞賜給官辦學者的一塊豐饒的“自留地”，以供其任意縱橫，瞬間暴富。

住房改革是新自由主義者們奉獻給中共經濟改革的得意之策，也是歷史必將記住的不公正的過程。

工薪階層，普通民眾，半生風雨，一世辛勞，或胼手胝足，或節衣縮食，所得積蓄，瞬息之間，便消失於住房改革，房開商的錢袋卻與其便便之大腹，一起豐滿鼓漲。每一個成功的房開商後，都有一個權勢灼人的貪官，和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貪官為房開商攫取民財提供權力保護；經濟學家為房開商刮食

民脂民膏提供黑色的智慧。奸商、貪官、無恥文人——三位一體，恰可成吸血之魔；三足鼎立正托起屬於權貴的“太平盛世”。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造被新自由主義者們譽為經濟改革的“攻堅戰”。事實已經證明，“攻堅戰”的實質，就是腐敗的權力通過新自由主義設計的改革方案，與奸商惡賈勾結在一起，合法地瘋狂掠奪由工人的血汗凝聚而成的國有企業。

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在半個世紀間，由工人奴工般艱苦的勞作構建而成。工人極低的工資同他們創造的價值完全不成比例。只是過去國有企業為工人提供簡陋的住房和公費醫療，還可使工人低質量的生活得到保障。

中共當局首先通過住房改革，廢止了無償住房制，工人不得不把終生積蓄拿出來購買遮風擋雨之所；隨後通過醫療改革，廢止了工人的公費醫療制度；最後，又通過改革“攻堅戰”——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造，由各級貪官主導，把國營企業以幾十倍壓低的價格，出賣給與貪官沆瀣一氣的商人。商人又在幕後把其購買國企獲得的超巨額利益，回饋給貪官。而數千萬工人則由此失去了生活的唯一依託，成為被社會拋棄的人。

證券市場和所謂“現代金融管理機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經濟改革的名義引入中國的。

十年滄桑，證券市場證明它不過是由經濟學家投資知識，貪官投資腐敗權力組成的“有限公司”，而這家公司的社會效應只在於，通過黑箱運作把無數股民的金錢、渴望、焦慮和痛苦，變做投資者的財富與歡樂。

“現代的金融管理機制”則使銀行演化成一種特殊機制——通過銀行的投資運作，儲民的儲金合法地轉化成貪官與奸商錢袋裏的財富和銀行的金融黑洞。

縱觀“六四”之後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無非害民、損民、欺民之策；新自由主義參予實施的改革計畫，儘是殘民、賊民、虐民之舉。

貪官污吏出專制權力，奸商惡賈出骯髒的金錢，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為首的官辦學者出墮落的知識，共同構建起政治黑幫集團對中國的統治。政治黑幫集團壟斷了權力，金錢和知識，底層民眾則由此喪

失了實際可能真正行使的基本人權——現代中國專制體制下的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實已經冠絕古今。

十六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所作所爲，可一言以蔽之：毀滅正義與良知；掠奪底層民眾；強化腐敗之專制。

然而，“魔鬼三角”之波詭雲譎，不如人心之難測。同樣欲強化中共專制的“新左派”，在痛苦的沉寂之後，竟對新自由主義發出思想決鬥的挑戰。這究竟是為什麼？

三、新左派為什麼仇恨新自由主義

新左派實質上是被鄧小平打入冷宮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左派前冠以“新”，是一種不倫不類的時髦。在經濟領域，新左派堅持認爲，只有以國營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才能爲中共獨裁專制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

鄧小平之所以把新左派打入冷宮，並非因爲他們對專制的忠誠，而是因爲他們對計劃經濟的堅持。鄧小平早已意識到，計劃經濟在中國的實踐是失敗的；蘇聯的崩潰則表明計劃經濟會導致專制政治的大潰敗。作爲一個精明的實用主義者，鄧小平相信，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都可以用來爲專制政治服務；既然事實已經證明計劃經濟不能有效地維護專制政治，那就應當通過經濟改革，變計劃經濟爲市場經濟，以滿足強化專制政治的需要。

鄧小平，以及其後的江澤民冷落新左派，是由於新左派們顛頑頑固，不知變通，而鄧小平到江澤民又賜給新左派比較寬鬆的生存空間，是因爲獨裁者明白，新左派心中雪藏著對專制終身不渝的依戀。

中共專制政治必須以計劃經濟爲基礎；沒有計劃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這是新左派的基本理念。不過，在考察新左派時，不必太注重其理念，因爲，信奉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者，大都是心靈之外的存在。

新左派之所以義無反顧地堅持計劃經濟，根本原因在於他們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什麼也不懂；馬克思主義已經變成他們的衣食父母。如果離開以教授或宣傳馬克思主義爲內容的職業，新左派們就喪失了其唯一的謀生手段。可見，新左派的現實生存都要仰賴

可能永遠不會實現的共產主義。這是新左派堅持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的根本原因。

在此點上，新左派遠不如新自由主義者聰明。如果把鄧小平、江澤民等獨裁者比作狗的主人，那麼，新左派就是蠢笨的狗——它咬住一根已經沒有肉的骨頭，寧死不鬆口；新自由主義者則屬於聰明的狗，它會適時放開無肉之骨，撲向另一塊肥肉。

新左派對新自由主義刻骨的嫉恨之情，不是基於對中國命運的關懷——崇尚給中國造成無數人間苦難的計劃經濟者，不可能真正關懷中國的命運——而是由於社會政治地位的變化。

新左派代表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過去長期處於中共政權的中心，享有政治顯貴和精神顯貴的尊榮。但是，自鄧小平公開宣稱“市場和計畫都是方法”後，新左派及其代表的思潮迅速退出歷史中心，以致被徹底邊緣化。與之同時，鵲巢鳩佔，新自由主義以主流經濟學者的名義，成爲主導經濟改革的理論新貴，並受到萬眾矚目。一卑一亢，一落一起，世事滄桑，世態炎涼，新左派“怎一個愁字了得”！又怎能不於懷念往昔尊榮的同時，對專制者的思想新寵——新自由主義嫉恨如仇。那種刻骨銘心的嫉恨，可有一比：恰似人老珠黃、雞皮鶴發之大老婆，對撒嬌賣呆、風騷俗豔之小老婆所有的嫉恨情懷。

新左派無新自由主義者的聰明機變，卻也有政客的精明。鄧小平、江澤民時代，新左派雖然也作出過一些意志表現，但總體上處於蟄伏狀態。他們明白，當其時也，新自由主義正獲熱戀，權勢熏天，不可與之爭鋒。胡錦濤爬上權力之巔後，新左派如冬眠之蛇遇春雨而復甦，昂首瞪目，向天鼓噪。因爲，新左派敏銳地意識到，胡錦濤，這個不學無術的前學生輔導員，同他們一樣，除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之外，什麼知識也沒有——胡錦濤是他們的同類！

新左派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論據中，包括了經濟改革造成的人民苦難、巨大的社會不公正和權力的空前腐敗，以及民族道德的崩潰，而這似乎爲新左派贏得了政治道德的籌碼。但是，新左派又以向毛澤東時代全面回歸和重溫計劃經濟之夢，作爲中國命運的方向。這就使新左派論據中蘊涵的政治道德，在其結論中消失殆盡，蕩然無存。理由在於，對於人民，毛澤東時代和計劃經濟乃是另一種悲劇，另一番苦難。

新左派以人民的苦難和社會不公正為論據，要求驅逐新自由主義，使自己重返歷史中心。不過，這個要求註定只能是水中撈月。新左派代表的思潮已經完全不適應強化中共現代專制的需要，因此，不可能被中共權貴集團所接受。即便胡錦濤個人更寵愛新左派，情況也不會有根本變化。而作為一種為專制主義的生存殫精竭慮的思潮，天生只能通過專制政治的寵愛，來獲得發展的前提。

不過，新左派將繼續在狹小的空間中生存下去。中共權貴集團完全明白，新左派是專制政治的忠誠戰士，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乃是何種方式最適於維護專制生存權之爭。所以，只要中共極權專制的政治制度沒有崩潰，新左派就不會徹底喪失生存空間。

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論戰，乃是中共暴政思想理論危機的一次爆發。它表明中共暴政已經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思想理論危機會產生、加速、或者強化專制的政治危機的效應，但是，無論雙方在論戰過程中表現出多少聲嘶力竭的激憤，歷史都不會真正嚴肅地關注這次論戰。因為，新左派和新自由主義在最終的政治立場上是一致的——他們都是為強化現代專制而生存與戰鬥。

對於中國，有歷史價值的爭論乃是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爭論。這個將決定中國命運的爭論會在政治大變革的暴風雨中展開。

四、新自由主義的謊言

專制政治之下，歷史常在欺騙中行進；被欺騙的人民總是懷著種種幻想，走向屬於他們的社會悲劇，直至幻想破滅——“六四”事件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的進程，再次證明了上述歷史的邏輯。

如果說中共獨裁集團是這項歷史性欺騙的總設計師，新自由主義以及政治改良主義思潮，就是謊言內容的編導者。

“六四”之後，由於政治道德基礎徹底崩潰，中共暴政處於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之中。面對政治危機，鄧小平以及中共獨裁者集團決定實施兩個政治舉措。

首先，為擴大中共暴政統治的社會基礎，決定允

許兩個最具社會能量的階層：知識份子和商人，進入統治階層，從而形成由官僚、知識份子和商人共同主宰社會的政治黑幫集團。

其次，繼續推行由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以達到兩個目的：一是以改革的名義，為官僚、知識份子和商人攫取、掠奪社會財富建立“合法”的社會機制，從而通過物質利益強化統治集團內部的凝聚力；一是通過經濟改革，為強化因政治道德基礎崩潰而弱化的專制政治，提供經濟實力。

毛澤東、華國鋒時代，知識份子整體上處於地獄的最底層。或許由於絕大多數高貴自由的靈魂在一次又一次殘酷的政治迫害中凋殘了，死去了，而活下來的絕大多數是奴顏媚骨的小人，所以，一得到暴政意欲把知識份子納入權貴階層的信號，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便歡呼雀躍，毫無愧疚地背叛了良知，放棄了對真理的忠誠，如饑餓的烏鴉之群撲向腐肉一般，撲向暴政扔給他們的物欲和社會地位。同時，他們也竭盡所能地，以知識的名義，為暴政辯護。其中新自由主義者，即主流經濟學者，最受暴政賞識。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種種觀念，正為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欺騙世界和中國人民，提供了極為動人的謊言。這些謊言中最經典的有下列三項。

其一曰：經濟改革最終目標是建立完善的市場機制，而完善的市場機制，會給人們帶來幸福的生活。現在底層民眾經歷的艱難困苦，只是改革的陣痛；權力極度腐敗乃是經濟改革的潤滑劑。

其二曰：國營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造，即各種方式的私有化，是實現完善市場經濟必須邁出的關鍵一步。而最終目的的合理性，比國營企業私有化過程中的弊端更重要。

其三曰：經濟改革將造就一個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強大之後，就會提出政治上的權利要求，整個社會便因此而逐步民主化。

除上述三項經典謊言外，新自由主義者們幾乎用學術的文字，為中共經濟改革導致的每一項人民的苦難和社會罪惡，作精緻的謊言包裝。他們存在的主要價值，就是讓底層民眾在謊言描繪的幻想中，習慣於現實的苦難，無限度地容忍現實的罪惡。

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根本沒有能力演進成自由市場經濟。理由很簡單：自由市場經濟以民主政治為前

提和依託，構成自由市場經濟所必須的主體平等的法律權利，公平競爭的法律規則，都需要由民主政治的法律提供。

中共專制之下，市場運作不可能擺脫腐敗權力的控制，市場主體之間因此失去了實質的平等關係和公平競爭的關係——與權力關係的親疏決定著市場主體是否能取得特權，和競爭中的強勢地位。所以，中共經濟改革只能以崇尚腐敗權力的權貴市場經濟為歸宿，而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就在於為權貴階層以暴發的速度積累私人財富提供運作機制。因此，權力的腐敗與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一致，只要權貴市場經濟機制存在，權力腐敗就會愈演愈烈。而與社會不公正相伴的底層民眾的痛苦，也不會是“陣痛”。

國營企業的產權改造，不過是貪官、奸商、無恥文人共同組成的政治黑幫集團，為他們“合法”地搶掠國營企業——幾千萬工人一生血汗凝聚起來的財富——設計的“經改方案”。新自由主義者則力圖讓人相信，權貴階層對國營企業的“合法”搶劫，是為自由市場經濟創造所有制的條件，即擴大私人所有權的範疇。在這裏，新自由主義暗示：私有制等同於以民主政治為背景的自由市場經濟。但這個暗示是騙局。

中國歷史數千年，實行的全是有自己特點的私人所有制，而專制制度就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上。鄧小平對此看得極其清楚。他相信，中共獨裁集團完全可以通過由貪官、奸商、御用文人掌握的權貴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財產私有化，來維持專制政治，而且這種經濟體制，比計劃經濟下的所有權模式，更有利於強化專制政治的統治基礎。

當今世界上，中國九億農民乃是少有的被剝奪了土地所有權的群體。在中國，土地名義上歸國家所有，國家又是共產黨的私產，而共產黨實質上由共產黨權貴階層所控制，所以，共產黨權貴階層乃是中國所有土地的主人，是當代最大的地主。如果新自由主義者真認為中國私有化的目的是實現自由市場經濟，那麼他們首先應當推行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即把名義上歸國家所有的土地，分給農民所有，否則，剝奪了九億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怎麼可能實現真正的市場經濟。但是，新自由主義者決不會這樣作的。因為，土地一旦歸農民所有，權貴階層就再也不能把對土地的任意支配權轉化為他們個人的財富了。這正是，權

貴所不欲，新自由主義必不為。

亞里斯多德曾提出，中產階級占絕對多數的社會最穩定而富於理性。新自由主義者便把這個理論演繹成前述第三項經典謊言。

一個理性、健康的中產階級只能通過公平競爭的現代自由市場經濟產生，而中國的權貴市場經濟唯一的結果，便是權貴們的豪華生活和底層人民的苦難，便是財富和權利的極端的兩極分化——這不是理論的推演，而是事實的證明。

在此情況下，權貴市場經濟製造出的作為政治裝飾品的所謂中產階級，不僅永遠不能成為絕大多數，因為，兩極分化才是權貴市場經濟邏輯結論；同時也不會嚮往民主，因為，他們不是公平競爭的產物，而是腐敗權力的附產品。當民主與專制決戰時，“戀母情結”會使他們遠離民主。

謊言重重，遮天蔽日。新自由主義已然成功地欺騙了歷史，而歷史正在艱難地掙脫謊言。值此歷史艱難之際，人們發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領域的學術謊言，卻正在政治範疇內最深刻地傷害著中國的命運。

五、新自由主義與政治改良主義

改良，還是民主革命——這是現實對中國命運提出的無可回避的問題。

改良主義思潮論證，中共政權正在或者可以通過自我的政治改革，逐步由專制走向民主。民主革命意志則昭示天下，唯有通過全民的大反抗，以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一切方式，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才可能實現憲政民主，構建聯邦中國。

政治改良主義也試圖欺騙歷史，而被欺騙的歷史必定與罪惡和苦難同在。為了挽救歷史，必須撕裂謊言的鐵幕。

中國為什麼不可能走向政治改良之路？

中共建政五十七年，是用暴政的罪惡和人民的血淚書寫的歷史。中共官僚集團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必受天遣，不可饒恕。唯有通過歷史性大審判控訴如山如海的罪行，被中共暴政虐殺的正義和良知才能復興，死於暴政的八千萬同胞的冤魂，才能不再詛咒這個冷酷的國度，並得到安寧。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於中共暴政已經失去了自我救贖的政治道德基礎；歷史

只有通過對其罪惡的懲罰，才能回歸人性。

與權力腐爛同生共長的權貴市場經濟，使中共官僚集團墮落成只能聽懂物欲召喚的黑幫集團。這個黑幫集團殘存的主要政治意志，便是通過國家恐怖主義強化專制權力。因為，專制權力是權貴階層榮華富貴之所托，生死存亡之所依。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於中共暴政已經喪失了民主政治改良所需的政治良知和政治意志。

謊言可以欺騙歷史，命運卻仍然依照真實的邏輯運行。權貴市場經濟運行十六年來，儘管御用文人、官辦學者的謊言如火如荼，但諸種矛盾的積累卻勢如瘋牛狂奔，不可阻止，早已超越了政治改良的界限。政治改良必不可能，是由於中共暴政製造的政治、經濟、社會大危機，在呼喚民主大革命。

改良與革命之爭，絕非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屬於用溫柔的，還是堅硬的方式否定專制之爭。在中共暴政完全沒有民主意義上的政治改良能力和意志的情況下，改良主義政治幻想的廣泛流播，只能遲滯民主大革命的進程，為專制贏得更長的時間；要求人民與暴政和解的陽痿的“智慧”恣意氾濫，恰可麻痹全民維權抗暴的意志，為專制贏得更大的迴旋空間。

現代政治改良思潮是中共暴政生存權的辯護士，它存在的價值只表現為論證中共暴政繼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這才是問題的關鍵。而新自由主義的學術謊言，乃是當代中國政治改良主義的經濟學上的思想之源；政治改良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是新自由主義學術謊言的政治延伸。

在西方，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是關於自由市場經濟的一種學說，而自由市場經濟又與民主政治如影隨形；新自由主義被中國文人模仿到中國之後，竟成為權貴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成為替暴政粉飾太平，欺騙人民的思想佞臣——這個思想理論的悲劇的原因，可簡而言之：“橘在淮南為橘，生淮北則為枳”。失去民主政治制度依託的新自由主義，便失去了基本的理論良知。

自由，意味著豐饒的精神內涵。“文藝復興”運動湧現的“自由”，乃是創造自由人格、撞碎中世紀專制地獄之門的生命哲學；乃是崇尚人權，否定專制的政治哲學。或許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僅僅從文字的角度引發的同“自由”的相關性錯覺，使得新自由主義

在同新左派的論戰中，贏得了更多同情。不願深思的大眾，往往傾向於望文生義。殊不知，新自由主義在中國衛護的，並不是“自由”，卻是“自由”的死敵，極端專制主義。這個現象正以可悲的方式論證了亞里斯多德關於形式優於內容的哲學理念。

心有靈犀，心意相通——在新自由主義稱謂的啓示下，中國當代政治改良主義者紛紛自稱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的乾脆簡稱“自由知識份子”，以便盜名欺世，掩蓋其專制主義文奴的醜陋之心靈。於是，在真正自由的心靈因其追求自由而被關入鐵牢、被萬里放逐之時，又出現了自稱的“自由知識份子”與中共極端專制主義暴政和諧相處的奇觀：“自由知識份子”以專制政治為衣食父母，又以製造和傳播改良主義幻想回饋專制；暴政則以“自由知識份子”作為欺騙天下的政治花瓶，並給政治花瓶們充分的言論和行為空間，來表現其花瓶的價值。

如果林昭泉下有靈，得知被專制去勢的精神太監們竟也不知羞恥地自稱“自由知識份子”，她曾用青春的生命與暴政作百死不悔之決戰的鬼魂，定然會悲憤得願再死百次。

在一個謊言充斥的時代，所有高貴的概念都會蒙受侮辱。“自由知識份子”這個本應屬於反專制戰士的桂冠，卻由於被一群同暴政“和解”的改良主義文人盜用，從而蒙受血也難以洗盡的恥辱。

當代某些自稱“自由知識份子”的人們，竟爭先恐後，熱衷於充當極權專制的政治小妾，鎮日裏只顧假癡裝瘋，撒嬌賣呆，向獨裁者求“和解”之愛，與暴政調“和解”之情——只要想一想這種狀態，賈府門外的石獅都會嘔吐三日三夜。

盜取“自由知識份子”之名後，政治改良主義者便開始欺世。他們編撰了一系列改良主義政治哲學概念，儘管他們中絕大部分人的智商離哲學意境的距離，如有限至無限一樣漫長。

細數改良主義政治辭典，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特點：所有的概念都是，或者首先是對人民、或者是對被摧殘與被欺凌者提出的要求，其中最觸目的有五項，曰理性，曰中立，曰妥協，曰和解，曰多元化。

所謂“理性”，其實質就是人民受到暴政迫害、摧殘甚至虐殺時，只能在體現暴政意志的專制法律枷鎖內，絕對和平主義地表達卑微的不滿。

所謂“中立”，其實質就是在壟斷了權力、財富和知識的中共權貴集團荼毒天下蒼生，掠取社會財富時，“自由知識份子”應當採取超然於利用國家權力犯罪的權貴集團，和被害的廣大民眾之上的立場。如果同被害人一道譴責犯罪，則違背了“中立”的要求。

所謂“妥協”，其實質就是首先必須放棄對暴政五十七年間所犯的奴役人民罪、虐殺人民罪、思想滅絕罪、信仰滅絕罪、酷刑罪、掠奪人民和社會財富罪等反人類罪行的法律追訴權，然後才可以同中共進行政治談判，否則就是煽動仇恨。

所謂“和解”，其實質就是當獨裁者還高踞於專制權力之巔，手握滴血的屠刀之時，訴求民主者必須謙卑地俯下身軀，去乞討獨裁者把“和解”賜給專制政治的受害人。而受害人則應寬容地忘卻專制的罪惡。

所謂“多元化”，其實質就是在中共權貴集團以國家恐怖主義的鐵血方式，剿殺一切非專制主義的精神存在和生命個性的時候，改良主義不去抨擊中共權貴集團對多元化的血腥否定，卻裝模作樣地要求人們預先肯定民主社會中中共也有生存的權利。

改良主義思潮竭力給人平和理性的印象，那種平和理性溫柔得似乎永遠不會放聲大笑或悲哭，但是，認真審視改良主義的諸種觀念便會發現，改良主義外表的溫柔之下，隱藏著冷酷無情的鋒芒。不過，鋒芒所向，皆是抗爭不屈的自由的心靈，而新自由主義，正在改良主義的銳利鋒芒上刺目地閃耀。

結語

當今之中共暴政的本質，乃是對外開放型的現代奴隸制。絕大多數中國人被剝奪了政治選擇權、精神自由權和其他基本人權，並被囚禁在專制鐵幕之下；中共權貴階層則用奴隸的血淚所創生的金錢，去收買各國的政客和資本家，為中共現代奴隸制的發展與強化，提供國際政治和資本的支撐點。

新自由主義以及政治改良主義則用改良的幻想，欺騙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從而遲滯了民主大革命的思想理論準備，使中共暴政得以數經危機，依然保持著行刑隊一樣真實的存在。

新自由主義欲用經濟的高速發展，來為自己作最後的辯護。然而，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苦難和不公正也在高速積累，社會大危機也在高速積累。而問題的關鍵更在於，經濟發展並不必然表明社會進步。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德國和日本的經濟也處於高速發展之中，結果經濟的發展為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當前，中國正循著與上述情況相同的歷史邏輯運行。

專制政治如果不能死於民主大革命，就必然從法西斯化和軍國主義的轉化中，尋找殺出政治、經濟、社會全面危機的血路。中共暴政一旦完成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轉型——這種魔鬼轉型正在進行中，整個世界都將為他們對中共暴政曾經的“綏靖”，而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中國人則將為他們曾被改良主義欺騙，而噬臍莫及。

為了人類免於被中共暴政拖入萬劫不復的戰爭災難，為了早日結束中國的苦難和罪惡，一切熱戀自由並關懷中國命運的人們，應當迅速鑄成民主大革命的堅硬意志，並以果決的行動，把這一意志推向歷史之巔。

中國的命運，人類的未來，都取決於中國民主大革命的成敗。

感謝捐款人

明辨、張翠南（意大利）、官平非
(2000 美元要求專款專用支持大陸國民黨)、**若冰** LE BAN YI GAO GEQING ZHU
LIU HUAN GU JIN（日本，尚未入帳）

新增榮譽訂戶

李暉、民樟、楊錚、張夏陽、羅澄
陳三民、鄒翔

說明：第 15 期公佈的三位榮訂周光亞、王以源、曾勇的款項已經入戶。

最近，以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史達林主義死硬派中共統治集團，頻頻出招，從高唱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到恩准紀念胡耀邦等種種“德政”，讓人眼花繚亂。對此，外行人霧裏看花，暈頭轉向。凡此種種，無不贏得幼稚者，大腦炎患者，或者居心叵測者們一片鬧哄哄的喝彩。

在這種升平氣象下，一個最容易被忽略，同時卻是最能迭顯以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共統治集團本質的事物，是胡記“重建馬克思主義工程”。顯而易見的是，這個工程將濫用國庫資源，以便最優先地強化極權主義國家的“國教”——“馬克思主義”的顯學地位。中共這一重大政治決策提出的直接政治文化背景，就是作為中共專制統治之思想旗號和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因為它已經在中國的土壤上遭遇崩潰的命運。

中共死硬派集團通過“重建馬克思主義工程”，將重新史無先例地大規模提升其國教“馬克思主義”的顯學地位。於是，在普通高校系科設置方面，已經日益遭到冷落的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從原來政治學下屬的二級學科分離出來，恩寵有加地被正式提高為國家一級顯學，和“建國”以來第一次被批准的一級學科，從而為一個正在走向全面崩潰的罪惡的政治道統招魂，並用以重建極權主義國家的精神支柱，繼續強迫人民洗腦。

按照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計畫，“重建馬克思主義工程”需歷時10年。頭三年要出階段性的成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直接控制下，在國庫的大規模優先撥款支援下，出版13本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基本教義。其中四本公共課教材的提綱已經政治局常委審定通過，三本基礎理論教材中的《科學社會主義概論》和六本重點教材中的三部提綱已通過了學術諮詢委員會的審查，正等待政治局常委審定。

通向地獄之路

二評中共死硬派集團“重建馬克思主義工程”

葉寧

課題組去年設定的啟動資金是2000萬圓，這樣，平均到每本書約為100萬元。課題組嚴書翰表示，一本書花這樣大的成本，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有的。根據嚴的測算，現在一般學者出一本書，五萬塊錢的成本足夠了，而他此前出版的供中央黨校使用的科學社會主義教材成本更大一些，10萬元也已足夠。顯然這一“重建馬克思主義工程”，既非普通意義上的學術活動，也非一般意義上的國家行為，而是“合法”地劫持國家公權神器，濫用國庫資源，用以強化黨文化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結黨營私的行為。沒有報導提到，作為象皮圖章的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將為中共政治局常委會的這項專橫跋扈的決定和措施背書。

二

由於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正式提升為國家一級顯學，從而需要相應地組建新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於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李崇富，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程恩富主持籌建工作。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將在今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時正式成立。該院將以“工程”的方式來進行大規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所以，這一工程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進行，日常的組織工作由中宣部負責，由一批資深專家組成工程諮詢委員會。中央黨校、教育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編譯局也成立了由主要負責人牽頭的領導小組，統一組織課題的研究工作。另外，包括

中央黨校、社科院和國防大學在內的全國七個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中聯部、中央黨史研究室、教育部和中宣部等，都承擔了相應的任務。新的學院將比原來的馬列所研究範圍更大、人力更強：原來馬列所的編制是 75 人，現在學院編定的是 200 人；學科建設更全面，將成立五個研究部，分別研究馬列原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十六大以來重大理論問題，國際共運史，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像越南、朝鮮、古巴等，各國共產黨的發展，以及世界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等。

由於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工程——極權主義，早已遭到被迫害人民的道義唾棄，因而深感失落的前朝或當朝專業馬克思主義近衛軍士們，竟由此突然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價值，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恢復了當年的“顯赫”。

關於“重建馬克思主義工程”目前的進展情況，首先是根據課題研究需要成立了相關的課題組，制定了規劃：“一共 20 多個課題組，每組約 15 到 17 人，有的年事已高的專家，要有工作班子協助工作，第一批專家隊伍有 200 多人，還在不斷擴大，現在大概有 300 多人。”

癌細胞再一次擴散。這一個來頭不凡，侵略性十足的“工程”，顯然已經決定要鯨吞更多鮮活的年青生命。它要野心勃勃地擴大隊伍建制：“在隊伍建設方面，提出了“四個一批”，即培養一批年輕的理論家、節目主持人、記者和編輯，第一批共 80 人已經選拔了出來。”（消息引自“博訊”轉載的《瞭望東方週刊》）

這個意在體現 21 世紀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的“重建馬克思主義工程”，其根本宗旨，是爲了使中共避免步“老大哥蘇共的後塵。”在胡錦濤的中國共產黨看來，蘇聯解體的教訓，最根本的是丟了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局副秘書長，工程的課題協調人楊金海先生的極富感情色彩的評論，較能集中反映主事者們的共同心聲）。他說，“在一些地方，馬克思主義的聲音比較弱，自由主義思想明顯。我們搞過一個調查，發現在有的大學裏面，講哲學的不願講馬克思主義哲學，講經濟學的不願講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大量的西方原版教材引入，沒有導論，也沒有說明，完全照搬西方，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亂。蘇

聯解體的教訓，最根本的是丟了馬克思主義。”（引自“博訊”轉載的《瞭望東方週刊》）。今天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提出並實施“重建馬克思主義工程”，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人今天決心，就是要“重撿(建)”早就被前蘇共丟棄的政治文化垃圾，以根本抵制、全面拒絕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與進步。

三

然而，在一個“馬克思主義”實踐已經徹底破產，“馬克思主義”已經遭到越來越多的人唾棄的時代，重新抬出馬克思及其跟班們的政治僵屍，與其說是凸顯了根本缺乏想像力的共產黨官僚們的豐富的政治想像力，還不如說是反映了死硬派史達林主義份子們敢於大開歷史倒車的兇悍之氣：他們試圖把中國大陸政治日曆的水銀柱，永遠凍結在 1956 年 3 月 16 日（蘇共 20 大）之前。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以胡錦濤“同志”爲代表的史達林主義死硬派中共統治集團推出的“重建馬克思主義工程”，標誌著北京的新領導核心，在統治方式上，與其前任發生了重大的歧變，儘管本質一脈相承。

在理論和意識形態問題上，後毛時代的中共一代統治權術大師鄧小平的一貫方針，是消極避戰，高掛免戰牌。這絕不僅僅是此君本人在理論問題上先天不足，而是這位老於世故的權術大師已經本能地、敏銳地意識到，以馬教作旗幟的中國共產黨整體缺乏理論和意識形態等政治文化軟體方面的優勢。作爲中共統治集團的實際黨魁和至高無上的精神教父，此君給他的跟班與繼承者們耳提面授的法寶是：凡事關“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多幹少說”，或“只幹不說”，理論上“不作爭論”。個中奧妙，居然今天無法爲他親手挑選的隔代“共產黨皇儲”所破解。

後毛時代的中共一代統治權術大師鄧小平深知，儘管中共掌握著包括國家暴力機器和全國性硬體資源的絕對優勢，但它絕對沒有把握繼續掌握包括理論、意識形態、道義、合法性等軟體資源的優勢。在這一領域，鄧小平先生和包括中國被奴役的人民在內的政治反對力量，打的是一場麻雀戰，遊擊戰，非對稱性的超限戰，如果無法避戰的話。這樣做，會使得中共的敵人在這一可望取勝的領域對他狗咬刺蝟，無處下

嘴。顯然，後毛時代的中共一代統治權術大師鄧小平深知馬克思主義本身到底是什麼東西，因為他勸告非洲的左傾總統“不要搞社會主義”。所以他才試圖讓一個擁有巨大獨佔利益的極權統治集團和一個了無生機的僵化意識形態適當保持距離，不讓活人受死人之累。這是鄧小平的高明之處。

今天這種包括理論、意識形態、道義、合法性等軟體資源方面的優劣態勢改變了嗎？沒有。我們看到，在“誰是新中國”、“九評共產黨”等思想理論歷史專著和系列文章刊出並廣為傳播後，掌握著包括國家暴力機器、全國性硬體資源的絕對優勢的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便立即陷於無法應對的尷尬處境。不管中共喜歡與否，形勢比人強。所以，在實際生活中，中共於理論、道義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絕對劣勢，便迫使中共退回鄧小平“不爭論”的蝸牛殼裏。然而，中共今天明明面對如此險惡的理論劣勢現實，但以胡錦濤先生為代表的中共統治集團卻偏要突發奇想，在一批早已脫離實際、只會誤導好大喜功的君王“何不食肉糜”的酸儒們挑逗下，竟然要來挑起一場理論大戰，把被冠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治文化豆腐渣，拼湊成方陣，與人民對決。這種把一心要長命的中共和臭不可聞的政治意識形態僵屍——馬克思主義理論捆綁在一起的輕率做法，對中共統治集團，絕對不是好兆頭。因為一旦馬克思主義理論再次成為箭靶而遭到毀滅性批判，被綁在一起的中共必將連帶遭殃。

四

對反文明、反自由、反人道、反人類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實施催枯拉朽般的毀滅性打擊(批判)，附帶提出一個嶄新的、具有革命和建設性的新思維及其較為完整的方法論體系，也許並不需要十年時間，甚至十個月就足夠了。因為，今天以胡錦濤先生為代表的中共統治集團，為中國終究要來臨的歷史性變革，在無意識地創造著歷史的契機。

何為卡爾·馬克思？不過是一個渾身上下，每一個細胞都帶著反人類、反人道、反文明的基因的一無是處的惡魔。一個從少年時代就對人類毫無善意，反而立志要摧毀人類、踐踏文明的“假先知”，典型的撒旦而已。當然，至於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

當人們分明面對著馬克思主義實踐給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東方世界泰半人類帶來的空前浩劫與慘禍，使得超過一億的生靈塗炭，某些人卻依然執迷不悟，甚至還在用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調，要為這一政治僵屍繼續害人打馬虎眼。他們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深厚的人道主義哲學，只是以列寧為代表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背離了這個老祖父的遺訓。

尤其滑稽的是，英國人在 1999 年竟然把這個人類第一號“假先知”列為人類社會 1000 年來最偉大的十大思想家之一。可見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商業發達、思想淺薄貧乏的西方世界，從未得到過認真的清算。

其實，馬克思主義既非哲學，更無人道可言，（有的只是可以由他本人申請專利的“次人道”體系。）至於說到散見於這位假先知早期著作中的“深厚的人道主義哲學”，就是被用來包裝真正屬於他本人的、誤導毒害人類社會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體系的“東西”，那版權完全不屬於卡爾·馬克思。

當然首開“打馬虎眼”的鼻祖，還是卡爾·馬克思本人：“我撒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至於說到我本人，我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龍種”未必是好種，但從馬克思主義那兒，確實不能指望收穫比跳蚤更好的東西。

“從好樹上結不出壞果子，從壞樹上也結不出好果子來。”（新約：馬太福音）只要正視一下馬克思主義實踐給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東方世界泰半人類帶來的空前浩劫與慘禍，與超過一億的生靈塗炭的後果，就可以對馬克思主義是一棵什麼樣的樹，有一個清醒的瞭解。限於篇幅，以下展開的理論討論只能是提綱式的：

一、馬克思主義的剖析

認識論：憑藉 19 世紀極其不發達的對“物質”的認識程度，宣告經典哲學在認識論領域的終極：粗鄙的物質主義一元論（“馬克思主義者”對此有爭議），在認識論領域提供否定自由和導向奴役的哲學基礎。

在此認識論基礎上發展出典型馬克思臉譜的歷史觀和宏觀社會發展觀，即：不可救藥的線性“決定”論，在歷史觀和宏觀社會發展觀方面提供了否定人類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的所謂理論，製造了導向人類普

遍遭受奴役而不可逆轉的偽哲學基礎。

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無法否定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正是近代自由資本主義的物質經濟基礎，才孕育著以突飛猛進的科學技術所帶動的巨大的生產力：現代人類自由的早期物質基礎。如果真誠地設定其研究物件為“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就應在研究的過程中自覺維護研究物件的完整性。但作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經典著作“資本論”，其副標題為“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其貫穿始終的目的論，卻是論證“剩餘價值”學說，即一種用來支持(流氓)無產階級革命，激勵(流氓)無產階級專政所提出的不正當權利訴求，從而用以割裂乃至否定“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邏輯混亂。馬克思用他獨特的話語系統否定了他為自己規定的研究對象，從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形式邏輯困境。馬克思用其哲學思辯慣用的詭辯，扭曲其本身規定的研究物件的完整性，以便抽象出旨在根本毀滅現代自由的經濟基礎的偽理論體系：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邊成了“半過程”：用對掠奪性破壞性的再分配的不正當訴求，來建構否定“另一半總過程”；以“剩餘價值”的必要提留，來作為自由經濟自身發展規律的正當性和內在合法性。而自由和自由資本主義本身迫切需要的，就是人類社會物質財富擴大再生產。但為了達到破壞自由、蒙蔽人類常識和良知的目的，這個半通不通的偽學者，竟然不顧形式邏輯的基本要求，硬把完全不在“總過程”以內的“所謂”“資本原始積累”生扯過來修補其理論漏洞。

“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其法哲學/國家學說：“深厚的人道主義哲學”曾經被撿過來，偷過來，後來卻被他踩在腳下，並代之以“九九歸一”。即：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內核與終點：流氓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今天正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一條裏面。

還有，就是：方法論和倫理哲學：……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禍害人類社會的，反民主，反自由，反文明，反人道——一句話，反人類的偽科學。是敵視和踐踏我們偉大的造物主所創造的一切良善事物與法則的魔道邪說。是一瓶反人類、反文明的極權政體用以強迫餵飼人民的、臭不可聞的”狼奶”。在今天創導重建“馬克思主義”，實為逆天而

動，與全人類為”敵”，也與中華民族為”敵”。

（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執業律師，多家中英文媒體資深評論員，享有盛譽的作曲家。著有：“權利宣言”、“自由法典”、“自由進行曲”、“安魂曲-不朽者的禮贊”、“1989—新世紀序曲”、“皎潔的月亮”、“鹿回頭”等。

印共叛亂史載入教科書

印尼左翼分子企圖平反受挫

【中央社雅加達十九日電】經過多時爭論後，印尼國民教育部確定，將把印尼共產黨叛亂歷史載入教科書中；此舉意味著已被禁止活動的印共支持者及左翼分子企圖透過修改歷史教科書為印共平反的努力已受挫。

國民教育部歷史教科書標準化專家小組主委蘇利奧教授宣佈，將於 2006 年開始，在歷史教科書中更廣泛地載列印共在印尼現代史上進行叛亂事件，包括 1926 年在蘇門答臘西部，1946 年在西爪哇井裏汶，1948 年在東爪哇茉莉芬，以及 1965 年 9 月 30 日叛亂。

蘇利奧說，印共一系列叛亂事件對印尼歷史造成極大影響（災難），這是不能忽視的重要事件，把這些史實載入教科書，旨在使學生瞭解及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事實證明：該意識形態曾在許多國家政治進程中成為暴力因素。他說，教科書只是忠實載列曾發生的事件，並不作任何詮釋。

國民教育部去年新編完成的新歷史教科書，由於把印尼獨立後於 1948 年及 1965 年發生的印共叛亂事件刪除，引起回教界激烈反彈。

今年 6 月，右翼回教領袖尤梭夫哈沁（前總統瓦希德的叔父）率領代表團會見國會議長阿貢，要求收回該新編教科書。稍後，國民教育部長蘇迪比約即下令收回已在多個地區試用的新編歷史教科書，並成立小組重新進行評估。



中華百年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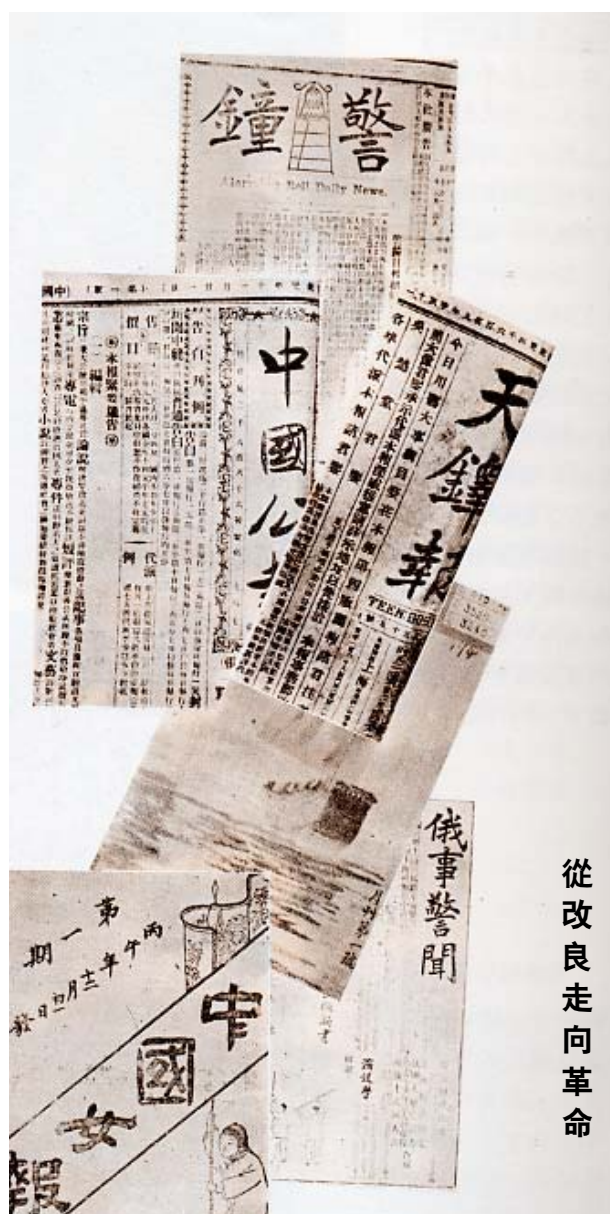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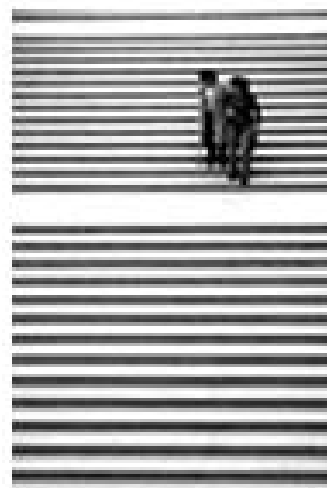
為紀念黃花崗忠烈獻身中國共和革命九十五週年作

辛灝年

漢家高樓墜洪荒，五十七年中華亡。¹
馬列橫槍血橫流，萬億漢兒魂不甘。
匈奴刀斧血色新，胡兒依舊逞愚頑。
滿朝腥雲赤俄種，一街狼犬狠毒貪。
山河已賤民更賤，家國已殘心更殘：
可憐海外棄婦心，有情有恨慕康梁。
情在江湖幽怨多，恨在革命星火燃；
告別革命忠腸表，栽賊辛亥意不慚；
反對革命聲氣急，千呼萬喚曾國藩。²
無奈江郎胡哥心如鐵，哭罷耀邦哭紫陽…
神州百年改良調，中華兒女不堪彈。

昔我孫文開共和，發軔革命起南洋。
羊城壯士不畏死，風氣未開多艱難。³
舉世只道康梁好，康梁一心在保皇：
恐懼革命驅滿虜，吹捧光緒世無雙；
誣指革命亂天下，天下大亂也勤王！⁴
勤王血染長江日，還朝美夢伴康梁。
康梁只圖花翎帶，朝思暮想在朝堂；
康梁只戀大清國，哪管漢民陷火湯；
康梁只恐大清歿，痛恨革命氣欲狂；
滿清朝廷終不改，康梁平生志不展；
合該滿虜命當絕，哭罷廢帝哭改良。⁴

共和從此開風氣，革命作我英雄膽：
拒俄翻作愛國潮⁶，反日掀起反滿浪；⁷
驅除韃虜舉漢幟，傾覆專制革命綱。
力山早絕康梁去，呼喊革命添闖將；⁸
天華躍海明壯志，喚醒滿奴四萬萬！⁹



從改良走向革命

鄒容赴獄志不改，革命軍旗卷大漢；¹⁰
 錫麟忠漢不忠賊，巡撫衙前挖心肝；¹¹
 吳樾堅懷荆軻志，出洋車上骨肉爛；¹²
 漢家兒女肝腸動，革命春潮晚來響；
 民族民權動心扉，歐洲學子隨中山；
 革命終為民生好，同盟聚義在東洋；¹³
 恢復中華建民國，海內海外同心幹！
 安慶新軍拋頭顱，廣州春血沃黃岡；¹⁴
 武昌城頭槍聲起，黃鶴樓上漢軍昂！
 滿虜朝廷因我哭，千年帝制由我亡，
 亞洲共和自我開，民國青天一片藍！
 藍天時有烏雲擾，共和路上多難關；
 歐洲王權多復辟，民主迭遭專制傷。
 獨我中華倡護國，反袁勝利再反張；¹⁵
 更有黃埔能披靡，北伐護法軍閥亡。
 民國從此向統一，民權民生步步瞻。

只恨赤俄野心熾，強輸馬列烏托邦。
 桃花源裏風乍起，輕薄少年夢黃梁；
 本姓華夏不姓戎，改宗馬列蔑夏商；
 世仇大敵渾不顧，甘心為奴新沙皇；¹⁶
 遂有國際號令緊，共產要逼共和亡。¹⁷
 猶添倭寇起禍水，黃皮賊心喜欲狂；
 明修棧道喊抗日，暗渡陳倉謀擴張；
 太行山高伏悍匪¹⁸，罌粟花香殺機藏。¹⁹
 外寇家賊相勾連，三國誌裏同滅蔣。²⁰
 可嘆民國將士忠，上下一心赴國難；
 可歌民國將士勇，血流無量戰疆場；
 可悲民國將士苦，抗戰勝利難還鄉；
 戰敗日寇迎赤寇，內戰烽煙望不穿。
 地崩山摧民國墜，共和被逼輸共產。
 匈奴桃花發嬌艷，華夏兒女血汪洋；
 馬教幽靈罩神州，漢家山河盡腥羶。
 直到國空民絕毛酋死，
 方有小平救黨無奈喚改良！

小平改良夢連連，洋務運動重開張；²¹
 小平改良夢翩翩，太后垂簾呼久安；²²



中國留學生呼喊反清革命的雜誌

小平改良堅不改，赤黨絕不下朝堂！
 民族民權渾不與，民生只為黨生忙。
 黔首十億夢初醒，伸手欲求共和還。
 可恨小平鐵血性，回報坦克機關槍。²³
 可憎赤黨貌猙獰：赤黨改良救赤黨！
 江郎受命危難間，腐敗治國玩股掌。
 儲君胡兒終躍馬，馬教祠堂頓上香。²⁴
 漢家宗譜焚抄盡，²⁵
 祖宗只認馬恩列斯毛鄧江！
 可憐馬列子孫十三億，
 怎比晚清覺醒漢家兒女四萬萬？！
 中華兒女哭同烈，不除馬列族不昌；
 中華兒女歌同恨，還我共和滅共產；
 中華兒女淚同乾，
 從此訣別馬列、專制和改良！
 百年歌罷豪情放，
 誓做完成中華共和革命好兒郎！



註釋：

1、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蔣介石曾公開指“共產革命為洪水猛獸，一旦得逞，將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地”。

2、1989 年後逃亡海外的前中共馬克思主義美學家李澤厚，曾及早地發表“告別革命”書，並率先攻擊孫文和辛亥革命，其後更有所謂體制內者公開發表“告別孫中山、回到曾國藩”的文章，歌頌康梁保皇和批判辛亥革命，遂形成一股頑強的“保共改良”風潮，不僅左右了海外的輿論，而且阻滯了海外革命意識的應有覺醒，甚至在長時期內成為海外民運的主流思潮。

3、1895 年，孫文已經創建的興中會在廣州發動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陸皓東等共和革命志士壯烈犧牲。當時因革命風氣未開，多為人所不理解，甚至將孫文等認作江洋大盜。直到 1900 年惠州起義之後，尤其是康梁武裝改良運動失敗，革命風潮始起。

4、康有為保皇黨攻擊革命的拿手好戲之一，就是攻擊“革命會造成天下大亂”。但是，康有為自己卻斷然不顧天下大亂，策劃了一起廣及長江沿岸七省的“武裝改良”、即武裝勤王以救光緒皇上，造成血流成河的局面，其規模比孫文領導和發動的任何一次革命起義都大，許多受騙的反清革命志士和反清會黨人士，包括改良人士，均為之而犧牲。康梁保皇派，亦因此而一蹶不振，許多原來意在改良的青年，亦從此訣別康梁保皇改良運動，而投身孫文的共和革命洪流；更有人以犧牲自己生命的壯烈行為，來表示自己與保清改良派決裂的決心，如徐錫麟、吳樾等。

5、1911 年 4 月，改良派聲淚俱下地聯合發表告全國書，宣稱對清政府的改良“希望全決”，並由此而倒向革命。廢帝，即指光緒皇帝。

6、1903 年 4 月 29 日(農曆 4 月 3 日)，因滿清與沙俄簽訂七項密約出賣東北主權，留日學生五百餘人在東京舉行拒俄大會，聲討沙俄侵佔東北。會後組織拒俄義勇隊(又名學生軍)，黃興、陳天華等二百餘人自動參加，準備開赴東北抗俄。但滿清政府竟指此次運動，名為拒俄，實為革命，電令清駐日公使會同日本政府嚴加彈壓。拒俄義勇隊遭到強行解散遂改名軍國民教育會。

7、1903 年初，留日學生已經開始覺醒反滿革命意識。2 月 20 日，日人準備在大阪博覽會內設立人類館，並稱將僱用“台灣之生番”，“於館內演出其固有特性及生息之程度階級並其惡風蠻習等，以供展覽”，引發中國留日學生的堅決抗議。4 月 26 日，日成城學校開春季運動會，會場高懸各國國旗，竟獨缺中國國旗，並宣稱：“凡世界獨立國均可於

此地懸旗。中國已降為各國保護國，安得懸旗與各國平等乎？”中國留學生三百人聚會抗議，並在日人被迫掛上中國國旗後，也無一人與會。但中國留學生的反日愛國運動卻遭遇清廷的壓迫，其後隨著抗俄運動的興起，和日俄兩國對中國領土的爭奪，直至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日俄戰爭，先後發生的反日和抗俄運動，遂匯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洪流。

8、秦力山原為年輕的改良志士，曾參與領導了康有為的武裝勤王，並在安徽大通率軍與清兵惡戰七天七夜，失敗後僥幸逃往海外，赴新加坡找到康有為，卻發現遲遲不匯款予國內勤王軍，從而造成各地勤王起義失敗的康有為，竟然在海外擁款自肥，過著花天酒地的日子，遂當場與康有為決裂，回到日本後即創辦了第一張公開呼喚反清革命的“國民報”，在留學生中造成很大的革命影響。

9、1903 年，留日學生陳天華曾出版“猛回頭”、“警世鐘”等書，主張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影響很大。1905 年，為反對日本勾結滿清政府、歧視和限制中國留日學生的反滿愛國運動，於 12 月 8 日在日本大森海灣跳海，以壯夫一躍的壯烈犧牲精神，號召國人起來革命推翻滿清洋人專制朝廷，為鼓舞國人參與共和革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0、年輕的鄒容是“革命軍”的作者，對掀起反清共和革命的風潮，功勳殊大。他因“蘇報”案而為清廷通緝，後主動投獄，志氣不改，病死獄中。

11、徐錫麟原為青年改良志士，後因目睹清政府實為假改革而真腐敗，遂轉身革命，以刺殺皇親國戚——安徽巡撫恩銘，標明他“訣別保清改良、擁護共和革命”的意志。他親手殺死了恩銘，被逮後拒不悔罪，被清廷下令在安慶安徽巡撫衙門前挖心剖肝，壯烈殉志。

12、吳樾亦原為青年改良志士，後決心拋棄改良、投入革命，謀炸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壯烈犧牲，轟動海內外，其感人至深之行為，成為有志革命青年的楷模。詳見本刊本期發表的“棄改良而獻身革命的壯士——吳樾”一文。

13、1905 年春，孫文自美國赴歐洲，於比利時、法國和德國首次向中國留學生講解他業已成熟的三民主義，歐洲留學生共有五十多人與孫文結盟，為數月後(1905 年 8 月)在東京創立中國革命同盟會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組織準備。

14、1908 年慈禧與光緒相繼而亡，已經建立秘密同盟會組織的安慶新軍遂發動起義，犧牲革命志士二百餘人，事隨不成，但震撼了海內外。這是由青年軍人發動的第一次革命

起義，被認為有力地撼動了清王朝的統治。廣州春血沃黃岡，即指震動全球的黃岡起義。

15、新創建的共和國發動護國運動，在近代歐洲走向共和的歷史中，屬於共同現象。但正式提出為共和國“護國與護法”的概念，則為孫文和中國人民首創。反袁反張，就是指中國人民為護國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反對張勳復辟滿清。其後中國人民反對北洋軍閥在中華民國的國號國統之下，“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之實”，則為護法。蔣介石領導中國國民革命軍北伐打倒軍閥，重建南京政府，統一中華民國，就是護法的勝利。

16、1840年鴉片戰爭後，沙皇俄國殺我人民最毒，掠我領土最廣，曾為我“世仇大敵”（蔣介石語）。其繼任者前蘇聯則承續老沙皇的衣鉢，卻在共產革命的旗號之下，在中國發動共產革命，建立、扶持和指揮中國共產黨，顛覆我共和的大中華民國，陷我中國於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至今而不能救。

17、中共為蘇共建立之後，其一切叛亂叛國叛族之行爲，無不為蘇共借口共產國際的命令親自指揮。參閱《誰是新中國》一書和大陸人民二十年來的諸多重大反思成就。

18、中共軍隊在抗日戰爭中不抗日，假抗日，游而不擊和專打國民黨抗日軍隊，已為歷史的事實所證明。毛澤東甚至對內宣稱，他們過去打蔣介石和將來打蔣介石，都要打運動戰，但是目前打日本卻不能打運動戰，但又隱藏在大山裏面積極地練習運動戰。其種種行徑，都是為了準備來日發動內戰打天下。請參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19、中共的歷史性謊言之，就是說它在抗戰時期曾為了堅持抗日而發展大生產運動。但是，中國大陸人民反思的結果則是，共產黨的大生產運動，是種鴉片、賣鴉片以準備內戰打天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並設有專門的鴉片生產委員會，政治局委員鄧發就曾當著毛澤東的面，告訴第三國際和蘇共中央《真理報》駐延安特派員佛拉基米諾夫說：“現在我們就是用賣鴉片得來的錢買武器揍國民黨！”而著名的南泥灣就是鴉片的生產基地，所謂“花籃里花兒香”的革命歌曲，唱的其實是“花籃裏的鴉片香”，八路軍的359旅就是鴉片旅，旅長王震則稱應該稱之為“鴉片將軍”。目前，更進一步得到證實的是，中國大陸學者張躍景教授已經親赴陝北找到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所指的“張思德同志”，原來並不是為燒炭而死，而是死於“熬鴉片”。請參閱大陸已經先後出版兩次的《延安日記》（佛拉基米諾夫

著）一書，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及其“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中共在抗戰中作做了什麼？”講演錄。

20、二十年來，隨著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的日漸深入，越來越多的史實已經足夠證明，中共曾在抗日戰爭時期與日本侵略者及汪偽政權相勾結，以共同對付正在堅持艱苦抗戰的國民黨政權。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也在他於1999年出版的廬山會議回憶錄中指證，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全會上親口說過，他和共產黨在抗戰中執行的路線，就是在日、國、蔣“三國誌”中，與日本軍隊一起夾擊抗戰的國民黨。並且要讓日本人多佔地，和日本軍隊佔領中國領土越多越好。

21、稍懂一點中國近代歷史的人，都知道，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就是當代版的“晚清洋務運動”，從思想到實際均無出其右。

22、鄧小平自改革開放伊始，就和慈禧太后一樣，不斷高喊要“長治久安”，凸顯前後兩家黑暗王朝的專制改良，其目的如出一轍。

23、1989年春夏之交，共產黨是用坦克車和機關槍公開地和殘酷地鎮壓了那一場民主改良運動。

24、由鄧小平隔代欽定的共產黨王儲胡錦濤，上台以後的一系列行爲，都意在表示，他仍然要在中國承續“馬列的思想政治統治”。從他公開聲稱“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到他大張旗鼓地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建設工程”等等，都證明他顯然是要將馬列的共產專制路線在中國繼續下去。

25、數千年以來，中國社會均有治“宗譜”的習慣，中國的家庭亦均有“家譜”代代相傳。唯中共非法奪取政權之後，藉口馬克思主義的“反封建”口號，並通過歷次殘酷鎮壓人民的政治運動，特別是中共文革中的“破四舊”，一方面以抄家為手段，焚抄民間家庭的家譜；一方面則因整個社會都陷於恐懼之中，人民也只能被迫將各自的家譜燒毀。以至在現今的中國大陸社會，其各姓後人，家譜盡失，幾乎都不知自己之“所來”。再加上中共代代都自認是“馬列子孫”，至今仍期圖“馬恩列斯毛鄧江胡溫……”地代代相傳下去，所以，中華民族實際上早已陷入了“亡族”之危險境遇。



拋棄專制改良 獻身共和革命的壯士



吳 樾

何 彤

華夏自古以來就不乏捨身取義的志士仁人。最有名的當屬荊軻之刺秦王，聶政之刺俠累，豫讓之刺趙襄，專諸之刺王僚。延之滿清末造，隨著滿清愚民囚籠政策的日漸式微，以及受東鄰幕末維新志士，俄國民意黨人的事跡影響，中國傳統任俠精神與近代民族解放理念的結合。以國父孫先生為首的革命黨掀起了反清光復的高潮，其中湧現出了一大批精忠報國的勇士從事暗殺活動。

吳樾字夢俠，後改孟俠，皖北桐城人，八歲喪母，家有弟兄五人，為其二兄所撫養。後兩位兄長病故，迫於家計，奔波於「凡塵間」。然自幼好古文，諸子百家之說均有涉獵。猶好古詩文，但極惡八股之術，不願入仕。20 歲又東遊浙江滬一帶，目睹江南「開化之風」。後又由堂叔吳汝綸推薦與 1902 年入保定高等學堂就讀，廣閱革命書籍，如《革命軍》，《警鐘報》，《自由血》，《黃帝魂》，《楊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略》等等，思想為之一變，由立憲轉向光復，並自此廣結志士。最好的幾個朋友有，湘人陳天華，楊篤生，蘇人趙聲，魯人張榕，浙人蔡元培，章炳麟，秋瑾，皖人陳獨秀，每每與之相遇則必「深談午夜夜而不寐」。吳樾在趙聲，楊篤生的介紹下，由楊監督與馬鴻亮等加入革命組織「北方暗殺團」任支部長，並由蔡元培介紹加入光復會。

1903 年 4 月 29 日(四月初三日)，因滿清與沙俄簽訂七項密約出賣東北主權，留日學生五百餘人在東京舉行拒俄大會，聲討沙俄侵佔東北。會後組織拒俄義勇隊(又名學生軍)，黃興、陳天華等二百餘人自動參加，準備開赴東北抗俄。但滿清政府竟指此次運動，名為拒俄，實為革命，電令清駐日公使會同日本政府嚴加彈壓。拒俄義勇隊遭到強行解散遂改名軍國民教育會。

7 月 5 日，軍國民教育會在東京集會，通過改組軍國民教育會意見書，改「實行愛國主義」的宗旨為「實行民族主義」。綱領有三點，第一起義，第二暴動，第三暗殺。組織極為嚴密，所有成員必經嚴格篩選，皆有徽章以供識別聯絡，為圓形鑲制徽章如墨西哥鷹洋大小，一面為軒轅黃帝頭像，一面撰刻誓詞：「帝制五兵，揮斥百族。時維我祖，我膺是服。」聘俄國，日本教官教習格鬥，爆破，刺殺，軍械各種技能，並派人回國聯絡各地志士，共同反清。軍國民教育會決定：王維沈、董鴻禔去南洋活動；龔寶銓到滬，陶成章到浙一帶活動；黃興、陳天華回湖南活動。黃興回湖南的這一路同志經多方活動，在 1903 年 11 月 4 日以慶賀三十大壽為名，邀約劉揆一、陳天華、章士釗等共 12 人在長沙保甲局巷彭淵恂家集會，商議籌設革命團體等事項。會上決定成立華興會，對外稱「華興公司」，以「興辦礦業」為名，入會者均稱人股，「股票」即會員證，並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為口號，隱含「撲滅滿清」之意。日後兩湖的日知會，科學補習所一系列組織皆出於華興。另一路，龔寶銓返滬後建立了「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後陶成章、龔寶銓會同上海的蔡元培等改暗殺團為光復會。蔡元培為會長，口號是「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日後的紹興大通學堂等兩江、閩浙一帶的革命組織大多出自於光復會系統。接受過刺殺滿清浙江巡撫的任務。當然還有一些相對獨立的組織，比如安徽陳獨秀任會長的岳王會，以武穆精神為號召，在安慶新軍中擁有極大的實力。陳獨秀與蔡元培在組織關係上皆是暗殺團的成員，蔡是爆破組的主要負責人，陳、蔡同在上海愛國女校與章士釗、楊篤生、鍾憲鬯、俞子夷試製炸藥和

彈殼。日後北大的校長，教授，五四時的旗手，就是當日一齊在刀尖上舔血的戰友。同盟會裏的兩大派系皆是出自於暗殺團的班底。

吳樾自加入暗殺團後，以民族解放、光復漢室爲己任，精練各種技術，同志趙聲[江蘇鎮江人]擅武藝，槍法猶精，左手槍百步穿楊，精詩文，曾組織南京鼓樓崗附近的北極閣集會，開創了中華大地利用聚會和公開演說形式，鼓動革命，抨擊時弊，宣傳群眾的先河。並作《保國歌》「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個保國歌；中國漢人之中國，民族由來最衆多……仔細聽我保國歌，天和地和人又和，取彼民賊驅異類，光復皇漢笑呵呵！」《保國歌》用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七字唱詞形式寫成，全文共

134句，近千字，語言激昂慷慨，讀了悲壯感人。和陳天華的《警世鍾》、《猛回頭》以及鄒容的《革命軍》一樣，對於喚起民眾起到了巨大的宣傳推動作用。僅章士釗在上海就密印了數十萬份。另一同志張榕，祖籍山東，客籍遼東，原漢軍旗人。祖上世代爲滿酋努爾哈赤守陵，家資巨富。後張榕幡然覺醒，毅然棄旗歸漢，力求殺敵以贖祖先之罪。他精於刀術，曾戰勝日本黑龍會二刀流的高手，轟動東京。吳樾師從楊篤生學習炸彈爆破技術。當時主要炸彈技術有兩種，一種是銀藥法，以水銀置彈內，拋擲時產生巨大威力，不過水銀易與硝酸發生反應，使用時不安全，楊篤生的左眼也曾在試製時受傷，故不用。另一種是用普通黃炸藥置彈內，用導火線激發，任嫌不足。後採取撞針式法，拋擲後以撞針接觸激發。吳樾於楊篤生於北京西山八大處山上多次練習，手法漸熟。還曾因此被巡山清兵盤查，從容而脫。

暗殺前的國內局勢；隨著國內外革命黨人實力的逐步增強，清庭朝內的政局也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一

派是以慶王、袁世凱爲首的北洋派，一派是張之洞、岑春煊地方派系，中樞的瞿鴻機的清流，還有就是鐵良他們的滿洲少壯派。雖說派系不同，但以改良來對抗日益膨脹的革命勢力是他們的公識。祇不過滿洲親



壯士吳樾

貴是想借改良來防漢，漢人重臣是想借改良來擴充自己的實力。與此同時，流亡海外的康梁一黨也打出保清立憲的招牌，想以此重回清庭權力核心。各種勢力的合流，造成當年立憲呼聲甚囂塵上，革命黨人處境相當困難。吳樾對此深表憂憤。他說寧願吾國民爲懵懵不醒之國民，也不願吾國民爲半夢半醒之奴隸。因爲懵懵不醒之人一旦猛醒皆會復九世之仇，光復漢室。而半夢半醒之奴隸，名義上爲立憲保國，實際上不過是滿清鷹犬，立憲派以馬爾

尼加富爾自居，實際上比吳三桂，洪承疇而不若。保的是滿清不是漢族。因此他提出殺一警百，以儆效尤的計劃。在革命黨暗殺名單上排名靠前的有下列幾人：奴漢族者那拉氏，亡漢族者鐵良，封疆大隸袁世凱，張之洞，岑春煊。

1904年冬，王之春在上海謀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被捕。1905年科學補習所成員王漢在河南彰德謀刺清戶部侍郎鐵良未中殉節。消息傳來，吳樾慨然說，萬王二子事跡非勉他人，乃勉我爾。吳樾在保定創上下兩江公學，辦直隸白話報宣傳革命。交友廣闊，與各方義士日夜密議，決定入京刺殺鐵良。因爲鐵良是滿洲少壯派的領袖，收刮東南各省的財富，提取上海江海關的幾十萬兩銀子，又電告日本方面祇許滿洲流學生學警察，不許漢族學生學軍事。又編練京師八旗兵來防備漢人。在論及殺鐵良的後果時，他說：「逆賊鐵良一殺，而載振、良弼輩必起而大行壓制之手段，將不盡滅我漢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斷言曰：『幸事，幸事！』」

因為滿漢衝突愈烈，革命倒滿愈有厚望。所以，他要「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滿酋雖眾，殺那拉（慈禧）、鐵良、載湉、奕劻諸人，亦足以儆其餘，滿奴雖多，而殺張之洞、岑春煊諸人，亦足以懼其後。殺一儆百、殺十儆千……。」因此以它為目標。

吳樾臨行前曾與趙聲（伯先）、陳幹生（獨秀）密計於蕪湖科學圖書社小樓上。趙與吳互爭北上任務。吳問：『捨一生拚與艱難締造，孰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吳曰：『然則，我為易，留其難以待君。』議遂定，臨歧置酒，相與慷慨悲歌，以壯其行。吳樾草擬了萬言《意見書》，謄清後交張嘯岑一份，鄭重囑咐張，他若離開人世，「萬一無法發表，便交湖南楊篤生先生，或者安慶陳仲甫先生」。吳因保定學堂畢業必由滿清大員到場授與出身，吳樾不願受清庭之封，遊歷遼東與張榕結伴到京師，密圖行動。經堂姐吳芝瑛結識秋瑾，結為知己。恰逢清廷為了敷衍求變的潮流，乃同意君主立憲，先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搜集資料。吳越為撕破滿清政府假立憲的騙局，而「寧犧牲一己之肉體。」並說：「予願死後，化一我為千萬我，前者仆而後者繼，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為有濟也。」遂決定改變計劃行刺五大臣，決定在火車站動手。吳先與秋瑾至前門火車站踩點，後秋瑾先回南方籌備，吳樾寫好了一紙遺囑交給她，說：「不成功，便成仁。不達目的，誓不生還。」吳在安徽會館等待時機，在此期間，吳樾寫下了《暗殺時代》等十三篇文章，篇篇有血，字字有淚。特別是其中寫給未婚妻的與妻書裏，吳樾馳書未婚妻子，拋開個人私情，從容論述生死大義。函中要求未婚妻學習法國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 原名 Jeanne-Marie Phlipon, 1754-1793)，並有「吾之意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耳」之語。從吳樾給未婚妻的兩封信可以看出，他們兩人對激烈行動、暗殺計畫有過討論，夫人亦賦詩三絕以壯其行。

1905年9月24日，輔國公載澤、兵部侍郎徐世昌、戶部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五大臣正式出洋考察。在此前一天，吳樾由隨同五大臣一同出國考察臥底的楊篤生那裏得知了詳細的出行計劃，與同志張榕在安徽會館設宴招待各方友人，席間慷慨悲歌，舉止豪放，有人不解其義，問

之，云不日將有所圖，人皆讚之。庶日懷揣楊篤生事先制好的炸彈離開會館，留置一信於枕下，詳書其此次行動的緣由，並說與會館眾人無關。以便萬一事泄，不拖累旁人。五大臣原定十點出發，鐵路局預備的專車一共五節，前面兩節供隨員乘坐，第三節是五大臣的花車，第四節僕役所乘，最後一節裝行李。一大早就在前門車站，八點剛過，送行的人陸續到達。首先到的是徐世昌，接著是紹英、端方、戴鴻慈，最後到的是載澤。吳樾穿的是學堂的操衣，被攔不得入內。他急購一套清隸僕役的衣服；藍布薄棉袍，皂靴，無花翎的紅纓帽。混入僕役之中進入車站上了第四列車，張榕在他的身後，因送站的人多，被隔在了遠處。在試圖由第四列車箱進入中間花車五大臣包廂的時候，被衛兵攔住，因他口音不是北方話，引起了衛士的懷疑，正糾纏間，又上來幾個兵卒。吳樾見此就衝進花車，借火車開動之際引爆身上的炸藥與五大臣同歸於盡。電光閃過，倒退車頭接上了車廂，力量猛了些，五節車一齊大震，砰然巨響，車廂頂上開了花，硝煙之中飛起來碎木片、鮮血、斷手、斷足，嘩啦嘩啦地落在車廂頂上，好一會才停。共斃傷數十人，內有端方親屬，徐世昌，戴鴻慈因有僕人王是春在前頸受輕傷，頂帶花翎皆被削去。紹英受傷較重，載澤用一隻受傷的血手，摸著自己的脖子問：「我的腦袋呢？」烈士吳樾當場殉節。張榕因離得較遠，加之楊篤生掩護，趁著混亂脫險。

事後，京師全城戒嚴，慈禧一面下令追查，一面傳旨為防止有人攜炸彈等物潛入頤和園，故將圍牆在原有高度上又增加三尺有餘。園內設電話；增派駐軍晝夜巡邏。現在，人們在北宮門兩側圍牆上看到的痕跡，就是那次增高留下來的。查辦方面由肅親王善耆和趙秉鈞負責，他們從吳樾烈士屍骸上找不出線索，就用玻璃棺用藥水保存，找人認領，想從中發現線索，攝成照片，印了數百份，分發給所有的便衣偵探，到客棧、會館、廟宇，以及任何可以作為旅客逗留之處去查、去問。問來問去，終於問出結果來了。在桐城會館有個小女孩，認出他就是在會館住過的桐城世家子吳樾。桐城會館的執事吳士祿被捕召出張榕。因事前吳樾留有遺書，因此會館中大部同鄉都已避去，並未牽連他人。探訪局的總辦，名叫楊以德，原來是天津老龍頭火車站的司事，職掌剪票。養成一

樣特長，識人之面，過目不忘，數日後趁張榕熟睡，合數人之力，才把他拿獲。在獄中張榕除坦承與吳樾認識之外，一字不招，乃被判入獄。

吳樾刺五大臣的事跡迅速傳遍天下，同盟會的天討號增刊把他的遺著全部發表，追認他為盟友。

友人趙聲詩曰：

淮南自古多英傑，山水而今尚有靈。
相見塵襟一瀟灑，晚風吹雨大行青。
一腔熱血千行淚，慷慨淋漓為我言。
大好頭顱拼一擲，太空追攫國民魂。

知己秋瑾詩曰：

昆侖一脈傳驕子，二百餘年漢聲死。
低頭異族胡衣冠，腥膻污人祖宗恥。
忽地西來送警鐘，漢人聚哭昆侖東。
方知今日豚尾子，不是當年本漢風。
裂眦齧指爭傳檄，大叫同胞聲激烈。
積恥從頭速洗清，毋令黃胄終淪滅。
大江南北羣相和，英雄爭挽魯陽戈。
廬梭文筆波蘭血，拼把頭顱換凱歌。
年年歲月駒馳隙，有漢光復總無策。
志士備呼東誨東，胡兒虎踞北京北。
名曰同胞意未同，徒勞流血歎無功。
提防家賊計何酷？憤起英雄聲皖中。
皖中志士名吳樾，百煉剛腸如火熱。
報仇直以酬祖宗，殺賊計先除羽翼。
爆裂同拼殲賊臣，男兒愛國已忘身。
可憐憐憐天竟瞽，致使英雄志未伸。
電傳噩耗風潮聳，同志相顧皆色動。
打破從前奴隸關，驚回大地繁華夢。
死殉同胞剩血痕，我令痛哭為招魂。
前仆後繼人應在，如君不愧軒轅孫！

陳獨秀詩曰：

伯先京口誇醇酒，孟俠龍眠有老親。
仗劍遠遊五嶺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陳其美詩曰：

烈士是以起，殺賊紅塵裏。
一擊天地崩，餘響復振耳。
憤東未及展，武士不暇威。
丑類四方竄，血肉風雨飛。
賊膽一已破，君軀一已殞。
不惜一士命，惟於戒來軫。

又云

我愛吳夫子，視死忽如歸。
慷慨赴大義，初陽生光輝。
志士赫然怒，有家且不顧。
使吳君而在，執鞭所欣慕。

補續主要人物結局：

吳樾 [漢族]

烈士成仁後，被滿清拋屍荒野，幸有志士金某保全屍骸，民國後，吳樾之弟詢其遺體以公葬，蔡元培主祭。安徽有義士修吳樾路於安慶中心，以茲紀念。吳之未婚妻得悉夫君殉國，慷慨自刎以殉。另按清制，犯人的名字中要加一偏旁部首，以示污辱。吳樾名字中的「樾」之「木」即為此故而加，然今日，「樾」字反而體現其精神之光榮，故而文中皆用「樾」字。

張榕 [漢族]

1908 年越獄逃亡日本，入士官學校，習軍事，參加同盟會。武昌起義後，曾組織東三省"聯合急進會"會長，手握重兵，準備發動武裝起義，1912 年 11 月被清將張作霖暗殺。有《遼鶴集》。

趙聲 [漢族]

與孫中山「親如手足」，「甚為器重」，任香港同盟會會長。醞釀廣州起義，被推舉為總司令。起義失敗後，趙聲痛不欲生，不久病逝於香港。死前長吟杜甫「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詩句，淚隨聲下，臨終前呼：「吾負死難諸友矣，雪恥君唯等！」1912 年，孫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追贈趙聲為「上將軍」。同年 5 月，其靈柩歸葬鎮江南郊竹林寺，並開追悼大會。

於琴園。墓前置石碑坊，橫額有「浩氣長存」四字，陵前樹正碑曰：「大烈士丹徒趙伯先之墓」。

楊篤生 [漢族]；

曾與蔡鍔、黃興等發起組織「湖南編譯社」，華興會，光復會，同盟會皆是主要領袖。後遊學英國，1911年6月13日，因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憂同志犧牲，憤清廷腐敗，赴利物浦投海自沈。

秋瑾 [漢族]

聯絡浙省革命志士和會黨成員，組織光復軍，與徐錫麟策劃皖浙同時起義。並以大通學堂督辦職務之便，以該校為中樞，往來杭滬間，活動軍學界，運動會黨。4月正式組建光復軍八軍，推徐錫麟為首領，自任協領，並導擬軍制、軍旗、軍服。約定先由金華府發難，處州府立即響應，會紹興光復軍襲取杭州，計劃若受阻則出江西以通安慶，會合徐錫麟，合力攻取南京。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倉促起事，被捕遇害，浙江之嵊縣、武義、金華、蘭溪等地光復軍在中、下旬亦相繼失敗。奸人胡道南密報清廷，清兵於14日包圍大通學堂，秋瑾與少數學生持槍抵抗。被捕後堅貞不屈，次晨於紹興軒亭口慷慨就義。著述被輯為《秋瑾集》。

陳獨秀 [漢族]

1905年夏，早年的陳獨秀以岳飛精忠報國的精神為號召，在蕪湖與柏文蔚等人創辦了安徽反清革命團體岳王會，他被推舉為總會長。岳王會還設分會於南京、安慶等地，並成立了同心會、華族會、維新會等外圍組織，並在新軍中大力發展會員。同盟會成立後，岳王會接受同盟會領導。民國後應暗殺團上級蔡元培所召，赴北大任教……。



秋瑾

「寶刀歌」



漢家宮闕斜陽裏，五千餘年古國死，
一睡沉沉數百年，大家不識做奴恥。
憶昔我祖名軒轅，發祥根據在昆侖，
闢地黃河及長江，大刀霍霍定中原。
痛哭梅山可奈何，帝城荆棘埋銅駝，
幾番田首京華望，亡國悲歌淚涕多。
北上聯軍八國眾，把我江山又贈送，
白鬼西來做警鐘，漢人驚破奴才夢？
主人贈我金錯刀，我今得此心雄豪，
赤鐵主義當今日，百萬頭顱等一毛。
沐日浴月百寶光，輕生七尺何昂藏，
誓將死裏求生路，世界和平賴武裝。
不觀荆柯作秦客，圖窮匕首見盈尺，
殿前一擊雖不中，已奪專制魔王魄。
我欲隻手援祖國，奴種流傳徧禹域，
心死人人奈爾何，援筆作此寶刀歌。
寶刀之歌壯肝膽，死國靈魂喚起多，
寶刀俠骨孰與儔，平生了了舊恩仇。
其嫌尺鐵非英物，救國奇功賴爾收。
願從茲以天地為鑪陰陽為炭兮，鐵聚六洲。
鑄造出千柄萬柄寶刀兮，澄清神州。
上繼我祖黃帝赫赫之威名兮，
一洗數千數百年國史之奇羞。



很長一段時間內，康有為是作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的對立面的。然而，斗轉星移，八、九十年代之後，當人們開始“積極”評價改良和漸進改革的意義時，也對康有為為首的變法活動給予了“積極”評價，把他看做一個愛國的改革先驅。但很快，康有為的人格又遭到了懷疑，康的狂妄，虛驕，功利都成為被詬病的對象，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中康有為的形象頗為不堪，便是這股潮流的藝術體現。

事實上，通過對歷史資料和研究著作的解讀可以發現，不論在當時還是後來，在真正清醒的旁觀者和研究者的眼中，自稱為“聖人為”的康有為從來都不是一個光輝的形象，也就是說，以康有為的人格和能力，他所能“騙”的人也都是很有限的。

康有為的功利心，首先表現在對權貴的巴結。1888年，康有為去北京參加鄉試時“遍謁權貴”，以求上書推進變法，結果被北京的保守官僚們拒絕。一方面，康有為的思想不可能為保守的滿清官僚接受；另一方面，他的阿諛奉承，“囂張卑鄙”，也引起了官僚們的反感。當時的京官們都覺得康有為是“託名西學，希圖利祿”，過度熱衷功名。1895年公車上書後，康有為已經是名滿全國的維新領袖，他帶領弟子梁啟超建立強學會，創辦《中外紀聞》，表面上看，他成功地網羅了一批重要官員，組成強學會的幾乎全是清政府中有改革思想的新權貴，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和直隸總督王文韶各捐了5000兩銀子贊助強學會。但據康有為本人在《康南海自編年譜》中的記載，他很快就失望地發現，開明官僚如丁日昌、張之洞的贊助不過是想“藉以漁利”而

已，也就是說，儘管康有為刻意巴結高官，他們卻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盤，並非改革的忠實盟友，張之洞後來的翻臉果然證明了這一點。

因為上海是當時中國最西化、思想最先進的地方，擁有眾多熱情支持變法的紳商富賈。康有為當然也希望得到上海商界的 support。但據啟蒙思想家，廣東籍的上海紳商鄭觀應在一封私人書信中指出，“滬上強學會，南洋士大夫多列名助款，惜辦事者無條理，

不允選舉商董協力維持。”商人出了錢卻不能參與管理，豈不等於是冤大頭？康有為雖然提出了很多有利於發展現代經濟的改革建議，但在現實中，卻始終不能擺脫傳統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運和皇帝、官僚連在一起，對商人懷著根深蒂固的輕蔑。他熱衷於利用新興的社會階層的經濟力量，但卻全然不顧他們的權益。而當時上海紳商雖然在道義上支持變法，但對康有為個人的評價並不高，對變法的成功也並不樂觀。康廣仁曾經勸兄康有為“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辦報，激勵士民愛國之心，養成

多數實用之才，三年後大行改革等法。”1898年6月16日，康有為在即將接受光緒皇帝召見前，特地面晤鄭觀應，問，“政治能即變否？”鄭當即指出，“事速則不達，恐於大局有損無益，譬如拇指與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舉重否？”可惜，康有為哪願再等三年？當時旁觀者已經看得非常清楚的形勢，康有為卻一定要逆流而上，孤注一擲，其政治頭腦和能力不待後世批評，就已有定論。其主觀武斷，就連梁啟超亦不諱言：“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其對於客觀之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¹⁾

康有為

是

聖人

嗎



瀚文

但是，鄭觀應仍然在變法失敗後努力保護康有為在上海的弟子，並送給避難於澳門的康有為之父一百元。在康有為流亡海外後的 1900 年，正是上海的紳商發起一系列政治活動，試圖阻止慈禧太後廢光緒帝的陰謀，其中上海工商界領袖經元善還因此被清政府通緝，被迫流亡澳門。立憲運動和共和革命中，也都少不了全國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身影。看似精通日本明治維新的康有為只注意日本的體制變革，而忽略了其社會因素，他似乎沒有弄明白，在日本變政成功背後的，正是企業精神的勃興，工商階層的積極支持和參與。康有為面對中國新興的工商階級卻不去爭取，其勢利和缺乏遠見可見一斑。

最初經張之洞介紹後結識康有為的經元善，對康有為的印象也並不好，他在致康有為的一封信中說：“惟采諸輿論，清濁兩途皆有大不滿意於吾公之處。靜觀默察，方知吾公尙少閱歷，且於謙恕慎三字未能真切體驗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亟須內省自訟，不必尤人”。(2)

這封信中暗示出這樣的情況，康有為先寫一信給經元善，對維新運動的推動不力大有抱怨不滿之意，經元善則在回信中明確指出康有為的缺點是太急功近利，如果說，十年前康有為在北京的時候，京官們對他的負面評價可能是守舊者的偏見和誤解，那麼一個支持變革的上海企業家表達完全一樣的看法，就只能說明這是事實了。而“清濁兩途皆有大不滿意於吾公”之一語，點明了康有為當時的真實處境，除了幾個後生晚輩把他奉為“聖人”，搖旗吶喊，在新舊兩面他都沒有什麼真正的支持者（譚嗣同“沖決網羅”的堅定性和否定皇權專制的徹底性早超過了康有為，最鐵杆的梁啟超後來也一度接近孫中山，差點棄康而去！）康有為的孤立，不能再歸咎於社會的保守，只能說明他的人品和個性的確存在某種問題。康有為當時已四十歲左右，大名鼎鼎，經元善卻說他“尙少閱歷”，幾近於毫不留情的挖苦。當然，作為文人，驕傲自大甚至希圖名利都在所難免，但此時的康有為也已經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作為一個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從事政治反對活動的領導人，如果不能以自身的人格力量爭取最大限度的支持，一味浮躁冒進，無異於死路一條。而上海紳商對康有為的活動持觀望態度，也表現了對他的能力和行事方式的不信任。

對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和後來的保皇活動持懷疑態度的，還不止上海商人。當年在日本軍校留學的閻錫山讀了康梁編輯的雜誌後曾歎息，“保皇黨豈足以救中國？”後來成為革命黨人和偉大教育家的蔡元培，曾經也是維新派爭取的人物，但是蔡元培當即拒絕了維新派的邀請。羅家倫曾經當面請教蔡元培當時為何拒絕，蔡從容地說了這樣一段話，令羅家倫多年後仍覺“言猶在耳”：“我認為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著手，他們要想靠下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把這全部腐敗的局面轉變過來，是不可能的。我並且覺得，他們的態度也未免太輕率。聽說有幾位年輕氣盛的新貴們在辦公室裏彼此通條子時，不寫西太後，而稱‘老淫婦’，這種態度，我認為不足以當大事，還是回家鄉去辦學堂吧”。(3)

蔡元培何以拒絕變法活動而投身同盟會，康有為為何在上海陷於孤立，上面這段話中可見端倪。西太後為人手段狠毒，但畢竟勢力很大，而且對改革並非絕對反對，否則洋務運動也搞不起來。曹汝霖留學日本歸來，初入滿清外務部，有一次受到西太後召見，西太後向其詳細瞭解日本憲法的宗旨，國會的選舉辦法，曹汝霖即逐一申說，並強調立憲的重要。而西太後“對於立憲，似感興趣”，曹當時的印象是西太後喜歡攬權，但思想並不頑固，只是缺少關於各國憲政的知識，曹甚至覺得，假如康梁當年能將變法計畫，直接向西太後詳加說明，消除她以為變法只救中國，不救大清的錯覺，並讓她不感覺自己大權旁落，未必不能得太後同意，“惜乎當時維新諸君子，求進之心太切”。(4)

就連被視為維新人士，後來參與“籌安會”的才子楊度，對康有為和梁啟超的評價也不高。楊度在 1898 年前後的日記中，對康有為的評價是“其才足以辯偽經，其識不足以治真經。”對於康有為倉促的維新活動的失敗，楊度在日記中後悔自己沒有及時勸阻，但他對康的動機也表示了懷疑——“當此時而思問世，是必為名利之徒也。”從楊度的態度中可以感到，在當時即便是有政治抱負，且政治立場屬於同一陣營的人中，對康有為完全持尊敬和支持態度的人，也是極少的，康有為的孤立，完全在情理之中。(5)

梁啟超對待光緒皇帝的態度，也給人以輕率和不負責任的感覺。一方面，梁並不象康有為那樣真心擁戴光緒，而且光緒也不過給了他一個六品的官位，據說是因為在受召見時梁的廣東口音太重，光緒聽不大懂，影響了交流。另一方面，由於維新派事實上捲入了清廷內部的帝黨與後黨之爭，梁又出於宣傳的目的必須拼命吹捧光緒為“聖主”，“未來的總統”，同時竭力咒罵慈禧、榮祿等人，其結果是更加激起清廷內部保守派的疑懼，直接導致了慈禧欲廢帝的意圖和一場政治危機。當時就有人致書梁啟超，勸他不要再捧光緒，越捧他越會死得越快。(6)

而作為變法最有力的支持者，被康梁“視若帝天”的光緒本人究竟能力如何？翁同龢的日記中曾記載，幼年光緒膽小怯懦，成年後的性情，有一段軼事可證。有一天，“童心猶甚”的光緒皇帝突然將管理清宮中安裝電燈的“電燈委員”召入，要求立刻安裝電話（德律風），委員對稱：此物都中不全，應在外洋購辦。光緒大怒，斥令一日內尋到，否則掌嘴。最後是由一名原在太後身邊的老太監跪地力阻，並搬出西太後警告，光緒才作罷。當時一位熟悉內廷的官員在致盛宣懷的信中說，“且聞當今（光緒）性情急躁，喜怒無常，雷霆雨露，均無一定……借此可知老太太之嚴待非無故也……當今之難以有為，實可憂也。”(7) 康有為的風格和光緒的脾氣可謂半斤八兩，所以惺惺相惜，但在旁人眼中，一個是“童心猶甚”，一個是“尚少閱歷”，但其實又都老大不小了，國家政治豈能靠這樣的人來搞？那麼，光緒究竟是不是象人們想象的那樣信任康有為，乃至以身家性命托付？華裔歷史學家 Luke S.K. Kwong 在其研究戊戌變法的英文專著 *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Ideas of 1898* 中對此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兩者間的親密關係被誇大了，在光緒的眼中，康有為不過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並非是一個可以委以重任的改革家。

胡漢民在自傳中也有專文論及康有為和戊戌維新：“康有為生長廣州，聚徒講學二十年，其得志前後，廣東學界頗受其影響，惟余素薄其為人與其學說。蓋康居鄉，為土豪劣紳之所為，熱中奔競，行不踐言；治學則剽竊武斷，只以大言欺人。其徒相率效尤，高者當不逮唐之八司馬。且是時余之民族思想，

已不可遏，康等由保國而變為保皇，其理論尤覺每況愈下，故當時對之，絕對不生一種信仰……”(8)

康有為的政治思想前後不一，也令後世學者困惑。康有為在維新變法時高呼，“全變則強，小變則亡”，主張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大倡民權，張之洞作《勸學篇》，主要就是為辟民權說。到辛亥革命後康則說，“中國之危在盡棄國粹”，應當以“我之政治教化風俗為主”。短短的十幾年間，中國的典章制度何以就化腐朽為神奇，真是“教人一些不懂”。如果說，康有為的思想退化到了和張之洞一樣的體用模式，那麼當初又何必激進地推進變革呢，而西太後不也重用張之洞嗎？民國時期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和政黨的學者楊幼炯認為，對康有為前激進後保守之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他真正關心的是只是保皇而已，所謂保教保種都是次要的。在我們今天來看，僅僅為了保他那個“童心猶甚”的皇，拉起民權的旗幟，把國家攪個天翻地覆，這玩笑也開得太大了。所以楊幼炯非常為譚嗣同惋惜：“惜乎其所遇者非孫中山，而為康有為，遂使新黨中多一冤魂，革命軍中少一猛將”。

看來對康有為的好大喜功，時人均有所感，而在治學上的“剽竊武斷”，在後人的權威學術著作中則得到完全證實，並非是因政見之爭而起的詆毀。梁漱溟在 1921 年口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序言時說，他在著作中直言批評了許多人，“卻是除康南海外，其餘的人我都尊重”。何以康南海被擯棄在外，不值得尊重，梁漱溟倒沒有明說。但史學大師錢穆在著名的《近三百年中國學術史》中關於康有為的專章裏講得很明白。他認為，康有為的主要論著之一《新學偽經考》直接繼承自今文經學大師廖平，但康本人對此一直避而不談。廖平本人對此也頗為不滿，認為康有為是在與他談話，並讀了他的著作之後，只一年時間就推出了偽經考，明顯有抄襲之嫌。廖平甚至專門致書康有為，批評道，“……吾兩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聞知。余不願貪天功以為己力，足下之學自有之可也，然足下深自諱避，使人有向秀(注：此為廖平筆誤，應為郭象，漢代人認為郭象剽竊向秀)之謗”。雖然學術和思想總有傳承、啟發和影響的一面，但這通常有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不是一年之內就能完成，而刻意的回避理論來源，的確有沽名釣譽、做賊心虛之

嫌。錢穆在著作中對康有為持明顯的批評態度。對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的康著《大同書》，錢穆也大不以為然。錢穆認為，雖然《大同書》如梁啟超所說，具有一些近代世界主義、社會主義的特徵，但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自有其歷史背景和實現的方法，而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既無時代的需要，又無具體的步驟，不過是“以空想為遊戲而已”。錢穆進一步質疑說，康有為號稱尊奉孔子，但《大同書》中所謂去國界，去家庭，明顯背離了儒家學說，“平等博愛”是來自西學，兼襲墨家，所謂“去苦求樂”，只是淺薄地抄襲佛家思想。就算人類社會真的按康有為設想地破除一切界線，實現絕對平等，是否就是真的極樂世界？錢穆從純學術的角度，將康有為的烏托邦大同思想的出現，放在乾嘉考據學派衰落的背景下考察，算是替康有為找了個台階下，但他仍然批評康有為“以好高矜奇之心理遇之，遂以此成侈張不實之論也。”錢著成於1937年前後的北平，與今天中國國內論者關於康有為的爭議及相關政治背景根本不在一個歷史時空，錢穆的觀點和評價，值得相當的重視。

將以上來自完全不同的身份、角度，時代的人對康有為其人及其政治、學術活動的評價綜合起來，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不論當時的旁觀者，還是後世學者，對康有為的評價從來不高。雖然康有為的勇氣、維新思想和實踐值得肯定，但其自負，浮躁，功利心重，而且過度以主觀意志為轉移，使得他的貢獻黯然失色。康對政治形勢的把握與他在《大同書》中暴露的缺點是一致的：以追求空洞的目標代替對現實環境和可行性的細心研究——僅憑此一點，孫文、蔡元培諸人的確遠高過康梁，再加上人格的磊落，中山先生得到後世的崇仰絕不是偶然。他們的區別，也不全在於革命和保皇，更是方式、態度、為人的問題。康有為對待廖平思想的那種為我所用的態度，也和他只顧向上海紳商募捐，卻拒絕給對方尊重和禮遇的做法如出一轍。救國救民的熱忱和個人的私利，以及人品和個性上的種種缺陷混合，必然導致康有為成為近代史上一個非常複雜、甚至不大經得起推敲的人物。但是，探討康有為及其同黨的複雜性倒並不是非要將他們批倒而後快，熱情如何與理性結合，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余英時先生在論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時候，把

士大夫分為兩個壁壘分明的階層：職業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假如這一模式也適用於清末，則康梁顯然屬於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處“體制外”的知識份子。然而，這部分人身上，有時也存在著宏大的目標與責任和自身性格缺陷之間的矛盾。(9)章詒和對羅隆基有句精闢總結：“他是坦蕩蕩的君子，也是常戚戚的小人”，何嘗不可以說，康有為既是自我期許之“聖人”，實為一實踐之庸人。

注釋

- (1)梁啟超，《清代學術史概論》。
- (2)經元善，《居易初集》。
- (3)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81頁。
- (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版，50-51頁。
- (5)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1969年版，85頁。
- (6)楊度，《楊度日記》，新華出版社，2001年，95頁，122頁。
- (7)陳旭麓等編，《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8-19頁。
- (8)《胡漢民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版，5頁
- (9)余英時詳盡論述“國是”一詞的起源的內涵，指出這是宋代天子與士大夫共治的條件下形成的最高國策，康有為的變法上書中，恰恰要求“下詔定國是”，可以看成是爭取體制外知識份子與最高統治者共治的局面，恢復宋代傳統的努力。參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康有為 欺騙了中國人一個世紀



（大陸網文選載）

夜讀《溫故戊戌年》（《於張建偉歷史報告·晚清篇》），心驚肉跳，不知道張建偉先生在多大程度上已經否定了他已經獲得魯迅文學獎的那個“戊戌年”，也不知道這種標識為“歷史報告”的著作該不該當作正史來讀。如果新版的“戊戌年”成立的話，那麼不僅戊戌變法史要重寫，而且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許多歷史事件都要重寫，許多在這個領域裏耕耘了多年的歷史學家都要重新修正自己的歷史觀念，數以億計的青年學生要更改自己的歷史知識，並會為從小就崇拜被奉為“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的康有為和熟背譚嗣同的“獄中題壁詩”而蒙羞，進而凡是接受了現行中國近代史教育的中國人都會蒙羞，因為新版中的康有為絕不是戊戌變法的旗手和領袖，而是一個權慾薰心、卑鄙無恥的小人，他用無數謊言製造了虛假的歷史，欺騙了全世界，欺騙了全中國，而且欺騙了整整一個世紀，他還要部分地承擔中國自戊戌變法以來丟失許多良好發展機會的責任。

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新版《溫故戊戌年》叫做“康有為別傳”或者“康有為盜國記”更合適。

讓我們擇其主要事件來看一看新版中的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前後都幹了些什麼。

第一件：涉嫌“剽竊”張之洞門生廖平兩篇文章《知聖篇》和《辟劉篇》，也就是說當年極大地震動了中國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學偽經考》是抄襲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為急於馬上在學術界奠定自己的地位。

第二件：公車未上書，只是在松筠庵門前召集了各省舉人，準備上書，但終究沒上，原因是康有為從一個內線太監那裏得知他可能考上了進士，如果他帶頭上書，眼看就要到手的進士“學位”就會被取締，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將前功盡棄。

第三件：為了取悅於光緒帝，也為了用手中僅有的權力泄私憤、報私仇，康有為製造“莫須有”的罪名，硬把許應當作反改革的典型查辦，許被罷官。

第四件：假傳聖意，說光緒帝允許他直接晉見，還說他上呈的摺子可以不通過都察院傳遞，直接遞給光緒帝，其實變法後他所有的摺子都是通過都察院遞交的。

第五件：製造“偽詔”誘勸袁世凱發兵包圍頤和園。光緒帝給楊銳的詔書中只說要緩和與慈禧太后的矛盾，康有為卻要“圍園殺後”救皇帝，因而製造偽詔。

第六件：錯信袁世凱。康黨中人都說袁世凱不可信，但康有為固執己見，強逼畢永年充當“敢死隊長”，強逼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結果袁世凱告密，但戊戌政變不是因為袁世凱告密發生的，榮祿是在戊戌政變後才被調進北京的。

第七件：戊戌政變的直接原因是伊藤博文的來訪，此前康有為向光緒帝大力推薦伊藤博文，並倡議與日本、英國等國“合邦”，其實就是賣國，也就是說康有為為了實現自己的權欲，不惜賣國，充當漢奸。他與李提摩太交往多年，而李提摩太全是利用他，才制訂好了完備的分割中國的計畫，只等他上套。

第八件：為了掩蓋“圍園殺後”的計謀，逃到日本後軟禁王照，並與梁啟超一同篡改譚嗣同的“獄中題壁”詩。原作是這樣的：“望門投趾思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公罪後人論。”康有為認為原詩暴露了他們的計謀，非改不行，由梁啟超操筆，改成了後來流傳開來的這四句：“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至於為什麼這麼改，新版中敘述未詳。

第九件：曾寫信給日本“大同學校”的康黨，叫他們“不得招待孫逸仙”，因為怕孫中山革命黨的“惡名”影響他成為真正的帝師，流亡到日本後孫中山曾經求見，康有為又以帶血詔的欽差大臣自居，說孫中山是“著名的欽犯”，不便見面。

第十件：以假詔作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騙取錢財，後輔佐張勳復辟。

與這些大事相呼應的，新版中還敘述了一些可笑的細節，也直指康有為的人格。搬弄迷信，自比孔子；爲了上書清帝，用盡伎倆，向多人騙取錢財，包括自家親人和北京望族，以給他的銀子數量多寡分封“賢人”、“大賢人”等稱號；在上海嫖娼多次，不付錢，被妓女追著索要等等。

也許由於偏見，本人自從接觸戊戌變法的歷史以來就不喜歡康有為這個人，對政變的結果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康有為，但讀罷新版，還是殊爲震驚。不單單是因為新版揭示了康有為之壞，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樣一個人怎麼能夠欺騙中國長達一個世紀。戊戌變法的歷史固然複雜，但它總是歷史，總有史實可以考證，而中國絕不少態度嚴謹、不從俗流的歷史學家。可是康有為還是把包括許多學齡兒童在內的中國人都欺騙了，這是爲什麼？我不由在想，張建偉的新版康有為是不是完全合乎史實，當今史學界能否接受他筆下的康有為？因爲新版中並不是沒有疑竇：康有為究竟爲什麼要隱瞞“圍園殺後”的計謀就是其中之一。我甚至不願意康有為這樣壞，因爲這樣一個事實對每一個中國人都太殘酷，尤其是對中國近現代史太無情……其實說來說去，還是張建偉太無情，太勇敢，把這樣一個命題重新提到中國人面前，就看我們怎樣對待它了。

中共文革時期

曾挖墳暴尸批鬥康有為

羅思義

清末名人康有為是維新保皇的大人物，他亡命國外多年，直到帝制推翻，民國成立，他才回國，民國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山東青島嶗山縣李村棗兒山去世，沒有想到死後四十年，在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紅衛兵造反派挖墳鞭屍批鬥，追究他「保皇的罪責」。

此一鬧劇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初起之際，青島市展開『破四舊，立四新』運動，在一個燥熱的

下午，年輕老師帶著一群初中學生，每人臂上纏有紅衛兵布條，浩浩蕩蕩來到康公墓地，大叫要把保皇派頭子揪挖出來示衆，以平民憤！

接著把墓碑推倒，把墓門刨開，棺木已腐爛，屍骨仍在，但有清廷朝服裹住，朝服是用紅色錦緞縫製，頂上挂著光澤猶存的珍奇朝珠，旁有雕著『國學大師』的青玉石牌和一把刻著英文的金鎖與幾面金牌，一名大膽的紅衛兵上前拿起幾根屍骨及頭顱骨，上面還纏有長髮，然後高叫遊街示衆，於是隊伍從墓地出發走向市區。遊街之後，頭顱骨的下頷骨脫落下來，剩下的則被送去『青島市造反有理展覽會』公開示衆，上面寫著：『康有為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這是他的狗頭。』

展覽會結束，把其他搜來的物品撤走，留下康有為的頭骨無人過問，由於展覽會場是設在青島市博物館內，博物館藝術設計職員王集欽悄悄收藏起來，外面裹著錦緞紅布，連同朝珠、金鎖、金牌、玉石放入盛文物的空木箱內，並釘上蓋子。直到毛死江囚，文革被稱爲『浩劫』，青島市府才決定重建康墓，四處尋找康公散失的屍骨，這時王集欽才敢出面把埋藏心中十幾年的秘密公開，把康公的頭骨拿出來。

王集欽說：紅小將在批判『康保皇』時，命康的後代子孫站在一旁觀看，紅衛兵爲了表示仇大苦深，把康的頭骨當作尿壺，大家上前小便，對康公遺骨極盡侮辱之能事。

爲什麼紅衛兵批保皇派，目的是批劉少奇周圍的人，讓他們知道保護劉少奇這個『皇帝』是什麼下場！



中共文革造反派批鬥和尚

評中共對待康有為的

三副面孔

高山流

中共對待康有為，在歷史上有過三個不同的態度。

第一個態度，是因為康有為曾是保皇改良派，而中共自稱是革命派，又著意混淆了共產革命和共和革命的區別，特別是共產主義作為共和主義死敵的本質，所以，他也就渾水摸魚地為肯定共產革命，而批判保皇改良的康有為了。對此，只要翻一翻中共四九年建政建國以來的各級各類歷史教科書，便會一目了然。文革當中，紅衛兵造反派們敢於對“康聖人”挖墳掘尸，其膽量就是來源於此。

第二個態度，則是在中共為救黨而不得不實行改革開放之後，由於稍稍知道一頂點歷史的人，特別是中共專制體制內的一些知識官僚們，便自然地警覺起來，以為再不可對康聖人橫加批判與否定。因為，今日共產黨要做的和正在做的，也就是當年大清朝所曾做過的；雖然康聖人當年曾被老太后逐出海外，甚至下旨通緝，但說到底，他還是只想大清好，希望大清朝能夠通過改革開放而獲得長治久安。於是，中共對康有為的態度也就變得曖昧起來，八十年代伊始，才會出現康夫子的隔代傳人們。要羞羞答答地為康聖人“擺好”的文章，也已經偶見於黨報報端。如此，康聖人也就局部地獲得了平反，雖然“帽子”還被共產黨拿在手上，但是日子卻是好過得多了。當然，這也屬於“我黨”在思想戰線上的改革開放——聲稱要對歷史人物採取“客觀公正”立場的一部份。但是，由於學識、人格和膽量的關係，他們絕然不敢象康先師那樣，敢於大聲疾呼政治變法，甚至敢於不怕天下大亂而發動武裝改良，但是，他們的心，他們的情，還有他們的立場和好惡，卻與康師傅大同小異。

第三個態度，則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因為，中共上演了一場和戊戌政變一模一樣的歷史大戲。只不過，晚清砍頭的大戲，是在政治變法已經發動了一百

天之後，因而才有“百日維新”之稱；中共屠殺的大戲，卻是在連一天的政治改革都還沒有推行之前。所以，鄧小平比起西太后來，便要反動得多，連試驗都沒有給做，就大開了殺戒。再就是，西太后至多也就是在菜市口砍了六顆要求變法的腦袋，而鄧小平卻在皇城裏鋪天蓋地大殺了一場，其殘酷與暴戾便又是西太后所望洋興嘆的。但是，這非但沒有使得中共對康老夫子的態度轉了回去，相反，那些紛紛逃亡到了海外的保共改良派們，也就是被中共從專制體制內攆出來的“我黨”各色“專家學者官僚們”，他們因自身的命運，而立即敏感到此事此刻，不論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大共朝”，都必須歌頌康有為不可，尤其要象當年的“康聖人”那樣，為決心保皇而必須堅決地反對革命不行。所以，他們便一邊大聲疾呼地詛咒孫文的革命，把辛亥革命罵了個底朝天；同時還堅定地表示要“告別革命”，也就是向已經不要他們的共產黨表示：我等絕不會造反革命。我等對我黨我朝的衷心日月可表。一邊便把孫文革命的對立面——康有為捧到了天上，而且時時處處都以康師傅為表率，將他們對大共馬列王朝的赤膽忠心，表露得令人唏噓不已。唯一不同的，就是只敢年年歲歲地開會、研討、寫文章，忘情地歌頌當代共產黨的光緒帝趙紫陽，卻絕不敢效法康師傅也發動一場武裝改良，誓死營救今日的光緒帝趙紫陽。好在這一批“我黨”的專家學者政治家們，大約他們本來也只知道康有為不過是拼命反對孫文的保皇派而已，所以，彼等只需取其“精華”，以為當朝服務也就夠了。而這一“精華”，第一就是無情無理地反對孫文革命，栽贓辛亥革命，但絕不否定共產革命；第二就是要專在這改良二字上下功夫，並從此將這改良二字描繪得美妙得不得了，不獨為它戴上了“和平”的桂冠，而且為它制造了一條假設的歷史規律——就是：如果孫文不革命，則康先生的“和平改良”早就成功，中國的民主早已實現，“中國人民早就拖著豬尾巴實現了四個現代化了！”。一時間，竟然與當年一樣，將一個糊里糊塗風氣未開的海外，直鬧成了一個“保共改良”的天下。

當然，中共開始尚不明白他們的可憐保共之心。可待中共一旦看懂了之後，雖然對他的這些“棄婦”們毫無興趣，卻對康聖人的“用處”上了心了。因

為，共產黨突然明白過來，大凡今日中國不發生革命則已，倘若一旦發生了革命，便必定是要革他共產黨的命的！於是，海內海外，便鴉鵲齊噪地大大地唱開了一首首康聖人的頌歌，甚至是“打出去拉進來”、手段用盡地在海內外大罵起孫文及其共和革命來了。而且中共的專制統治愈有危險，保共改良派們對孫文的恨恨之心和熠熠之情，就愈加地張狂。就象是不推翻孫文，中國就斷然民主不起來；更好象當今中國人所受的一切苦難，倒不是共產黨所一手製造，竟然全都是來自於孫文的“反動革命統治”！

然而，不幸的是，中國民間終因中共的冥頑不化而重新思量起晚清的共和革命來了，還因此而突然對中共之所以“推動”歌唱康聖人和辱罵孫中山恍然大悟。如此，另一股要重新評價康有為和重新認識孫文革命的思想潮流，便在革命之機已經悄然而動的時代，猶如一聲春雷，而驚醒了人心。史詩——《走向共和》的出現，便是明證。康有為在劇中那令人惡心的保皇形象，已然是栩栩如生；孫中山在那裡面令人崇敬的革命精神，亦已經感人至深。當代的普通中國人，終於對康有為看明白了，也終於對當代的保共改良派們看明白過來了，更對重新倡導孫文的共和革命與重建我共和的新中國，志多慷慨起來了！

這就是中共對康有為三個態度的歷史及其形成原因。這三個態度，也標誌著中共及其保共改良派們自身命運的起落；和他們必將如大清朝一樣，最終也要因共和革命的再起而一朝覆亡的下場。



興中會廣州秘密機關，原址在廣州雙門底王家巷王氏書舍。

興中會廣州秘密機關

悼孫文挽聯選

何彤 選編



吳敬恒挽聯

聞道大笑之，下士應多異議
貽謀後世者，成功不必及身

唐紹儀挽聯

約法壞，民國危，革命未成功，誰復能支大廈
議和終，致位支，補天太無術，自愧有負使君

徐紹楨挽聯

道不能亡，三民主義長留天壤
國烏乎建，卅年辛苦盡瀝胸肝

戴恩賽挽聯

三民主義闡發萬方，九原應無遺憾
半子恩情侍疾累月，寸心唯以永傷

孔祥熙挽聯

唐虞湯武，合冶一爐，至彌留時，猶為同胞呼後起。
松柏蔦蘿，忝聯十載，於痛定後，更從羣眾哭先生

陳少白挽聯

失敗云乎哉，行道期百年，唾棄小就，力赴大同，雖在顛沛中、彌留中，未嘗少懈
流風今已矣，入世垂卅載，驅策群雄，招徠多士，為問真知己、真同調，究屬伊誰

謝持挽聯

敵者哀，忌者吊，毀者太息，真心救國，故能迴避鹹動，異趣者亦賦同情，揭橥是三民五權，死矣乃見其大

黨事渙，國事亂，人事難知，在耳遺言，倘得正確遵行，天下事洵猶反手，此志如青天白日，誰乎不負先生

蔣公三十年祭

大陸青年書生 雪原

編者按：大陸三十歲上下的一代新青年，因其中大部分已然掙脫了對中共及其腐敗專制政權的感情羈絆，所以，他們在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已經持續了二十年，並已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之後，終於能夠面對歷史，而別添了另一番情懷。這番情懷，無疑將對於重建真正之共和中國——我大中華民國，帶來更加令人可信的思想基石和感情基礎。這裏發表的就是一位大陸青年對蔣介石的祭文，應該說，這篇祭文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表現了新一代中華兒女對蔣的重新認知。

民國九十四年冬至，大陸而立書生雪原祭蔣公中正曰：

自國父孫總理肇造民國伊始，即不幸遭袁氏竊政，後有張勳復辟及軍閥割據，民衆困頓，國勢不振。國父雖數次護國護法而不竟功，蔣公繼承總理遺志，恒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激勵國人，雖有共黨蘇俄之掣肘紛擾，而終能克定軍閥一統全國者，惟因公及黃埔諸君爲國爲民之意志也。

後十年，雖有共黨及軍閥餘孽不斷作亂，然公治下之民國百業興隆，雖逢國際經濟蕭條之際，我中華竟成“黃金十年”之盛。倭寇覬覦我華夏日久，不欲我就此復興，乃不斷尋釁滋事，公堅忍爲國數載以厲兵備戰，却不幸爲共黨所乘，煽動不明真相之熱血青年施壓於政府，又有張、楊包藏禍心，竟聯共以囚公。我中華命運一度操於俄酋之手，公於逆境中仍不失氣節，雖夫人等多方奔走而亂事得平，剿共大業則因之而廢，思及於此，張、楊實陷我民族萬劫不復之罪人也。

繼民國十九年占我東北以來，倭寇日驕，二十六年夏，遂至全面侵華，公登廬山而告國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舉國上下，群情激奮，人人奮勇殺敵以報國家。公運籌帷幄，爲破敵三路切割我華北之企圖，乃集重兵以滬上，一惑倭寇，二示國際我抗戰之決心，力戰三月有餘，吸引敵重兵彙集滬上，乃轉運物資設備至蜀中，此實我軍民持續抗戰八年之關鍵也。其後貫徹“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爲大勝”之方針，與敵會戰二十二次，大型戰役一千一百餘次，其餘戰役不勝計數，終至克服倭寇，並廢清季百餘年來之不平等待約，我中華民族一洗百年頹廢之氣，得以重振雄風，公及黃埔諸君建功至偉。

然則其後內憂驟起，共黨挾俄援及抗戰八年乘國難所積戰力，竊據大陸，公不得已於民國三十八年率政府撤退至台。我大陸億萬同胞陷於中共魔掌，毛酋殘暴，自比秦皇，殘害我同胞八千餘萬，江河嗚咽，山嶽含悲，有識之士雖懾於淫威，□不敢言，然無日不思蔣公；我等後生，受共黨累年欺惑，竟誤會至以公爲仇，家國之悲，亘古未嘗有過此者也。

遷台以後，公雖日以反攻大陸、救我億兆同胞爲念，然事多不諧，更因我大陸同胞或懾於淫威，或惑於共黨，不能內外相協，終至未成。民國六十四年，公駕鶴仙遊，並停柩以待祖國光復，而留未竟之業於諸同志，令人不勝唏噓！

幸得大陸學者辛灝年君不避斧鉞，撥歷史之雲霧而見今日之青天，余震驚之餘更慕公之高德，於公仙遊三十年後重讀公之遺囑，覽及“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爲無形之總理，以複國爲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爲餘畢生之志事……”，不禁泣下，公遷台以來屢被共黨詈罵，以至大陸民衆多不知公，今餘及諸多書生方醒，而公長眠已久，此情向何以告？

然則世有正氣長存，雖歷經污蔑，終不能廢。余今代表大陸已醒諸生謹祭蔣公，必不負公之所期，以總理及蔣公精神相勵，爲光復國土、拯救同胞、復興文化、重建民主爲己任，克勤克謹，爲驅逐馬列各盡

其力，功成之日，當遷公之靈柩回紫金山，並慰總理及蔣公在天之靈。

大陸書生雪原敬上
民國九十四年冬至

北伐宣言

民國 17 年 7 月 6 日

廣州國民政府

編者按：北伐打倒軍閥，統一民國，為蔣公領導中國國民革命之第一功。是革命，還是反革命，亦請今日之讀者諸君自行辨識。

中國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極矣：以言農人，則血汗所獲，盡供兵匪之掠奪，預徵特捐，有加無已，終年辛苦，不得一飽，鬻田賣牛，寢成失業，此猶僥倖者也。至如直魯豫京兆等省區之農人，則兵匪所過，村裏為墟，老弱死於溝壑，壯年多被俘擄，男為牛馬，女被姦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餘生，亦不過皇皇如喪家之狗，不操下賤之業，即作他鄉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則終日勞作所獲，僅能苟延性命，既無餘資，又鮮保障，平時日日有失工之慮，災患一至，不免淪為流氓之列；此時欲商無資，欲耕無地，不降為苦力，以逐漸消耗其性命，則直成餓殍而已矣。以言商民，則外被洋商售賣洋貨、販運土貨之壓迫，內受大小軍閥土匪、苛捐重稅及明搶暗索之剝削，鮮能獲什一之利，而頻蒙虧本之災；馴至小資生意不堪損失，傾家蕩產，比比皆是。以言知識界，則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憂哺啜，而不能傳其智能；學者每以匪患兵災，斷絕資斧，而無以進其學業；加以百業凋敝，雖屬聰明才智之士，難免彷徨失業之憂；至於直魯豫各省，年年烽火，學校關閉，小學教員淪為苦力，青年學生多成餓殍，更無論矣。其他各省軍

閥部下之軍人，則多數本系農人工人，為求生計而投軍者；然而投軍之後，不但生計仍無可托，且為野心軍閥驅而置諸死地，大好熱血，不用以靖國難、救人民，乃徒以受軍閥參養之故，反用以屠殺人民，為軍閥爭功名、求富貴，世間慘事，孰有過於此耶？至於經營工業企業家，在從前固為社會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則銷場不佳，利益全無，工廠停閉，成本呆滯，即或勉強開工營業，而困於苛稅勒捐，無法支持，即不投降於軍閥，即乞靈於洋商，不但事業已非我有，資本則喪失大半矣。

總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國，除少數軍閥、官僚、買辦、財閥之外，全國人民入則有老弱待哺之憂，出則無立業謀生之地，行則逢擄身喪命之變，居則罹舉家凍餒之禍，災害深於水火，困苦甚於倒懸，凡此皆帝國主義之侵略及賣國軍閥之竊權之所致也。帝國主義經濟上之侵略，其剝削之巨，歲輒萬萬，數十年來未嘗或息也。迄中國之人民膏血已盡，僅存皮骨，彼為債主，我為債戶；彼不勞而坐獲，我終日充牛馬；彼為經濟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揮之全權；我為經濟的奴隸，而居被驅使之地位。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剝削中國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萬惡之賣國軍閥，造成筆難盡述之罪惡。帝國主義者既使軍閥竊取政權，又使軍閥盜賣國家；既使軍閥永演鬩牆之爭，令吾民受盡兵刀之苦，更嗾使軍閥壓迫革命運動，欲吾民永無自決之日；既使軍閥式的政治發生土匪，更使土匪變成軍閥，軍閥生生不已，人民困苦無窮。以軍閥為刀俎，以吾民為魚肉，如此則無怪乎中國農民不能安於鄉，工人不能安於市，商民不能安於行旅，知識界不能安於校舍，軍閥下之軍人恒輾轉慘死於連年之內戰，甚至經營工業之企業家亦惴惴不能一日安其生也。

帝國主義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軍閥之暴虐日益加重，則中國全國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軍閥混戰經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國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無好政府，而且亦無惡政府；不但無從減少既有之痛苦，亦且無法減輕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繼此以往，指顧之間，不難使數千里土地變為荒墟，數萬萬人民化為蟲沙，豈但政治的及經濟的奴隸而已。本黨於此時機，熟察前因後果，深知中國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賣國軍閥；深

知目前中國之唯一需要，在建設統一政府。統一政府成立，則外足以抵抗帝國主義之恫嚇壓迫，內足以杜絕軍閥之禍國殃民。

統一政府不成立，則外禍益烈，內亂益甚，中國人民之困苦，亦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中國人民將無噍類矣。

本黨從來主張用和平方法，建設統一政府，蓋一則中華民國之政府，應由中華人民自起而建設；一則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經內亂之禍。故總理北上之時，即諄諄以開國民會議，解決時局，號召全國。孰知段賊於國民會議，陽諾而陰拒；而帝國主義者復煽動軍閥，益肆兇焰。迄於今日，不特本黨召集國民會議以謀和平統一之主張未能實現，而且賣國軍閥吳佩孚得英帝國主義者之助，死灰復燃，竟欲效袁賊世凱之故智，大舉外債，用以摧殘國民獨立自由之運動。帝國主義者復餌以關稅增收之利益，與以金錢軍械之接濟，直接幫助吳賊壓迫中國國民革命；間接即所以謀永久掌握中國關稅之權，而使中國經濟生命，陷於萬劫不復之地。吳賊又見國民革命之勢力日益擴張，賣國借款之狡計，勢難得逞，乃一面更傾其全力，攻擊國民革命根據地，既使匪徒擾亂廣東，又糾集黨羽侵入湘贛。本黨至此，忍無可忍，乃不能不決於出師之一途矣。本黨敢鄭重向全國民眾宣言曰：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設一人民的統一政府；而過去數年間之經驗，已證明帝國主義者及賣國之軍閥，實為和平統一之障礙，為革命勢力之仇敵；故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之勢力不被推翻，則不但統一政府之建設無希望，而中華民國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據地，且有被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聯合進攻之虞。本黨為實現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統一政府之建設，為鞏固國民革命根據地，不能不出師以剿除賣國軍閥之勢力。本黨為民請命，為國除奸，成敗利鈍，在所不顧，任何犧牲，在所不惜。本黨為求遵守總理所昭示之方略，盡本黨應盡之天職，宗旨一定，生死以之。願全國民眾平日同情於本黨之主義及政綱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進而同情於本黨出師，贊助本黨之出師，參加本黨之作戰；則軍閥勢力之推倒，將愈加迅速，統一政府之建設，將愈有保障，而國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將不遠矣。

統一政府建設萬歲！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中國人民自由解放萬歲！
中國國民革命軍萬歲！

七七抗戰十週年紀念

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大中華民國總統 蔣中正
大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七日

編者按：領導衛國戰爭勝利，廢除百年不平等條約，是蔣公領導革命建國的第二功。嗣後則敗北於中共發動的內戰。然而，這既是他個人的失敗，則更是我大中華民國和我大中華民族的慘敗。今天，凡經歷過中共統治的幾代大陸百姓，如能重讀他在抗戰勝利兩年後和中共發動內戰時的“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想必都能夠體會得到他為國為民的赤忱之心；更因已經親身經歷了中共半個世紀的殘暴統治，就更能領悟到他當年陳述的正確和預言的英明——中華民族、中國人民果然如他所預言的一樣，從此陷入了萬劫不復的罪惡深淵……

今天是我們七七抗戰十週年紀念日，我覺得對抗戰勝利以來我們國家局勢的變遷和民族整個的危機，以及同胞們禍福利害的關鍵有向我全國同胞鄭重說明的必要。

我們對日抗戰的目的，原在於捍衛國土，收復東北，保持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東北的主權和領土行政一天沒有恢復，便是抗戰的目的沒有達到，我們為抗戰而犧牲的千萬軍民的英靈就無由慰藉，這完全是我們後死者共同的責任。大家都知道：在日本投降以前，東北是沒有共軍的。及至國軍進入東北，接收領土主權的時候，在這一年半中間，共軍竟對國軍先後

發動了五次的攻勢，圍攻政府已經接收了的地區，割裂東北的土地，屠戮東北的人民。最近國民參政會的和平建議，共黨的反響，首先是經過他宣傳機關的謾罵誣衊，接著便在關內外發動瘋狂的攻勢，來作事實上的答覆。特別是他這次對東北的攻勢，規模之大，前所未有。五月初旬以來，他發動了三十萬以上的兵力，向各重要據點，作猛烈攻擊，最後把攻擊重點集中於四平街，以十倍於守軍的兵力，展開了十八晝夜慘烈的攻城戰，卒賴我將士繼續對日抗戰的精神，對來犯的共軍，以殲滅的打擊，而粉碎了他包圍長吉、奪取瀋陽的企圖，使東北戰局得到一個成敗的轉捩點。但是中共毀滅祖國一貫的陰謀，決不會從此罷手，所以東北的危機，並不能說因四平街的勝利而根本解除。中共是怎樣的進入東北？他在東北參加叛亂的部隊，又是怎樣編組成立的？這都盡人皆知，很明顯的，中共是繼承了帝國主義者日本和偽滿漢奸的衣鉢，他正在執行帝國主義者日本滅亡中國所未曾貫徹而遺留下來的毒計，不許我中華民族恢復東北的主權，不讓我們中華民國享有領土和行政的完整，而且他到今天還在利用敵軍日本殘餘的部隊，帶領了他們來蹂躪我們中國的土地，殘害我們中國的人民。中共這種倒行逆施喪心病狂的作為，比之歷史上任何流寇盜匪都要凶殘，他的居心比之中國歷史上所有漢奸傀儡都要狠毒。同胞們須知中共這樣的軍事叛亂，就是要分裂我們整個中國，斷送我們整個民族，他必要使我們民族的精神和固有的道德，消滅淨盡，使我們神明華胄生生世世永遠淪為奴隸牛馬，不能保有獨立自由的人格。這種破壞人性、滅絕人倫的獸行中共，如果任其繼續存在，那我們黃帝子孫，便要受到最近亡國各民族一樣的集體殺戮，集體放逐與永遠奴役的慘禍。

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建國的工作，必以國家的和平統一為前提。但是和平與統一是不可分的，統一與民主自由是不可分的，統一與人民幸福，更是不可分的。國家如果不能統一，則一切建國理想都成空談，民族民權民生主義就都無法實現；人民在地方被蹂躪，經濟被割據，生產被破壞，交通被阻斷的狀況之下，決不能享受水準以上的生活。同胞們必能回憶，「大戰甫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這是我

在勝利以後對共產黨所發的真摯的呼聲。任何有責任心的政府以及有愛國心的人民，斷不願在大戰後瘡痍滿目之餘，使國家與人民重陷於戰禍的痛苦。我們當時只希望共產黨遵循民主的途徑，像英美各民主國家的共產黨一樣，以和平合法的政黨，來爭取選民。所以十年以來，尤其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政府對於共產黨始終是苦心忍讓，委曲求全，只希望共黨不破壞統一，不擁兵割據，不推翻國本，不斫喪民命，一致為和平民主建設而奮鬥，政府都可儘量容納他們的意見。但是任何的商談協議和調處，終不能消弭他們叛國的禍心，終無法感召他們為國家前途和民生痛苦而覺悟。中共一年多來的主要行動，無不集中於破壞交通，破壞工礦，而且到處破壞奄奄一息的農村。政府每一次呼籲和平，每一次頒發停戰令，只能助長中共更進一步的擴張和進攻，只能增加國軍前線的困難，只能增多忠勇將士和人民的犧牲，也只能把匪患擴大，戰禍延長，使以後社會復興重建的工作，比以前更陷於艱難無比的困境。到了現在，我全國同胞，可以明白認識共黨是「本性難移」，絕對沒有悔禍的誠意，是決定要叛亂到底的。它的野心陰謀非斷送國家，貽害世界，是決不會停止的。我們如不能舉國一致，洞察奸謀，抱定決心，戡平叛亂，那不只民生日益凋敝，而整個國家，也要被他割裂斷送，淪胥以盡了。

中共在抗戰結束後公開叛變，本來是他們早已預定的步驟。當我們抗戰勝利之時，它就在佔領區內公然發動其所謂「參軍運動」和「社會鬥爭」、「民眾清算」，以強暴和劫持的方式，專以殘忍的殺戮立威。上至老嫗，下至童稚，一粟一布，不容保留，一草一木，都被劫奪為他叛國的暴力。佔領區內所有壯丁，不隨他為匪，就別無生存之途，稍有違抗就凌割活埋，實行他所謂「一人逃亡，全家處死」的暴刑。佔領區內成千成萬的同胞，就是這樣的被中共驅迫著作了他們叛國害民的犧牲品。

但是在我們後方的，尤其是在華中華南各大都市，還有許多人沒有認識國家民族的根本危機，沒有看清中共窮凶極惡的暴行，或徼倖姑息，或苟且偷安，不知道我們後方同胞，今天尚得保持其經常的生活方式，全賴我們為剿共救民而犧牲的國軍將士，在前線奮鬥阻遏之力，否則就早已陷入華北東北中共佔

領區內民眾一樣的悲境。因之我們如果今日削弱了國軍，就是動搖了全國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利。正因為我們後方同胞，還不能明察這種禍福利害的事實，於是中共就利用社會上苟且偷安、因循姑息的心理，指使其反動工具，提出「反對徵糧」、「反對徵兵」、「反對內戰」等各種口號，來顛倒黑白，麻醉人心，蠱惑社會，搖動國本；使我們的人力物力乃至精神的力量，都不能集中應用到剿共和建設的工作上去，坐視中共暴力長大，叛亂因而蔓延，追本溯源不能不說是我們社會人士中了中共反宣傳的毒計。要知道中共爲了遂行他背叛國家民族的陰謀，首先他必須閉塞我們同胞的耳目，麻醉我們同胞的良知；中共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同胞對於民族大義，完全不明，對於國家危亡，視若無睹，甚至對於自身禍福，與永久利害，亦茫然無知，由此喪失了自強自立與獨立自主的信心，無形之間成了中共精神上的俘虜。今日國內是非不分、利害不辨的這種麻痺狀態，正是中共所欲造成的。這正如古語所說，燕雀巢於危巢之下而不自知其危；實際上覆巢之下，決無完卵，同胞們今天的袖手旁觀，就是他日的束手待斃，待到像中共戰領區同胞那樣已入陷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時候，雖欲後悔也已無及了。我們國家和全國同胞的命運，實際已臨到了這樣嚴重的危機，我怎麼能不負責明告喚起全體同胞一致的警覺。

同胞們！要知道現在我們中國擺在面前的，只有兩條道路，我希望我們同胞，立刻有所抉擇：一條是因循貽誤，袖手旁觀，坐待中共宰割蹂躪，使整個國家和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淪胥陸沈以亡的道路。一條是正視事實，認清禍福，明辨利害，自立自強，一致奮起，肅清匪患，救國自救的道路。我們究竟還是共同一致，全力戡亂，保持國家領土主權，完成統一，以期達到民主自由的目的呢？還是坐視共軍猖獗，叛亂蔓延，讓自己的家鄉被劫奪，家族受凌辱，子弟被驅迫做賣國的工具，而最後斷送了國家命脈呢？我們全體同胞，要想想東北華北遭受中共禍亂的同胞，所過的是怎樣的日子？在東北經過了十多年淪亡奴辱的苦痛，而勝利所帶來的，乃是中共的恐怖壓迫，劫奪屠戮，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強暴統治。至於華北各地，在抗戰期間，犧牲最大，受苦最深，在抗戰勝利後，許多地區的同胞，喘息未定，又遭到中共的侵

入，重新墮入黑暗的深淵。最近中共在各地所發動的攻勢，都是中共驅逼其所謂「民兵」在前，大車騾馬在後，凶鋒所過，裹脅擄掠，雞犬不留，有過於抗戰時期敵人的三光政策；每逢中共侵佔了一個據點，則成萬的民眾只有拋棄一切，冒著危險，向國軍陣地後方來歸，其呼號怨憤之聲，極人間之慘事。我們後方同胞，和他們都是一脈相承，同氣連枝的兄弟，對於他們的命運，怎麼可熟視無睹？對於他們的災難，怎麼能不急起直追的趕速拯救？並且中共的全面叛亂，是以滅亡整個中國，奴役全體同胞爲目的，我們如不能萬眾一心，剿共戡亂，則今天東北華北陷共區域同胞慘無天日的生活，就是我們華中華南同胞們不久將來的生活寫照。我們復員未竣，阻礙迭乘，我深深知道在我們收復區內，一般同胞生活的艱難，尤其是農村農民的困苦，不堪言狀；但不論如何，比之受赤禍區域的同胞，生活行動，精神物質，同受剝奪沈淪之痛，乃至一呼一吸，一言一動，都被壓迫脅制，父子夫婦之間，也要互相提防，不敢傾訴痛苦的悲境，究有天淵之別。可知今天我們全國軍民同胞的戡亂剿共，不但是拯救中共佔領區同胞，實在就是自救自衛。如果在中共的企圖已經這樣明顯的時候，還是因循卻顧，冷淡旁觀，任令中共蔓延猖獗，而還不能對國家對同胞負責盡職，努力奮起，遏滅叛亂，那便是甘心斷送自己的身家性命。何況我們經過八年堅貞卓絕的抗戰，受盡了萬苦千辛，犧牲了千萬軍民的生命，如果任令中共，得逞他幸災樂禍的陰謀、叛國殃民的野心，毀滅我們全國軍民抗戰光榮的歷史，替日本帝國主義者執行其滅亡中國未完的工作；那我們撫心自問，又何以對自身當時奮起抗戰的初衷，何以對無數殉難軍民先烈的英靈。

所以今天的戡亂剿共，是爲了國家最高的利益，也爲了人民的基本生存和民主自由的權利而與中共奮鬥。這和對日抗戰神聖的意義，並無二致，換句話說，今日剿共工作就是繼續對日抗戰未完的任務；也正如我對同胞們所說的，要確保抗戰勝利成果，獲得國家民族真正獨立自由所必須經過的奮鬥。我們國軍將士，前仆後繼，英勇慘烈的犧牲，應與抗戰先烈獲得同樣崇高的尊敬。而足食足兵，充實前線軍事，乃爲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每一個人無可旁貸的義務。在救國保民的意義上，不論任何地域，無分前方後方，

都是休戚相關，存亡與共的。我要嚴正的昭告我們同胞，從最近東北戰役中，可以看出中共野心完全暴露，國家危機日益加重。因此，大家不能再存任何僥倖苟安的幻想，不能再有置身事外的態度，必須急起直追，統一意志，集中力量，軍民一致，加強剿共實力，加強建設工作，為國家掃除這一個百世的禍根。我們要以抗戰時期同樣的精神，實行全體總動員，並且要格外振奮，格外嚴整，來改正抗戰時期所發生的缺點。我們要毫無疑遲毫無保留的貢獻一切人力物力和生命，共同努力於救國家、救同胞，戡亂定變的戰事。如此，才能保障對日抗戰勝利的成果，國家才有獨立自由，社會才有重獲安全的希望。

同胞們：國民政府業已下令實行剿共總動員了。這次總動員最重大的意義是在喚起全國人民的警覺，統一全國人民的意志，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我們要號召全國愛國民眾一致奮起救國自救，政府一切措施，必循法定的軌轍，而且完全信任我們同胞的愛國良知，使全國同胞，在民族大義之下，自動自發的報效國家。但是我們國民，必須人人愛國自愛，遵守國家的法律，竭盡國民的職守，對於與剿共有關的任務，都要踴躍仗義，悉力以赴；無論一言一動，都要裨益剿共與建設工作的進行。社會上有地位的各界領袖，更應首先急公赴義，為天下倡。我全國青年們是國家民族命脈所寄託，尤其要明辨是非，認定順逆，發揚國家意識，保障民族生命；如果青年們甘心為中共作工具，不惜使國家淪亡，民族滅絕則已，否則大家應人人自認為黃帝的子孫，中國的國民，為中華民族求得獨立生存，使自己將來能發揮自主自由的思想，不受中共的摧殘壓迫，那就要立定決心共赴國難，求學的專心求學，為農工商的，要努力生產，增加國力，各守崗位，各盡職責，使後方社會秩序絕對的安定。我全國同胞，尤其要知道中共的全面叛變，和他徹底破壞社會秩序，是互相呼應，互相配合的。自從我們對日抗戰以來，中共始終一貫反對國府抗戰建國的工作，肆意作誣蔑詆毀的宣傳，其目的就是要離間我政府與國民的關係，分散我中華民國整個的力量，貶損國家的地位，抹煞我全體軍民抗戰的歷史，減低我人民救國的信心，沮喪我人民愛國的意志。他們不僅在學校、在社會、在工廠、在經濟界，造謠挑撥，擾亂破壞，他們並公開宣稱這種擾亂破壞行為，

是他叛亂的「第二道戰線」，而以軍事叛變為他「第一道戰線」，兩者互相策應，既可以軍事影響社會，更可以後方影響前線，這是何等險毒的陰謀，我不能不喚起大家及時防止。我可以向大家申言，政府這次實施總動員，一切必照法定的範圍，對於人民的基本權利，各級軍政機關，自必一體尊重；但是對於不顧國家危機，不守民族大義，甘受中共亂國殃民的指使，參加其「第二戰線」的工作而有擾亂秩序危害治安的行為，則政府為國家存亡與人民禍福計，自不能姑息養奸，必須負責取締，依照法紀予以處治。當此剿共軍事積極展開，前線將士浴血奮鬥的時候，凡我愛國同胞，務必萬眾一心，團結一致，認清目標，積極努力，乃可以加強軍事力量，縮短戰禍日期，及早達成戡平叛亂的目的。政府對於當前時局的決策，已見於國務會議的決議，這次的總動員，不僅為爭取勝利而動員，也為了求取國政改革與努力建設而動員，因此我更要為我同胞指出下列的兩點。

第一、我們要致力完成建國的工作。我們今天當然要集中力量，加強軍事，戡平叛亂，實現統一；而一面亦要努力建設，增進生產，來打破中共妨礙建國危害民生的陰謀。尤其我們實行憲政與推進民主的工作，決不因剿共軍事而稽延。中共高呼民主，而反對憲政，拒絕參加國民大會，盡力破壞建國程序的進行，這就可以看出中共是根本不願中國有憲政，根本不願中國實行民主，根本不願中國完成生產建設的。如果中國實行了憲政，他就要在憲政之前，解除其私有的武裝，喪失他叛國的根據；如果中國走上了民主的大道，由人民起來作國家的主人，則他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獨裁的恐怖政策，在人民大眾的公意之前，就無法行使其欺騙與壓迫；而且中國一旦實行憲政與民主，完成經濟建設應有的工作，他就不能製造社會的混亂與經濟的恐慌，就無法憑藉人民的飢餓困乏，以遂其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陰謀。所以我要正告我全國同胞，正告全國真正為民主自由與建立現代國家而努力的同胞，我們要實現民主憲政，完成建國工作，必須剷除這個與民主自由及復興建設根本不能相容的中共武裝集團。同時正因為要使中國脫離了恐怖主義，製造混亂，製造飢餓的魔爪，我們更應該急起直追，完成憲政準備，實行民生主義，保障人民的基本權

利，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絕不能絲毫動搖我們一貫的信心，鬆弛我們應有的努力。

第二、我們要全力促進國家的改革與進步。我們現在一面要執行剿共戰事，一面就要改革內政。我不諱言政府的本身，存在著種種缺點，而我們社會亦存在著許多弱點；經過八年艱苦的抗戰，接著就有中共叛變的禍亂，使政府與社會不遑喘息，治標治本，難於兼顧，國力民力更加疲敝，戰後各種缺點弱點更形顯露，以致人民痛苦日益加深，整個民族意志分散，如果政府不能斷行改革，力求進步，我們國家就無法存立於當代的世界。因之我們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各方面的改革，決不能待剿共軍事結束，而應該立刻開始實行，我們要從徹底的改革中間，充實國家的力量，解除人民的痛苦，統一政府與人民的意志，以突破國家當前所面對著的國難。我們同胞，對於政治經濟的缺點，和民生痛苦的所在，凡有意見貢獻，政府無不竭誠採納，努力改正；對於各級政府施政上的錯誤，更望指明事例，剴切舉發，俾資切實糾正。我們這次實行總動員，就是要集合政府與人民的力量，一德一心，自反自覺，來刷新政治的積弊，割除一切妨害國家進步的阻力。所以我們總動員的意義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責成人民，而同時也是鞭策我們各級政府和各地社會的進步和建設。中正許身革命，一貫為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為實行三民主義而奮鬥，為統一建國與實現民主憲政而奮鬥，個人的成敗得失，毀譽榮辱，都非所計；我所可揭示於我同胞的，只有救國救民的一片耿耿忠誠；我決不能辜負國父與革命先烈，決不能自背革命救國的初衷，決不能辜負八年抗戰患難與共的軍民同胞；我必竭忠盡智，以保持我們抗戰勝利的成果，任何妨害我們主義實現，破壞我們國家統一，阻礙我們國家建設與進步的敵人，我誓必領導我全體同胞生死不渝，始終一致的奮鬥到底。

我全國同胞們：到今天七七抗戰神聖紀念日，我要求全國同胞重振我們抗戰時期舉國一致奮勇邁進的精神，而堅定我們對於掃除建國障礙，完成建國大業的信心。我在抗戰勝利時，曾經宣示我全國同胞：「我們戰後復興建國的任務，比之戰時更要十倍的艱鉅」。以我們中國近百年來遭受內憂外患的深重，以我們國家社會基礎的薄弱，要造成一個富強康樂獨立

自由的新中國，本來不是旦夕之間所能期成的事。但是我們國家歷史這樣的悠久，人口這樣的眾多，民族德性這樣的優秀而堅忍，我可以斷言任何頑強的阻力，決不能妨礙我們國家的復興。只要我們同胞以抗戰期間同樣的決心和忍耐，一致奮起，積極努力，則中共的叛亂，必能於最短期內，予以戡平；我們克服了這一個最後困難掃除了這一個最大障礙之後，國家民族就可進入於光明燦爛的坦途。所以我們同胞，切不可為中共虛偽的宣傳所迷惑，不可因當前局勢的艱難而灰心喪志以動搖其自信。我願同胞們無忘當時「抗戰必勝」的誓願，堅定我們「建國必成」的信念，發揚抗戰勝利的偉績，突破一切的艱難險阻，肅清中共掃除赤禍，以完成建國的大業，而安慰我們為抗戰與剿共而犧牲的軍民先烈之靈。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告全國同胞書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華民國總統 蔣中正

編者按語：三十五年前蔣介石先生之“為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告全國同胞書”，一不知大陸讀者讀後會有何種感想？二不知今日台灣讀者和海外花華人讀之又添何種感想？三不知今日之聯合國秘書長者流亦有何種感想？總而言之，只要想到一個失敗者尚能如此地堅持，既能夠在內內外外的壓力之下，處變不驚，苦撐待變；又能夠捍衛祖國寶島，建設祖國寶島……。今日大陸正在為重建我大中華民國而奮鬥的志士們，還有，就是今天正在賣力向腐爛中共政權出賣我大中華民國台灣，和企圖加緊分裂我大中華民國國土的不孝子孫們，你們究竟又會怎樣想呢？

海內外全體同胞們：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違反憲章規定，通過阿爾巴尼亞等附匪國家之提案，牽引毛共匪幫竊取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我們本漢賊不兩立之立場及維護憲章之尊嚴，已在該案交付表決之前，宣佈退出我國所參與締造的聯合國。同時聲明，對於本屆大會所通過此項違反憲章規定的非法決議，中華民國政府與全中國人民，決不承認其有任何效力。

毛共匪幫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叛亂集團，對內殘害人民，罪惡如山，乃全中國人民尤其是大陸上七億同胞之公敵；對外肆行顛覆侵略，為聯合國所裁定之侵略者。目前大陸雖為毛共匪幫所盤踞，但以臺澎金馬為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乃是大陸七億中國人民真正代表——代表他們的共同意願與痛苦呼聲，並給與他們反抗毛共暴力，爭取人權自由以最大的勇氣和希望。所以無論根據聯合國憲章原則，人道主義與自然法則，尤其是全中國人民的公意，都決不容毛共匪幫非法占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與安全理事會中之席位。

一九四四年我國參與敦巴頓橡園會議，簽署聯合國宣言，以及後來參加金山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並制定憲章，其目的在「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的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為達到此項目的，乃規定了聯合國的宗旨與原則，相期共同信守。詎本屆聯合國大會自毀憲章的宗旨與原則，置公理正義於不顧，可恥的向邪惡低頭，卑怯的向暴力屈膝，則當年我國所參與艱辛締造的聯合國，今天業已成為罪惡的淵藪；歷史將能證明，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實際上就是聯合國毀滅的宣告。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是堅持正義、愛好和平，現在我國雖已退出我們所參與艱辛締造的聯合國，但是我們今後在國際社會中必當仍以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為準繩，繼續為維護國際間公理正義與世界和平安全而勇毅奮鬥。

在此，我要嚴正聲明：恢復大陸七億同胞的人權自由，乃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共同意願，乃是我們決不改變的國家目標和必須完成的神聖責任。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對於主權的行使，決不受任何外來的干擾，無論國際形勢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將不惜

任何犧牲，從事不屈不撓的奮鬥，絕對不動搖，不妥協。

我要警告世界人士，在過去短短的半世紀之中，這個世界早已發生兩次慘不堪言的戰禍。第一次世界大戰創鉅痛深之後，大家為了避免再遭戰禍，乃組成國際聯盟，期以維護世界的正義與和平。後來因為有些國家懼於侵略者的威脅，以為向邪惡低頭，向暴力屈膝，便可換來屈辱的和平，其結果國際聯盟因而癱瘓瓦解，不能發生制裁侵略與維護正義的作用，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隨之爆發。今天有些民主國家竟隨同附匪集團，牽引毛共匪幫非法占有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與安理會的合法地位，其想法與做法，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若干國家的情況完全相同，必將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維護正義的道德勇氣，乃是世界安全和平的堅固磐石；而強權政治的「霸術」運用，則是走向戰爭的道路。

同胞們：我們國家的命運不操在聯合國，而操在我們自己手中。國父說：「存在之根源，無不在於國家及其國民不撓獨立之精神，其國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劫，而後可以自存於世界。」今天我們革命基地所擁有的人力資源與經濟力、軍事力和支持這兩種力量的精神力，尤其是大陸上七億反共人心與國外一千八百萬反共僑胞的愛國心，無論在亞洲和世界，中華民國絕非可以任人支配出賣的弱者；而且我們對於改變世界均勢與決定人類命運，實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所以大家不可祇知別人的行動可以影響我們，應知我們的行動實可以使這個世界發生重大變動。

當前的國際形勢雖然很險惡，但是，祇要我們自己自強不息，便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們動搖；祇要我們自己勇敢振奮，便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我們屈辱；祇要我們堅忍奮鬥到底，最後一定成功。大家應知，自來革命的勝利果實，都是從巨變之中孕育產生出來的。

大家尤其要認清，現在世局的變化，乃以中國問題為中心；而中國問題如何解決，亦將決定整個世界人類的命運。所以我們在這個大變局中，實處於無比重要的關鍵地位；而我們奮鬥的成敗利鈍，也將決定世界的安危與人類的禍福。我們決不靜觀或坐待世局的變化，一定要爭取主動，掌握變化，積極奮鬥，制敵機先。

二十年來，匪幫不斷發生奪權鬥爭，近且愈演愈烈，實可充分說明毛匪思想與共產制度均已完全破產。大陸人民包括大多數共黨幹部，已由失望而實行反抗，毛共匪幫眼看腳下的反共火山要爆發，鎮壓不了，無路可走，遂改變對外戰略，欲藉詭詐欺騙，苟延殘喘；實則毛共匪幫決不能改變它「反蘇修」、「反美帝」與「反一切反動派」的目標。故其對外戰略的改變，更使它在思想路線與政策路線上進退失據，造成更嚴重的紛歧混亂更劇烈的奪權鬥爭；從而將使大陸上的反共勢力與抗暴鬥爭乘機加速擴大起來。面對這種形勢的轉變，所以我們更要堅定信心，充實力量，強固戰備，俾能迅赴事機，加速大陸上反毛反共革命鬥爭的燎原之勢。

同胞們！反共鬥爭的行程，正如在風雲變幻莫測的海洋中操舟前進，祇要大家對於反共的基本形勢，都有共同的認識，不為一時的變局所迷惑，緊緊把握正確的方向，精誠團結，協力同心，禍福相倚，甘苦與共；在風平浪靜時，不鬆懈，不苟安，不驕惰；在暴風雨來襲時，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形勢愈險惡，我們愈堅強，愈奮發，必可很快到達彼岸，拯救同胞，光復大陸。

蔣介石

才是高尚的民族主義者

編者按：回首識蔣，愈知蔣之人格和行為的不朽。如不必僅儘以四九年的成敗來論英雄，則蔣確乎是我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蔣不是，何人能是乎！

1923年8月16日，蔣介石先生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前往蘇聯考察，三個月之後，也就是12月29日回國。這本是一次標準意義上的「北天取經」活動，問題是，蔣僧與唐僧不同，他發現「北天」並非極樂世界，他說：「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

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他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裏交待：「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我們現在找不到蔣的《遊俄報告書》，但是從他的書信集裏，還是能收集到諸多遊俄體會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蔣不遊蘇還好，遊了總共三個月，他就打定主意要反蘇反共了。

蔣給廖仲愷寫了封長長的信，說：「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祇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其利於本國與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國代表總是倒楣，以張某作比者，乃離事實太遠，未免擬於不倫。其故在於中國人祇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則將來恐也不免墮落耳……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則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自辭也。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為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

為個人忠臣相譏諷、弟自知個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報君，不失其報國愛民之心，至於漢奸、漢奴，則賣國害民而已也。吾願負忠臣卑鄙之名，而不願帶洋奴光榮之銜，竊願與兄共勉之！」

看這書信，不由得感歎，蔣既有先見之明，還有難得的一腔忠誠。完全可以說，蔣才是標準的高尚的民族主義者。歷史好像特喜歡調戲人：蔣在國共兩黨尚沒有成為仇敵之前，就發現自己未來的對手淪為了俄奴；而他未來的對手則在很久之後才用同樣的手法攻擊他是美奴。不過相形之下，還是應承認蔣的英明的，因為他年紀輕輕（時年 36 歲，四年之後，他就不惑了，那一年，他將共產黨清除出了國民黨），就那麼地具有先見之明，隨著歷史的發展，他對蘇俄的認識和概括，不幸被一一言中。首先，主義與事實不是一回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一個新的羊頭。現在，蘇俄不掛了，我們還掛得很高，高到百姓們連羊頭的影子也看不見了。其次，俄國素無好心，晚清的中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民國以後的歷史是最好的證據，“共和國”時代的歷史更是最好的證據。再者，蘇俄的專制與恐怖與三民主義或者說與自由民主是格格不入的，蔣踏上蘇聯國土三個月就能看出，真想不出中國隨後恁多的留蘇學生在蘇俄呆了恁長時間都發現些什麼？！

（網上文選）



蔣介石 領導浴血抗戰記實

《中日決戰》連載之三：艱難歲月

大陸 孫挺信

1

蔣介石於 1939 年末在長江下游兩岸發動的空前規模的冬季攻勢，給日軍以沉重打擊。同時，使日軍看到了蔣介石軍隊的強大和對侵華日軍構成的嚴重威脅。於是，招致了日軍一系列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殘酷報復。這就是 1940 年以後近兩三年的艱難時期。

1940 年初，日本方面為抵消重慶國民政府，決心推出汪精衛，建立全國性的漢奸政權。“建國”的人選、組織、機構都早已按日本人的旨意準備好了，只等“黃道吉日”，粉墨登場。

1月16日。

汪精衛向蔣介石發出通電，威逼他趕快向日本人投降，否則，他的“新中國”一成立，重慶國民政府就將被取代。通電稱：

兆銘（汪精衛）對救國夙有決心，如先生始終堅決予以拒絕，則兆銘即不能再顧慮此事，勢必先全力謀求局部和平，再選擇到達全面和平之途徑。除此而外，別無他途。先生如能以國命民生爲重，此時毅然決定大計，與日本停戰媾和，根據近衛聲明之原則，以求其具體實現，則兆銘及各同志必能與先生同心協力，迅速實現全國和平。

蔣介石對汪精衛發出的通電，不予理睬。

3月30日。

南京城各高大建築物上突然掛起一面面青天白日旗。各主要街道上，一群又一群的遊行隊伍，喊著和平建國的口號穿城而過，大街小巷橫空扯起了大幅標語：

熱烈慶祝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和平建國萬歲！

上午。

一長溜大小汽車越過鐵路，行駛在南京城中央大道上。汪精衛的新“中央政府”各院部及委員會的頭面人物，佇立車上。好一派春風得意景象。

車隊駛入“國民政府”院內，在甯遠樓舉行就職典禮。汪精衛身著禮服，站在麥克風前，聲嘶力竭地宣讀了《還都宣言》。

爲了混淆海內外視聽，更好地取代重慶國民政府，汪精衛的“新中央政府”，除名稱上照搬重慶政府外，還把南京政府裏所有機構的名稱，一律照搬重慶政府的模樣兒，甚至還別出心裁地把南京政府主席的“尖尖帽”，硬戴在現任重慶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頭上。汪精衛自己只屈居“主席”之下的行政院長（兼代理政府主席一職）。

但是，正當“還都”劇演到高潮之時，鼓樓和市中心新街口等處，卻響起了乒乒乓乓的槍聲。隨著槍響，“國旗”上頓時現出槍眼若干。甚至有的旗杆被“神槍手”擊中，“國旗”頹然倒下。

正在遊行的人們，開初還以爲是哪里在放鞭炮慶祝，但當那槍子兒嗚嗚怪叫著從頭頂上飛過時，這才

瞠目結舌了。只見一群群日本大兵在街道上提著槍，指著“國旗”大罵不休。

汪精衛得到日本兵槍擊“國旗”的報告，立即派梅思平代表“新中國”政府，前往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交涉。

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回答梅代表，按照事先協定，“國旗”上方必須加一塊三角形杏黃色布片，上書“和平建國”，或“和平反共建國”字樣，以區別於重慶抗日政府國旗。你們沒有按協定辦，因此，引起日軍官兵的憤慨。如果派遣軍聽任把沒有區別的重慶政府國旗飄揚在南京上空，勢必嚴重影響大日本皇軍的士氣，動搖皇軍軍心。因此，你們必須立即取下現在的國旗，換上有區別標誌的“國旗”。

汪精衛無法“獨立”行事，只得下令換上有區別的“國旗”。轉眼之間，南京城大街小巷又擡起一杆杆附有三角形黃布片的“國旗”來。

3月30日。

蔣介石從收音機裏聽到“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和汪精衛宣讀《還都宣言》的聲音，頓時大怒，下令中央電台開大功率，向全世界廣播，重申1939年6月8日，重慶政府發出的對汪精衛等人的通緝令。通緝令說：

汪兆銘違背國策，罔顧大義，於全國一致抗戰之際，潛離職守，妄主和議，並回應敵方謬論，希冀煽惑人心，阻撓大計。經中央加以懲戒，猶復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於上月秘密赴滬，不惜自附於漢奸之列，與敵往還，圖謀不軌。似此通敵禍國行爲，顯屬觸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之規定。此來海內外民眾同聲憤慨，先後呈請通緝嚴懲者，不下千餘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寬容，其何以伸張國法，慰我軍民。應即由全國軍政各機關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以肅紀綱。

接著，蔣介石下令懸賞十萬塊大洋，拿辦汪精衛人頭。

日軍爲了摧毀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意志，傾其海陸軍航空力量，對以重慶爲中心的西南根據地，進行了連續半年之久的狂轟濫炸。

5月20日至30日十天中，日機七次轟炸重慶，共出動飛機五百七十一架次。

6月，重慶被炸二十一次，日軍共出動戰鬥轟炸機一千一百一十八架次。

7月，敵機十三次轟炸重慶，每次出動飛機五十至一百二十架。

8月，重慶被炸十八次，每次出動飛機九十至一百九十架。

9月，重慶被炸五次，每次敵機六十至一百架之間。

10月，重慶被炸五次，五次敵機均在一百架以上……

敵機在轟炸重慶的同時，成都、自貢、樂山、宜賓、萬縣、南充等大中城市盡數受到毀滅性轟炸。連巫山、奉節、雲陽、涪陵、墊江這些不設防的小縣城，也受到日機一次次一遍遍地轟炸，房屋被夷為平地，許多小縣城的居民還不知飛機為何物，初見敵機光臨，都拿了紙錢對天焚燒，抓了白米照天上撒，跪在地上對天磕頭作揖，以為那是天上來的神物。

這些嗡嗡怪叫的天上神物，就照著地上大群大群的燒香拜神者俯衝掃射，向他們頭頂上扔炸彈。

7月31日，中午。

上百架敵機順長江而上轟炸重慶，途經涪陵時，也給這座長江邊上的小山城帶來了災難。

機群臨空掠過，燃燒彈雨點似地傾倒下來。千千萬萬的市民呼號掙扎……住在小東門廬陵會館的上千名受訓新兵，被炸彈炸了個中心開花。會館變成了焦土，到處是殘缺的肢體，一些炸彈落到長江和烏江匯合口，江水裏飄浮著數以億萬計的死魚死蝦，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一切都無一倖免，倍遭戰爭塗炭。

地處莽莽巫山叢中的巫山縣城，是一座從屈原那個時代起，就有著說不盡道不完的民間優美傳說的小城鎮。神女峰、望天坪、楚陽宮……每一個傳說都飄散著長江文化的清香淳秀，每一個傳說都飽含著巫山人民的智慧和善良。但是，他們卻首先“品嚐”了當時最為毒烈、殺傷力最為殘酷的空爆炸彈的轟擊。敵機走後，長江邊上那座明珠似的小山城被燃燒彈焚為灰燼，男女老幼死傷枕藉。倖免於難的居民，在蘇鵬舉的國民自衛隊和駐軍的幫助下，上山割來羊鬍子草搭成窩棚，因而在《巫山縣誌》上留下了“草城”時期的歷史記載。日本飛機經常從沙市機場起飛，前去轟炸重慶，總忘不了要丟幾個燃燒彈燒草城。

大後方民眾，已經到了無處安身的境地。

巫山縣中學，被迫在離縣城三十多公里的早陽鄉的一個山洞裏上課，被人們稱為岩洞中學。

1936年6月11日，夜間。五十四架敵機突然飛臨四川首府成都，投下大量燃燒彈。文化古城被巨大的火海吞食，火光映紅了半邊天際。離成都六十餘里的新繁鎮上的人們，都能看見成都上空那舔食天穹的紅紅的火舌。許多市民全家被炸，燒死及受害者在六千人以上。

1940年10月27日，白天。大批敵機轟炸成都，數以萬計的市民驚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敵機俯衝掃射的活靶子，錦江河畔血流成河。

1940年8月19日上午。

敵機一百九十架轟炸重慶。

蔣介石正在舉行軍事會議，會議室附近連中數枚炸彈，玻璃窗亦被震碎。

最高統帥部——軍委會軍令部、軍政部被炸得一塌糊塗，火光沖天。

敵機剛去，蔣介石和宋美齡來到他的統帥部，映入他眼裏的是嗆鼻的濃煙，灼人的烈火，還有電線杆上、樹杈上掛著的被炸爛的軍裝布，血淋淋的斷手斷腳，他也分辨不出那些玩意兒是哪位高參身上的了。冒著硝煙的焦土上，遠處崖壁上濺滿了濃腥味兒的人血和灰白色的腦漿。

受傷的在血泊中掙扎，沒受傷的在奮力撲火、搶救戰友。統帥部仿佛是一幅德拉克羅瓦筆下的《希奧島的屠殺》，又仿佛是米開蘭基羅的油畫《洪水滅世》。

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見了這血雨腥風的慘景，禁不住鼻頭一酸，流下淚來，趕忙摸出手帕抹眼睛。

蔣介石一動不動地立在壩子中間，臉色鐵青。離他夫婦倆不到十米的地方，軍令部二處年輕的少校參謀裴先章和公務員吳某，正在排除一顆嗖嗖冒煙、即將爆炸的燃燒彈。近在咫尺的危險，蔣介石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裏，但他沒有動，一直站在那兒，此刻，復仇的怒火使他忘記了一切。

他的眼光越過院子。山城，正燃燒著沖天大火，各處不斷傳來定時炸彈的轟隆聲。

蔣介石決定在 1940 年夏季，對長江中、下游之敵發動一場比冬季攻勢規模更大的夏季攻勢。第五、第九、第三戰區，根據這一戰略意圖，在冬季攻勢結束後，立即著手整訓部隊，準備大反攻。

但是，曾受到冬季攻勢沉重打擊的華中日軍，決心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報復作戰，現在又偵悉重慶方面將發動夏季反攻，決心以先發制人手段，打破第五、第九戰區的夾擊重壓，爭取主動。

日軍中央陸軍部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批准了這一先發制人的作戰方案，第 11 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迅速調集了第 3、第 13、第 39 三個師團和第 40、第 6 兩個師團各一部，於 1940 年 5 月 1 日，發動對李宗仁第五戰區的進攻。

日軍兵分三路進擊。

第一路：第 3 師團和石本支隊，由信陽以北向西進攻；

第二路：第 39 師團和池田支隊，由隨縣向襄陽進攻；

第三路：第 13 師團，由鍾祥向北進攻；

到達棗陽地區後，與中路第 39 師團和池田支隊並排向西進攻。

日軍企圖以左、中、右三路同時西進，將第五戰區主力迂回包圍於棗陽地區唐白河畔，予以殲滅。

5 月初旬。

蔣介石致電李宗仁，指示：日軍之戰術為速進速退，在一周內就能恢復原來態勢，故應夾擊與截擊其退路，以消滅敵人。

李宗仁認真按照蔣介石意圖，命令戰區主力各部，避開日軍進攻鋒芒，向側面山地退避，只令小股部隊阻擊遲滯日軍。

5 月 4 日。

日軍第 3 師團和石本支隊一路猛殺，攻陷泌陽，準備乘勢向西猛進，突然收到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的十萬火急電報：

湯恩伯第 31 集團軍開始南下，其精銳部隊 4 日到達泌陽北側，有於當夜攻擊第 3 師右側背之勢……

該路日軍一聽說湯恩伯軍到來，立馬慌了神，停頓下來，搶佔有利地形，構築陣地，準備迎戰。

園部軍司令官還很不放心，當即又調一個旅團配屬第 3 師團，以加強抵抗力量。

第 3 師團等部（約兩個師團兵力），在泌陽提心吊膽地呆了三天並未遇到湯恩伯軍，才壯了膽兒，於 5 月 7 日繼續西進。

5 月 8 日，襄東平原。

各路日軍會師於棗陽地區，卻撲了個空，中國軍



隊主力早已不在此地。

5 月 8 日，重慶。

夜間，蔣介石向李宗仁發報：日軍企圖向原駐地退卻，第五戰區應以全力先在戰場附近圍殲敵軍，然後向應城、花園一線挺進。

5 月 10 日。李宗仁指揮的張自忠、湯恩伯等四個集團軍和其他部隊，已將日軍包圍於唐白河畔、襄東平原，準備將其殲滅。但是，日軍此時並未疲憊，戰力仍強，圍殲日軍變成了一場短兵相接的大血戰。

園部和一郎得到報告：第五戰區第 33 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親自率領五個師的部隊渡過漢水，進入東岸。在重圍中殺得兩眼發紅的園部和一郎，頓時感到可以借此狠咬中國軍一口。立即命令第 13、第 39 兩師團和池田支隊等部，南下包圍第 33 集團軍。

此時，第 3 師團等部頓呈孤軍。湯恩伯集團軍等部，迅速從四面蜂擁而至，將敵包圍，予以痛殲。日軍不支，拼死殺出一條血路突圍。

張自忠將軍的情況卻日趨嚴重。

張將軍所部原駐守襄河西岸荊門地區。當日軍長驅直入，直下棗陽，並向第五戰區長官部駐地襄陽進攻時，他接到李宗仁命令，令其渡過襄河截擊日軍。張自忠決定親自率領突擊隊過河作戰。集團軍副司令馮治安將軍竭力勸阻，但無法改變張的堅決態度。馮又提出由自己率隊過河作戰，張仍執意親征，不容更議。

出發前，張自忠面對沉沉夜色，深知自己此去生死未卜，對祖國破碎河山油然升起無限眷戀之感，提筆給馮治安留下遺囑，決心以身報國：

仰之我弟：因為戰區全面戰事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 38D、179D（D：師的代號）取得聯絡，即率該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設若與 179D、38D 取不上聯絡，即帶馬之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何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

張自忠率領直屬特務營和第 74 師渡過襄河，立即投入激烈戰鬥。5 月 8 日，在新街與敵遭遇惡戰一場；5 月 9 日，揮師北進；5 月 10 日，到達峪山，與峪山之敵展開血戰。

此時，園部得知張自忠行蹤，將張部一個師誤認為五個師，傾其三路大軍中的兩路圍殲張部。

張自忠與絕對優勢的日軍血戰數晝夜，予敵重創，但始終未能突出重圍。

5 月 16 日。

張自忠左臂中彈受傷，仍鎮定自若地指揮部隊作戰。戰至下午兩時許，張自忠身中數彈，壯烈殉國！

隨張自忠作戰的全體將士，亦在南瓜店十里長山，全部戰死。

重慶。

天低雲暗，苦雨瀟瀟，山城在雨霧中靜靜地淌淚。

巍峨的朝天門碼頭，站滿了自動前來迎襯祭悼張自忠上將遺體的各界群眾。

蔣介石一身戎裝，佇立在滔滔的大江邊，他的身後，肅立著重慶國民政府的“文武百官”。

江水的浪濤聲，仿佛成了萬民悲悼張將軍的哭聲；

從天而降的雨絲，似乎是神州人民哀悼張將軍的淚水；

迷茫的江面，船影點點，長長的汽笛聲，像是在呼喚著將軍的忠魂……

民族的優秀兒子張自忠回來了！他的遺體和忠魂一起從前線歸來了！朝天門碼頭，大江兩岸，傳來千千萬萬的哭泣聲！

蔣介石凝視著緩緩而來的江輪，緩慢地抬起右手，向大江，向張將軍忠魂致以莊嚴的軍禮！

國民政府為張自忠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全國各地都舉行了追悼和公祭儀式……

張上將是一方面的統帥，他的殉國，影響之大，決非他人可比……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我國抗戰軍人之魂！

3

1940 年 5 月下旬。

第五戰區的戰況更加嚴重了。

佔領了棗陽地區的日軍，以第 39、第 3 兩個師團，於 5 月 31 日下午，在強大炮火長達一個半小時的轟擊後，由襄陽南面強渡襄河，突破了第五戰區的襄河西岸防線。幾天之內，日軍接連攻陷襄陽、宜城、南漳、荊門、遠安等地，從北面向四川門戶宜昌撲來。

6 月初旬。

日軍第 40、第 13 兩個師團、池田支隊、漢水支隊等部組成南路大軍，在沙洋南北地區強渡漢水，連下沙市、江陵、十里鋪等地，馬不停蹄地向宜昌猛進。

南路日軍的戰略企圖是：切斷宜昌地區中國軍隊主力的退路，配合北路日軍，進攻宜昌。

宜昌週邊防線，已被日軍撞開、沖亂。宜昌守軍正處於被各個擊破和節節敗退之中。

宜昌扼川江門戶，是戰時首都重慶和西南大後方的咽喉所在。宜昌的得失影響甚大。日軍向宜昌南北夾擊猛進，對重慶統帥部震動很大。大後方民心浮動，謠言四起，紛紛傳言日軍將進攻四川內地了。

6月3日。

蔣介石急令陳誠趕往前線，組建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全權指揮宜昌保衛戰。

陳誠打點行裝準備出發。蔣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張治中將軍與陳過從甚密，將其拉在一邊，搖頭歎道：“五戰區敗了，宜昌必失無疑，你卻現在去守宜昌，太老實了，這是任何人都不願去的。”

陳誠亦感到情況不妙，但他對蔣介石唯命是從，故以苦笑謝過張將軍的好意提醒，強打精神掛帥出征。

6月4日。

陳誠風風火火趕到宜昌，在郭懄的江防軍司令部所在地三斗坪設立了右兵團指揮部。此時，他面對的已是一個被打得七零八落的爛攤子，宜昌的兵力亦甚空虛。

原來，擔任宜昌地區江防任務的主要是郭懄的江防軍（三個軍）。蔣介石曾有令在先，沒有軍委會最高統帥的命令，任何人也無權調動江防軍一兵一卒。但是，當6月1日北路日軍攻陷襄陽時，李宗仁覺得兵力不夠用，便嚴令江防軍主力第94軍北上，向京山、隨縣、棗陽之敵側後迂回襲擊，以解襄陽之圍。

出於第94軍被調走，江防兵力頓感空虛，無力阻擊日軍向宜昌的進攻。

陳誠急令在湖南整休補充的李延年第2軍趕赴宜昌東北面，在龍泉鋪、鴉鵲嶺、安福寺一帶組成第二道防線，又令遠在四川萬縣地區整訓的第18軍星夜兼程趕來宜昌“救火”。

第18軍趕到宜昌，尚未部屬就緒，日軍便兵臨城下了。敵軍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分三路向城郊進攻。激戰一天，陣地被突破，宜昌城內已是火海一片。

6月14日。

日軍攻陷宜昌城。

6月16日。

李宗仁指揮第五戰區部隊，對當陽、荊門、宜昌之敵發動反攻。

陳誠嚴令第18軍軍長彭善奪回宜昌。第18軍以屍山血海之代價攻進城去，收復了這一戰略要地。

6月中旬，東京。

就在第18軍奪回宜昌之時，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和海軍部軍令部長，並排站立在天皇面前，報告中國戰場情況。軍令部長提出宜昌作為海軍航空隊轟炸重慶的中繼基地，有著極大的戰略價值，要求佔領該地。

天皇當即追問參謀總長，“你們陸軍難道就沒有辦法重新奪取並確保宜昌嗎？”

於是，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向中國派遣軍下達重新攻佔宜昌的命令。

日軍又增加兵力，在飛機瘋狂轟炸下再次攻佔了宜昌城。中國軍隊數度反攻，敵據城死守，反攻無效，且傷亡慘重。陳誠只得下令停止反攻，調整部署，在城西長江三峽口處，憑險防守，與敵咫尺相峙，互聞雞犬之聲。

宜昌要地失守，是八年抗戰中，蔣介石感到危機最大的一次。重慶朝野上下，輿論一致譴責宜昌保衛戰的指揮官陳誠，使這位蔣介石重臣的赫赫威名一落千丈。他不僅受到國民黨內、軍內和政府內一些要人的圍攻，民眾對他也非常氣憤。在當時的國民參政會上，有人公開散佈“不殺陳誠不足以謝國人”的言論。

陳誠認為宜昌失守的原因，與李宗仁在關鍵時刻判斷失誤，抽調江防軍主力北上有直接關係。他陳某只是在戰役中途臨危上陣，當時敗局已定，決非他陳某過錯。宜昌失守，他陳某實為代人受過，徒招恥辱。

但他覺得自己有口難辯，負辱回到重慶，自知丟失國府都門罪責匪淺，哭喪著臉前去見蔣介石，請求處分。

蔣介石叫他坐下，好言相慰，說：“宜昌守不住，早已在我意料之中。當時五戰區的情況就那樣兒，我是因為沒辦法了才叫你去抵擋一陣子的，對此，你不必過疚。”

陳誠對蔣介石的明斷感到敬服。對李宗仁不主動承認自己責任，一直悶著不吭聲，聽憑輿論對他陳某攻擊，而心懷不滿。

4

1940年夏季。

蔣介石和重慶國民政府面臨的局勢是異常嚴峻的。

日軍佔領宜昌，如同一把鋒利的鋼刀，將第五、第九戰區對武漢形成的銅牆鐵壁似地防禦體系，給劈為南北兩半。“鋼刀”的鋒刃直對陪都重慶。

此時，國際局勢亦風起雲湧，急劇變化。就在日軍攻佔宜昌之時，華南日軍又向法屬印度支那國境出動，切斷了經由越南進入中國廣西、雲南的國際援助路線。

7月中旬。英國政府出於自身利益，與日本簽訂協定，宣佈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規定在此時間內，禁止軍械、彈藥、汽油、載重汽車及鐵路材料等抗戰物資，經緬甸運入中國。

重慶和整個西南數省各大中城市上空，幾乎每天都有上百架日本飛機編隊臨空，向下傾倒炸彈。在炸彈的轟隆聲中，大地在瑟瑟打抖，在流血和燃燒。

人心惶恐不安，一日數驚。

爲了安定民心，鎮靜內部，蔣介石在中央電台發表演講，誓言重慶國民政府將堅定不移地抗戰到底，堅持獨立自主地抗戰方針，以不變應萬變。

來自長江方面的危機最爲緊迫。

反攻宜昌，至少在目前狀況下是無能爲力的。北岸，李宗仁的第五戰區部隊被日軍緊緊擠壓在鄂西北偏僻山區，已不便於顧及和指揮宜昌這個缺口了；南岸，薛岳第九戰區主力被遠遠甩到了側後，因而對江南鄂西地區和湘西地區的防務，亦是鞭長莫及。

以宜昌爲中心，北起鍾祥，西迄常德，形成了一個數百里的空間，一個混亂複雜而薄弱的結合部。

宜昌以上的長江三峽段，成爲拱衛重慶的天然屏障。若宜昌之敵繼續西犯，突破三峽天險，則重慶自

然不保。若再失去重慶，國民政府就再無立錐之地了。

蔣介石決定在宜昌方面，新建立一個第六戰區。他在軍委統帥部最高幕僚會議上指出：“倭寇已緊逼陪都大門，我們已沒有了任何退路，新建立之第六戰區，負責拱衛重慶門戶，這是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關係到民族存亡的大事。因此，第六戰區比其他戰區

的責任更爲重大，比其他戰區的戰略地位更爲重要。我們的任務和口號是，軍事第一，第六戰區第一！”

誰出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蔣介石沒有點將，將領中也沒有自告奮勇者。

第六戰區責任重大、特殊，若守不住這大門，作爲司令長官被殺頭事小，背上個亡國之罪而遺臭萬年卻使人望而卻步。

會後，陳誠來到蔣介石住所，請求讓他去守這個大門。他說，“宜昌是在我手上失掉的，理應由我去守。”

陳誠當時身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和三青團書記長等要職，蔣介石覺得將其放到戰區，有點兒委屈了他。

但陳誠卻執意堅辭所兼中央高官，決心去第六戰區戴罪把守都門，並發誓擋住日軍。若陪都門戶有失，願將自己頭顱擲地。

其實，蔣介石也覺得只有陳誠去守這個門戶，才使他最爲放心，便允准了。

兩人在一起商議組建第六戰區的有關問題。蔣介石問陳準備將長官部設在什麼地方。

陳誠早已胸有成竹，說出一番見解來，“日軍若從長江方面進攻重慶，江北，有縱橫數百里的巫山和神農架原始林區擋道，因此，敵使用大兵團從江北進攻的可能性極微。從宜昌向西仰攻三峽天險，亦可能



蔣委員長在廬山談話會宣布最後關頭已到，決定對日抗戰。

性不大。江南的川湘鄂三省相銜接的邊境地區，大多爲丘陵、山嶽地帶，湖南的常德、沅陵、辰溪經四川的黔江、彭水、涪陵，有公路與重慶相通；湖北的巴東、恩施、宜恩、咸豐亦有公路通四川的黔江而達重慶；宜昌南岸的安安廟經木橋、野三關到恩施、建始，有一條人行大道入川，直抵重慶。這些公路和大道，便於大部隊運動。因此，據我判斷，日軍若攻重慶，必然從江南而來。第六戰區的防禦重心應放在江南。六戰區長官部也應置於鄂西恩施。”

蔣介石對陳誠的意見甚表贊許，意味深長地說：“恩施，據說古代的夜郎之國就是那個地方。我現在撥五個集團軍，四十萬兵力給你，望你這個夜郎之國，頂住日本這個世界軍事強國！”

8月中旬。

陳誠率領新湊齊的第六戰區長官部人員，由重慶來到恩施上任。並首先將他的五個集團軍的戰區直轄部隊進行了精心佈置。

長江上游江防軍總司令：吳奇偉。該部轄三個軍，駐防於巴東至宜昌的長江兩岸，在石碑設要塞，構築永久工事。在懸崖峭壁上鑿貓耳洞，配置機槍、炮群，封鎖長江航道，如同一把鐵鎖鎖住江防大門。

該部鄭洞國第8軍的榮譽第1師駐守天皇寺、雨台山一線，在山上居高臨下俯瞰宜昌機場。一次，敵轟炸機二十一架轟炸重慶之後，在此降落，該部立即以山炮直接瞄準射擊，擊中機場油庫，頓時火光沖天，將二十一架轟炸機全部焚毀。自此之後，敵機再不敢在這個機場降落。

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瓚緒。守備江南湘西的津市、澧縣及華容、南縣地區。

第10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之。守備江南石首、公安、松滋、宜都一線。

第26集團軍總司令：周宥。駐守江北霧渡河、分鄉場、遠安地區。該部第32軍415團1營一直堅守在宜昌西郊三遊洞山頭陣地，達六年之久，該營官兵與日軍陣地僅隔數十米，說話聊天相互都能聽清。

第33集團軍總司令：馮治安。擔任江北遠安以北洋坪附近守備。

戰區直轄第2軍軍長：李延年。部隊配置於江南巴東至野三關之間，以作機動。

陳誠來到施恩。這是一個地處叢山之中的市鎮，交通不便，居民不滿五千，而且已數次遭日本飛機轟炸，市面破敗不堪。陳誠同時兼任湖北省主席。當時的湖北有七十一縣市，比較富庶的已淪陷殆盡，尚能行使政權的不過三十一縣，均爲地瘠民貧的丘陵山地。平時民眾自給亦感困難，陡然增加幾十萬軍隊，以及從武漢、宜昌等地後撤、逃亡到恩施的公教人員及家屬、學生等數萬人，糧食和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更成爲最突出的難題。

爲了安定民心，鞏固防線，陳誠致力於軍、政兩途協調並進的戰區建設。

陳誠在戰區地方建設中，首先將鄂西的專員、縣長中的無所作為者都一個個地撤換下來，換上了有魄力、敢負責的人。鄂西不單地僻民窮，而且風氣特別敗壞，吸大煙、賭博、嫖娼盛行，土匪猖獗。陳誠上任後，制定了一連串的行政法令、法規，親自檢查督促，務求貫徹施行。對於違法犯規者，無論平民百姓還是國民黨官員，犯了哪條哪款，就按哪條哪款辦理，毫不留情。當時的宜昌縣長名叫武長青，此人是陳誠在保定陸校的老同學，與陳關係甚好。因包庇鴉片走私，違了法規，被陳誠下令逮捕，經審判後判處死刑，槍斃在七橋坎公開示眾；省糧政局恩施辦事處主任陳國良貪污腐化，被判死刑；利川縣有個搞兵役的營長賣放壯丁，吃空缺，被判死刑……經過一番整治，政府官吏基本上不敢怠忽職守，初步穩定了社會局面。

陳誠在第六戰區推行所謂的民生主義新經濟政策，以解決軍民吃飯問題。其主要手段和措施是：減輕當地農民負擔，努力增加社會生產；設立平價供應處，遏制通貨膨脹；保證軍隊、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家屬和教師、學生的生活必需品供應；鼓勵商品流通，保障工商業者生產。巴東縣有個叫朱立青的在江邊大道旁開了個榨油廠，常有過往的軍隊占住廠房，生產受影響。他便寫信給陳誠，述說苦楚，陳當即手書一道“工廠重地，不准駐兵，倘敢故違，嚴懲不貸。”的告示，寄給朱某。

自那以後，雖然仍常有軍隊過往，多有累、餓得走不動路者，卻再也沒人敢進民房工廠了。

收留逃亡教師和學生，興辦戰區教育事業。陳誠一到恩施就創辦了湖北省立師範學院、省立農學院和

省立醫學院。這三個學院的院長，都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博士，都是陳誠使盡手段、竭盡恭敬之意將他們從重慶等地請來恩施效勞的。

陳誠將逃亡到恩施來的大批教師、學生組織起來，興辦了若干所學校，統叫“湖北省聯合中等以上學校”，當地民眾稱為“聯中”，由陳誠親自兼任聯中校長。陳誠經常以一副文質彬彬、溫文爾雅的面孔，到教師、學生中來，笑容可掬地問寒問暖，徵求意見，贏得了知識界和廣大青年的擁護。他提出計畫教育方針，指派人員編印《計畫教育實施綱要》、《湖北省中等學校升學就業辦法》等教學法規。所謂計畫教育，就是全部實行公費教學制度，所有學校，都是培養各方面專業技術人材的地方。

陳誠親自抓教育，以嚴師態度，父母心腸，對待教師和學生。因為侵佔學生利益，他親自下令撤換了建始高中和巴東初中的校長；恩施一名糧倉主任，因將發了糧的玉米供應給學生，被關押了起來；利川一名學生被土匪殺害，陳誠頓時怒火萬丈，限令利川縣長于國楨在兩天內破案，抓獲兇手……1943年，日軍大舉進攻第六戰區，恩施岌岌可危之時，陳誠下令，省府以下各級公職人員一律不准擅離恩施。同時，他卻命令省教育廳三科科長王延傑火速去川湘鄂交界的安全地帶，為各校聯繫落實校舍，首先將學生和教師撤離。在戰鬥打得最激烈的幾天，他還打電話到教育廳，詢問各校撤離情況，並規定不准一個學生掉隊，否則，拿教育廳長是問。

陳誠初到恩施，為了解決軍糧問題，他跟第九戰區薛岳通了關係，薛某給了他一批糧食。湘糧運鄂西，千里迢迢，途經土匪雲集的永綏、保靖、龍山、桑植、酉陽、秀山、黔江等地，陳無力抽調大批部隊去川鄂湘邊區剿匪，特派了一名叫傅仲芳的老將軍前往匪窩子進行安撫召示，宣傳抗戰救國的道理，講明抗戰軍隊的艱難困苦。結果，土匪盜賊皆為之感化，千里山道運糧，暢通無阻。

陳誠採取了一系列的戰時措施，不僅很快就將第六戰區所在的那塊數省交接、貧窮險惡的三角地帶，建設成為抗戰較為堅實的前進基地，有效地拱衛了陪都重慶，而且還在社會各界為自己贏得了戰區建設典範的美名。

5

1940年，長江方面的正面戰場，受到日軍極其沉重的打擊，戰鬥力受到很大削弱。日本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中將向天皇報告：“1940年，與去年同期相比，中國軍隊戰鬥力減少了兩三成。中國軍隊的抗敵意識仍然旺盛，但有窮於補給的跡象。回顧1940年，中國方面由於我政、戰兩略的各種施策，受到了相當的打擊。”

這年年底，中國政府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向蔣介石報告，“1940年，我軍傷亡嚴重，據各戰區全年歷次戰報統計，傷亡共為三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人。是開戰四年來，傷亡最重的一年。”

1941年春。

華北日軍集中了七個師團的兵力，向蔣介石在黃河以北的最後地盤——中條山進攻。

中條山背臨黃河，橫亘於山西南部，東接莽莽太行山脈，西連巍巍稷山，長三百餘里，寬一百餘里，為屏障豫、陝，保障西北的戰略要地。1938年，冀察戰區總司令衛立煌將軍率領部隊進入山中，將該山分為東西中三段，分別由所部三個集團軍把守。

東段：絳縣至橫嶺關。由劉茂恩率其集團軍駐守。

中段：聞喜、夏縣一帶。由曾萬鍾的第5集團軍駐守。

西段：平陸一帶。由孫蔚如的第4集團軍把守。

衛立煌督率全軍二十六萬人馬，依著中條山山勢構築堅固陣地，把諾大個中條山變成一座堅固的城堡。在1938年至1941年初的四年中，日軍曾先後八次大舉進攻中條山，企圖打開這道黃河北岸的防線，向黃河以南進犯。日軍的八次進攻都碰了個鼻青臉腫，慘敗而回。衛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條山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

日軍卻認為，中條山衛立煌指揮的約二十六個師的中國軍隊，成為擾亂華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華北日軍腹中的“盲腸炎症”。

5月5日。

日軍決心要割掉這段“盲腸”，以七個師團的兵力，分九路從東、西、北三面向中條山進攻，來勢異常兇猛。

在此之前，蔣介石曾親往中條山前線視察，在衛立煌的總司令部召集高級將領訓話。蔣介石訓完話，要將領們當面表態，立誓死守中條山。各軍長官，群情激昂，紛紛立下鏗鏘誓言：盡忠職守，誓與中條山共存亡。

第 4 集團軍總司令孫蔚如將軍騎著戰馬檢查部隊陣地情況。他從各方面情況判斷，日軍此次進攻，意在徹底摧毀中條山守軍，自知此一惡戰，生死不保，決心指揮全軍與敵決戰，力挽狂瀾，以救國救民。他一時心潮激蕩，詩情洶湧，勒住戰馬，立於滔滔黃河之岸，隨口吟作《滿江紅》詞一首：

立馬中條，長風起，淵淵代鼓。
怒皆裂，島夷小丑，潢池耀武。
錦繡江山被蹂躪踐，炎黃胄裔遭荼苦。
莫遑巡邁步赴沙場，保疆土。
金甌缺，隻手補，
新舊恨，從頭數，
挽狂瀾作個中流砥柱。
剿絕天驕申正義，
掃除譴逆清妖蠱。
躋升平，大漢運方隆，時當午。

敵機一群群地飛臨中條山上空投彈，日軍地面部隊在大批坦克、戰車和騎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軍陣地撲來，很快突破了前沿陣地，將守軍分割包圍。一路日軍迂回中條山側後黃河岸邊，佔領了平陸等處的黃河渡口，切斷了中條山守軍的退路。

中條山守軍同敵人展開了空前悲壯的殊死搏鬥。許多山頭陣地被敵機轟炸削平。三百里中條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燒，都在怒吼，都在滴血！血戰一星期，中國軍隊死傷竟達數萬人之多！各集團軍總司令以下各級將官，都持槍在第一線戰壕工事裏與敵血戰。

包圍圈越收越緊。

守軍各部都面臨彈盡糧絕境地。有的部隊只有殺馬充饑；有的部隊已將戰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裏的野菜、野草充饑。各部隊仍誓死堅守在中條山上，沒有一個擅自後撤的。

5 月 7 日。

中條山中段血流成河。聞喜、夏縣、四交河、張鎮店等地的守軍已被日軍分割包圍，均呈孤軍奮戰狀態。

日軍第 36、第 37 師團和獨立第 16 旅團等部，向張店鎮以東猛攻，突破第 3 軍與第 80 軍的銜接處，該兩軍被迫轉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線抵抗。

5 月 8 日。

日軍蜂湧而至，進襲位於唐回的第 3 軍司令部，因敵眾我寡，唐回很快為日軍攻佔，第 3 軍也陷入重圍。

軍長唐淮源將軍命令部隊以團為單位突圍，爭取跳出鐵圈，轉入外線作戰。唐軍長親率軍部特務營和一個團的兵力突圍，但遭到日軍層層阻截，最後，在夏縣附近又陷入重圍。唐軍長指揮部隊左沖右突，無法沖出包圍圈，軍部與上級失去聯繫，無法求援，將士戰死殆盡。敵人幾次沖到軍部附近，特務營營長童鶴齡、副營長趙樹和士兵們揮舞大刀片，又將日軍砍了出去。

戰至 5 月 13 日，唐淮源軍長身邊只剩下一名衛士，餘皆全部戰死。唐軍長望著成堆的將士屍體和血染的陣地，悲憤萬分，舉槍自斃殉國！衛士見軍長壯烈殉難倒下，伏在將軍的屍體上失聲痛哭，然後舉起手槍，在唐軍長屍體旁飲彈身亡！

5 月 13 日。

第 3 軍第 12 師師長寸性奇將軍所部，在縣山地區陷入日軍重圍。經數日血戰，終未能脫離險境，官兵紛紛戰死。5 月 12 日，寸性奇師長親率部隊衝鋒時，胸部中彈受傷，13 日晚，寸性奇在組織部隊突圍時，被散炮彈炸斷右股骨，為了不當日軍俘虜，寸師長毅然拔刀自戕！

5 月 9 日。

新編第 80 軍第 27 師師長王竣將軍和參謀長陳文杞，率部已在張店鎮與敵血戰了兩天。敵集中炮火向守軍陣地猛轟，數十架敵機輪番投彈轟炸，並施放毒氣。王師長、陳參謀長及以下官兵全部戰死。

同日，第 27 師副師長梁希賢率領的部隊，在台紫村與日軍苦戰，官兵陣亡殆盡。日軍蜂擁而來，梁希賢縱身投進洶湧咆哮的黃河，壯烈殉國！

5 月 18 日。

第 14 集團軍已經在敵人的包圍圈中惡戰半月之久了，官兵傷亡近半，部隊極度疲勞。此時，劉茂恩總司令接到衛立煌司令長官的電報，命令該集團軍向黃河南岸撤退。爲了縮小目標，乘虛轉移，劉總司令把集團軍司令部的人員分爲兩部，分別由他本人和參謀長符紹謙率領突圍。

5 月 19 日。

劉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濟源縣龍岩鎮，被緊追上來的日軍包圍，數次突圍皆告失敗，情況萬分險惡。左右僚屬苦勸其更換便衣，設法逃出。劉茂恩卻凜然作色道：“我身爲堂堂中國軍人，沙場捐軀，死亦光榮，豈能求一時苟安，喪失民族氣節，爲人恥笑！”說罷，拔出手槍要自殺，侍從急忙撲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劉總司令嚎啕痛哭。

劉茂恩和殘餘官兵彈盡糧絕，對突圍絕望，已做好同敵人最後一拼、以身許國的悲壯準備。

夜色漸濃，奇跡出現。天氣突變，雷電交加，風雨狂作，山洪滾滾，黃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

劉茂恩抓住這時機，在黑暗和風雨的掩護下，順利突出重圍，冒險搶渡黃河天險，抵達南岸，絕處逢生。

參謀長符紹謙帶領的部隊，經過一場激烈戰鬥，僥倖突圍，但在混戰中迷失方向，鑽進深山，晝伏夜行。黃河沿岸已被日軍封鎖，到處都有大批日軍活動。符參謀長想，若再撞上敵人，不免全軍覆滅，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敵人圈子裏打轉，行軍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沿一律向後，隨時準備投降，以保全部隊性命。

後來，符參謀長帶著部隊終於鑽出深山，渡過黃河，歸回建制。但是，當劉茂恩聽說部隊帽沿向後這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喪失軍人氣節。並立即報請戰區司令長官，將其撤職查辦。該部第 65 師師長邢良臣，帶重病在第一線指揮作戰，昏倒在戰壕裏，送後方就醫。在醫院聽說中條山失守，憤然大叫，口吐鮮血，倒床氣絕，含恨身亡。

5 月下旬。

日軍攻佔夏縣、聞喜等地後，又兵分三路向南橫掃，直通黃河岸邊，企圖強渡黃河，攻佔澠池，截斷隴海路，威脅洛陽、潼關。

蔣介石急令第一戰區發起反攻，阻擊南下。

第二戰區以第 13 軍、第 40 軍爲主力，向敵後夏縣、聞喜發起強攻，迫使日軍向後龜縮。

第一戰區長官部令馮欽哉第 18 軍爲左翼，李興中第 96 軍爲右翼，向敵之兩側出擊；又令李鐵軍第 76 軍從洛陽渡過黃河，擔任正面阻敵任務。

第 76 軍以第 196 師之 587 團爲前鋒，跨過黃河，向張茅大道急進，在廟凹以東不幸誤入敵人伏擊圈。全團一千多名將士，正行進在一條狹窄的凹地裏，突遭敵強大火力襲擊。團長李南平身上中彈三十多處，壯烈犧牲。全團一千三百餘名官兵，全部戰死疆場，無一生還……

巍峨的中條山，會千秋萬代向爲保衛她而英勇獻身的壯士們致哀！

洶湧的黃河水，永遠奔騰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呼喚抗日英烈的忠魂！

于右任先生遙望北國，悲聲大放：“中條山雪壓雲垂，黃河浪卷冰嘶，血染將軍戰史……”

6

1940 年秋季。

隨著近衛文磨第二次上台任首相，東條英機任陸相和杉山圓轉任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日本與德、意軸心同盟更加緊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同世界法西斯的侵略戰爭已經更加緊密地結合爲一體。

蔣介石敏感地意識到，中日戰爭與世界大戰終於沾上了邊，掛上了號。此一變化，對孤軍奮戰的中國或許是很有利的。於是做出決定，公開宣稱與美、英採取一致行動，共同反對德、意、日軸心國的侵略。

9 月 6 日，蔣介石借正式明令重慶爲抗戰首都之事，向國內外莊嚴宣言，困難再大也將毫不動搖地抗戰到底，中、日戰爭只有通過戰爭的勝利才能得以解決。因此，即使是最體面的和平條件，中國也斷然拒絕，日本把戰爭強加在中國頭上，中國就只有反侵略直至最後勝利。

美、英此時對中國的抗戰也開始轉向支持的態度。10 月 8 日，邱吉爾政府宣佈重開援蔣的滇緬公路；12 月 2 日，美國國會通過對華借款一億美圓；12 月 10 日，英國批准對華貸款一千萬英鎊。

11 月 13 日。

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又一次策劃對華戰爭措施，認為蔣介石公開倒向美、英，最終對日取得勝利的信心已經更加不可動搖，對東京企圖通過單獨交涉所提出的和平條件，蔣已完全採取不予理睬的態度。

針對以上新情況，御前會議確定了《中國事變處理綱要》。其方針為三條：一是繼續對中國行使武力打擊；二是封鎖海、陸、空路線，嚴加杜絕美、英援助中國抗戰的行為；三是調整日、蘇邦交，使用一切政、戰手段，削弱重慶政權之抗戰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12月26日。

日本政府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和大本營陸軍部參謀長杉山圓會談，商議如何困死蔣介石政權的問題。兩人取得一致意見，認為：日陸海軍必須加強對中國的全面封鎖。從地面、海面及空中斷絕中國與美、英西方世界的聯繫，切斷法屬印支路線，破壞滇緬公路，兼以海軍封鎖海面，陸軍封鎖海港，加強對華經濟壓迫。

在此之前的10月3日，日本新組建的印度支那派遣軍司令部和海軍航空部隊進駐法國的殖民地越南河內，切斷了經河內進入中國雲南和廣西的國際路線，並作為日本海軍轟炸中國內地的航空基地。日軍“和平”進駐河內四天之後，海軍航空部隊就起飛轟炸了重慶政府的“後院”昆明市。

1941年2月至4月。

華南和華中日軍調集了六十四個大隊的作戰兵力和二十三個大隊的後備兵力，相當於十個師團的人馬，加上海軍艦隊、海軍航空兵團等部隊，連續發動了東起浙江寧波，南至雷州半島一系列的“截斷”沿海口岸的作戰。

截斷香韶路。

日軍認為在卡斷了重慶政府於河內方面的海外補給線後，中國軍隊必將以香港為基地，其補給物資在香港東海岸卸貨，再經陸路運往廣東韶關。日軍認為截斷這一通道至關重要。

1941年2月4日。

日軍第18師團之川口支隊在香港大亞灣登陸，採用突然襲擊手段攻佔了淡水；第38師團之末藤支隊由深圳方向佯攻策應。2月12日以後，日軍攻佔了這一

地區有關碼頭，徹底封鎖了香港方面的大鵬灣和大亞灣，卡斷了這一交通口岸。

截斷雷州方面交通路線。

雷州半島是中國軍隊在南方的物資進出口的重要基地，香港方面的交通線被日軍封鎖後，此處更具戰略意義。日軍三個師團，共六個支隊的兵力，在海軍艦隊的支援下，於3月3日拂曉，在廣州以西經雷州半島至北海長約五百公里的正面要地登陸，對該地區內所有碼頭港口實施掃蕩破壞，以斷絕中國方面在南方的這一重要補給線。

截斷汕尾方面交通線。

早在1939年6月以後，日軍獨立混成第19旅團就攻佔了廣東東邊的重要口岸——汕頭和潮安。為了徹底封死中國，1941年3月23日，日軍又出動近衛師團一部，配合獨立混成第19旅團，對潮陽、汕尾地區進行破壞和掃蕩，以斷絕該地區的海外交通。

截斷福州方面的海外通路。

日軍大本營認為福州是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貿易港口，日中戰爭爆發以來，一直是西方國家主要的援蔣運輸路線之一，是中國抗戰物資的集散地，必須以大的兵力予以堅決卡斷。

1941年4月19日凌晨。

日軍第48師團和近衛師團、第18師團各一部，在海軍第2遣華艦隊和台灣第一飛行集團強大的海空力量配合下，冒著狂風大浪，在福州附近強行登陸。日軍第48師團迅速包圍了福州，中國守軍與敵血戰三天，終因力量對比懸殊，突圍撤退，福州落入敵手。日軍18師團迂回到福州以南，截斷了守軍退路，雙方又經過一場惡戰，日軍攻佔了海口。近衛師團則攻佔了福州附近的炮台。

緊接著日軍又先後向甲子和東江等地進攻，截斷了這些地區的交通線。

截斷浙東通路。

日軍攻佔並封鎖了福州至雷州半島所有口岸，遼東半島至上海間的口岸。早在1937年下半年，即被日軍封鎖。現在，中國漫長的海岸線，僅剩下浙東寧波至溫州之間的一段小口子。

日軍大本營決定發動甲號作戰，封閉中國這最後一道交通口岸，以達到徹底截斷之目的。

3月15日。

大本營發出第 490 號命令，令華中第 13 軍進行截斷浙東通路的作戰，並令在日本國內九州參加陸海軍聯合登陸演習的第 5 師團火速調往浙東作戰。

4 月 16 日。

上海日軍第 13 軍爲使第 5 師團在浙東順利登陸，派出第 22 師團主力及第 15 師團一部，在第 3 飛行師團配合下，由杭州附近向諸暨進攻，牽制和吸引第三戰區主力。該路日軍與第三戰區部隊血戰五天，於 4 月 20 日佔領諸暨。

日軍第 5 師團在駐上海的海軍部隊配合下，於 4 月 19 日拂曉在寧波、石浦、臨海、溫州一帶登陸，並順利佔領以上要點。

爲奪回最後一個交通口岸，顧祝同指揮部隊進行了殊死反攻。但日軍卻像釘子似地釘在這些交通要點上，憑其強大的火力和瘋狂的“武士道”精神，頂住了第三戰區部隊的反攻。

至此，中國漫長的海岸線，自東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軍佔領了。

5 月 12 日。

日本大本營在陸軍完全攻佔中國沿海口岸之後，立即宣佈由海岸實行水上封鎖。上海、香港、澳門、廣州灣等方面遼闊的水域，都變成了日本海軍的“軍事禁地”，從外部截斷中國整個海上運輸。打擊美、英等國援助中國抗戰的“海上走私”活動。

當這一系列“截斷”行動完成之後，東條英機向天皇報告：“從此，在我方戰領區與敵方地區中間的陸地上，構成一條封鎖線，杜絕了敵方必須物資，特別是鹽類等流入其後方，並轟炸重慶附近的制鹽設備，以期加強封鎖。”

中國的東方和南方以及東北被日軍封死後，西北還有一條陸上的生命線，這就是經由西安、蘭州、新疆到蘇聯的交通線。

1941 年 4 月 13 日。

當日軍正在進行封閉東南部各口岸戰役行動之時，這唯一的西北陸上運輸生命線又爆出一個大冷門：日、蘇雙方正式簽訂《日蘇中立條約》，史達林在中國最艱難的時刻，竟然幫助日本侵略者完成了封死中國的“宏圖大業”。

整個中國，從水上、陸上和空中，僅剩下一條崎嶇險惡的滇緬路。蔣介石政府只能通過這條羊腸小徑與遙遠的美國和英國來往。

7

四川。在這塊小小的盆地四周，北有秦嶺、大巴山脈；東有巫山；東南有大婁山、武陵山；南面橫絕烏蒙山；西邊是終年積雪的大雪山和岷山。

川東重慶。長江方面中國軍的大本營，被緊緊鎖於崇山峻嶺之中。

以重慶爲中心，通往各戰區的軍需、兵員和民用必需品的運輸，都成了緊迫的難題。

閉塞的西南之地，工業不發達，交通十分落後。當時，占湖北三分之一版圖的鄂西、鄂北地區，僅有零零碎碎幾條短公路，加起來一共才七百三十四公里長。而在這塊地盤上，卻駐紮著李宗仁第五戰區和陳誠第六戰區的百萬大軍。僅第六戰區每月就需從湖南運進稻米一千五百噸。同時，湖南每年需從這個方向從四川運去食鹽六萬噸。日軍佔領南昌，長江水路斷了，以上兩筆運輸，幾乎成爲曠日狀態。

四川多山，交通閉塞，抗戰前還沒有一條與外省相通的公路。

蔣介石明白，如不改變四川的交通狀況，就勢必被日軍困死。

重慶政府決定趕緊修造東西南北四大公路。

南邊，川黔路；四川——貴州；

東邊，川湘路；四川——湖南；

西邊，川滇路；四川——雲南；

北邊，川陝路；四川——陝西。

所需勞工，由沿途所在省縣就地徵用。僅在川境徵用的勞工，前後總數在二百五十萬人以上。

數百萬築路民工，開山劈嶺，挖土運石，全憑一雙手。有的使鑿子、鋤頭；有的用木杠、扁擔，施工勞作原始而艱巨。在修造川陝公路時，爲趕在限期內完成，百萬築路大軍以馬燈照明，頂風帽雨，挑燈夜戰，搶時間爭速度。

在搶修川滇路時，正值嚴冬。工地又多在深山峽谷、懸崖絕壁之中。民工們攀崖開鑿，開山放炮，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在全民抗戰的激流中，數十萬

民工拼命大幹、苦幹，雄壯的歌聲在深深的山谷回蕩：

修公路，打日本；
大家努力，齊向前。
……

到 1940 年底，川陝、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後竣工通車。

在修建公路的同時，國民政府根據中國當時交通工具落後的實際情況，成立了驛運管理局。各省、各戰區亦於 1940 年中期，先後成立了驛運管理處。

驛運：原始的非機動車輛的陸上運輸。

在鄂西北，戰時的湖北省政府，在李宗仁的請求催促下，責成驛運處組織工程師專門研究，決定開發鄂西北驛運通道。在技術人員的嚴格督導下，工程進展迅速。於 1940 年底，在鄂西北地方、長江兩岸的崇山峻嶺之中，共開鑿了兩千二百四十公里的驛運大路，將近在咫尺、千年隔絕的鄂西北山區各要點和城鎮連成了一片，對抗戰期間長江方面的軍運、民運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公路、大道開出了不少，但汽車卻成了寶貝疙瘩。從 1944 年 3 月 15 日四川省公路總局向重慶政府交通局的報告中，我們不難想像當時交通運輸的艱難狀況。其報告說：

全川公路總共五萬六千公里。客車共 220 輛，內中缺零件待修者 45 輛，報廢者 85 輛，可用者僅 90 輛。

這就是全省的客車情況！

同日，重慶的《中央日報》以無比喜悅的心情報導了一則大喜訊：“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創制桐油發動機行駛汽車成功！”

1942 年 12 月 15 日。

四川省省會成都爆出一個令人們驚喜的冷門：“成都市公共汽車經數月籌備，裝置木炭車四部，今月試行通車，路線為東門車站至西門車站。”

一個省會的公共汽車公司，僅四部木炭車！

據蔣介石的蘇軍總顧問亞·伊·切列潘諾夫所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書上說，當時，由於油料斷絕和國際封鎖，國民政府中只有蔣介石一人才配有專門汽車。當時的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是一個與軍令部、軍政部平級的單位，卻沒有配一輛汽

車，部裏也無錢購買。只有該部總監何成浚上將每月有一百八十圓車費補助，而當時的米價每石一千多圓。

日軍“截斷”作戰之後的重慶政府情況是：鐵路不通，飛機沒有，水運有敵機轟炸。汽車沒幾輛，沒有來源補充，用壞一輛少一輛。

此時，中國還不能自己生產石油。

以汽車製造工程師高國恕為首，組織了中國煤氣機製造廠，研製用汽油汽車改造裝成木炭汽車。所謂木炭汽車，就是把固體燃料放進特製的煤氣爐灶內燒；使之產生煤氣，推動發動機運動。在改裝試製過程中，由於煤氣爆炸，高國恕面部被燒傷，頭髮、眉毛被燒了個精光。

木炭車，每行一步都淌著中國抗戰的辛酸淚水。

木炭車試製成功了。它首先在鄂西北前線的山道顛簸著行走。接著在陪都重慶，在成都，在川東、湘西，在許多抗日的戰場上都有這種車顛顛簸簸地、緩慢地、艱難地爬行。

一次，在鄂西前線運送物資，突遭敵機俯衝掃射，木炭車被敵機打了幾個大洞。司機用布條將那些洞紮住，又朝前開。

湖北省代理主席嚴立三及其省府大員們，坐著木炭車從鄂西經川東、湘西，前往湖南衡山參加軍事會議。蔣介石和陳誠等人圍著木炭車東瞧瞧西看看，好生稀奇。蔣介石摸摸自己精光的腦袋，翹起大姆指連說幾個好。後來，陳誠到恩施就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兼鄂省主席，也坐著木炭車到四川、湖南、江西、福建、貴州等地公幹。

與木炭車同輩的還有桐油車、酒精汽車等。它們恰像中國人不屈不撓的性格，載著沉重的抗戰物資、士兵、傷員和將軍，在燃燒的長江兩岸戰場上，在險峻的軍用公路上，頑強地、顛顛簸簸地向前挪行！

西南的水路運輸也是令人心酸的。

1938 年以後，縱觀全局，橫臥於川東南的長江主幹道，僅萬縣至瀘縣段可通航。以民生公司為首的數十條火輪，如果在白天航運，就必遭日本飛機的轟炸掃射。一次，一條火輪運貨去巫山縣城外，幾架敵機從神女峰腳下順江而來，追著輪船掃射轟炸。最後，竟將一顆炸彈投入那火輪的煙囪裏，將其炸沉。

川江的航運，只能偷偷摸摸進行。白天靠岸或駛進港叉間“貓”起來，夜間冒險航運。因此，觸礁翻船，人貨盡沉江底的慘痛事件，屢有發生。

長江在四川段，北有渠江、嘉陵江、涪江和岷江，南有烏江。但是，這些縱橫於蜀國大地的大江大河，當時幾乎都不通航。條條江河，盡是兩岸峽谷陡立，河床多呈“V”形。一進峽谷，河道驟窄，河槽幽深恐怖；出峽谷則江面寬闊，河床水淺。江水落差很大，峽谷險灘密佈，白浪滔天，山谷震動。

爲了支撐抗戰時局，必須開發水上交通。重慶政府責成交通部、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等單位，會同川、鄂、湘、黔、滇等省水利局和民生公司等，組成聯合勘察隊，對四川各條江河進行勘察，提出開發、建設的報告。在此基礎上，分別組成人力物力，對烏江、嘉陵江、金沙江等進行突擊整治，採用轟炸暗礁，鑿掏險灘，修建壩、閘、絞灘站設施和開拓纖道等辦法，疏通航路。

8

蔣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後，爲了贏得四川民眾的擁護，把四川稱作自己的第二故鄉，決心要把第二故鄉建成經濟實力雄厚的抗戰復興基地。但是，他遇到的麻煩卻不小於當委員長。

戰時首都，大量湧進的難民、政府機關、學校、工廠和其他人員，以及留川軍隊和各戰區大部隊人員的供給，加上日軍四方八面封鎖和連年乾旱，吃飯成爲第一難題。

蔣介石就任川省主席第一件事，就是解決數萬名從陝西翻越秦嶺來到川北的難民的吃飯問題。蔣介石指示四川省難民賑濟委員會將少壯者分別送往昭化、廣圓、劍閣、蒼溪、閬中、梓潼、綿陽、巴中、通江、南江等十縣，安置在集體墾農場勞動；對老、弱、病、殘、喪失勞動能力者，由廣圓縣專設一個收容所來收容。

幾天之後，又一批黃泛區難民一萬五千多人，由秦嶺源源不斷進入川北。蔣介石又叫川省難民賑濟機關，在川陝公路沿線設置黃河災民配運站，每站都架起若干口大鐵鍋，煮出大桶大桶的稀飯，災民隨到隨吃。然後，在配運站住下集中，由配運站將難民們分別送往通江、南江、巴中三縣安排生產。

蔣介石就任川省主席不到兩個月，來川難民已近十萬，吃喝拉撒，攪得他不得安寧。於是，便在省府內成立墾務委員會，專門負責將來川難民統籌安排到指定地方墾荒屯田，生產自給。墾務委員會在四川劃定兩大墾殖區：第一區：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犍爲、涼山；第二區：松潘、理番、懋功、清化、汶川。兩區計畫開墾土地二十四萬畝，可收留難民數萬人。

中賑會還在成都、重慶、合川等地開辦賑濟工廠若干座，將四川各縣收容的難民中有工作能力者選入廠裏工作。

這些措施雖然暫時安頓了無家可歸者，但卻加劇了整個大後方糧食的緊張。在蔣介石任川省主席第五個月時，康定等地的米價一下子上漲了一倍。

1940年2月4日。

四川紳糧代表嚴昌齡、李伯申、邵從恩等十九人，聯名致電國防最高委員會、行政院、財政部，對四川省府當年預算高達一億圓以上提出抗議。電文說：

僅田賦一項，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絕大之痛苦；而各縣隨糧附加，比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請中樞體民疾苦，核實緊縮預算，將一切不急之務明令罷免，俾創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蘇喘息。

同月7日，四川各縣旅省同鄉會聯合辦事處又分別致電蔣介石、國民參政會、行政院及省府各單位，申訴川民不堪再增負擔，呼喚核減省府預算。

這些電報、抗議，都是針對省府的預算而來，作爲省主席的蔣介石當然明白，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四川民眾在對他不得已的重稅進行抗議。

3月13日。

成都地區米價暴漲，高價米也很難買到。民眾難熬春荒之苦，遂發生了搶米事件，軍警前往搶米現場武裝鎮壓，曾打死打傷一些市民。

蔣介石在重慶得到報告，覺得問題嚴重。天府之國，沃野千里，歷來是有名的米糧倉。蔣介石原來也希望以川西壩子的米糧倉爲後盾，建立抗戰復興基地。哪知，現在米糧倉裏頭卻鬧了糧荒。蔣介石思前想後，覺得不可思議，怎麼也不相信成都地區會缺糧吃。最後，他認爲這絕不是真鬧糧荒，而是不法商人利己思想嚴重，在故意搗鬼。於是，他馬上給成都行

轅主任兼省府秘書長賀國光和川康綏署主任鄧錫侯去電：

據報成都米價陡漲，確系奸商大賈囤積居奇抬價，應即查明，不許再有囤米、買賣“倉飛”交易。

5月19日，又令省糧食管理委員會普查全川糧食，以便摸清底數，並規定所有糧商，凡存谷三十市石以上者，除提留二成待必要時由政府平價收購外，其餘的限令在四個月內將糧全部出售給市民。

這一措施絲毫也未緩解市場糧食緊缺的問題，而且糧價還較以前更加兇猛地上漲。糧荒風潮席捲著巴蜀大地。

9月3日。

為了解決糧荒問題，穩定後方，蔣介石改組了省糧食管理局，選派得力人員充任局長、副局長。在糧食管理局內特設糧食供應處。同日，以省府名義下令各縣成立糧食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縣內糧食調查、徵購、平息糧荒風潮。還明令各縣縣長兼任糧管會主任。

蔣介石的措施雖然強硬，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天不作美，旱災嚴重，糧源枯竭。這年秋天，川糧欠收，產量銳減，糧荒像洪水猛獸似地撲來，穀價飛起咬人。軍糧和政府機關、學校、工廠用糧四處斷源。全國糧食管理局只得再在四川這只“瘦羊”身上剪毛，增加四川的定價派購黃穀四百五十萬石，以解燃眉之急，卻加劇了四川的糧荒風潮。

9月11日。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坐臥不安，遂發表了《為實施糧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書》，嚴令各地迅速杜絕藏糧不售現象，並向全省人民發出呼籲，體諒國家困難，發起踴躍捐獻軍糧的愛國運動。

呼籲人民獻軍糧，實際上是蔣介石向人民乞討軍糧。

10月1日。

成都地區的米價漲至每石二百圓。

10月31日。

四川臨時參議會第三次大會發表宣言：

當前第一嚴重事態為糧食問題。自春涉夏，糧價激增，生活高漲，人民咨歎。然一加平抑，則流通阻塞，黑市暗流，米荒之象，彌以滋甚。其次則為物價問題。一面感於物品之不給；一面迫於通貨之增發，

遊資氾濫，所在居奇，物價膨脹，亦失常度，民生國用，動感困難。再其次則為財政問題。據財政當局報告，截至現在實施結果，除第二預備金用罄無存，復追籌補充外，尚差1000餘萬圓。至於民國30年度預算，赤字達9000餘萬圓……

四川省全年稅收僅為六千八百萬圓。

蔣介石被糧荒風潮沖得頭昏腦脹，而且這風潮將越來越猛。他無法再糾纏在這“搞吃的”的事務中，便於1940年11月15日，宣佈辭去四川省主席職務，而由他的親密夥伴張群繼任。

12月中旬，大後方食鹽供給基地自貢的鹽業工人，因物價暴漲，影響到正常生活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1941年初春，成都市各私立中等學校，因物價高漲而宣佈增加學費。

1941年元旦日，蔣介石發佈命令：凡囤糧二百石以上拒不拋售者，予以沒收。

1月4日。四川省政府嚴令登記存糧。各縣檢查報三百石以上的囤米者，由政府收購，再低價出售給市民。

4月24日，四川省府以異常強硬的態度，發佈糧食管理的五種辦法：（一）糧食買賣，必須集中在指定市場。未經獲准之商人，不得經營糧食業；（二）糧食運輸，由綏署及沿途員警、保安團隊保護；（三）所有糧食（包括農戶餘糧）必須登記；（四）凡由縣派令出售糧食供應市場之糧戶、農戶，必須照量售出；（五）凡隱匿不登記之糧食，一經查出，即予沒收。

重慶國民政府先後決定，對陪都重慶和川省大中城市的居民、國家公職人員、教師、學生及其家屬的糧食和其他主要的生活必須品煤、油、鹽、布等物資，實行公家計畫定量供應。同時，宣佈糧食由中央直接統管。

6月16日，重慶國民政府宣佈：自1941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賦一律征由實物（黃穀）。政府要做到手中有糧，心中才不慌。

1942年8月1日，鑒於政府收糧困難，蔣介石電令四川省府，督飭各級行政長官一律在征糧期間下基層，向地主農民灌輸國民政府的收糧政策，指導鄉長、保長、甲長向農民收糧。規定：凡阻撓徵購及從

中舞弊者，不論地位高低，督糧委員會有權將其送交軍法審判機關，就地軍法從事。

糧荒警報一直在叫。1943 年 5 月時，四川米價已高達每石一千零二十圓。成都光華大學的學生們因此吃不起飯，集體請求校方減低學費，救濟生活；校方又集體向中央教育部請求救濟補助；教育部又找誰救濟呢？

糧食成了大後方第一金貴之物，城市饑民因有公家保持低水平的供應；但在廣闊的鄉村，那眾多無人“供應”的饑民，就常常鋌而走險，攔路搶糧。通往各戰區和地方征糧送糧的路上，還經常發生盜匪襲擾事件。

1943 年 6 月 3 日，川康綏靖公署專門就此召集各地部隊長官開會，佈置武裝護送公糧的任務。並將重要糧道，劃分為若干區段，分派部隊負責押送。

1943 年 11 月 10 日。重慶國民政府糧食部宣佈實行糧食公倉制度。所謂公倉制度，也就是動員農戶把糧食象存錢一樣，存到“公倉”裏去。“公倉”對農戶所存之糧，實行水火兵盜保險。糧食變成了貨幣。

大後方民眾生活艱苦不言而喻。大後方的軍隊和一般政府人員的生活同樣難過。

1942 年 1 月 19 日，中國陸軍大學特六期學員夏鼎新等人，寫信給軍委執法總監何成浚上將，述說在校吃不飽飯之苦，請求補助。

1942 年 2 月 2 日，中央內政部參事包惠僧，因其家人口多，陪都米價昂貴，難於糊口，四處求人說情開後門，要求到生活較好點的戰區去工作。

1942 年 3 月 14 日，少將參議兼中央考核委員會少將委員黃格，專門來找老熟人何成浚將軍，求他寫封信給陳誠，讓他到六戰區去工作。何問黃為什麼要去前線，黃說陪都生活太苦，想到前線去拼將一命，吃碗飽飯，其他絕無侈望。何將軍在日記中寫道：“中央各機關人員，日日為柴米油鹽所苦，不能專心致力於其職務者，實在十之八九以上……近以一般人生活艱窘，竊賊特多。”

軍委會軍政部副部長張伯璿的兩套舊西服和兩雙皮鞋被小偷偷去，派人立案清查，不久破了案。原來，小偷竟是軍委會政治部裏一個中校級部員。問其原因，那位當了小偷的統帥部中校部員說，家裏負擔

太重，物價飛漲，工資又低，無法生活，不得已而做出了這種丟人現眼的事。

9

1942 年隆冬。

凜冽的雪風順著峽江刮來，空氣也象被凍凝固了。

一位體魄偉岸的老軍人，身著洗得泛白的棉布軍裝，從朝天門碼頭高高的石階大步走到江邊，蹬上一艘淺水火輪。小火輪一聲汽笛拉響，溯江而上。小火輪載著他先後到江津、白沙、內江、隆昌、自貢、樂山、瀘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餘縣市。每到一處，那位高大的老軍人，都要召集當地各界民眾大會，即席發表演講，或唱或說，激情滿懷。他還親手揮毫作畫寫字，在街頭上擺攤義賣這些字畫，並當場將義賣的錢捐獻為抗戰之用。

他，就是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將軍。

馮將軍自從 1937 年下半年以後，基本上處於“二線”，在重慶深居簡出，很少過問實際事務。到了 1943 年，經濟的枯竭壓得蔣介石喘不過氣來，幾百萬軍隊和漫長的長江戰線的軍費，實在挪用不開了。馮將軍再也看不下去了，發起組織國民節約獻金救國運動總會，自任總會長。

大後方的民眾，也像這連年乾旱的土地一樣，“油水”早被戰爭給榨幹了。僅以四川的公債為例，從 1937 年 9 月第一次認購救國公債一千九百多萬圓開始，已先後認購、發行過“建設”、“軍需”、“興業”、“同盟勝利”等各種戰時公債數十種，每次多在一億圓以上，有時一月發一種。如 1940 年 5 月才發放了建設公債一個億，8 月又發行興業公債一個億。

再以獻機捐款為例：

1938 年 4 月，重慶兒童發起捐購“中國兒童號”飛機運動。

1941 年 2 月，航空建設協會四川分會發起捐款獻機一百架運動。

1942 年 2 月，重慶市北碚民眾捐款購買滑翔機一架；中國電影製片廠捐購“中國電影號”滑翔機十架。

1942 年 3 月，重慶和川東數縣、市青年捐購戰鬥機一架，滑翔機二十架；成都青年捐購滑翔機一架。

1942 年 10 月，四川民眾捐購“忠義號”戰鬥機二十架。

1943 年初，航空建設協會發起一圓獻機運動，計畫購機三十架。

1943 年 3 月，重慶婦女界發起捐購“婦女號”飛機運動。

1943 年 4 月，國民兵團第二次獻機運動，捐購驅逐機十架。

其他還有“記者號”、“報人號”等等獻機運動……

在合江縣城召開的獻金大會上，馮玉祥對著萬頭攢動的民眾慷慨激昂地講著：“同胞們，倭寇說三個星期即可滅亡中國，三個星期之後，又說三個月可以完事，三個月又過去了，他們又說至多半年，一定滅亡中國。現在，中日戰爭已經六年多了，我們還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著！這是我們前方幾百萬將士同敵人拼死戰鬥的結果！

“可是，我們前方的將士，還穿著草鞋，有的還赤著雙腳，扛著單發步槍，同兇惡的日本鬼子拼殺。我們的將士凍死餓死的不計其數！我們的將士受傷後得不到醫治而死亡者無計其數！在長江兩岸戰場上，我們的將士在淫雨季節裏沒有雨衣，只能穿著濕衣服堅守在戰壕裏！”

馮玉祥說到此處，已聲音哽咽，老淚橫流。

會場上，聞者無不為之淚下。

馮老將軍接著說：“同胞們，我發起節約獻金運動，完全是出於本人的良心，是受前方將士的精神鼓舞。同胞們，讓我們都拿出自己的良心吧！今天，無論老少男女，都要立個新的志向，下個新的決心，那就是：不把倭寇打出中國決不甘休！同胞們起來！獻出你們的良心和赤誠，用我們所有的力量，支援前線，支援抗戰！”

前方抗日將士的事蹟感動了人民，千萬民眾爭先恐後捐款捐糧。合江白鹿鄉施晉先一次獻金六十萬圓；合江縣工商地主兼私立祖毅中學校長陳秋農，捐款六十二萬圓；鄉紳丁慎輝、木材商人雷紹清等人也捐獻了三十萬。

合江國立女子中學校長龔慕蘭女士，將自己一枚金戒指脫下交給了馮老將軍。在她的帶動下，該校教師、學生共捐出金戒指二十多隻。該校許多女學生在大街上給人擦皮鞋，用勞動掙的錢捐獻。姑娘們的口號是：愛國不分畛域，愛國沒有顧慮，愛國超居人前。

馮玉祥出色的演講，深深打動了姑娘們善良的心。合江女中師生真正地表現出了“愛國沒有顧慮”的性格，趕排了話劇《嫁給勇士們》，用通俗、樸實的語言抒發對抗日將士深深的愛，推動節約獻金運動的深入發展。

合江第十四陸軍醫院住著一批從前線轉來的榮譽軍人，他們最知前方之苦，節約口糧四百五十斤，捐獻國家。

合江救濟院的孤寡老人們也掏腰包，湊了一千圓，捐獻出來。

合江三青團、民眾教育館等團體，舉行了三天時間的籃球義賽，賣票三萬圓，全部捐獻。

節約獻金如火如荼地開展，合江地區卻下起了綿綿細雨。縣城大街小巷，每天都有一群孩子在雨簾裏奔跑叫賣《節約獻金專刊》。孩子們滑倒了，渾身泥水，不哭不喊，把賣報得來的每一文錢都獻給了國家。

國家的危機也使那些吝嗇鬼、守財奴受到心靈上的震撼。合江《黨政公報》報導：

馮玉祥將軍在這國家生死關頭，帶著興奮的心情來到合江，使醉生夢死的人們，有錢不出的紳商及出錢未夠、發國難財之流夢醒了，覺悟了，抬起頭來，挺起胸膛，節約所有的靡費，獻出自己所有的金錢，以洗罪贖愆，從此作一個堂堂正正的愛國好男女，黃帝的好子孫……

在國家處於生死關頭的時候，馮玉祥將軍是“帶著興奮的心情”還是沉痛的心情，暫且不去計較，總之，他的行動使許多人覺悟了，夢醒了。

當時的合江只是個二等縣，人口四十來萬，連遭三年天災，同時多次遭受敵機轟炸，滿目創傷。但他們在短短的幾天之內，獻金達一千二百五十多萬圓。

馮玉祥也被人民的愛國熱情感動了，爬上城外赤水河與長江會合處的馬街渡口懸崖，運足底氣，揮毫寫下四個鬥大的字：“還我河山！”並在這四個字後

頭附跋一段：“民國三十二年春，餘以節約獻金救國來合江，此間同胞，愛國超居前人，突破各地成績，爲書武穆遺訓以作紀念。”

在內江，金台旅館經理李煥章向馮玉祥表示，從今後每年向國家捐獻黃穀六百擔，直到抗戰勝利爲止。

在自貢，鹽商余述懷一馬當先，捐了一千萬塊；自流井大老闆王德謙不甘落後，捐了一千五百萬圓。

在獻金高潮中，有人獻了六百萬圓而不留姓名，感動得馮玉祥一口氣寫下好長一首打油詩“……祥受大感動，感動淚沾衣；何以報大德，打過鴨綠去！”

川省主席張群捐了一萬塊，在他的帶動下，成都獻金頓呈高潮；

一群穿得破破爛爛的丐幫隊伍走上獻金主席台，將各人多年討來的共計二千二百五十圓錢，雙手擎著交給馮副委員長。馮玉祥含著眼淚代表政府將錢接過來，又代表政府莊嚴宣佈，將這筆錢回贈給乞丐們。但他們說啥也不再接受政府的回贈。

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他們的心永遠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同搏動。內遷到樂山的武漢大學學生，家鄉淪陷，生活非常艱苦。時已嚴冬，許多學生尙無寒衣。學生鄭德信、熊彙瑩等人發起每人捐十圓運動，很快就有百多人簽名認捐。

在江津，許多來自淪陷區的大中學生，成群結隊到輪船碼頭扛大包、下苦力，到大街上替人擦皮鞋，掙錢捐獻。

在江津召開的獻金大會上，出現了某大學先修班、新本女中、女師學院附中、聚奎中學等校學生愛國獻金的競爭場面。各校學生竭盡全力，一再追加捐款數。淪陷區遷來的國立第十七中學的學生，在再也追加不出錢的情況下，宣佈全體節食一天，追加一萬圓。

在前方，張自忠將軍在就義以前曾對部屬說：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爲其死，別無其他辦法！

在後方，青年學生們說：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獻出良心，別無其他辦法！

重慶《大公報》赫然通欄標題：

我們都跪下了！

報導的是白沙一次獻金大會的情況。

馮玉祥將軍親自主持大會，當商會代表宣佈獻金六十萬圓時，全場各界民眾議論紛紛，都認爲商會獻得太少了。但商會對此卻裝聾作啞，不予理睬。

參加大會的各校學生代表自動聚在一塊開會，商議促動商會獻金。一個學生代表提議，每校選五名代表，到台前向商會跪求，得到大家贊同。於是，各校學生代表在台前跪下！

商會代表不得不宣佈增捐十萬圓。學生和各界民眾仍感覺商會太摳，他們齊聲呼喊“兩百萬”的口號。

商會心痛錢財，不肯再增加。

學生的呼聲越喊越響亮，並紛紛參加到跪求的行列。最後，全場一萬多名男女學生都一齊跪下了！

全場一片慘痛的哭聲……

馮玉祥將軍再也忍不住了，淌著淚哽哽續續地對全場青年學生們喊道：“你們的這種愛國熱情，就是鐵石心腸也會感動的！”又對商會的人喊：“我們對這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要本著自己的良心啊！”

商會代表終於被感動了，答應捐款二百萬圓。

隨同馮玉祥參觀獻金運動的美國友人羅斯先生，見此情景，也被感動得淚水直淌，他對馮將軍說：“我真是深深地受到了感動！”

夜裏，馮老將軍躺在床上，心情怎麼也平靜不了，眼前老是浮現出那一大片黑壓壓跪下的青年學生；耳畔老響著那成千上萬個青年學生爲苦難祖國哭泣的聲音……深夜了，那哭聲越來越大，他再也躺不住了，從床上坐起來，用他那當兵人樸實的語言，用他那顆被感動的心靈，一連寫下了五首五言詩，以頌揚那些爲苦難的國土跪下的青年學生：青年跪地哭，請君快救助；獻金救國家，不作亡國奴。青年跪商人，請快救沉淪；財富千千萬，敵來化浮雲。青年捐衣服，爲復我國土；不畏饑與寒，雪恥最爲主。青年血淚哭，赤誠復國土；流血作警鐘，同胞齊禦侮。白沙獻金多，熱烈如荼火；各地皆如是，一定能救國。

國民政府中央宣傳部公佈，四川各地獻金總額爲：五億多圓。

那不是錢，是大後方人民一滴一滴地擠出來的血！是萬千青年學生同苦難深重的祖國一起跳動的心！

馮玉祥將軍宣佈：節約獻金運動所得捐款由總會直接呈交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用於慰勞前線將士、傷殘軍人和苦難民眾，以及用於購買飛機、大炮和坦克等軍需裝備。

10

在抗戰最艱難的日子裏，從精神和經濟上支撐重慶政府這座大廈的，除了國內的民眾，還有一根頂樑柱——八百多萬華僑。

海外華僑以地區形成三大集團：

第一大集團，南洋華僑。居住南洋諸國，人數為六百七十多萬，以陳嘉庚為首成立有南僑總會。

第二大集團，美洲華僑。主要為美國華人十萬餘眾，以司徒美堂為首，稱為全美洲洪門華僑。

第三大集團，歐洲華僑。主要是居住在英、法兩國的華人，成立有全歐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

這些僑居海外，接受了所謂海洋文化，受過西方文明薰陶的中國人，對國內的黨派之爭，多採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以“嫁女”的心情，傾力關懷和支援“娘家”的抗戰。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成立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蔣介石任主任委員。第一期發行救國公債五億圓，海外華僑認購了大半。以後，凡國民政府發行救國公債，華僑都大力認購。1937年至1942年，國民政府先後發行了六次救國公債共三十億圓。華僑購買了十一億圓，占總數三分之一強。

由於蔣介石以孫中山忠實信徒自居，在烽火連天的抗戰之中仍在艱難地推進著憲政準備，海外華僑基本上都買他的帳。

國民政府之下，專門設立僑務委員會。蔣介石經常通過這個委員會向華僑求援要錢。華僑突擊性的捐款已解決了政府不少難題，但蔣介石苦於常年常月的戰費開支，便直接打電報給各地華僑組織，請求他們搞常月捐。

常月捐，就是每月都有個固定的捐款數，就像老闆給工人發工資一樣，每月都有。

蔣介石的電報說：“海外月捐，增加長期抗戰力量，所關至巨，各地僑團務必努力促進，藉收實效。”

政府僑委會根據蔣介石指示，通電海外僑胞，請其推行常月捐。通電說：

我國長期作戰基本條件，在於財力有源源不斷之補充，而目前國內生產較厚之地，都被敵騎蹂躪，敵機肆虐，損失重大，經濟建設，不免困難……然每念前方將士，前仆後繼，戰區民眾，顛沛流離，自當本匹夫有責之心，再接再勵，以爭取最後勝利之光榮。

海外僑胞遂按月繳納抗日捐款，如同按月給國民政府發工資。

南洋諸國華僑每月平均實際捐款為：七百三十四萬圓。

美國華僑每月平均實際捐款為：五十八萬三千圓。

八年抗戰中，華僑捐款共計為：十三億二千二百五十三萬餘圓。

各地華僑匯兌的僑匯就更多了。

僑匯：即華僑以贍養費名義寄回國內的款項。它成為抗戰期間重慶政府財政經濟的重要支柱。整個抗戰期間的僑匯為九十五億圓以上。

美國華僑為了支援抗戰，竟將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彙回國內。

1940年，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報告：1939年政府全年的戰費開支為十八億圓。這一年，華僑的捐款和僑匯共為十三億三千萬圓。華僑承擔了絕大部分戰費開支。

華僑除捐款、認購公債和僑匯外，還捐助了大批軍需物資。

重慶政府宣佈：抗戰頭三年中，華僑捐款飛機二百一十七架；救護車汽車一千餘輛；坦克二十三輛；其他如棉衣、麻袋、醫藥用品等無法計算。

重慶國民政府統計宣佈：從1937年到1941年底，國民政府的總收入為：二百二十六億圓。其中，華僑匯款為五十三億圓，相當於國府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將近國府軍費開支的二分之一。

國民政府對此評價：華僑龐大之外匯，對於祖國之抗戰，實予以巨大之助力。

戰爭在中國南方、北方和東方前線夜以繼日地進行著。（待續）



王雍罍致徐文立（網上文選）

文哥！新年好！

你在新唐人電視中的『人杰地靈』節目，我已經看了，令弟非常感動，使我從中更瞭解了你。

從這片中所看，你年紀輕時，還是個帥哥；大嫂也是個靚妹，郎才女貌，好讓人羨慕。可是你們倆生不逢時，竟然在中共黨國長大，和我們這些所有的人一樣，歷經種種不應該的人生磨難、痛苦和不幸，這就是推翻中華民國“公家國”的直接後果。……不知在今天，還有多少憤青怒老，在繼續無知地拒絕這一鐵板釘釘的事實。

在你的節目中，弟才瞭解，你的父親——令尊大人，在中華民國中，是抗戰英雄，了不起！而且他還是一個軍醫官，為國軍和百姓，進行治傷醫病；直到最後的抗戰勝利……。在那血與火的反法西斯年代裡，令尊大人，為中華民族的亞洲第一共和國，付出了他所有的一切，令小弟羨慕、感動和敬佩。

更令小弟興奮的是：在那所謂「腐敗和黑暗」的中華民國，令尊大人即是他再苦再累，却有其自己的自由思想，有其自己想做的行動主見；甚至在內戰的軍事中，令尊可以在他的職權範圍內，因其醫生天使的慈悲心太重，可以不顧國軍的軍紀軍規，隨意放走那些背叛中華民國的恐怖份子——共黨叛匪；甚至不屑一顧地抗拒蔣介石的最高軍事命令，可以拒絕去台灣退守中華民國的義務；為此他不但沒有遭到任何軍事處罰和迫害，而且還平平靜靜地等到了泥腿子大軍的到來。

由此可見，當時蔣介石的獨裁和專制，原來是一個假老虎的假獨裁和假專制；人人可以不把他當一回事。今天我們出了國的人才知道，這一切不是抗日大英雄蔣介石將軍無能，而是自由的中華民國所致。凡是有良知的人，都對之明白。所以今天那些口口聲聲要民主自由的人，却在拼命反對、拒絕、迴避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比昨天的共產黨和今天的台獨幫，還要猛烈地喪心病狂，從而徹底暴露了他們內心葉公好龍的假面目。

然過分慈善的令尊大人，以為這些泥腿子來了，中國可能有重獲新生的機會；他這一好心的想法，和所有天真的老百姓一樣，在喜慶洋洋迎接蘇維埃連鎖政權的共產黨國後，突然才驚恐地發現，原來共產黨是真老虎的真獨裁和真專制，向他們這些無辜的抗戰英雄，反對打內戰的軍人，同情泥腿子革命的老百姓，以及曾經是中華民國的好公民，凶猛地撲了過來，將他們的肉體，尤其是他們的靈魂，撕得粉碎，使他們在體無完膚中，一一受辱不堪地倒下。而令尊大人，也在這多次殘酷的政治運動中，不幸被共產黨整得死去活來，直至他最後死不瞑目地被活活整死為止。

天哪——，令尊是一位抗日英雄啊；是一位救死扶傷的軍醫天使啊；是一位救活和釋放不少共匪將士的慈悲者啊；是一位有責任心的、有才華的、有愛心的好父親啊；他却在無緣無故中、在莫名其妙中、在無中生有的種種莫須有罪名下，被共產黨理直氣壯地剝奪了他老人家的神聖生命。這是天憤人怒的暴行啊！

其實，象這樣悲慘不堪的情況，何止你父親一個人；而是成千上萬啊。只是你父親在千百萬人頭落地中的一個縮影而已，一個象徵性的悲慘代表而已。這就是反對蔣介石紙老虎的回應，這就是對中華民國公家國失去信心的報應。我們這些醒悟了的晚輩，在這萬分悲慟和強烈氣憤之中，也深深為之惋惜和遺憾。

然這一切無緣無故的苦難，並沒有就此在你的家門口結束，相反在暗中變本加厲地深入和增大。當你成長為象你令尊大人一樣——人杰地靈的漢子時，就同樣被無辜地慘遭迫害，被共產黨二次無罪地重判，前後相加二十五年。害得我雍罍小弟為你呼籲，並相應你太太的絕食聲援，為你公開聲明絕食。為此我現在還要嚷嚷，叫你賠償我身體補償費一千萬圓，你看你自己，多麼慘不忍睹！

倘若你的父親、和我的父親，都能在當年，不感情用事，不做憤青怒老；明白【共和】來之不易；明白凡是天下好事，都要經過長期反復的艱苦磨煉之後，才能最後得以保守完成；那麼你我的父親，都會服從蔣介石的命令，將我們帶去台灣，共同退守中華民國。這樣你的父親，不但不會死，還會成為有名的軍醫大官；尤其是今天的你，憑你的聰明，不但肯定

不會流亡，肯定不會坐牢，而有可能在中華民國中，或擔任議員，或擔任縣長或市長，或在經營你令尊的醫館。你不但儒雅瀟灑，而且風流倜儻，我今天的王雍置，不但不敢叫你賠一千萬，還要千方百計地巴結你，你說是不是？（一笑！）

凡是有智慧的人都知道，『台上十分鐘，台下十年功』的大道理。一切真正天大的好事，她肯定需要長期反反覆複的好事多磨，經過無數次失敗和磨礪後，才能取得眾人首肯、刮目相看的成功。若象憤青怒老那樣，沒有持之以恆的耐心，只有那種聰明活絡、偷奸耍滑、投機取巧的本事，凡事總是埋怨、責怪、不滿和牢騷，最後就索性脾氣暴躁地『自我一套、推倒重來』，象這樣的人，能成功什麼『天大好事』？這就是憤青怒老的基本刁相。你我都是政治家，切切要明白、要看透、要遠離這種非理性、無理智的刁相。寧可暫時少一些朋友，也千萬不能與這類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憤青怒老，進行所謂的合作共事。因為他們的腦袋，不但比政治家天然地少了一根弦，而且因共產黨對他們長期的洗腦，而常常出現思維斷路的後遺症。你能拿他怎麼辦？

在今天，你我之輩之所以如此不幸，這不是你我之輩的過錯；而是你我的父輩們，曾經因為無知，同情泥腿子革命，與匪共舞，才產生這樣的報應，才導致他們的自己和他們的兒女，遭受沒完沒了的痛苦和不幸。所以你我等所有人的這一切苦難，按佛門的第一天理，乃是因果報應的作用，是活該，是應該，是萬該；包括當今汕尾的農民報應在內。別忘了，汕尾地區，曾經是中華民國時期，第一個叛亂的蘇維埃家鄉，而不是之後的井岡山。

只是那些不是活該的人，最後去了台灣，所以他們就被上帝庇佑，逃出了這個是非不分、感情用事、憤青怒老的大陸，從事正兒八經的民主事業——上帝所賜福我華夏的中華民國；而他們的這些子女們，也開始獲得善有善報的回應和報應。這就是老天爺的公正啊！

今天知道歷史真相的人們，才明白所謂曾經腐敗的國民黨，不是在抗戰之前的腐敗，而是在抗戰之後才開始的腐敗。因為他們當時以為抗戰勝利了，天下就萬事太平了，於是他們面對滿目瘡痍、遍體鱗傷、奄奄一息、民不聊生的創傷環境，為了人本能的生存

活命，而迫不及待地求生，於是產生了為生存而腐敗的不良現象。這個不幸的現象，在戰後的當時，誰也無法能阻止，只有讓中華民國，有三到五年的經濟恢復，才能開始緩解；然後，政府有能力可以進入法制系統的管理，讓那些當官的人，不再為求生活命而腐敗（編者按：如果不是中共在日本投降的當天晚上就發動了內戰，則民國非但能夠象二戰所有參戰的國家一樣，能夠治愈腐敗；而且不會因持續的和大規模殘酷的內戰，而導致中華民國政權腐敗的迅速加深）。

譬如蔣介石退守台灣後，不但用贖買政策，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同時在三年中，利用經濟的恢復，而有效遏制了求生活命的腐敗，老百姓開始安居樂業；使得在 1954 年，蔣介石就結束了軍政，啟動了訓政，容許鄉、縣和地方市的民主選舉。譬如之後的台灣經濟起飛，蔣經國結束訓政，容許直轄市和省級的民主選舉；再之後，便是在 2000 年就已經實現的政黨和平替換了。

這一切在和平環境的經濟發展中，才能一步步地實現成功。哪裡象民運中的憤青怒老，憑空想想的那麼容易；只憑自我感覺良好，而誇誇其談，信口開河，然後不屑一顧中華民國一系列好事多磨的偉大事實和歷經的苦難，只是輕嘴薄舌地對之亂罵和亂反；從而造就了一批反亞洲第一共和民主公家國的偽民運。這就是民運失敗的總根源！

所有象你一流的民運政治家們，都應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看懂了這一點。在今天開始進行華夏復國的民主運動。因為我們在今天都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抗戰後所出現的無可奈何的求生腐敗，與文革後的共產黨，拋棄了共產信仰，在恢復自己的官位後，利用手中的特權，進行「不貪白不貪、不拿白不拿」的那種貪得無厭的超級腐敗，是有著天地的差別和根本性質的區別的。二者豈能同日而語！

所以那些在民運大會上，信誓旦旦地「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擔保」，而為共產黨的勝利，進行公開辯護的民運人士，就是典型地「感情用事、不分是非、又不肯學習現代中國歷史」的憤青怒老。他們始終理直氣壯地認為共產黨曾經是這麼說的，或者我的父親是曾經這麼說的，那麼我也就不加思索地要這麼說。作為一個普通百姓，對他這樣的表現，不能對之有所要

求，屬於正常現象，但也是會令人遺憾和痛心的。然而，一個要爭作民運的精英和老大，卻也如此沒有分量的胡言亂語，則是令人無法接受的。

象這樣的人，在民運中的確不是少數。我們不能迴避這一事實。這是共產黨長期洗腦後，在今天所產生的收穫期效果，從而使共產黨和台獨幫繼續反中華民國後續有人。如果他們在共產黨滅亡之前，不被歷史所淘汰的話，那麼即是在共產黨滅亡後，他們依舊會接過共產黨、台獨幫反亞洲第一共和的民主大旗，繼續明目張膽、明火執仗的反中華民國，以便“開創”他們各種各樣的新私家國，造就更多感情用事、是非不分、憤青怒老的接班人，大陸的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而你我都是有一定名望的【政治人士】，千萬不可對之隨波逐流；否則你我的民運事業，也將功虧一簣。被今天曾經上當過、而現在已經覺醒的人民，痛罵成一個居心不良而反共的野心家、搗亂鬼和害人精。從此臭名昭著，被人取笑一世。

我們華夏復國人士，坦率地擺一句滾釘板的話：那些感情用事、是非不分、輕嘴薄舌的憤青怒老，即是上帝再給他們二十五年的民運時間，他們依舊是今天這個四分五裂的成績，無法再有新的進展。即是共產黨不推自垮後，讓他們有幸去執政，將不出三年時間，因他們憤青怒老的傻鄙勁而自我垮台。有目共睹的民進黨，比這些民運中的憤青怒老，不知要强幾十倍，但他們同樣有這種感情用事、憤青怒老的傻鄙勁，要被今天台灣人民的選票所拋棄。由此你我都看到了，台灣人民對他們的內心是什麼反應。

一個比民進黨還憤青怒老十倍的人，它對恢復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能作出什麼好事？不把中國引向新的私家國、或四分五裂之下的小私家國，上帝已經真正保佑我華夏民族了；而我們就要為這樣的上帝保佑去奮鬥。這就是我們華夏複國的信念。

一個政治家的偉大，或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就在於他是否掌握了一個五百年不變的相對真理；而不是它是否掌握了五年不變、或十年不變的權力。

我在新的一年裡，祝你一家健康、順利和快樂！而且相信，中華民國一定會回歸！

雍丕頓首



駁胡說八道的親共漢奸理論

著名民運人士 徐水良

不久前，世界日報古今上下專欄接連四次連載發表為漢奸汪精衛辯護的署名文章《汪精衛係中奸乎？》。這是繼承共產黨與日本及汪精衛相互勾結，秘密談判，真賣國、假抗日的傳統，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派出潘漢年與汪偽漢奸政府勾結的傳統，製造的親共漢奸輿論，是在當代條件下發揚光大漢奸傳統，宣傳漢奸理論的代表作品之一。

由蘇聯策劃、組織和扶植起來的共產黨，是地地道道的漢奸賣國黨。舉凡要親共媚共者，大約也就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漢奸賣國形象和相關漢奸理論。而這篇文章是胡說八道的標本之一。作者的無知和毫無道理，令人驚奇！

但凡漢奸國賊（或者如文章所說“中奸”、“華奸”），除了極個別徹底喪失人性的人，或者本來就不是中國人，而是自認侵略民族之一員的人以外，心裏總是矛盾的。汪精衛及其漢奸政府是這樣，溥儀及其偽滿政府也是這樣。並且他們在心理上確實也需要自我安慰，減輕自己的良心負擔，減輕罪惡感，用救國救民來安慰自己。對此，歷史材料實際上比該文作者披露的內容要多得多。例如這些漢奸確實幫助過共產黨國民黨，但這能說明他們不是漢奸嗎？否！這恰恰是古今中外國奸們的共同特點。古今中外絕大多數、甚至是幾乎全部的國奸們，都有這個特點。作者連這個特點，這種常識也不知道，就來胡說八道，其淺薄，令人齒冷！作者的臉皮也够厚的，這樣的連常識也不懂的東西，也敢於厚臉皮拿出來公開宣傳！

如果因為漢奸、國奸內心裏有矛盾，有時也幫助自己的同胞，就說不是漢奸、國奸、國賊，那古今中外就基本上沒有國奸了，在中國就是沒有漢奸、中奸、華奸和國賊了。

多年來，拼命鼓吹賣國當漢奸，公開吹捧汪精衛之流，在公開的親共陣營，已非少見多怪。他們的理論基礎，都是馬列階級國家，階級專政，無產者無祖國之類的謬論而已。

必須堅決地批判來自馬列、中共和一切方面的漢奸理論。
（網上文選）

中共的

十八騙

馮
騫
編
寫

第一騙：騙國民黨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始有“聯俄容共”做法，容許共產黨人李大釗、譚平山、張國燾、毛澤東等人以個人身份宣誓加入國民黨，當時在國民黨內部引起極大爭執。

聯俄政策甚少人反對，因為當時國父在廣州設立大元帥府與北京政府對抗，世界各國皆承認北京政府是合法政府，對廣東革命政府同情者少、打擊者多。俄國適在此時獲得共產革命成功，推翻了只存在了八個月的“俄羅斯共和國”，復辟了沒有沙皇的黨主極權專制制度，卻對外偽稱“要解放全人類，還要在全世界實行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並兩次公開聲明欺騙中國，要廢除俄國二月民主革命前沙皇政府強迫滿清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編按：純屬欺騙。非但絕不兌現，而且在中華民國政府東北當局於 1929 年收回中東路主權時，竟悍然發動侵華戰爭，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中東路戰爭”的由來）。

所以，廣東革命政府視蘇俄政府為友乃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因聯俄而要容共，內部意見便不同了。國民黨內忠貞黨員以張繼為首堅決反對，認為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又仍然要保留共產黨員身份，而國民黨與共產黨立場並不完全一致——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共產黨要實行共產主義，此類跨黨黨員究竟該實行那個主義便爭執不下。為此，張繼憤而脫黨，容共之舉幾乎告吹。中共黨員在俄共領導下，向國民黨施行騙術以博取同情，終得加入國民黨，當時所施辦法甚多，而以李大釗聲明為代表文件，茲錄於後：

對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之聲明 李大釗

諸位同志們：兄弟深不願在本黨改造的新建中，潛植下猜疑與不安的種子；所以不能不就我個人及一般青年同志們加入本黨的理由及其原委，並我們在本黨中的工作及態度，誠懇的講幾句話。

兄弟們到廣州來，承本黨總理及黨中先進諸同志歡悅的接受，令我們在國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盡其棉

編者按語：黃花崗雜誌的一位香港讀者，為支持本刊，將二十多年前曾由香港呼聲月刊發表過的“中共的十八騙”寄給我們，希望我們能夠重新發表。本刊十分感謝這位有心的香港讀者，也十分地願意重新發表並連載這篇優秀的文章。因為它完全根據歷史的事實，對共產黨的拿手好戲——“騙”，作了十分實在而又精彩的歷史註腳。更何況，中共不僅已經騙了香港人民，而且更在處心積慮地欺騙今天的台灣人民，特別是台灣的國民黨，而後者又正在被共產黨騙得稀里糊塗，甚至心甘情願，興高彩烈……當此之際，為了 2300 百萬台灣人民的福祈，更為了中國大陸人民的萬難民主追求，還為了我們中國民主統一的希望和前途，我們發表這篇佳作，就不僅具有反思歷史的意義，而且富有針砭現實的價值了。

由於該文在香港發表時，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運動尚未開始；但二十餘年之後，當該文在本刊重新連載之日，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運動已經碩果累累。故在必要處，本刊將以編者按語的形式，為該文作些必要的補充。

薄的機會，我等不能不敬服本黨總理及黨中先進諸同志熱誠的促進負有國民革命的使命的國民黨的精神。但有少數先進的同志終不免對於我等加入本黨致其懷疑者，使此懷疑不能渙然冰釋，則於本黨改造的新機中，即預伏一種妨害將來發展的危機，此斷非吾輩之所願，想亦先進諸同志之所願。用是不能不將我等加入本黨的理由，開誠佈公的講出來，以求得一共同的瞭解，而消除各方在潛萌的危機。

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強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也就是本黨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想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國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的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運行，非從全民族之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我們覺得光走革命派的聯合戰線，力量還是不夠用，所以要投入本黨中，簡單編成一個隊伍，在本黨總理指揮之下，在本黨整齊紀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驟，為國民革命而奮鬥。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求的。因為在今日經濟落後淪為帝國主義下半殖民地的中國，只有國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國民革命的事業，便是我們的事業，本黨主張的勝利，即是我們的勝利。我們以此理由，不但自己願來加入本黨，並願全國國民一齊加入本黨。這種發展本黨的責任，是要先進諸同志與我們共同奮鬥的。（編按：這是1924年元月1日李大釗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向國民黨作的“保證”，然而，不過半年，至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李大釗本人居然又於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十二次會議上，公然地反口宣言說：“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我們黨的黨員和共青團員個別地參加國民黨，目的在於改組它，改變綱領（改變國民黨的綱領）……在國民黨中把‘左’翼拉到我們一邊……。北方的工人組織仍在我們手中。在南方，特別是在廣州，國民

黨在工人中間有一定影響，而我們的策略在於掌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以便把他們培養成革命先鋒隊（共產革命先鋒隊）……”轉引自《誰是新中國》一書）

有一部份同志疑惑因為我們加入了本黨，本黨便成了共產黨，這亦是一種的誤會。我們加入本黨是為接受本黨的政綱，不是強本黨接受共產黨的黨綱。試看本黨新定的政綱，絲毫沒有共產主義在內，便知本黨並沒有因為我們一部份人加入，便變成共產黨了。

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議：本黨章程應規定不許黨內有黨，黨員不許跨黨。這或者亦是因為我們加入本黨而起的。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因為我們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編按：就是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只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曾加入國際的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於國民革命的運動，但我們不能因為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的組織。我們若脫離了國際的組織，不但於中國國民黨沒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損失。因為現代的革命運動是國民的，同時亦是世界的，有我們在中國國民的組織與國際的組織的中間作個聯絡，作個連鎖，使命的運動，益能前進，是本黨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國際所希望的。由此說來，我們對於本黨實應有著二重的責任：一種是本黨黨員普通的責任；一種是為本黨聯絡世界的革命運動，以圖共進的責任（編按：要變中國的國民革命，為世界共產革命的一部分，此處已見端倪）。所懼我們的才力不勝，不能擔當此任，還望先進諸同志不吝指導而匡助之，是我們的欣幸。

總之，我們加入本黨，是幾經研究再四審慎而始加入的，不是糊塗混追求的，是想為國民革命運動而有所貢獻於本黨的，不是為個人的私利，與夫團體的取巧而有所攘竊於本黨的。土耳其的共產黨人加入土耳其的國民黨，於土耳其國民黨不但無損而有益。美國共產黨人加入美國勞動黨，於美之勞動黨不但無損而有益。英國共產黨人加入英國勞動黨，於英之勞動黨亦是不但無損而有益（編按：全是在糊弄國民黨）。那麼我們加入本黨，雖不敢說必能有多大的貢

獻，其為無損而有益，亦宜與土爾其的先例一樣。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研究。本黨總理孫先生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遂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我們所布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允許我們以參加，即不必對於我們發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認我們參加本黨為不合，則盡可詳細磋商，苟有利於本黨，則我們之為發展本黨而來者，亦不難為發展本黨而去；惟有猜疑防制，悉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自今以往，我們與先輩諸同志共事之日正長，我們在黨中的行為與態度，當能徵驗我們是否盡忠於國民革命的事業，即以盡忠於本黨。願我先輩諸同志提攜而教導之。北京代表李大釗意見書。（錄自「革命文獻：第九期第三七一四〇頁）

李大釗這篇聲明說的何等誠懇。但實際上共產黨自加入國民黨之日起，便下定決心要吃掉、消滅國民黨，其中事例太多，祇舉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吳敬恒向中央監察委員會所提檢舉以作例證。

呈中央監察委員會文 吳敬恒（稚暉）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

竊總理於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黨份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亦曾釋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準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以固大逞。按總理容納共產黨份子，有兩層用意：

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中國國民黨行為，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為之學說，（同聽其研究）。

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鬥爭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份子之有覺悟，服從國民黨主義，使潛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份子加入國民黨以來，共產黨

積漸謀逆，迨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護，且瘖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總理消其逆謀之願。而不知終究適予以得步進尺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借赤化為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省區執行委員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以諸如此類之叛逆印刷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其真相，不欲輕啓口舌之爭。蓋彼輩凶狡無賴。若不到徹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騰為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份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惛迷離，一犬吠影，衆犬吠聲，函電紛論，詈罵交聞，使成獸鬥泥中之形，以丐虎踞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廷之類）一擊不中，更張其焰。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為若輩包圍，離奇逆迹，隨在呈露。鈕委員永建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入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晤兄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十六號鈕永建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為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孫總理，當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嫌不足。」陳首領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輕挂招牌，止足膺鼎。」陳說：「你更瘋癲，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麼？但你以為康有為之復辟，與偽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偽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跟問，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退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狀，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亂以閒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餘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造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盤商量才好。」因此強笑而罷。

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聽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爲要之言曰：「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爲內部奸戚仍未徹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呵。」「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膽量，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我們的步驟，就是：一、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本委員案：如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的貓腳爪，被他們拿住了，向火裏取煨栗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新軍閥，乃非常可怪的奇議論。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所以近來惜抑新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著中國國民黨部國民政府，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都是他們預定計劃。

「二、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法，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難爲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痛快快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徹底吧。」本委員案：亂麻指國民黨，快刀足指無產階級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請大家注意，開首喊起語，所謂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與非同志，多未分清楚呵！他們必定還有秘密文件，也得雲：「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一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打倒國民黨。」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乙，借丁打丙，抽繭剝蕉的辦法，已施於國民黨者，可以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爲同志，足見工呀，農呀，都是他們的貓腳爪。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份人，止剩他們的同志，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罵孫文思想不徹底，送他照相到歷史博物館。規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

法再來中國試驗，難道因爲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特產，中國遠東病夫還夠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嗎？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讚美蘇俄抑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反了蘇俄，爲什麼？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

「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徹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斯主義萬歲，階級奮鬥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本委員案：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裏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寵，這算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或正式挂出招牌），似已爲難逃之巨禍（編按：不幸而言中！）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賀的，乃系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廷之口號，查有歐人牛德爾致陳同志友仁書，曾言鮑羅廷從前化名犯罪屢更其國籍，鮑羅廷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爲煽動委員會之委員，故挑撥離間，手段惡劣萬狀，對人情厚貌深，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們閒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說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來是惡惡辣辣，謊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爲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之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希旨者甘爲傀儡。鮑羅廷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曾無疑義，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掩，說中俄同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是戲法的說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蒙古是做慣屬國的，我生蒙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圖，何妨又屬蘇俄。中國是正被人一再盜國，卻還不曾做過屬國，這只好共產黨去作新試驗。我們國民黨不願意，不要用要進第三國際，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進去，列寧式的共產黨做贅禮。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等之言，則明明為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皆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為俄煽動員鮑羅廷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為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為變相之屬國。按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有人說，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廢除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止能認為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為最惠國，尚未聯合也）。因此，本委員認為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蘇俄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廷所盤據，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攻堅肉搏之時，而肆其咎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方，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舉，俄國共產黨鮑羅廷在廣州，亦建緩取江浙之議，即因他們老實不客氣，勢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豐滿，使共產黨難下摧毀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單幾中央執行委員會謀報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尚聽其行使職權，恣為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摘發。用是本委員持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迅予公決！俾咨交中央執行委員會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於否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

附：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份，合併附呈備查（存汪主席處）。（錄自「清黨實錄」第三八四頁）

第二騙：騙汪精衛

共產黨對國民黨，騙之外，便是拆，拆散國民黨的團結，擁一派打一派造成國民黨內部分裂。他們當

時的政策便是擁護汪精衛，打擊汪精衛以外的國民黨中堅。

中山先生在世時毛澤東便投入汪精衛門下，得汪提拔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一屆候補中委，代理中宣部長（部長江精衛）。及中山先生逝世後，共黨始公開擁汪打胡（漢民），當中山先生北上時，胡漢民代行大元帥職務，各方均稱胡代帥，在國民黨內部無論年資、聲望，中山先生之外均不作第二人想，尤其當時代行大元帥職權；中山先生逝世更是合法繼承人。但共產黨卻利用汪精衛打擊胡漢民，首先將大元帥府改為國民政府，選舉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降為外交部長。繼而由於刺廖仲凱案發生，誣指胡漢民主謀，迫其出國，等於放逐。造成胡、汪交惡，引致國民黨內部分裂，前後十年時間，內鬥不休，使共黨坐大。

以後由於發生「中山艦事件」，汪精衛出國，不久，蔣總司令誓師北伐。到了十六年（一九二七）吳敬恒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檢舉時，汪精衛回國。船靠岸後，蔣總司令登舟與汪密談請汪負責黨、政，自己率軍繼續北伐，完成統一。汪也同意，蔣總司令離船後，召集革命軍將領訓話，說明今後黨、政均由汪先生負責，任何人不服從汪先生便是不服從本人，定以軍法論處，語意懇摯。此為國民黨大團結之轉機。

誰知蔣總司令下船後，陳獨秀上船與汪再作長談，兩人立即發表一項「汪陳聯合宣言」全文如下：

國民黨、共產黨同志們！此時我們的國民革命，雖然得到了勝利，我們的敵人，不但仍然大部份存在，並且在那裏伺察我們的弱點，想乘機進攻，推翻我們的勝利。所以我們的團結，此時更非常必要。

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於主張打倒自己的友黨，主張打倒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軍閥）素所反對之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使敵人稱快。

無產階級獨裁制，本是各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國雖然實現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

治經濟的環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度，是否要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樣形式的同樣階段，還是一個問題。何況依中國國民革命發展之趨勢，現在固然不發生這樣問題，即將來也會不致發生。中國所需要的是建立一個各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來對付反革命，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獨裁。

兩黨合作人有各種不同的方式，重要之點足在兩黨大多數黨員羣衆，雙方以善意的態度解決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精神。

中國國民黨多數同志，凡是瞭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理論及其對於中國國民黨真實態度的人，都不會懷疑孫總理的聯共政策。

現在國民革命發展到帝國主義的最後根據地上海，驚醒了國內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傷、離間，無所不用其極。甲則曰：共產黨將組織工人政府，將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將打倒國民黨。乙則曰：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糾察隊。這類謠言，不知自何而起。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議之議決，已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上海軍事當局表示服從中央，即或有些意見與誤會，亦未必終不可解釋。在共產黨方面，愛護地方，安寧秩序，未必敢役於他人，對於國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表贊同，總工會亦已發表不單獨衝入租界之宣言，對於市政府表示贊同各階級合作政策，事實具在，更無造謠之餘地。

國共兩黨同志們！我們強大的敵人以武力對待我們，並且想以流言離間我們，以達其「以赤制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的觀點上，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開誠，協商迫行。政見即不盡同，然如兄弟般親密，反間之言，自不得乘隙而入也。披瀝陳詞，萬希各自省察，勿致爲親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國革命幸甚，兩黨幸甚。汪精衛、陳獨秀十六年四月五日。

（錄自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國聞周報」第四卷第十六期）

此項宣言正式出現了「聯共」字眼，也就是中共到今天所說聯俄，聯共的根據，汪精衛上了共黨大當而不自知。

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國民黨在上海大員又與汪作了一次懇談，要點如下：

四月五日會議紀事

滬訊：四月五日午前，汪君精衛、蔣君介石、柏君文蔚、宋君子文、李君濟琛、李君宗仁、黃君紹雄、白君崇禧、古君應芬、甘君乃光、蔡君元培、李君石曾、吳君稚暉，開一談話會於滬海道尹公署樓上，所談預先聲明暫不宣佈。惟吳君報告：因今日報紙登載國民黨共產黨兩首領之宣言，外間誤會者甚多，以爲從此中國歸兩黨共同治理，信有之乎？汪君大笑，以爲那讀報的大不辨文理了，全部宣言，「僅言兩黨之誤會。不可發生，未言兩黨共理中國」。吳君又補充幾句說：總理臨歿，致蘇聯遺書曰：「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之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照此看來，我們國民黨黨員，止有老實不客氣說治理中國，止有國民黨，沒有聯了共黨來共治之可能。又一方面，於總理的聯俄政策，容納共產政策，及友視不入國民黨之共產黨，皆無抵觸。聯俄政策，遺書所謂「予我國之援助」，自然不是請他共治中國。至於容納共產黨，乃是叫共產黨內的個人來服從國民黨主義，他便是國民黨。至於友視不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充其量也與所聯之俄國一樣，請他予我黨助力，不是請他共治中國，更不是不一定容許他們來鼓吹共產主義，止容許他們相當的研究。然若有抵觸國民黨，或竟危害國民黨者，則總理囑咐我們：「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之旨，我們定可有相當之制止。他們自去擁護共產黨，我們也要擁護國民黨。他們的擁護，若出了友誼的範圍，或要共治中國，甚至於他們想獨治中國，那我們的擁護，也不得不增高力量了。這是凡尋常與國所謂聯盟，及我總理所謂聯俄，汪君所謂聯共，皆有相當之範圍，無人不知者也。聯共二字，本不見條文，我們國民黨之條文上，止有容納共產黨員入國民黨而已。汪君曰：去年自國共兩黨聯席會議，聯字或由此而出。然聯席會議亦正是合一切之共產黨，友誼的解說誤會，並非定相聯之名義。至於未入國民黨之共產黨，止憑幾封往還之書，是意在言外，應當友視而已，況我國民黨友視世界一切革命之黨，本亦不待言者也云云。

（錄自民國十六年五月一日「國聞周報」第四卷第十六期）

汪精衛此後即去了漢口，在共產黨擁護下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反共的國民黨人在蔣中正、胡漢民、吳敬恒、蔡元培、張靜江等領導下，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厲行清黨，便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寧漢分裂。

但汪精衛在武漢不久便發現上了共產黨的當，七月中不得不實行分共。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清共已三個月，武漢始實行分共，分共與清共不同。清共是把共黨作叛亂分子辦，分共則是把共黨分子從國民黨組織中分出去，仍可在法律範圍內自由活動。

關於分共原因，江精衛當時曾有一篇報告如下：

政治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一件很重大的事，討論甚久，今天有報告：一個人說不完，分幾個人來講，本席裏有一個電報，打算先將前後情形講一講，然後再來宣讀。上月五日，就是主席團到鄭州去的頭一天，中央名譽主席，第三國際中央委員會魯依（編按：又譯為魯易）同志約本席去談話，拿出第三國際首領史達林（斯大林）拍給他同鮑羅廷同志的電報交本席看。本席看過之後，就說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看了再說。當時主席團中只有譚平山同志和宋子文同志沒有看見，近來宋同志已經看見了。這個電報是訓令中國共產黨同蘇俄在中國工作之人員的，且將他宣讀之後，再來討論（宣讀原電譯文），我們可以看出這個電報中有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

一、沒收土地不要國民政府下令，須由下級沒收。（汪：怪不得湖南鬧成這個樣子。有一般同志還說農工的行為並不幼稚，原來他們是照著第三國際的訓令在那裏做。但總理在民生主義中說得很清楚，要實行耕者有其田，須以法律同政治的方法來解決，也就是說，要由國民政府下令沒收，我們不必批評是由下級沒收的好，還是由上級沒收的好，蘇俄當日就是先由下級沒收，然後政府再加承認。第三國際固應如此，但與三民主義相衝突，國民黨就應該怎麼辦？）

二、在中央委員之中，多增加工農領袖。（汪：本黨的中央委員，是由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他們有錯誤，當然可以制裁，如楊希閔、口口口等之受處分，

但中央不能任命誰作中央委員，他們要本黨在中央委員之中，多增加工農領袖，試問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如何能干涉代表大會的權限？這簡直是破壞本黨的組織，要我們違背總章。）

三、國民黨現在的構造，必須改變。（汪：這是何等的大事，中央委員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而且又改變成一個什麼東西？）

四、由二萬武裝 CP 同志，及五萬工農份子組織新的軍隊，消滅舊的軍隊。（汪：我們的軍隊向來不分 CP 不 CP，為什麼單單要二萬武裝的 CP 同志組織軍隊？這是根本搖動我們的軍隊，完全變成 CP 的軍隊好了。）

五、組織特別法庭處分反革命派，不要 CP 同志參加，由老黨員組織。（這就是說：讓國民黨來作劊子手。綜合這五條而論，隨便實行那一條，國民黨就完了！當初容納 CP 同志加入本黨，不想結果竟如此！本席那天看了這個很重要的電報之後，因為第二天就要到鄭州去，只好說等主席團看過從鄭州回來之後再說。鮑羅廷同志是我們的顧問，但他始終不曾把這個電報拿出來給我們看，過了不久，魯依同志又來說，他不久就要走了，問他為什麼要走？他說鮑羅廷同志和 CP 同志反對他將這個電報給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看，所以他不能不走。他又說來此六個月，看見一切情形，很是痛心，革命黨同革命黨相處，應該要光明磊落，可行的，大家齊心努力去奉行，不可行的，就是爭到決裂也不要緊。但 CP 同志並不說明，弄得國民黨左派同捉迷藏一樣，照這樣鬧下去，國民黨，CP，國民革命，一齊都要失敗。他說他回到莫斯科，一定要告訴他們。當時本席就勸他不要走，走了之後恐怕要決裂。他就說最好是接受這個電報，不然，國民黨左派同 CP 都完了。本席於是回答他這五條一條也不行，我們不能犧牲國民黨！他說他無權說話，要我繼續同鮑羅廷同志商量，本席說鮑同志不同我們講，又商量什麼？他又說莫斯科有一個政綱，問我們看見了沒有？本席說不曾看見。又過了不久，陳友仁同志告訴我們，說鮑羅廷同志講的，魯依同志已經被趕回國去了，莫斯科所來這樣的電報很多，他們認為不能採用的，就不給我們看。這種話本來是可以安慰我們一下，但事實上不然，他們還是幹他們的，既不報告政治委員會，也不報告軍事委員會，過了幾天，魯依同

志就送了一個綱領來，同時，鮑羅廷同志也來電話說那個綱領是魯依同志一個人的。但這個電報是本黨中央名譽主席，第三國際中央委員送來的，不能說他是假的，而且 CP 同志已在討論，只有國民黨的同志不知道。現在不是容共的問題，乃是將國民黨變成共產黨的問題，國民黨的同志想起來能不痛心！從前 CP 同志加入國民黨，我們知道他們是要受第三國際的指揮。但我們始終不知道第三國際是如何訓令他們，一直到現在才曉得。一個黨的存在，不外主義與政策，其次是組織，再其次是軍隊。CP 同志加入國民黨，一方面受國民黨的指揮，一方面受第三國際的指揮，當然是受第三國際指揮的時多，那麼，就是國民黨完了！現在所行的不是三民主義，不是建國大綱，是第三國際的訓令，我們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賭咒發誓要以至誠接受總理遺囑——每次開會時，也要恭讀總理遺囑，是否口是心非？如果國民革命成功，是否還要以三民主義為綱領？政治委員主席團，除了譚平山同志因病請假之外，天天討論，到昨天才有結果，有兩件事要作：一、魯依同志已經回國，鮑羅廷同志也要走了，本黨應該派很有責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說明總理的聯俄政策，乃是三民主義聯合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的中國聯合共產主義的俄國，若是丟開了三民主義，那就不是聯俄，而是降俄了！這中間應訂出種種關係，不要曖昧行事。二、對於本黨內的 CP 同志，應有處置的方法，一黨之內不能主義與主義衝突，政策與政策衝突，更不能有兩個最高機關。例如土地問題，本黨是要由上級沒收，第三國際是要由下級沒收，CP 同志究竟是照那一邊的政策去做？照這樣下去，一天到晚只是主義與主義衝突，政策與政策衝突，最高機關與最高機關衝突，如何能不求一個處置的方法。這是本席自己工作經過的報告，還有主席團的意思，請別的同志講。此種文件以前是本席保存，現在這個電報，應該交把什麼人保管？（錄自民國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武漢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第二十次會議速記錄）

中間有過半月便是八月一日中共南昌暴動，汪精衛可被共產黨害慘了。

八月五日汪精衛在國民黨二屆中常會第二十三次擴大會議報告說：

這種狼心狗肺的東西，我們再說優容，我們就是叛黨！這種叛徒，我們要用對付敵人的手段對付，捉一個殺一個，同時我們要自請處分，本席就預備向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請求處分。為什麼容共政策到發現了第三國際給鮑羅廷、魯依的命令，還不把他們一個個抓來槍斃？現在事實已經大變了，共產黨已經明目張膽的做了，我們的敵人，和我們開戰。再有誰說優容，誰就是叛徒。我們要向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議請求處分，因為我們對於容共政策，太不知變通了。

八月六日汪精衛發表一篇論文，題為「錯誤與糾正」：

我們有錯誤沒有呢？唯有的。我們最大的錯誤，是誤解了總理的容共政策，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共同致力國民革命。由此可知共產黨員如果不和我們共同致力國民革命，我們便立刻不能容他。我們為什麼一直等到共產黨員快要消滅國民革命，我們才不容他，這真是我們極大的錯誤。共產黨員要使國民革命變成共產革命，使國民黨變成共產黨，所謀不遂，則破壞國民革命，破壞國民黨，都無所恤。我們對之可怎麼樣呢？如果恬然受之，只有以下幾種解決辦法。

其一：居國民黨領袖之名，行共產黨傀儡之實。在國民黨中，佔了一個領袖的地位，手下用的全是共產黨人，一切聽憑他們鬧去，只要毫不用腦的，點點頭簽簽字就行了。這種辦法，可以諡之曰：廢物，無恥。

其二：名為國民黨黨員，而其實早已完全接受共產黨的理論，暗中呢，已以共產主義代替了三民主義了，表面呢，說這才是左派，這才是革命。這種辦法，可以諡之曰：狡詐，無恥。

其三：已經是國民黨黨員了，而又悄悄的不待國民黨之許可，加入共產黨，為共產黨員。於是在國民黨裏，成了探頭探腦的奸細，在共產黨裏，成了知彼知己的軍師。這種辦法，可以諡之曰：陰險，無恥。我們幸而不曾犯了這種罪惡，我們只有錯誤。現在共產黨已經在南昌公然與本黨宣戰了，公然破壞國民革命了，公然從國民革命軍中裂取一部分以去了，於此之時，本黨黨員如果還有厚著面皮替共產黨迴護的，這人便是本黨叛徒。我們如今不是引咎的時候，是補

過的時候，人的知識，是有限的，而革命是無前例的。以有限的知識，而幹無前例的事，如何能不有錯誤。所靠得住的，發見錯誤，立刻糾正，我們不能效某某之飾非文過，瞞著良心說硬話。我們也不能效南京派，今日說要受第三國際指導，明日說殺盡共產黨人，毫不知自責的，而反沾沾自喜，自鳴得意。我們只有悲痛，我們只有加緊工作，我們唯一的糾正錯誤之方法，是先補過，後引咎。（錄自民國十六年八月廿一日「國聞周報」第四卷第三十二期）

然而，到了汪精衛知道錯誤時，共產黨已經坐大了。

（編按：其實，寧漢分裂，“造釁開端實在俄”。是蘇俄在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北伐眼看就要成功，中華民國就要走向統一之時，因誘變中國的國民革命不成，才決定製造中國國民黨的分裂，進而破壞中國的統一，以繼續發動中國的共產革命。所以，當北伐已經解放了南半個中國時，蘇共不僅命令中共製造種種事端以破壞北伐，而且指使中共於1927年2月在北京召開政治局特別會議，決策“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實際就是要將因親共而去職的汪精衛從歐洲召回以繼續製造蔣汪的分裂與內鬥。這才是寧漢分裂的直接原因。共產黨因此而又一次得逞，汪精衛遂將武漢的國民政府辦成了連他自己也承認的“俄國政府”。如該文所述，直到這位“夸夫死權”的國民黨左派領袖突然看到斯大林的五月訓令之後，才自覺不能和共產黨再在一條船上呆下去，這才下了“分共”的決心。文中，他對南京政府的指責，仍不過是他的“派性”表現而已。）

第三騙：騙死後的孫文

中共捏造出一個「三大政策」以代替三民主義，李雲漢教授曾有以下敘述：

共產黨人對於三民主義的最大誣衊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謂「三大政策」，並妄圖以「三大政策」來取代三民主義。事實上，在孫先生的全部言論和國民黨歷次的宣言、決議案中，從來就沒有「三大政策」一詞，而且在孫先生在世的時候，共產黨份子也不敢提出這一偽造的名詞。這一名詞不見於國民黨的文獻，其最早出現乃在中共上海區秘密通訊第七號，時間在

民國十四年的十二月。共黨的秘密通訊上有這樣的話：

「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

民國十六年一月起，鮑羅廷和他指使下的共產黨人乃大肆叫囂所謂「三大政策」。特別是在武漢地區，只聽到「擁護三大政策」的叫囂，很少人敢宣傳三民主義了。關於當時的情形，在武漢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顧孟余氏，曾經很坦誠的說：

「國民黨歷次宣言中，本來是有許多政策，但外間宣傳的所謂三大政策，卻找遍了總理遺教、歷次宣言，以及各種決議案，都找不出這麼一個東西！實在說：三大政策的歷史很短，不過只有七個月，何以知道只有七個月呢？因為三大政策的內容，在七個月前還沒有定。今（十六）年正月，本席由江西到武漢來，才聽見鮑羅廷同志談起三大政策，並勸大家要遵守；而當時他所說的三大政策是反帝、聯俄、農工，同現在天天嚷的不同。可見三大政策的內容，在正月時還沒有定，而且未經任何會議決定，是共產黨替我們想出來的。於是各軍政治部、各報館、各團體的宣傳，就只有三大政策，絕不提三民主義。」

在國民黨的歷史紀錄中，孫先生難曾採行過「聯俄」與「容共」政策，但都有其一定的條件與限制。「聯俄」的條件是蘇俄承認「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並保證「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思與目的」。容共的條件是共產黨人以個人身分被允許參加國民黨，必須信奉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黨綱與黨紀，誠如李大釗所保證的，不能利用國民黨來作共產運動，更不允許陰謀赤化國民黨。這一政策，由於蘇俄和中共背棄了他們的諾言，一味進行破壞活動，國民黨乃決定清黨，並對俄絕交，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並作成決議：「凡與聯俄容共政策有關之決議案，一律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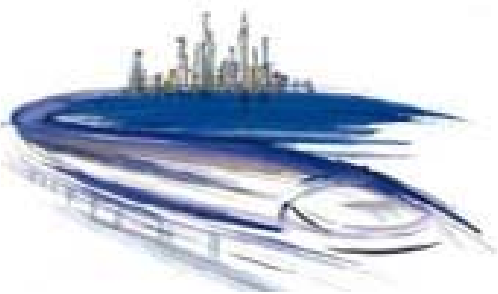
共黨出版有關孫先生文集和傳記書刊中，不敢提越飛的保證，妄指「聯俄」是孫先生要走蘇俄的路線。又把「容共」一詞，一廂情願的改為「聯共」，以提高身價，但又不敢提到李大釗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席上所作的保證，真是作賊心虛。至於所

謂「輔助工農」或「扶助工農」，根本上是對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斷章取義；國民黨建黨以來一直為全體民眾利益而奮鬥，何止限於工農；況且，國民黨的工農政策也絕非是共產黨的「工農革命」、「工農暴動」或「工農專政」。共黨在民國十六年高嚷「三大政策」，目的系在以「三大政策」來代替三民主義。這一陰謀詭計失敗了，曾經沈寂了一段時期。到了抗戰初期，毛澤東又複利用所謂「三大政策」來捏造了一個「新三民主義」的名詞。毛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什麼「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真是荒謬到極點！

（編按：鮑羅廷在 1927 年 4 月 12 日於武漢創辦的英文版人民日報上，曾首次提出新三民主義就是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參見《誰是新中國一書》）

目前中共又利用所謂「三大政策」來作「第三次國共合作」的統戰，並利用鄧穎超這樣曾經加入過國民黨的人，大肆喧嚷，說這是在孫先生主持下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的革命政策」。這不僅曲解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史實，也對孫先生的嚴正態度形成不可饒恕的謾謗。孫先生無論對蘇俄，對共黨，都不允許有危害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的行為，否則就加以棄絕。這一點，連陳獨秀也不敢否認，陳曾書告其共黨同志說：「孫中山屢次向國際代表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的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待續）



記實報告

國民黨軍人 劉箴和李植榮 之死

陳世忠



編者按：希望今天的台灣讀者、特別是今天的台灣國民黨人，能夠讀一讀這一篇記實報告。雖然這篇報告所記下的，只不過是 1949 年後，國民黨人在中國大陸無辜慘遭迫害的兩個最平凡不過的“故事”。

“莫攀共，攀共太心偏……”

我在勞改隊滯留十餘年，經歷的事情可以說是不計其數，其中印象較深的有劉箴之死和李植榮的被殺害。

我和劉箴相遇有一定的偶然性。那是 1973 年。當時我已經從黑龍江省泰來縣第八勞改支隊（對外掛牌為黑龍江汽車製造廠）出監，但是仍然戴著反革命份子的帽子。我患高血壓病比較嚴重（210/130），被安排到新生醫院住院，和其他刑滿釋放份子在同一個病房。房間裏有八張病床。

有一天成吉思汗農場送來了幾名患者，其他人的名字我已經忘卻，唯一給我印象較深的是劉箴，劉箴是一個身材頎長、面色紅潤的南方人。由於他在東北和內蒙古已經度過了幾十年的勞改生涯，他的口音變得使我無法確定他原籍是什麼地方了。光知道他是黃埔軍校四期的畢業生，在國民黨軍隊裏資格算是比較老的。他原來在中華民國國防部擔任中校參謀，職務

不算高，但位置相當關鍵。解放後他在數難逃，被捕判刑，發配黑龍江勞動改造。

劉箴是一個有修養的人，說話有禮貌，態度和藹可親。從舉止上看，他雖然歷盡磨難，軍人的風度沒變。他患的是食道癌。我從自己的切身經驗知道，勞改生活對犯人的種種摧殘有許多是無形的。例如，長期吃不飽飯，勞動時間長，尤其農活忙時往往沒有足夠的吃飯時間，不得不狼吞虎嚥，再加上心情壓抑等等，久而久之，消化系統很容易得病。我本人就曾因為胃和十二指腸潰瘍嚴重而動了手術，切除了 80% 的胃。我還認識幾位“難友”，也是消化系統疾病纏身。

劉箴的食道癌需要動手術。由一位醫術較高的李大夫主刀。劉箴平靜地接受這種大手術。手術整整進行了七個小時，據說很成功。當他從手術室被送回病房時大家都很高興。按理說，只要好好休息，得到好好照顧，他的健康是可以逐漸恢復的。而因為是同病相憐，我們同病房的患者之間，相互關懷和照顧的情形是頗為感人的。

天下有許多太巧的事情。不早不晚，就在他動手術前夕，他接到成吉思汗農場場部的通知，說是根據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決定，對過去擔任縣團級以上的偽職人員進行特赦，不僅提前釋放，而且給予他們公民權，每人還發一套新的中山裝，以示寬大和關懷。劉箴是夠條件的，也獲得了這項“殊榮”，這樣一來，他的身份就變得和同病房的其他患者不一樣了。

就在他術後醒來和大家微笑時，醫院院長來巡視病房了。院長來了就生氣。怎麼搞的，一個已經獲得特赦的公民怎麼可以繼續和這些刑滿釋放份子呆在同一个病房裏呢？階級觀念和政策觀念哪里去了？於是，他不由分說，命令立即把劉箴轉移到幹部病房去。

當李大夫來巡視由他動過手術的患者們時，發現劉箴已經被轉移到幹部病房，大吃一驚，而且非常不高興。要知道這是一次非同小可的大手術。我聽說僅僅是刀口就得從前胸一直交叉地切到後背。所以患者根本不可以有哪怕是輕微的運動，更經不起像轉移病房這樣的折騰了。

果然，由於受到了過大的震動，劉箴的刀口惡化。而更要命的是他被換進了一個只有勞改幹部才有

資格住的病房。在那“階級鬥爭要天天講”的時代，勞改幹部會怎樣看待一個剛剛獲得特赦的國民黨軍官呢？他們之間可能有一絲一毫的“階級感情”嗎？別說是互相照顧了，就連倒個開水也不會有人管他的。所以他的病情急速惡化。而我們這些難友們曾經怯生生地主動提出照顧劉箴，不出所料馬上被頂了回來：“幹部病房是你們‘二勞改’去得的嗎？”

沒過幾天，到了劉箴病危時，醫院才破例地允許我們病房一個姓張的小夥子去伺候他。可是為時已晚，當天晚上劉箴就不行了。小張回來後告訴大家：劉箴頭腦很清醒，沒有任何神智不清的症狀。小張問他有什麼話要捎給親屬，他說不用了。過了不久，他就安安靜靜地走了。我們只知道他的妻子和女兒都住在上海。

這是一個不大好聽的故事。沒有驚心動魄的內容，也沒有嚴刑虐待的罪惡。在那個年代，甚至可以說院長也是好心好意，但恰恰是那根繃得緊緊的階級鬥爭的弦，送了劉箴的命。儘管我對劉箴的瞭解不算多，但是我想，他作為黃埔軍校四期的學員，在國民黨軍隊裏一定打過許多硬仗，他一定是一位抗日戰爭的功臣，可是新中國的建立，給無數像劉箴這樣的人和他們的家庭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結果是經歷了漫長的勞改歲月之後，孤單寂寞地死在塞北他鄉，給妻子女兒帶來無限的哀痛和思念。我猜想，他的家屬接到的肯定是一份簡單的死亡通知書，說是劉箴因患食道癌經醫治無效而去世。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還在人世。就讓我的這段不太愉快的回憶留給劉箴的同期同學和同事們作為小小的紀念吧！

不論怎樣，劉箴是病死在醫院的病床上的，從這一點說，他還算是幸運的。這要看和誰比！比方說，和同是國民黨軍官的李植榮相比，他就幸運得多。

李植榮是在 1969 年 4 月被解放軍戰士擊斃在黑龍江省嫩江勞改農場的勞動現場的。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犯的又是什麼罪呢？這話得從頭說起。

李植榮沒有劉箴那麼高的學歷和資歷。他出身於河北省順義縣的一個貧農家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國民黨軍隊把他三哥和他當作壯丁抓去入伍，後來他當上了小小的排長，隨傅作義將軍的部隊和平起義、接受改編，不久以後復員回家，按理說，

“歷史罪惡”即使有，也應該是一筆勾銷了吧？可是不然！1957 年反右開始，根據毛澤東的一句話：“言者無罪對於他們是不適用的”，李植榮也就在劫難逃。既然被打成右派，就得新賬舊賬一起算，成了歷史反革命加現行（反革命）。剛剛結婚才六天的李植榮被捕判刑十年。他覺得他是響應黨的號召提意見，不應該算犯罪，於是上訴。而根據當時的法律，上訴本身就意味著不服判決，不服判決就意味著對自己的罪行缺乏認識。而在人民法官眼裏，是否認罪是量刑的重要標準之一。既然李植榮不認罪，就說明他罪加一等。所以他上訴的結果就是撤銷原判，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發配黑龍江勞動改造。

李植榮死心了。人在矮簷下，不低頭又能怎樣？只剩一條路：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人總有個盼頭，他的幻想是通過刻苦的勞動爭取減刑，早日回家，和苦苦等待著他的妻子胡鳳蘭，和從未見面的兒子小早重新團聚，過幾天人的日子。加上他年輕力壯，勞動家庭出身，幹活是把好手，樣樣農活拿得起放得下，每項勞動都走在前頭，擔任犯人小組長。就這樣，一天一天地過，一年一年地熬，熬過了十三個年頭，眼看就有出頭的希望了。說不準哪一天天老爺可憐見，興許會發下來一張減刑甚至提前釋放的通知書呢！這樣一想，他的勞動勁頭更足了。

就說一個極小的例子吧！1969 年 4 月，嫩江草原天寒地凍，我們中隊 130 名犯人在兩名勞改隊長和三名解放軍的押解下來到勞動現場執行打草任務。每個犯人每天的打草定額是三百斤。完不成任務的要受罰，例如，別人空手回監舍，完不成任務的得背一大捆草回去作燒炕用。勞改隊的定額總是必須經過艱苦努力才能勉強完成的。可是李植榮呢？總是提前超額完成任務。出事那天，李植榮一上午就打了 415 斤草，名列全隊第二，僅次於打了 435 斤的李樹文。中午吃飯後，李植榮一面磨鐮刀，一面笑著對李樹文說，要爭取超過他。真的，這種渴望通過艱苦勞動，獲得寬大處理的心情若非身臨其境是難以理解的。

打草任務比較特殊，犯人必須彎腰低頭緊張幹活，一不注意就可能越出警戒線。而什麼是警戒線呢？是犯人大組長奉命在勞動現場周圍插四面紅旗，象徵性地畫地為牢。兩面紅旗之間的距離是 300 米到 500 米。根據初中物理學的常識，在這麼長的距離上允

許的視覺誤差應該是 5 米到 10 米。為什麼建築工人需要不斷地“吊線”呢？就是這個道理。

就在下午開始幹活一小時左右，戰士（後來得知他叫馬洪才）從他在東北角的哨位上走過來，指著一堆草問是誰打的。正在彎腰打草的李植榮不敢回答。馬洪才又問一遍，李植榮不得不回答說：“報告隊長，是我打的。”馬洪才說：“你出了警戒線，知道嗎？”根據勞改隊規定，越出警戒線是嚴重的錯誤，回去是要受批鬥，受處罰的。李植榮就比劃著兩端的紅旗，意思是說他並沒有出警戒線。馬洪才看這個犯人膽敢強嘴，就有點生氣，命令他朝前走。李植榮只得說軟話：“報告隊長，我下次注意。”但是解放軍的話他又不肯不服從，於是放下鐮刀，乖乖地朝前走了幾步。這樣一來，如果他本來沒出警戒線，現在也站在警戒線外了，如果他真的出了警戒線，現在離警戒線就更遠了。

在通常情況下，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許多曾經越出警戒線的犯人，也都曾被釘在原地罰站大約半小時到一小時，然後就命令他們回去，繼續幹活。要知道，在四月份的嫩江農場，脫了棉襖，只穿背心，站在野外是很冷的。而且這麼長時間被釘在那裏不幹活，就很可能完不成當天定額，所以罰站本身也是一種懲罰。後來這兩個解放軍自己說，當天在喝住李植榮之前，就有三、四名犯人曾因越出警戒線而被釘在那裏。

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以為李植榮也會在罰站以後回來繼續打草。可是不然。解放軍的代理班長（後來知道他叫王忠全）巡邏到了李植榮罰站的地方，他問了馬洪才幾句話，就開始詢問和訓斥李植榮。對話內容大致如下：

王忠全說：“你出了警戒線知道嗎？”

李植榮說：“報告隊長，我下次注意。”

王忠全說：“你們隊長沒有說不準出警戒線嗎？”

李植榮說：“隊長說了。”

王忠全說：“都隨便出警戒線，要紅旗有什麼用？”

李植榮說：“我下次注意。”

王忠全問：“你叫什麼名字？”

李植榮說：“我叫李植榮。”

王忠全問：“你犯什麼罪？”

李植榮答：“歷史反革命。”

王忠全問：“你過去是幹什麼的？”

李植榮說：“我是國民黨軍隊的排長。”

王忠全問：“殺過人沒有？”

李植榮說：“殺過。”

……

由於野外風向不定，各人聽到的對話內容不完全相同，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他們之間有較長的對話。

這番對話惹怒了王忠全。他命令李植榮轉身朝前走，李植榮向前走了幾步；王忠全還嫌不夠，又喊：再朝前走！李植榮又服從了。這樣的命令重複了好幾次，這樣一來，李植榮就距離警戒線越來越遠了。王忠全對旁邊的馬洪才說：開槍打！馬洪才奉命拉上槍栓，準備射擊。李植榮是軍人出身，聽到槍栓聲，覺得不對，急忙轉過身來。可是子彈已經打中了他的腹部，他應聲倒下。王忠全急切地對馬洪才說：“再開一槍，再開一槍。”可是，馬洪才在慌亂中把子彈掉落在草地裏，他蹲在地上找到子彈，再上了膛。朝天開了第二槍。

兩聲槍響驚動了正在昨天打完的草垛裏休息的勞改隊長。李隊長趕到現場，看到的是被擊中腹部而躺在地上的李植榮，便問解放軍怎麼回事。王忠全和他嘀咕了幾句，李隊長就命令犯人大組長劉德元在離草垛不遠的地方集合犯人隊伍。這期間，李隊長走到李植榮跟前，踢了他一腳，跟他說了幾句話，然後按照王忠全的說法，向全體犯人宣佈：“犯人李植榮，非法越過警戒線，經鳴槍警告不聽，被我解放軍當場擊斃。現在收工回去！”這時候，李植榮又掙扎著跪起一條腿來，但馬上又倒了下去。

王忠全、馬洪才和鄭隊長帶領隊伍回監舍，留下李隊長和戰士趙明貴看守現場。受傷的李植榮沒有得到過任何搶救。一直到王忠全、馬洪才步行好幾里路押送犯人隊伍回監舍，然後向上級彙報，再由上級派人趕到現場，經過這麼長時間，李植榮還沒死，還和趕到現場的排長劉繼賢有過對話。自始至終沒有任何人企圖採取任何措施搶救李植榮。據說，是在派一名犯人用牛車把李植榮拉到半路上的時候他才斷氣。該犯人將他草草埋葬。事後，按照“犯人企圖越獄逃

跑，經鳴槍警告不聽，被解放軍當場擊斃”的結論，通知李植榮的家屬。就這樣，李植榮的生存權被極其卑鄙而殘忍地剝奪了。而被扣上“企圖越獄逃跑而被擊斃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屬”的帽子的胡鳳蘭，和從來沒有見到過自己父親的小早，則幾十年如一日地背著這頂黑鍋，抬不起頭來！

還有一個插曲：第二天犯人照常出工打草，犯人大組長需要用紅旗，可是發現紅旗已經不在原來的地方，而是被移動到離草垛近幾十米的地方了。這就不奇怪了：後來向各分場犯人傳達時，都說是嫩江農場七分場有個犯人企圖越獄，跑出警戒線七十米以外，解放軍鳴槍警告，他不聽，繼續逃跑，解放軍不得已才開槍，將他當場擊斃了。

1986年，胡鳳蘭和小早收到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再審判決書，說是李植榮原來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屬於冤假錯案，給予平反。這就是說，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標準，李植榮是個守法公民，他完全是無辜被捕判刑的，而在服刑（讀作苦役）十三年、只剩兩年殘刑時，竟被罪惡的子彈剝奪了生存權利。儘管後來法院於1989年確定王忠全、馬洪才的行為是典型的故意殺人，李植榮純屬無辜遭到陷害，他的親屬至今得不到任何賠償，甚至連一句慰問的話從政府那裏都沒有聽到過。

我們這些經歷過長期勞改煉獄的人，能夠從勞改隊裏活著出來，畢竟是倖存者。儘管九死一生，儘管妻離子散，但是與李植榮和劉箴相比，我們是不幸中的萬幸。我們有責任使醜陋的真相大白於天下。李植榮和劉箴的命運告訴人們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就是毛澤東喜歡說的那句話：“能夠消滅者馬上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留待以後消滅之。”毛澤東是這麼說的，毛澤東們也是這樣做的。

2006年2月22日



毛澤東重要歷史疑案考訂

何晴蓀

“我身上有七塊錢，於是用來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終於安全到達農軍那裏時，口袋裏只剩兩個銅板。”

一九四八年秋天，中共勢力在大陸

關於毛澤東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次被捕的事，過去很少有人懷疑，更少人甚至不見有人提出過“異議”，其原因可能是歐美政黨出入十分自由，政治人物脫黨並不認為是名節大事，也可能是因為沒有資料引起人們對毛澤東被捕一事的懷疑，只能按毛澤東自己的交代去相信。何況這一交代被中共一致肯定，也無人敢去議論，黨外和國外人士只好承認毛“被捕”後“急智脫逃”的結論，連中華民國副總統陳誠簽署王健民著的《中國共產黨史稿》亦照例引用。

流傳於世的毛澤東“被捕”又“急智逃脫”的記載，出於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現將該書有關章節的文句摘要抄錄，斯諾記下毛澤東的談話是這樣：

“當我從事組織軍隊，奔走於衡陽礦工和農軍之間的時候，我被國民黨屬下的一些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搞的恐怖正達到頂點，許多國民黨的嫌疑犯正被槍殺。當時，我被送到民團總部去，到了那裏將要被殺害。但我從一位同志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傭的，看著我被殺，對他們沒有特別的好處，所以他們答應釋放我。但是，負責押送我的隊長卻不肯。因此，我決定逃脫，可是，直到民團總部約兩百碼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脫的機會。在那一剎那間，我掙脫了繩子，逃到田野裏去。”

引文下面由毛澤東不厭其詳的談逃脫後的驚險場面，他說：“士兵追趕我，並且強迫一些農民協助他們搜尋。他們有許多次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接觸他們。可是，我終於沒有被發現。雖則有五、六次我曾放棄了希望，覺得我肯定會再被抓到，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索。”

毛澤東脫逃後的情形，經斯諾寫出是這樣：

急劇膨脹，中國東北和天津戰役結束的時候，長江以南各省震動，在毛澤東當年被捕的地區，一些中小學教員很自然地對中共和毛澤東的歷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個金姓的小學教師讀了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就地調查一九二七年毛澤東被捕的情況。最初找不著什麼線索，過一段時間，經朋友介紹，得知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曾在當時的民團團部做過文書，於是他和朋友尋訪到了這個老人。

這個老文書經過久久的回憶，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誰，但記得那年（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節前，有個瘦長的男人在鎮上經過，因為背的包袱沉重，又東張西望鬼頭鬼腦，被民團懷疑背的是槍枝，把他抓住，原來背的是一百多塊銀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說是做生意的，當即解到民團團部審問，經過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產黨一個頭頭，他供出好幾個同黨，有一個同黨並且是做縣長的，在鎮上小夥鋪裏等他，也一同被捕獲。這個老文書清晰記得的大體情況，就只這些。

金姓教師要老文書回憶他聽得的所有其他情況，老文書所知不多，只聽說當天民團總部把那幾個被捕的人解到邊防司令部去，被捕的人給政府做了許多工作，招安了一大隊暴徒。以後的事，就說知道了。金姓教師再次請老文書增加記憶，提供線索，老文書說當年的團總已死，可去找團總的兒子問問。團總的兒子當時也老了，又有病，對當年毛澤東被捕的事也有興趣。他肯定當年父親抓的是毛澤東，但抓的具體情節不大明瞭，只聽說毛澤東能說會道，願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親愛才重義，見毛澤東為國軍立了一些功，又是同鄉關係，幫他討情，保他回鄉教書，誰知後來他卻逃到井岡山去了。

當時金姓教員和老團總的兒子對毛澤東遭受挫折後仍然上井岡山的精神，表示佩服。到中共軍隊渡過長江以後，老文書的下落不明，土改期間，團總的兒子被槍斃了。後來，金姓教員當了“右派”，和他另外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談起他調查所得的往事。上述資料是香港回歸後，金姓教員好友的女兒到香港在閒談中提及的，是否可靠或有多少成份可靠，誰也不能肯定。

這位金姓教員好友的女兒說：我們長期住在香港的人，對中共歷史和毛澤東個人行為，一般都不十分關心，許多大陸事情只是耳聞很少目見。時間長了，有些香港人回內地或內地人到香港，或內地親鄰來信，知道內地人民受中共迫害，對照香港一些報刊記載，證實無誤，使人不能不信。內地每次政治運動的開展，香港人大都為內地親友提心吊膽，擔心他們的禍福吉凶，誰被槍斃，誰被逼死，香港人總為內地親友歎息。一九五八年後，大陸“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是人禍）期間，內地逃香港的人數突然增加，內地親友來信要米、要油、要肉，還有用血簽名哀求速寄，這自然嚴重損害了中共的形象。最初，內地“土改”，“村村見血”——殺地主和國民黨鄉保長；“肅反”時期，廣州一天殺三百人，各中小城市殺一百人幾十人不等；一些香港人都不大相信。至此，只有搖頭歎息，希望中共不要收回香港。至於毛澤東的為人和毛澤東的書，我們很少看也不關心。直到文化大革命，有如地震一般震動了香港，日益增多的從內地逃來的人，將有關毛澤東殘暴和荒唐的故事說出來，特別是彭德懷、劉少奇、陶鑄等人的被害，使我們對毛澤東為人的無情無義，逐漸由憎惡變成憤恨。

六年前，我的丈夫張時中先生在香港聽到關於毛澤東被捕的實況，回美國和我談論不止一次，我們總覺得太簡略，說明不了問題，而且做調查的人和調查的物件，用中共的政治術語來說，政治上都不大可靠，又沒有書面文字可證，很容易被中共指為“造謠”或“誣衊”，我們一直把它存在記憶的資料庫裏沒有寫出來。有時，和朋友談起，許多朋友都說這資料對毛澤東的歷史可以提出新的佐證，我們覺得事不關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和中共為敵，害怕中共降罪。但是，對毛澤東粉飾自己被捕的醜事，而對別人“脫黨”卻用最高標準去要求，比“餓死事小，

失節事大”的男權主義還苛刻十倍，以無上的清規戒律打倒那些扶助他多年並有功人員，甚至以“莫須有”三字定罪，誘供逼供捏造罪證無所不至，使被害的人難以數計。道義和良心使我們經常想起“毛澤東被捕”的事。直到去年冬季前，我和丈夫到北京探親訪友，有時上圖書館看報看書，才發現有幾本記述毛澤東被捕的書籍，並不如毛澤東對斯諾談過的那樣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證實老文書的所述“實而不虛”，於是，我們把它做為資料復印下來，回美國後，我們將復印資料對證我們的記憶。反復加以研究論證，現將我們復印的書籍資料簡單介紹於下：

第一種資料：胡長水、李瑗《毛澤東之路：橫空出世》第三九九頁稱：“安源會議後，毛澤東即化名為安源煤礦的採購員張先生，和潘心源等一起，直奔銅鼓縣城，進到瀏陽和銅鼓邊界的張家坊時，被團防軍扣押。”

按：將胡長水、李瑗記載對比毛澤東答斯諾的談話，多了一些情節和人物，是出發前毛澤東化名張先生，為安源煤礦的採購員，並且不是一個人去，而是和潘心源等一起去。至於潘心源是什麼人，還有“等”字是誰，都略而不談。毛澤東被捕以後的情況，只復述毛澤東對斯諾談話的內容來敷衍，但這一資料多於毛澤東談話的那些事實，引起我們注意。

第二種資料：楊慶旺著《毛澤東指點江山》上卷第一五八頁（中央文獻出版社）稱：“一九二七年有一支以二十軍獨立團為旗號的隊伍也是在瀏陽活動的瀏陽工農義勇隊。九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共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陪同下，離開安源前往銅鼓改編獨立團，九月十日，在瀏陽張家坊遇險逃脫之後，終於抵達銅鼓。”

按：這一資料雖然簡略，但記下和潘心源同去，而且明言潘心源是縣委書記，這和老文書所講同黨有做縣長的，可以相互印證。其次，這資料提到瀏陽活動的工農義勇隊後來活動如何，不得而知，是否因毛澤東被捕立功而解散了，值得注意。第三，張家坊在瀏陽和銅鼓之間，毛澤東在張家坊被捕後，自己說是到農民武裝部隊去，怎麼又會走往戒備森嚴的銅鼓縣城？這只能理解為沒有逃脫而是被押解去銅鼓縣城裏去的。

第三種資料：李新、陳鐵健主編《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二零零零年北京出版社）第一章第三節第七十一頁稱：“九月十一日，毛澤東領導第三團在銅鼓起義。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後，毛澤東與潘心源赴銅鼓指揮第三團，路經瀏陽張家坊遇險，毛澤東脫險，潘心源被捕入獄，因此只剩了毛澤東一人赴銅鼓。十日，毛澤東同志來銅鼓。”

按：這一資料是四大冊，第一冊序言說：“一九七八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委託李新……等組織編輯，材料早就準備，後改為李新和陳鐵健來主編”，說明這是一套由中共官方組織出版的書籍，筆下褒貶當然具有純正的中共“黨性”，一字一句不會隨便出軌，直書“毛澤東脫險，潘心源被捕入獄”，沒有詳細敘述毛怎樣脫險，潘又怎樣入獄，乾脆用十二字寫出，其中必有“難言之隱”，一個最合理的推斷是筆者佔有許多資料，因為自己的“黨性”關係和黨內地位，不敢明言，但歷史事實具在，不好粉飾，用十二字寫出，讓讀者看其中的因果關係，即毛的脫險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獄”是“果”，這就印證團總兒子所說的“立功”，是有“豐富”的具體內容的。

第四種資料：趙大義、高永芬著《險難中的毛澤東》第七六至七七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零年七月版）：“幾個團丁也要用繩子來綁毛澤東他們三人，其中一個團丁說：他們有安源礦的證明，就算了。幸好有這張證明，要不然綱著就難以脫身了。毛澤東學鐵拐李的樣子，一拐一拐走得很慢，潘心源和易學鐵見狀，明白了毛澤東的用意，就有意加快了腳步，使一行人拉成兩段”，“他們在路上走著走著，機會來了，毛澤東會意地說了一聲，謝謝黃大哥（押解他們的團丁姓黃），就追緊往回走十幾步，然後一拐就朝山林跑去了”。“為了掩護朝山林方向跑去的毛澤東，潘心源大聲嚷嚷：你們青天白日到底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吳縣長那裏去告你們，團丁們被潘心源這突如其來的吵鬧聲愣住了，發起呆來，說時遲，那時快，易子義趁機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潘心源為了掩護毛澤東，減輕易子義的壓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們，還不快跑呀！他邊喊邊帶頭向後跑。隊伍亂成一團，無辜抓來的人一轟而散”。

按：第四種資料是用小說體寫的，其中對話當出於作者的想像，敘事脈絡不清，文筆拙劣，把一場政治鬥爭寫得如同兒戲，但他們的資料來源當有所本，不可能全部臆造，如毛澤東他們拿安源煤礦的證明，即和我們所舉的第一種資料相同。還有，毛澤東走了後，潘心源還沒有走，還在那裏吵鬧，即使真實的事實不一定可靠，但毛逃潘未能逃是和我們引的上述第三種資料相同的。我們估計：潘心源這個人在中共佔領全部大陸後可能還沒有死，但毛澤東沒有再重用他，以致他沒有在中共報刊上再出名。中共要他寫過什麼，我們亦無法找到。在毛澤東坐上北京寶座權勢沖天時，他只有歌功頌德的一條路可走。第四種資料把潘心源寫得活靈活現，也許是看到潘心源在中共統治大陸後的自我交代資料，他強調他掩護毛澤東的功績向毛澤東求饒獻媚，不敢也不會揭發毛澤東的出賣，如此而已，但正足以說明潘在毛逃後還未脫身這一基本事實。再有，第四種資料提出潘心源之外，還提到一個人名叫易學鐵，另一個人名叫易子義，我們不知道這易學鐵是否即易子義，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老文書所說毛澤東“供出了好幾個同黨”，並非虛構，而是鐵的事實。這也證明了第一種資料“毛澤東和潘心源等”的“等”字有了著落，即毛澤東被捕後出賣了潘心源和易學鐵或易子義等等，鐵定事實，毛澤東即使未死，亦難狡辯。

至此，我們可以斷言：毛澤東自己所說的“被捕急智脫逃”的故事，是粉飾自己欺世欺人的行為。

中共建國前後，國內流行一篇宣傳資料，將毛澤東當年對抓他團丁的談話，詳詳細細，委委婉婉，寫得十分動人，好像除了以金錢賄賂團丁之外，還是這篇談話的說服力強，煽動性高，提高了團丁的階級覺悟，在放毛澤東逃跑這一事件中起了化解作用，使士兵欣然同意。這篇談話在毛澤東的湖南湘潭故居紀念館有存稿展出，香港劉濟昆先生的文章亦曾引用，大約兩百多字，無須在這裏寫出。我們估計：這篇談話是毛澤東本人後來化精神著力捏造出來的，大概他覺得對斯諾談話還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動人的談話補充宣傳。我們和幾個朋友研究了這篇談話，並找幾個湖南籍的朋友參加，認為談話的語法和語氣，完全和毛澤東生前談話口氣和著作風格相同。為什麼“被捕脫逃”事件，毛澤東本人和中共的黨棍子筆桿子如

此重視？因為，他們認為是維護偉大領袖英雄形象的大事。

但是，儘管怎樣多方維護，亂真的假貨，總會被人識破。用“文革”語句來說：“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歷史上多少疑案，經過人們積年補充資料，發覆鉤沉，最終都會使真相大白於天下。僅從毛澤東對斯諾談話的內容來研究，就可以發現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澤東後來不以此歷史事件來吹噓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裏有愧。中共筆桿子淡化這一歷史事件，沒有大事宣傳，亦可能怕紙薄風大，露出原形。我們對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有關“被捕脫逃”的疑點提問於下：

第一、毛澤東談話只說當時被抓的人只他一個，並無其他人和他一起活動並同時被抓，所以他只用一個“我”字而不是“我們”。“我”是自己一人，而“我們”是除我之外還有其他人，這是人們在生活中正常交往的常識。毛澤東只提“我”不提“我們”，心中有鬼，不可告人。不只是和斯諾如此談，和斯諾談話以前與他人談話，包括黨內交代，都是用“我”，一貫用來，不好改變也不想改變。當時，以至以往用“我”，除了心中有愧之外，很大可能是他以為潘心源、易學鐵還有易子義等人已死了不在人世，無人對證，所以膽大妄為，既不臉紅，也不心怯，這是道德墜落人格卑劣的表現，能騙則騙，只要騙人能對自己有利，對這樣的人即使大罵一頓亦有何用。對他鄙夷一笑，亦覺得不值。

第二、毛澤東對斯諾談話，沒有說出拿多少銀圓賄賂團丁，但“賄賂”一事是他著力強調的，他忘記了在他被捕以後，他已是民團的俘虜，他身上的錢財包括一身百把多斤的肉體，都是民團的捕獲物。照例，在檢查時都要搜身，拿去身上的所有東西，當做“懷疑之物”，要打要押，權在民團頭頭手裏。即使個別團丁想收被捕份子的賄賂，沒有上峰開口，他也不敢放人。何況團丁不止一人，卒然之間亦難齊心合力放人。而解到上級部隊去，可以立功受獎，不擔釋放犯人的查辦風險，這是常識範圍以內的事。就被捕者來說，他根本沒有權利自己行動和放言高論的自由，亂走幾步，多說幾句，都受限制，哪有可能任意處理錢物進行賄賂。

第三、毛澤東說“士兵答應放我，而隊長卻不

肯”，他沒有說明一個士兵或幾個士兵或全體士兵，也沒有說明隊長後來怎麼能夠同意，使人難以相信這是真事，還是在說童話故事。像這樣的事，沒有士兵商量和隊長同意的複雜過程，不能想像人世真有其事。毛澤東意圖騙人，可是又騙得不合情理，人們會問：用什麼魔術可以使士兵一致接受賄賂？他們分贓是否均勻而不爭吵；隊長由不肯而變為肯，原因何在？不說明其中理由和經過原由，人們永遠難以相信。毛澤東喜歡讀《西遊記》，是否在編造這個“脫逃”故事時，也想過齊天大聖使用過的定身法和動心術的神力。

第四、毛澤東被捕時身上只有幾十塊錢，而捕他的士兵卻是一隊，有隊長率領，至少十餘人，不會是一兩個。算他十個罷，幾十塊錢由十幾個人分，一人能得多少？分贓不均又怎麼辦？給隊長多少？給少了，隊長會肯嗎？更可疑的問題是：士兵接受毛澤東的賄賂，卻又給毛澤東留下七塊錢做為“盤纏”路費一路走去，真是怪事！愛錢如命不畏上級怪罪的團丁和隊長，如此大發慈悲。不如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提高了團丁眾士兵們的階級覺悟，使毛澤東不僅得到脫逃，而且一路有“七塊錢”路費可用。到底放人又送路費的真相如何？只有毛澤東自己一人知道。我們推測：這“七塊錢”路費，不是士兵也不是隊長給留下的，而是毛澤東為團防隊“立功”之後，由團防司令特意送毛澤東的。毛澤東對斯諾談話，假話連篇，只有這“七塊錢”的事是真話。

第五、毛澤東對斯諾談話關於他逃走以後的事說得非常詳細，簡直不厭其詳，比民團抓他以後和逃跑以前的事詳細數倍，如說：“我走到一處高地，那是在一個水塘的上端，周圍長滿了很高的草，士兵們追趕我，並且強迫一些農民協助他們搜尋。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索。”這段描述連細節亦不遺漏，很明顯的是毛澤東為了掩飾脫逃神話，而著意捏造出來用以搪塞他脫逃的隱秘的。他原來是被繩子綁住的，怎能掙脫？毛澤東是被綁著的一個人，而士兵是一人以上的多數。即使兩個士兵押解一個綁著的犯人，都很難掙脫，何況士兵手裏有槍，隊長手裏也不會沒有槍，如果槍響，逃犯很少不會被射中。既然是賄賂了士兵，大可不必追趕。追趕不上竟至費時費力

強迫農民參加，不是故意白費力氣。農民沒有接受賄賂，搜尋時在士兵之外增加更多眼睛，看不出草上有人經過的痕跡，發現不出逃犯藏身之處，那才是怪事。除非毛澤東有遮眼法，神通廣大，否則，那些士兵、農民、包括隊長在內所有追趕的人，都是瞎子。

第五、斯諾是個記者，自然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進一步盤問毛澤東。一個從大陸移民來美國的朋友說，他也曾對毛澤東這次談話懷疑過，只是不敢提出；又說，如果照中共“審幹”、“肅反”以及文革時期“揪叛徒”方式來審問毛澤東，不“磕爛狗頭”（一種嚴刑拷打的訊問形式）才怪。一般人見毛澤東後來上了井岡山又坐到北京的金鑾寶座，認為“被捕脫逃”事件在他整個歷史上只是一件小事，大家一時找不到有關新的資料，管不了那麼多。如今在斯諾的《西行漫記》有關的資料上，增加湖南和江西邊區小學教師的調查，以及胡長水、李瑗等著述提出的多種資料，有主證也有旁證，毛澤東重要關鍵歷史問題的重要性突然增加。在毛澤東統治時期，這樣的問題，不被毛澤東抓去槍斃，也會死在打手們的拳腳之下，死於不見血的“非命”。說來一個有“被捕降敵”的重要歷史關鍵問題的人，卻用“抓叛徒”的名義和由頭，對付政敵並害死成千上萬的人，這真是歷史的滑稽戲。主要原因是由於國家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手裏，這一個人成為專制極權寡頭，他就為所欲為。說來，專制極權不僅使人腐敗，而且使人兇殘。

為了進一步找尋毛澤東“被捕降敵”後果，我們從香港、澳門、臺灣、美國各地方找尋資料，如魏宏運主編的《中國現代史》（中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陳晉著《毛澤東之魂》（香港名流出版社）、馮治軍著《林彪與毛澤東》（香港皇福圖書）、《龔楚將軍回憶錄》（明鏡月報社）、《國民革命戰役史》（中華民國八二年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陳誠署名、台灣出版）等約三十多種，不能一一列出。經過綜合比較，參詳別抉，我們發現：毛澤東這次“被捕降敵”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不僅出賣了同黨，而且使共產黨領導的“秋收起義”遭受到慘重的損失。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國民革命軍攻下南京，華北軍閥震懾，汪精衛把持武漢政府，號召“向左轉”。中共便在湖北湖南及江西發動農民運動，打

土豪劣紳，“吃派飯”，“到小姐牙床上睡覺”，毛澤東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小冊子，大呼“好得很”。南方有幾處地方組織暴動，農民運動興盛，商旅嚇懼，商店關門，生產丟荒。長沙市的暴動被當時中外報紙記下來的情況是：農民自衛隊和工人糾察隊到處抓人封店，打土豪劣紳，戴高帽遊行，就地懲罰（槍斃），長沙名士葉德輝就是因為作了一首對聯被槍斃的。（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四四七頁直荀《馬日事變的回憶》：葉德輝對聯是“農運久長，稻粱菽麥黍稷，一班雜種；會場廣大，馬牛羊雞犬豬，都是畜生。”）另一方面，國民軍地方軍隊奮起反擊，著名的“馬日事變”（即五月二十日電報號碼日期），即由許克祥團長發起，得到省方夏斗寅、何鍵的支持，從長沙擴大到附近各縣抓暴徒，搜查中共秘密機關。中共中央為應付新形勢，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發動“秋收起義”，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與湖南新任省委書記彭公達共同負責領導秋收起義事宜。

毛澤東有重任在身，照理應劍及履及趕緊行動起來。可是，事實不然，他於八月十二日回到長沙，不是佈置工作，而是到長沙縣清泰鄉板倉看望比他先期回板倉的愛妻楊開慧，直到八月十八日才出席湖南省委會議，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會上，省委提出組織長沙暴動。奪占湖南，實行土地革命，與中央意見相左，經過雙方討價還價，直到八月三十日，才落實暴動計畫，以長沙為暴動中心，包括瀏陽、醴陵、平江、安源、嶽州等縣。國民黨軍政防範暴動日久鬆懈，向下級示警；中共中央的“馬同志”（見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五五五——五五六頁）則致函中共中央：“長沙遲遲不動，是給湘東及鄂南暴動的打擊”（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機關刊物《布林塞維克》第二十期）。直荀（即毛澤東的好友柳直荀）的《馬日事變的回憶》，則將共產黨遭到鎮壓，暴動失敗，歸咎於共產黨“沒有鬥爭的經驗”。後來，這次暴動遲緩在長沙不能得手，才決定組織省委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前往湘贛邊界。

這時，隱藏在國民黨革命軍的一些共產黨員，奉中共中央命令帶動部分槍兵參加起義，加上湘東一些縣市的工人糾察隊、農民自衛軍、礦警，組建工農革

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下轄三個團，總兵力共四千人。原定計劃第一團從修水向平江進攻，奪取平江後即進攻長沙；第二團進攻萍鄉與醴陵，對長沙取包圍姿勢；第三團由銅陵向瀏陽進攻，攻佔瀏陽然後三路會師挺進長沙，後又收一些散兵與民兵為第四團，企圖在各縣農民及長沙市工人暴動力量配合下，於九月三十日奪占長沙，“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直到奪取全國政權。毛澤東於八月三十一日才離開長沙。這時，第一團已從修水出發，佔領平江縣龍門廠；第二團進攻醴陵也已得手；第三團正在沖向瀏陽。毛澤東身為前委書記，應該迅速與前敵總指揮身在第一團的盧德銘匯合，可是，不知是什麼原因，毛澤東卻與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去銅鼓，因而在路上被捕。現在，事過境遷，當事人與事變經過都已無法調查，即使調查，在中共政權的嚴密控制下，也難尋得事實真相，只好讓中共為毛澤東塗脂抹粉，歌功頌德，好在中共篡改歷史以假亂真多的是。

根據已有資料綜合分析，毛澤東被捕日期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這一日期，是國府資料和中共記載相符合的。中共“秋收起義”的失敗，中共出版的魏宏運主編的《中國現代史》，訂為是年九月九日至十九日，而台灣出版的陳誠簽署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則訂為“民國十六年九月八日到十五日”，（按：民國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也大致相符。據中共記載：九月九日至十一日，第一團取道長壽衛，正當進軍的時候，國軍在平江增兵一個團堵擊第一團，約第四團一起進攻平江，不料第四團於平江金坪叛變，突襲第一團，使第一團損失慘重。第二團於瀏陽遭優勢敵軍圍攻，損失大半，殘部敗退文家市。第三團遭唐生智部兩個團夾擊，退往瀏陽上坪，據香港出版馮治軍著《林彪與毛澤東》統計：第一團從九月九日起義，只堅持了兩天；第二團從九月十日到十六日，堅持了六天；第三團從九月十一日起到九月十四日失敗，只堅持了三天。參加秋收起義的何長工回憶錄，只承認中共當時還相當幼稚。推脫起義失敗的責任，是否和毛澤東被捕有關，換句話說，毛澤東被捕是否招致“秋收起義”的失敗，其中有無政治交易，可以從下述幾方面去設想：

第一、毛澤東被捕後，跟著被捕的有潘心源、易子義等等，是鐵定的事實。毛澤東脫險，潘心源、易

子義等還在押，也是鐵定的事實。毛澤東是前委書記，是潘心源、易子義的領導，只有毛澤東軟化向國軍輸誠交出潘心源、易子義等等，毛澤東才能得到釋放，釋放時有無別的交易不得而知，但毛澤東得到釋放，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第二、一般行軍都有特定的任務，不會隨便改變，除非上級根據特定情報或有突發意圖，而上級的突發意圖也往往是根據特定情報才改變的。國軍在平江增兵，顯然是一種突發行動，沒有的確訊息，不會突然增兵。而增兵行動，正是在毛澤東被捕以後發生的，國軍情報從那裏來，不遲不早正是毛澤東被捕時候？

第三、毛澤東釋放後不去第一團，為什麼卻輕而易舉地很快跑到第二團和第三團，這種選擇應有一個前提，是他知道第一團將會損兵折將在敵人“增兵”吉凶未卜之情況下才決定的，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國軍知道對第三團無兵可以增堵，才讓毛澤東“順利”進入第三團去。據他自己對斯諾談話，當時他只是單身一人逃亡，為什麼一路順利沒有別的團隊檢查，他又是從何處得到訊息才下定決心去第二團的。

第四、第四團叛變當然不是一兩人的決定，而是一團人由團長率領突襲第一團，其叛變責任，由團長負責，但團長又是誰指使，而且，不早不遲，正是毛澤東被捕以後緊接發生，這中間必有原因，是否和毛澤東被捕扯上關係，不能臆斷。但據一個叫陳國鈞的人回憶：九月十七日，毛澤東在瀏陽的上坪，與第一團敗退下來的殘部匯合，沒有商議對叛變的第四團進行反擊報復，也沒有重振旗鼓對付國軍圍堵，起義軍的師長余麗度等提出“取瀏陽攻長沙”的主張，都被毛澤東堅決否定，決定迅速撤兵，沿羅霄山脈南移，向井岡山奔去。毛澤東後來強調“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時還有人員七百人多，槍枝五百餘，有可能用以反敗為勝，至少也可以掙扎一陣，何至於灰溜溜地向不熟悉的匪窩“井岡山”逃去。當時，毛澤東還沒有“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設想，這中間大有可能是他和國軍有“默契”，否則，是毛澤東嚇破了膽，二者必居其一，但這樣正好玉成了他後來擁兵稱尊的勝利。說來，也是歷史的吊詭。

最後，可以總結：毛澤東隱瞞自己被捕的嚴重歷史關節問題，偽造歷史，昭然若揭。也許有人要問：

毛澤東被捕有出賣行為，為什麼又拖隊伍上井岡山去？經過研究和多方討論，大家認為並不奇怪。第一、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已經是中央一級人物，他對這種地位不能不有所留戀。如果公開站在國軍這方面來，起碼得矮三級。第二，我們不否認毛澤東當時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也不否認當時國民黨北伐剛剛打贏南半個中國，統治剛剛建立，免不了有汗七糟八的事，這兩方面加在一起，使他想回頭站到國軍方面來，只有採取“權變”手段，保存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也是人之常情。第三，當時，毛澤東的愛妻楊開慧和三個兒子都在長沙居住，直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控制，並得到生活照顧和精神支援，毛澤東如果公開叛變，則他的妻兒很可能遭中共報復，演出後來顧順章全家被中共所殺無一乃遺的慘劇，這是毛澤東不能不考慮的。第四，正因為毛澤東當時在中共黨內有一定地位，國軍自然要利用他而不殺他。在軍伐割據山頭林立的時候，不同地區大小軍閥之間，有“以鄰為壑”的思想，並不奇怪，江西的朱培德就曾“遣送”共產黨員出境，以圖境內清靖，毛澤東正是在江西境內逃向井岡山的。

《三國演義》記曹操行刺被董卓發覺，於是改口說是“獻刀”，得以脫逃。毛澤東熟讀《三國演義》，當時正是運用曹操妙技脫身，不過他獻的不是寶刀，而是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易子義等，另加成千上萬的暴動武裝。

提出毛澤東的“被捕”歷史問題，並不是追究毛澤東的責任。毛澤東一生做了多少壞事，一個歷史學家為他細數到三百件，還沒有數到他丟棄楊開慧、賀子珍以及到處亂搞女人的事。毛澤東在中共統治區內的形象金光閃閃，比神佛還尊嚴萬倍。中共向來偽造歷史，黑幕重重，假的比真的多得多，需要大家共同揭發。自然，中共打擊報復的“記仇心理”，曾經使無數正直人士受到殘酷迫害，使人歎息扼腕。今後，我們決定不再到中共統治區去，中共也奈何不得。我們以真名發表文章，表示我們揭露中共真相的決心，要把毛澤東從威嚴尊顯的神壇拉下來。在過去幾年的調查中，我們已掌握有關毛澤東問題另外兩種資料：

一、毛澤東和湖南湘潭籍著名報人何海明的關係問題。何海明著的《新俄回想錄》和《蘇俄的工兵政策》等（二書皆殘缺）書中設想和復述及評論，為後

來毛澤東搞“供給制”、“人民公社”、“民兵組織”所師法。何海明是否即是為“毛氏族譜”作序的何海清，待查。是否因為何海明後來做了漢奸，所以毛澤東後來不提他們之間的關係，亦待查。

二、廣東一位老教授曾經確實聽得他的叔公說過，毛澤東和陳公博的關係非比一般。毛澤東到廣東來，得過陳公博的很大幫助。毛澤東到汪精衛兼任的宣傳部做幹事，是由陳公博引薦的。後來，汪精衛因為事忙，讓毛澤東代表出席國民黨中央會議，中共即以此吹噓毛澤東是代理宣傳部長，後來，八路軍、新四軍和汪記偽軍互相避戰，夾擊國軍的事，亦可由此得到理解。

如何能夠把這兩件事包括毛澤東所有的其他醜事、壞事、怪事，都全部揭露出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幸甚幸甚。

中國現代史海外研究中心公告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設在紐約市，是一家在美國正式註冊的獨立、非贏利研究機構。中心本「學術為天下公器」之精神，致力於探索和澄清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種種問題，發掘當代民間歷史，並積極將研究成果和方向與公眾分享，以期打通學術，思想，文化的界限，促進思想自由，推動社會進步。中國現代史海外研究中心現以編輯出版《黃花崗》大型歷史文化季刊為主，歡迎社會各方的款項資助。中心在現有圖書資料的基礎上，尤其歡迎各方人士繼續捐贈更多有關中國近現代歷史和國民革命史的圖書，資料，實物，手稿，文件等，以利今後本中心從事更多和更深入的研究和出版活動。



仇漢 — 民族虛無主義態度不可取

——兼論孫文決不是大漢族主義者

曾節明

編者按：曾節明先生的這篇文章，務請朋友們認真一讀。藉此可以了解當代中國民族虛無主義的來龍去脈，及其對我們民族的為害和危險。是時候了，是應該好好反省馬列越半個世紀的殘酷思想統治，已經給我們這幾代漢人，造成了怎樣的心靈殘害；特別是它對我們民族性的傷害，又已經是何等地“遺害無窮”。

劉宗正先生是一位主張基督教民主憲政的網上反專制鬥士，近兩年來十分活躍，發表了一系列可貴的文章。但是，劉先生的一些觀點，我認為有失之偏頗的地方。劉先生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一再竭力聲討“大漢族主義”，在其最近發表的《中山陵》一文中，更是對“大漢族主義”大張撻伐，把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批為“大漢族主義者”。

何謂大民族沙文主義？大民族沙文主義是一種極端民族主義，表現為一個民族對外侵略、擴張，貶低、歧視、排斥、強迫同化其他民族，發展得更極端則是種族隔離。大民族沙文主義是納粹主義的基礎，種族屠殺和滅絕則是民族沙文主義的最高形式。大民族沙文主義產生的一個先決條件是：（一個民族）具有強烈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精神和強大的凝聚力。

先不論劉宗正給孫、蔣、毛三人扣上的這頂帽子是否合適，讓我們先看看現在中國的大漢族主義的危害是否已經十分嚴重，到了非大張撻伐不可的程度？

在台灣，當前不僅不存在“大漢族主義”的威脅，而且隨著民進黨已達六年的執政，本土政治勢力成為主流；隨著陳水扁實行的“去中國化”政策，漢族人（特別是“外省”漢族人），反倒有邊緣化的趨向。

在大陸，大漢族主義更是一直倍受中共打壓，根本沒有成長的機會。由於六四以來中共煽動反日仇美思潮，好些人就認為中共是一個民族主義或大漢族主義的政黨，實際上大錯特錯。事實上，中共從來只是一個極端專制主義的政黨，僅此而已，別無它性；中共煽動民族主義，從來只是為了達到自己的專制目的服務，別無其他目的；中共從來就不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為了建立和維持一黨超級專制奴役制度，它叛族投蘇、勾結日偽、支持蒙獨、出賣國土、賤賣國土資源和人民血汗……這些真實的歷史，現在終於再也掩蓋不住了。

中共更是從來沒有代表漢族的利益。實際上，由於漢族人數占中國人的絕大多數，文明發展程度，經濟發展程度，文化教育程度在中國各民族中最高，最容易萌生威脅中共專制統治的力量，因此成為中共統治集團最主要的壓、榨對象。事實上也是如此，五十六年以來，漢族是在中國各民族中，死於中共專制最多，受奴役、受迫害最重的民族。在文革中，全國被破壞的文化古跡幾乎全部是漢族的文化古跡，被迫害的文化人士幾乎全部是漢族文化人士。從 1949 年至今，宗教信仰自由被剝奪得最徹底的也是漢民族。五十六年來，漢族也沒有得到任何優於其他少數民族的優待。

相反，絕大多數少數民族倒是在中共體制保護下，在生育、入學、工作、提幹甚至法律方面享有優於漢族的優惠待遇……當前的中共國，對少數民族的優待，一如既往，有的優待甚至到了過份的地步：根據中共的《治安管理條例》，漢族人在公共場合一律不准隨身攜帶較長的刀具，但是許多少數民族都有帶砍刀匕首的“特權”，公安不會管。對於一般的盜竊犯

罪，或者“擾亂社會秩序”（示威遊行）少數民族（特別是邊疆少數民族）普遍能得到比漢人更為寬大的處理。比如，目前在很多城市，都有新疆人扒竊團夥，扒竊或持刀砍傷人（只要不是重傷）的新疆人被公安抓住後，按照民族政策，一般都是罰款了事，不用坐牢（漢族人被抓到就慘了，不刑拘也得勞教）。這也是內地城市裏新疆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個原因。

五十六年來，對於絕大多數少數民族，中共並沒有採取強迫移風易俗、強迫漢化的措施，相反，對少數民族文化還採取了一些保護性措施，比如，為壯族設立文字，在通婚上給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以保護，設置少數民族語言教學課程等等。事實上，中共所“表現”出來的對於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比美國政府做的還要充分。

當然，中共優待少數民族，根本不是出於文明的本性，而是因為少數民族居住分散，所生活的疆域廣闊，地理複雜，且與多國接壤、民族相同，全面鎮壓有很大難度，容易引發國際關注，所以主要採取一種懷柔策略，以之籠絡人心，欺騙國際社會，以鞏固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專制統治。

1989 年以來，中共確實對新疆和西藏採取了增加漢族移民和強迫漢化的措施，但是這並不是出於什麼“大漢族沙文主義”，而是因為“三五”拉薩慘案和“六四”屠殺，中共“道義”完全破產，軟的籠絡方法漸漸不行了，就來硬的專政手段。中共這樣做，根本不是要把漢族的利益置於少數民族之上，而是要鞏固它自己在新疆和西藏的專制統治。瞭解西藏、新疆生活的人知道，在這兩個地區，漢族老百姓所受的壓制比當地少數民族更加嚴厲，處境更艱難。比如去年曾發起維權抗爭的新疆建設兵團（絕大部分是漢族人），所受殘酷壓榨遠超過當地少數民族，形同奴隸。所以，應該實事求是地說，長期以來，中共國並沒有對少數民族採取大漢族沙文主義政策。不僅如此，為了籠絡少數民族和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還採取了許多出賣漢族、損害漢族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做法，如：

歪曲歷史，刻意掩蓋蒙古、滿洲征服過程中對漢及任何其他少數民族的種族大滅絕罪行，把當年蒙、滿兩個外族入侵者偷換成現在意義上“中國大家庭”中的少數民族，把當年年華為外族征服、亡國的歷史真相扭曲為“民族大融合”；

把滿族的民族服裝（長袍馬褂）歪曲為“唐裝”，定為國服；

否定岳飛、文天祥、袁崇煥等傳統民族英雄的歷史地位，同時通過影視劇大肆為成吉思汗、努爾哈赤、多爾袞等當年殘暴的外族侵略者歌功頌德.....

近年來在大陸，宣揚漢族民族精神、文化、傳統的網站——漢網，備受打壓，去年更遭查封；而一些比漢網遠為極端的少數民族網站，如“滿洲八旗”、“滿族線上”、“吉祥滿族”、“滿族吧”.....公然充斥著“揚州屠殺殺得好”、“東北是滿族人的東北”、“滿洲應該獨立”、“漢族是劣等民族”等等典型少數民族沙文主義和種族歧視的喧囂鼓噪聲，卻在網上暢行無阻。

中共為什麼要特別壓制漢族民族主義呢？因為中共一貫出賣漢族的民族利益，漢族的利益它出賣的最多。漢族民族主義就像一面鏡子，能夠照出中共——這吳三桂集團漢奸國賊的鬼臉，所以中共拼命地要把漢族民族主義扼殺在萌芽狀態中。

漢族的民族主義長期受到中共強力打壓，基本上不能成長，而沒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就沒有強烈的排斥其他民族的衝動，因此，從一個整體來講，現在的漢族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大漢族沙文主義”。

社會現實也是如此，現在的漢族人，不像是哪個民族的人，而像是沒有民族的人。現在的漢人，只知分“哪省人”，不覺是“漢族人”，南方漢人與北方漢人之間的差距和矛盾，往往要大過他們與當地少數民族之間的差距和矛盾。

自南宋以後，漢族先後為蒙古人、滿洲人徹底征服，民族優越感受到重創，奴性大大加深。特別是滿清入關，以大屠殺強迫漢人滿洲化，“剃髮易服”、“留頭不留發”.....幾乎完全毀滅了漢族人傳統的服飾和髮式，兩百多年下來，極大地消蝕了漢族人的民族精神，使漢族人喪失了民族人格和民族自覺意識，徹底淪為“亡國奴”。從這些歷史罪行來說，滿洲人倒是對漢族實行了 268 年的大滿族沙文主義了。

中共建國之後，基本上摧毀了漢族人的儒家信仰，消滅了漢族的靈魂。如今漢族人成為一個沒有民族信仰、沒有民族精神、沒有民族傳統、沒有民族認同感、地域性差異遠大於民族共同點的所謂“民族”，完完全全的一盤散沙！如今漢族的年輕人，普遍的不知、不辨自己民族的傳統，普遍地崇歐親美“哈日”、

“哈韓”（我沒有全盤否定的意思）。這樣的一個民族不像民族。一盤散沙的“民族”，今後能不能作為一個整體存在都成問題，何來劉宗正先生所謂的“大漢族沙文主義”？因此，不能不說，劉宗正先生現在大力聲討大漢族沙文主義，是無的放矢、時空錯亂。

當然，作為行使言論自由權，劉宗正先生有權發表文章，痛批“大漢族沙文主義”，但是，這樣的文章對中國民主化不僅沒有建設意義，反而會被中共抓在手裏，作為異議、民運人士“反華”的絕佳證據，用之迷惑國民大眾，為中國進步設置障礙。

讓我們再來看看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是不是劉宗正所批的“大漢族主義者”。在《中山陵》一文中，劉宗正斥責孫中山先生是大漢族沙文主義者，為此，他舉出了哪些證據，證明孫中山主張、或者動用了政權的力量，對少數民族進行制度性的歧視、排斥、迫害了呢？劉宗正只舉出了兩個事例：

一是孫中山在領導推翻滿清的過程當中，提出的口號中有“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字樣；

一是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曾拜謁過明朝朱元璋孝陵。

但是這兩個事例完全不能說明孫中山曾經主張、或者動用了政權的力量，對少數民族進行制度性的歧視、排斥、迫害，證明孫中山先生是“大漢族沙文主義者”。

“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最早來自 1894 年孫中山領導成立興中會的誓詞，原文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1]。繼而在 1905 年 7 月 30 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召開中國同盟會籌備會議、並為參加同盟會的同志主持加盟儀式時，曾在他親自擬訂的《中國同盟會盟書》中，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同盟會綱領[2]。可見，劉宗正先生對孫中山的口號斷章取義，只抓住“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國）”，“而對孫中山同時提出“創立合眾政府”、“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視而不見，試問，後三句話是大漢族沙文主義的主張嗎？而且，孫中山隨即在同盟會的綱領中對“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了明確的成文解釋，即：“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這裏意思非常清楚，孫中山要驅除的“韃虜”，是滿洲專制統治者[3]。為了消除誤解，糾正激烈的排滿歧見，孫中山多次對“驅除

韃虜”作過明確的解釋——他要驅除的，不是滿人和滿族，而是滿族貴族的君主專制統治。並且他還更明確地說過：“即便是漢人做君主，也要革命。”因為，他所從事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而“要其一貫之精神，就是自由、平等、博愛”[4]。

武昌起義後，孫中山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號，並且在《臨時大總統宣言》中宣佈：「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其中明確地指出了：中華民族不等於漢族，漢族也不享有特權地位。由上可見，孫中山絕不是一個大漢族沙文主義者。杰出的歷史學家辛灝年、杰出的人文學者黎民等人，也都堅決反對那種認為孫中山先生是大漢族主義者的觀點。

孫中山拜謁朱元璋陵，是出於對朱元璋推翻元朝，結束蒙古人對漢人民族壓迫的崇敬。當年蒙古統治者對漢族實行赤裸裸的民族壓迫，公然把漢族定位最低等民族，對漢人民間社會厲行法西斯式的保甲制度，漢人連擁有菜刀的自由都沒有……朱元璋領導推翻蒙古人的民族壓迫，難道不是正義的嗎？而且，與當年蒙古人入塞後推行的種族大屠殺相反，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的過程中，沒有對蒙古人實行報復性的屠殺，1368 年 8 月 2 日，徐達北伐軍進入大都（今北京），封存庫府，嚴禁擾民[5]，與當年蒙古軍攻佔中都（今北京），燒殺搶掠一月之久對比鮮明[6]。朱元璋還親自命令各路明軍，對留居中原的蒙古等少數民族，要寬大為懷，視為本國臣民[7]。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朱元璋對待少數民族的做法不可謂不文明，沒有多少大漢族沙文主義的色彩。中國老百姓在明朝雖然繼續受專制王朝統治，其所受的壓迫畢竟比在元朝時減輕了許多，因此，推翻元朝是歷史的進步、是朱元璋的功績。而劉宗正僅僅因為朱元璋仍然是一個專制帝王，有著“以猛治國”、濫殺群臣的劣跡，就把朱元璋的功績一概否定，並因為孫中山對朱元璋的崇敬，就把孫中山也一概否定，不能不說是一種極端的思維方式。

劉宗正先生僅憑斷章取義的東西加上主觀偏見，就給孫中山戴上“大漢族沙文主義”的大帽子，完全不像是一個基督徒的思維，倒像是浸染著片面化和詭辯的中共黨文化思維。

當然，孫中山也不是沒有錯誤，孫中山的主要錯誤是“聯俄容共”，這表明孫中山對武力過於仰賴，對共產主義的危害認識不足。劉宗正要批評孫中山，不去批“聯俄容共”，而大批子虛烏有的“大漢族沙文主義”，不僅糊塗，而且荒謬。

在《中山陵》中，劉宗正抓住辛亥革命先烈鄒容在《革命軍》的一段極端排滿言論，卻根本不顧鄒容在其著作《革命軍》裏，用整個第六章系統地提出了創建中華共和國的藍圖：制定憲法、實施憲政、民主選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革命軍》正是因為如此，才被譽為近代中國的《人權宣言》。

誠然，鄒容的那一段極端排滿言論是錯誤的，但是從當時的歷史來看，他的排滿情緒是可以理解的。

當年滿清入征服中國，一度對漢族實行種族滅絕，入關之前，大殺“遼民”三百萬，幾乎將東北漢人殺絕^[8]，而後錦州屠城、濟南屠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鎮江、蘇州、江陰、昆山、長沙、廣州等等城市之屠，屠城幾十個，殺人上千萬，以致南方大地“民無遺類，地盡拋荒”。為了消滅漢族的民族意識，滿洲統治者又以大屠殺強迫漢族滿洲化，強行剔髮易服，“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王先謙《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清世祖實錄卷十七順治二年六月丙寅）。這一罕見的野蠻暴行，乃世界五千年文明史之絕無僅有。後來又為銷毀罪證、消蝕漢族的反抗精神，大興文字獄上百年，稍有異議不滿者即慘遭殺頭、凌遲、剝皮、挖心、誅滅九族……乾隆帝在位六十年，製造文字獄竟達一百三十多起，平均每年製造兩起多文字獄^[9]。事實上，滿清製造文字獄的殘酷程度、時間之長，遠遠超過秦始皇，只有中共可與之相比。在滿清兩百六十多年的罪惡統治當中，滿人始終享有種種特權，受當局供養，可以不事生產；漢人始終受到種種歧視，在法律上比滿人低等……

對於自己過去犯下的滔天罪行，滿洲統治者不僅沒與任何懺悔和道歉，反而竭力掩蓋歷史、銷毀罪證。近代以後，西風東漸，中國的愚昧閉塞型社會漸漸被打開，漢族人漸漸從日本、朝鮮等外國得到了失散多年歷史資料，瞭解了歷史真相，任何有血性的漢族男兒，對於滿洲人犯下的駭人歷史罪行能不恨之入骨嗎？能不產生激烈的情緒嗎？

更何況，面臨非政治改革無以圖強、無以圖存的情況下，滿清統治者一再死不悔改，仍然堅持以極端殘暴的手段殘殺異議人士。試問，主張君主立憲以保大清的譚嗣同等人按照《大清律》有何罪過，竟慘遭殺頭；秋瑾沒有殺人，僅因為謀反，也遭殺頭；擊斃恩銘的革命黨人徐錫麟更是遭到活活剖肝挖心……1906年鎮壓江西、湖南礦工騷亂，滿清竟不分青紅皂白，濫殺數萬人，把整村整村的無辜人殺光。只要是“亂黨”，不管有沒有參與暴亂，落在滿清手裏，等待著他們的一律是殺頭（武昌起義就是這樣逼出來的）。鄒容僅僅因為寫了一本《革命軍》，就面臨滿清的問罪殺頭，幸虧藏身上海租界，否則必死無疑，即便如此，滿清仍向租界當局施加壓力，將鄒容投入監獄（病死獄中）。面對這樣兇惡殘暴的滿洲反動統治者，漢族人民難道不容易產生極端的排滿情緒嗎？

當然，極端的排滿情緒是錯誤的，因為當年犯罪的滿洲人努爾哈赤、多爾袞、多鐸、福臨、玄燁、胤禛、弘曆……都已經下了地獄，後來和現在的滿族人是無辜的。但是，從道德上說，現在的愛新覺羅家族，特別是從其先祖那裏繼承了豐厚遺產的滿族人，應該為其先祖的巨大的反人類罪行懺悔，因為其先祖，向揚州、嘉定人民道歉，並予漢族人民以象徵性的賠償，因為其先祖的巨大遺產是以最野蠻的方式，從漢族人民手中掠奪來的。這是徹底化解滿、漢矛盾，大大加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最好的方法。

鄒容先生為建立民主憲政共和國獻出了年輕的生命，病死獄中時年僅二十歲。而劉宗正斷章取義地從偏見出發，大罵鄒容是“披著大漢沙文主義羊皮的狼”，在這裏，劉先生表現得不僅全然不像一個基督徒，簡直缺乏起碼的厚道和同情心！

在《中山陵》中，劉宗正痛罵蔣介石是大漢族沙文主義者，卻根本找不出任何的事例，說明蔣介石先生曾經主張、或者動用了政權的力量，對少數民族進行了制度性的歧視、排斥、迫害。因此，不能不說劉先生對蔣介石的這個指責是無稽之談。

毛澤東也不是一個“大漢族沙文主義者”。馬克思主義主張取消國家、民族，馬列主義者以階級來劃分社會，民族觀念淡薄。作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教主，毛澤東並沒有表現出任何大漢族沙文主義的言行。雖

然毛澤東在其統治期間，迫害了數千萬的人，但他的迫害行為並沒有針對任何少數民族，他也沒有將漢族的利益置於其他民族之上，而且，作為毛的制度性迫害的犧牲品，在各民族當中，漢族受害最深、最慘。

可見，劉宗正把毛澤東這樣一個共產專制主義者說成“大漢族沙文主義者”完全是不恰當的。評判歷史罪人，也因該實事求是，不能因為毛澤東犯了大罪，就可以往他頭上扣上任何帽子。

綜觀《中山陵》全文，滲透著一股帶有強烈仇漢情節的民族虛無主義。仇漢，或者仇視任何民族都是不對的。漢族人口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經濟、文化和文明程度相對高於其他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主體，這個客觀現實是歷史形成的，不是什麼“大漢族沙文主義”的現象。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現在一盤散沙，亟需要加強凝聚力，劉先生文章的仇漢情緒，卻要打擊和貶損起絕大多數中國同胞（漢族），起到破壞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劉先生崇尚基督教，口口聲聲反對民族沙文主義，強調愛和正義，卻以一種仇恨挖苦的態度，而不是以一種寬容和拯救的態度對待現在已經體弱多病的漢族，實在有違基督教的精神。

劉宗正先生強調“人權高於主權”，似乎是正確的。但是由此便否定民族存在的價值，實在有失偏頗了。的確，我們先是人，然後才是哪國（族）人。但是，在人類文明的現階段，人類的文明只能以各個民族並立的形態存在，並且由各個民族以民族化的方式創造、維繫；民族是國家的基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民族國家，移民國家實際上也是由各民族的移民組建一個新的民族，即使像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多民族移民大國，也得由一個民族的語言和傳統——英語和盎格魯撒克遜傳統，來維繫本國的主流文化。取消了民族，國家就要解體，文化就不能維持，文明就要湮滅。

民族虛無態度是不可取的。

注釋：

[1]見維琪百科：孫中山

[2][3]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編

[4]見辛灝年《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兼述當代中國的民族革命就是“驅除馬列的思想革命”》

[5]見《明實錄·太祖實錄·第二十一卷》

[6]見《多桑蒙古史》

[7]見《明實錄·太祖實錄·第二十二卷》

[8]見《明熹宗實錄》卷三、《三朝遼事實錄》卷四、朝鮮《李朝實錄》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9]見王彬《禁書·文字獄》第三章第七節（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 第一版）



從宗教之比較 看民族心靈的歸依和前途

王思漢

伊斯蘭恐怖分子襲擊世界貿易雙子大樓及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製造了九一一恐怖事件，直接向美國為首的基督教文明世界挑戰，導致日後美國及其盟邦的報復，一舉擊滅了暴虐的阿富汗神學士政權。接著今年再反對大軍擊潰伊拉克胡森獨裁政權。而伊拉克回教世界仍然仇恨美國及西方國家，這種仇恨並沒有美國解放伊拉克而稍減，我們可以看到未來這個區域的動盪不安。說來說去，人類千年宗教的黨同伐異以及導致的宗教戰爭會越演越烈。我們從事民主建國運動者也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

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前，羅馬天主教皇權力通天達地，歐洲各國帝王諸侯莫不在他統轄之下。國王們和教皇任命的大主教們分別統治世俗及精神的領域，人民是沒有半點宗教自由的。甚至沒有研究科學的自由，如天文學家哥白尼，加里略等人因為他們提倡的「太陽中心」宇宙觀違反了教會的「地球中心論」而受到迫害。那時的宗教裁判所壓制出版自由，控制人民思想，任何人若膽敢違反他們倒踏門觀點就被以「妖言惑眾」的罪名，送上火刑柱活活燒死。這個局面一直到十六世紀在古羅馬的原址上興起了文藝復興運動，人們從新揭開了被基督教壓制千年的古希臘羅馬哲學，人們的頭腦才開始活躍起來。而半個世紀後，馬丁·路得掀起了「宗教改革」的運動，接著北歐各國及英國也借機脫離羅馬天主教皇的束縛，改信新教（即現代的基督教），因而掀起長達三十年的宗教戰爭。羅馬天主教皇的聯軍大敗，不但北歐各國脫離其掌握，連日爾曼北部各邦也脫離教皇主導的「神聖羅馬帝國」，連傳統忠於教皇、護教最力的法國及西班牙都自立門戶，教皇的權力範圍縮小到只有阿爾

畢斯山以南的義大利，歐洲才有機會邁向現代化的文明及建設自己作主的現代民族國家。

中國在歷史上，除了毛共所搞的馬列神化政權外，一向是政教分開，皇帝很少兼作教主。皇帝也沒有要塑造人民的思想。在毛共統治之前，中國是有宗教自由的。皇帝很少會去干涉人民的信仰，就此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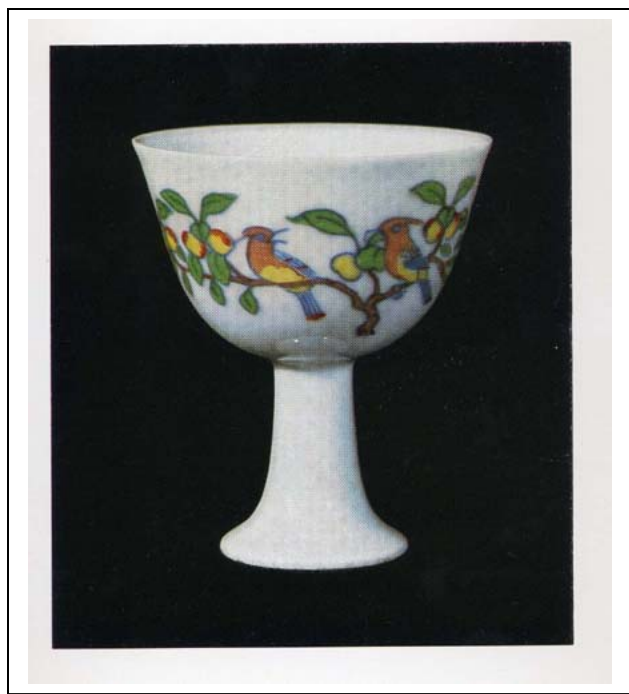
論，中國在歷史上比西方進步得多。可是宗教在中國的政權更疊中卻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一些由傳統宗教改裝過的神秘宗教，往往是聚集起義力量的主要因素。漢朝末年的黃巾賊；元朝末年的白蓮教；清朝中葉的太平天國；清末的義和團……將來還會有這類新興的組織，我們不敢斷言。這是個意識形態的問題，也是精神力量如何凝聚的問題，我們均不能掉以輕心。那麼在世界上的眾多宗教中，何者優，何者劣，何者和我們的民族文化風俗較吻合？我們不妨作個比較以決定取捨。在談到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分析一下各個主要宗教對人的看法。人在宇宙之間的定位如何？

西方的宗教，無論是基督教或是伊斯蘭教都認為人類是被神所創造的，宇宙的一切萬物，飛禽走獸乃至於山河大地草木石頭，日月星辰，都是神所創造的，一切受這個造物主的支配和管理。人既然屬於神所有，就是神的奴隸，所以他們每每稱神為主，自稱為神的僕人。所以西方宗教的人生觀，是主奴的關係，人是神的奴僕，一切唯有服從神的意旨，不從則有罪。如主人命令僕人先煮飯後掃地，而僕人先掃地後煮飯，雖然事情做得很好，也是不對，因為違背了主人的命令。這種宇宙觀就是能造的神和被造的人與萬物之間的關係。雖然人是奴隸，但卻是高等的奴隸。神創造了宇宙萬物以後，叫人去支配管理。所以人雖然在神前面渺小得可憐，然而在面對萬物時，好像又有了權威，不可一世。人就好比一個奴隸頭子，又有甚麼尊嚴可言呢？西方宗教離開了神好像就失去了一切意義。以他們的終極目的來說，就是為了榮耀神的偉大而活的。只有匍匐於神的腳底下，才能感受到神的慈愛，通過神才能將彼此的愛傳遞出去。這個

神是獨一無上的，若對方信別的神，就是異教徒，異教徒不但不能施愛，還要打擊。所以同是一神論的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就會互不相容，打得死去活來。西方一神教令人最不解之處是，既然神無所不能，那又為何創造出一個那麼不完善的世界，以及缺點那麼多的人類呢？是爲了滿足他的創造欲嗎？或是炫耀他的大能？如果是前者，顯然這個神的創造力有問題。況且既然人生的一切都是神安排好了的，任何人爲的努力也是枉然，那麼和「宿命論」又有何不同呢？

我們再來看看東方的宗教和哲學。中國的文化自漢以後就以道家 and 儒家爲主，其他諸子百家爲附。他們對於人生在宇宙天地間地位的看法比西方要高明得多。他們說人由天地所生，或由陰陽和合而生，天是屬於形而上的或精神的；地是屬於形而下或物質的。天地生萬物，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而成爲萬物之靈。甚至可以偉大到與天地並立而合稱爲「三才」。所以人在天地間是最高尚的，不同於西方的主奴體系。但是否人人都能與天地並立呢？非也，他們認爲唯有聖人才能「讚天地之化育」。以及提倡「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與萬物而同憂」。天地萬物是無心生成的自然現象，不同於上帝造萬物是有心的，要生就生，要你滅亡就滅亡。從好處看，上帝造宇宙，鳥語花香，一草一木都那麼可愛怡人；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大蟲吃小蟲，大魚吃小魚，弱肉強食，眾生彼此互相侵殺殘害，如果也是由上帝所造成的，那麼這個上帝也未免太殘酷了，所以神造萬物的理由實在說不通。儒家說天地萬物是無心的，萬物相爭相克又相輔相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這種現象一般人認爲理所當然，但是聖人卻不能無動於衷，他們的博愛精神要與萬物同憂。天地是屬於自然界的，聖人是有人文道德的。聖人看到人類爲一點私利就互相鬥爭殘殺，他就主張仁愛和平。看到人們缺乏知識而愚昧煩惱，他就用教育來提高他們的文化及工藝。看到人們道德淪亡，他就主張德育教化，提升人的品質。看到天地間種種的不好，聖人總是想盡辦法將之轉化成好的，以期達於至善的境界。這樣聖人就可以「讚天地之化育」了。這種觀念，比西洋宗教合理得多。由於中國文化是主張天地陰陽和合而生，所以中國文化體系是父子式的，家庭是父權家長式。政治也

是家長制度，形成一個權力的金字塔，皇帝是塔頂代表天子，以下的朝廷官僚層層節制，代表次一級的家長權威，所以又叫做「父母」官，老百姓是他們的「子民」。這種父子親情的文化體系，情重於理法，不像西方的主奴體系，法重於情理。道家做人最高境界是達到「天人合一」，一切順其自然，就可以和天地同壽，長生不老。儒家提倡通過「誠意正心」的修身功夫，進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孔孟學說以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爲做人定位的最高指示。唯有達到這三者其中之一，才能精神不朽，與世長存，才是人生最高的目的。歷代忠臣烈士孝子所表現的氣節情操，如文天祥的「正氣歌」，岳飛的「滿江紅」，都是精神不朽的代表，也是儒家對自我的最高要求。孔夫子曾經說過：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對生死之事，並不太放在心上。對鬼神，則敬而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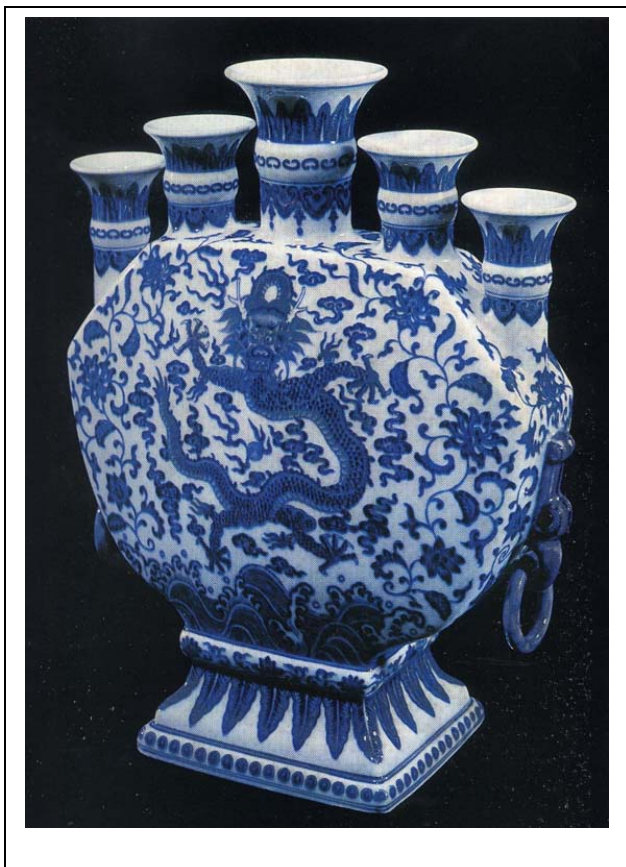
至於另一個影響中國文化至巨的佛教又是如何看待我們人和宇宙的關係呢？佛教在漢朝從印度傳入中國後，即積極地漢化，融合了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及風俗習慣，使之成爲中國化的漢傳佛教。漢化的佛教就是儘量沖淡原始佛教的印度神教的宗教色彩，加深了世間人生的意味。尤其是禪宗自六祖惠能大師特別

重視人性的自發見性開悟而成佛不外求，更是別樹一格，充分表現了中國人格精神獨立的一面。佛教認為宇宙間的一切是由個人自己起心動念的業力（宇宙萬物相互間的綜合牽引力）所造成的，所謂自作自受，共作共受，這是業感的因果定律，佛教的我造世界，以及人人共同來造就的世界觀與神教主張萬物由上帝創造的說法恰恰相反。佛教主張，既然這個世界是自身業報所招感，無論這個世界是乾淨還是汙穢，個人事業的成或敗，都是自己以往種下的因，所以必須自己承受它的果。所以絕對不會怨天尤人。並只有自己來解決問題。故自己應該培養一番能力，進而改造世界。而且相信果報的業力可以經過行善而促使緣分的改變，是自由自主的人生觀，而不是一般人所誤解的「宿命論」。人與人之間既不是主奴體系，也不是父子體系，而是師徒體系，先進先覺的是師傅，後知後覺的是弟子。先覺者有引導後覺者的責任，是應盡的義務而不是權力。後覺者或不覺者有尊敬先覺及服從教導的義務。先覺者對後覺者是亦師亦友，師友間情理並重，而在共同的事物上，又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佛在梵文裏的意思就是徹底達到圓滿究竟覺悟的先覺者，是已經獲得洞察一切事物原原本本的真相的無上智慧，及具有絕大慈悲心願力、願意為解救眾生諸苦惱盡一切力量而存的開悟者。他既不是神，也不是仙，更不是甚麼靈異鬼魂。也可以有形象。全看眾生的需要隨緣出現，化解救度眾生。所以佛教以成佛的覺悟者為師，而教祖釋迦摩尼是最接近我們近代人類的先進覺悟者。所以佛教徒要以他為師。在他去世後，則以他所傳授的佛法及繼承他衣鉢的僧眾為師。以佛法構成的社會關係，必然是師友文化的體系，最適合於民主自由的精神。

佛法最基本的法則就是「緣起，性空」。世間一切現象都是由種種造因的種子遇到機緣成熟，而產生業力的果實。沒有一件事情是獨立產生的，「此有固彼有，此生固彼生」，必然是「因緣和合，瓜熟蒂落」，所以都是假像，不是真正的獨立存在的實體。而真實的本性是不需要依靠因緣條件而生的。所以本性是「空」的。這個「空」不是一無所有的「空」，而是「真空妙有」的「空」（說道這個地步，語言文字已經無能為力，必須自己去修行體悟，才知道佛教的「空」為何指。）

既然佛教認為萬物是由因果業力感召所至，所以相信凡是世間事物莫非由因緣而生，亦由因緣盡而滅。所以佛教徒相信世事無常，這個包括了我們的生命，身體，心靈，運氣，際遇等，由於一念的迷惘及執著，種種痛苦及煩惱隨之而來，一切事物，包括了我們的身體，皆由此而產生。所以學佛的目的就是要擺脫生死的苦海，徹底解脫回到無限光明自在的法界虛空中。佛教認為人生到這個世界上是取決於我們神識中的「第八意識」，就是梵文所說的「阿賴耶」，這是個過去造作業績的總記錄。根據這個記錄，我們得到應有的報應，今生完結之後，又會繼續輪回到另一個世間。人類所處的世間叫做「娑婆世界」，意思就是「難堪痛苦的世界」。大致分為三界六道，三節包括了六道，六道也包括了三界，是一種重疊的說法。是哪三界呢？是「欲界」，「色界」，「無色界」；有哪六道呢？有「天道」，「修羅道」，「人道」，「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等。能投胎到前三道是福報，投胎到後三道是惡報。前三道的「天道」就相當於神仙的境界，生活無憂無慮；人道則苦樂參半；後三道的畜生道多愚昧暗昧，受人宰割；餓鬼道淒涼無依靠，有口小如針即便有食物也无法吞噬；地獄道眾生受盡種種酷刑折磨，痛苦無比。「修羅道」是梵文的阿修羅，意即「類似天人，但又非天人」，此道眾生享有大福報，但是嗔恨嫉妒心重，又嗜血好殺，分佈在其他五道之內，在天上則為「天魔」；在地獄則為「閻羅王」；在畜生道則為獅虎老鷹巨蟒恐龍等猛獸；在人間則為具有領袖魅力能夠操控群眾的人，世上有權力的暴君或某些群眾領袖或有影響力的名流偶像，及擁有廣大資源分配權力者……等等，只要是私心權力欲重的皆屬此類。所以有些佛經只提五道，因為他們認為阿修羅不屬於獨特的一類。至於三界，「欲界」包括「天道」的一小部分及其他五道（或是四道），此外的「色界」與「無色界」都屬於天道的更高層次的境界。「色界」的神仙們已經超脫了形體的物理束縛，有色相而無實質的身體，已無男女的性別，所以不會有愛欲情牽的煩惱，活的自在；至於「無色界」的眾仙們早就脫離了各種色欲的牽絆或煩惱，連形象都沒有了，看不見也摸不到，飄飄渺渺，無從捉摸，其中的「非想非非想天」是印度教大梵天神的所在，是婆羅門修行者企望

達至的最高境界。我們中國有句諺語說人「想入非非」就是來源於此，但是現代華語已經將之變成「性幻想」的代名詞了。天道三界雖好，但卻不是佛教徒的歸依之處，因為無論是「三界」還是「六道」，還都屬於凡夫的境界，天上福報壽命享盡，哪怕有千萬年之長壽（天上一日，人間千年），終歸要回來接受「六道輪回」生生世世輪轉不息之折騰，也有可能因往夕造的惡因而得惡果而墜下地獄道再度受苦。除非他能跳三界之外，橫空出世，不再受生死之大洪流的制約，那就是得修成正果，到了究竟涅槃，清靜無染的境界。也就是接近成佛的境地了。信仰佛教的最終目的就是修證成佛，哪怕歷經累劫累世都要堅持向成佛的方向邁進，不屈不撓，直到澈底脫離生死輪回的制約，證悟到自主自立的大道為止。但是又有些發大願的修行者，即便修成正果，本身已經免疫，不懼任何災難加害（即金剛不壞之身），不忍見眾生在命厄多舛艱難困頓的娑婆世界遭受一次又一次生死輪回的痛苦，會本著大慈悲心，倒駕慈航，再度回來人間弘法傳道，或是作種種佈施功德，作利益眾生的事情。



這些人就叫做菩薩（即將近成佛而僅僅差一步就到位的覺悟者，爲了慈悲偏偏留這一步，以便利接引茫茫眾生），他們所作的行爲就叫做「大乘菩薩道」。佛，菩薩，以及阿羅漢是已經修成正果的聖者，他們已經徹底脫離因果報應的生死輪回的束縛，能夠自主自己的方向，不受因緣果報的影響。和中國人最有緣的菩薩就是「觀音菩薩」，又叫「白衣大士」，以各種化身逢聲救苦救難，所以我們民間最敬愛的「神祇」（雖然佛教界認爲把觀音菩薩當作神明的說法不妥）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此外，和中國人最有緣的佛就是「阿彌陀」佛，他曾經發四十八大願，爲了救度十方世界眾生（不只是我們的娑婆世界，還有其他三千大千世界），特地成立了一個「極樂世界」，這個世界在我們的娑婆世界的西方，所以又稱爲「西方淨土」或是「西天」。中國民間常說，人死了就「往生西天」或是「撒手歸西」，就是由此而來。這個「極樂世界」中沒有我們娑婆世界的種種痛苦及坎坷（不是有云：世間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嗎？）只有快樂，而且是毫無條件的絕對的永遠快樂（不是夾帶痛苦條件的那一種一時「痛快」）。因爲能夠來到這個世界的眾生都已經超越生死輪回，不會有生、老、病、死的煩惱及痛苦，等於來到一個環境安靜優美且清淨無干擾的高級療養院及學府，可以繼續進修未完成的功課。所接觸的人和物都是善良無爭，彼此關懷鼓勵；眼見的，耳聽的，身心感受的，無不是善言好語，到處充滿佛陀圓滿智慧的法音妙用。甚至那些往生時勉強夠格上車的，也可以趁機在此補課，繼續修行佛道，而且環境能保證不會退轉，修成正果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但是此地並非人人能來，能夠來到此地的人，是要具備許多條件的，所謂的「福德」及「用功」，缺一不可。不是光嘴巴念念「阿彌陀佛」就可以被接引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中國漢傳佛教大乘十宗派裏頭的「淨土」宗就是講究修煉這個「念佛」的功夫。要念到心口如一，淨念相繼七天七夜以上，沒有一絲毫的雜念才算成功。一般沒有修煉過的人，可能無法持續一分鐘就雜念紛飛了。所以往生淨土的功夫不如想像的容易。

此外，大乘十宗裏另外一個比較流行的宗派是「禪宗」，就是印度天竺僧人「達摩」所創的「少林」寺。「禪宗」不立文字，口傳心受，直指人心，

明心見性。以打坐「參話頭」禪為主要修行方式。所謂「話頭」者，就是一句沒頭緒的話，如詩詞，如偈語，逼得你無從思考，無從捉摸，想破頭腦，心思斷滅時就能豁然開悟，或是在某個情境下，恍然大悟，這就是「頓悟」，有別於「淨土宗」的「漸進」式功夫。佛教各宗都有其修行的法門，限於篇幅，無法一一介紹。但是無論用哪個法門，開悟一定要通過「頓悟」而得，「漸進」的方式僅僅是為創造開悟的條件而設。有大慧根的人，可以用「頓悟」方式得道。慧根差的人，只能由「漸進」方式下功夫，希望功夫下得深以後導致量變而質變，最後水到渠成，開悟得道。然而不論是大乘佛教或是小乘佛教（南傳到東南亞的支派，以修阿羅漢果為主），顯教（漢傳佛教）或是密教（蒙藏傳佛教），都認為人人都有埋葬的佛性，只有通過修行才能將本有的佛性顯現，如石中玉，不經雕琢不能成器。而世界苦難都是由人類過去累積的惡業造成。要世界清淨完美，必須人人行善止惡，才有希望。要世界和平，個人安樂，必須從潔淨自己的身心做起，所謂「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為佛教」。

再回頭來說西方宗教的演變和我們中國的關係。自從明朝末年，天主教的耶穌會教士利馬竇來中國傳教，已經將天主教義作了某些改變，以迎合中國傳統思想及民間風俗。同時也引進許多西方的科技及科學思想（諷刺的是這些事物還是不久以前他們教廷所反對的）作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這些有利的新興事物很快就受到中國開明知識分子的歡喜接納，著名的大臣許光啓不但服膺西學，還歸依了天主教。這些來華的教士們開啓了中國對於西方天文、地理、數學、航海、火器等技藝的學習。但是導致科學發達的西方人文哲學思潮卻沒有被教士們介紹到中國，可能因為宣揚教義才是教士的本位，工藝科技僅是作為傳教的媒介工具罷了。西歐的人文思潮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突飛猛進，現代學術的基礎正是在這段期間逐步建立起來。但是由於地域的隔絕，當時交通不如現代方便，來華的多數是商賈，傳教士或者是投機的冒險家。能來中國進行文化交流的知識分子極少。同時我們中華神州大地正逢巨變，關外文化低落的滿清部族趁著中國內亂，趁機入關奪取了政權，繼而入主中原。為了鞏固政權，他們樂得利用根深蒂固的專制思

想籠絡中原漢族人士。當然也顧不得接受甚麼歐洲新思潮。所以除了康熙早年稍能運用一些西洋科學之外，民間對西洋學說根本毫無所聞，雍正時期更勵行鎖國政策，連天主教傳教士都驅逐出境，所以中西交流一度中斷。直到晚清英法聯軍攻破北京城，滿清政府震懾於西洋的船堅炮利，不得不「師法夷技」因而開啓中國的大門，派留學生到了海外學習所謂的「西學」了。

十七世紀末，英國、荷蘭等國海權勢力崛起，取代了往昔西班牙、葡萄牙海上霸主的地位。這時期來華的不再是溫文爾雅的羅馬天主教廷派來的神父，而是那些隨著英國、荷蘭軍艦商船而來的商人政客及冒險浪人。這些充滿奸商惡棍嘴臉的投機分子來華是以牟利剝削為目的，並不滿足於一般正經的商業交易。由於發現販賣鴉片可以獲得暴利，於是開始在中國傾銷鴉片，但是在眾多西歐國家中，只有英國鼓勵奸商作出如此卑劣可恨的勾當。是毒害中國的始作俑者。雖然英國的議會制度令許多民主人士稱羨，但是，這個國家對中國的傷害也最早，它對中國的為害也僅次於蘇俄和日本。談到宗教影響，英國卻乏善可陳。自從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初期，英王亨利八世殘暴好色，為了移情別戀，他向教皇申請離婚，但天主教是不允許離婚的，於是他用叛國罪名將前後數個皇后陸續送上斷頭臺。這樣的離婚休妻方式當然不為教皇所允許，於是他憤而和羅馬教廷決裂，自己創立英國教會，自己另立一個大主教，直接隸屬國王政府管轄之下（這和共產中國的「愛國教會」，同出一轍）。而這個不倫不類的教會和歐洲的新教又互相不隸屬，各自為政，和羅馬天主教的關係處於敵對狀態。因為英倫三島除了英格蘭改宗「英國教會」外，蘇格蘭以及愛爾蘭不願改信亨利八世的「國教」，仍然堅持信奉羅馬天主教，於是亨利八世發動戰爭，進攻蘇格蘭及愛爾蘭，後者當然不甘坐以待斃，立即聯絡歐洲大陸天主教國家如法國、西牙給予支援，於是一場局部的宗教戰爭就在西歐邊陲提早開打起來。由於蘇、兩島領導階層的農莊貴族散漫不團結、事力量亦薄弱，終究不敵英格蘭強大，最後被英國擊敗，亨利八世及其後繼者伊利沙白一世大舉揮軍進犯蘇格蘭及愛爾蘭，並且數度血洗愛爾蘭，屠殺愛爾蘭起義的農民。百年下來結下了血海深仇，導致如今北愛爾蘭民族主義分

子不斷抵抗英國的統治。希望將英格蘭勢力逐出，完成南北愛爾蘭的統一。由於英國的國教來路不正，連自己國民都不太相信，因此雖然他們後來征服了許多殖民地，卻很少推行他們的「國教」。反倒是脫離英國獨立的美國，雖然繼承英國的文化血統，但是宗教卻師承北歐荷蘭的新教，加以改造而具有美國特色的現代基督教會。於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美國的基督教支派中的「摩門教」，「浸信會」，「長老會」等等都很熱衷來華傳教，他們叫做傳播「福音」，中國近代社會產生了一些的影響力。在毛共奪取政權之前，中國沿海城市的中產階級以及海外歸來的留學生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在國民政府內部也有很大的影響力，不少上層軍政要人信仰基督教。包括總理孫中山先生，總裁蔣中正夫婦，甚至「倒戈將軍」馮玉祥也是基督徒，人們稱他為「基督將軍」。民國初年五四運動以來，有些倡導全面西化的人甚至認為應該以基督教為「國教」，才能徹底剷除中國的「封建」渣滓。因為由於基督教喊著「基督博愛精神」的口號，人們很容易將之和「平等、自由、博愛」的民主口號掛上等號。而且基督教是因美國的強大而盛行，人們看到信仰基督教的美國那麼強大，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如果把基督教搬來中國，是否就可以依樣畫葫蘆呢？我想世界各國都有人思考這個問題，包括開明的伊斯蘭國家如埃及、土爾其等國家的高級知識分子，可沒有聽說過他們要全面改信基督教。這不只是民族尊嚴的問題，主要還是民族文化風俗歷史背景的問題。只有那些文化低落、原來是殖民地的國家如菲律賓及南美各國才會將基督教或天主教認為國教。最近有些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再度提倡百年前的老調，認為基督教應該定為未來的國教，這種論調實在很令人擔心。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有宗教寬容的精神，只要是合乎民情道德的，都應該相容並蓄，不應該以政府領導人的信仰為國教而定於一尊。

那麼中國自己的本土宗教——道教又如何？既然是發源於本土的宗教，應該是勢力最龐大最旺盛的吧！恰恰相反，除了幾座點綴山林風景的道觀之外，好像已經被人遺忘，消失在歷史的黃卷之中，無蹤無影。乍看之下，道教似乎不但早已式微，而且銷聲匿跡了。和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攀不上任何關係。可是如果仔細一想，就可以發現，道教消失的僅僅是表

面的形式，它的精神內涵卻深深藏在許多中國人心內，融合在我們的文化思維裏，變成我們民族性格不可分的一部分。道教其實是化整為零，滲透到我們血液裏去了，遍及我們生活的每個層面。道家思想本來就不拘泥於形式，恬淡虛無，清虛飄逸，來去無蹤。它以細水長流的方式滋潤著我們中華民族。雖然沒有龐大堅強的具體組織，也沒有轟轟烈烈的龐大聲勢，可道家是柔弱勝剛強——君不見我們的太極拳能四兩撥千斤，我們的道家理論中的五行成為中原漢醫的基礎，在沒有西醫之前，千百年來不就拿這些本土的醫方為我們廣大的民眾維持生命的保健？它的中醫針灸理論甚至發展到全世界。一個「氣」字就貫穿了我們民族精華上下五千年。我們漢語裏面的「氣」不只指空氣的氣，還有氣功的氣，正氣的氣，氣派的氣，氣勢的氣，風水的氣，在道家來說就是精神力和物理力的總和。這個氣可大可小；大可上貫星辰下吞河獄，充塞宇宙之間；小可以存之丹田方寸之間。一般公認的道家學說是以老子為中心的哲學思想。其主要經典是「道德經」，所以老子也就稱為「道德家」，或簡稱「道家」。老子俗名叫李耳，是周朝的史官，掌管記載歷代興衰存亡的大事，所以對禍福成敗之道有深刻的認識。他認為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人們心動而亂動，太多的「有為」而召禍，因此主張「無為」。由於「無為」而心靜，心靜而後能體察自然之大道。由此推而廣之，變成他道德經的內容。道家老子的學說源自易經，而易經是我們中華民族哲學思想的源頭。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第一部書。它的創始來源已不可考證。有人說它為中華民族始祖黃帝所創，也有人說是黃帝之前的伏羲氏所創，無論如何，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的各種學說大致出於此。也因此造就了中國古代哲學政治思想百花齊放的燦爛局面。它不僅是探討形而上的領域，就是在科學的應用上，中國古代的數學也是源于易經。易經的陰陽提供了現代電腦所用的「二進位數學（零與一）」的基本概念，陰便是零，陽就是一。陰和陽（零和一）的排列組合，可以創造千千萬萬的數位。所以當十七世紀德國的數學大師萊布尼茲（Leibniz）第一次接觸到中國易經的翻譯本後，大為驚訝，認為這些陰陽的概念和他的二元論數學（Binary）竟然不謀而合。但是由於時代的局限性，他並沒有將之演繹為一門完整的學問，

等到十九世紀英國的數學家布林(Boole)才將此進一步發展成可以運算的數碼邏輯理論(Digital Logic)，變成數碼資訊科技的基礎，帶動了第二次的工業革命——資訊時代的來臨。而易經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再生八八六十四卦」相當於微積分數學的「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等等」無窮盡的微分下去。也相當於生物細胞染色體的不斷分裂，生生不息，無窮無盡。整本易經就是一套完整的二元數學符號邏輯系統。它標明瞭宇宙最自然的法則：宇宙混沌未開的狀況為無極（以空的圓圈表示）；太極氣化到了一定程度就劃開天分為陰陽兩氣，叫做兩儀；兩儀再分為四象，四象分為八卦……等等。八卦的卦像是伏羲氏所創。傳說：伏羲氏仰觀天象，俯視地理，中曉人事，依據易經的原理而創造先天八卦。也有人說是因他得到「河圖，洛書」，由觀察此二圖書排列的數位記號而得到靈感。其中斷線符號代表偶數，整線符號代表奇數。偶數是陰，代表靜態，也代表「無」；奇數是陽，代表動態，也代表「有」。再由不同的位置代表數位價值的順序。每個位置就叫做「爻」，每個爻由「陰」或「陽」構成。由於宇宙由「天地人」三才構成，亦有：「一生二，二生三，然後三生萬物」之說。所以易經排列八卦卦位時都用三個「爻」代表一個「卦」象，來推斷局勢的趨勢走向。伏羲氏的先天八卦和周文王的後天八卦合組成六十四卦就是整個宇宙人生的動態變易圖。天地萬物皆有其位，若不當位，則天下大亂。譬如說，該做國君的謙讓不做（有道的君子），讓不當的人來做（無道的昏君），自然天下紛擾不安。例如民國初年，孫中山不做大總統，讓位給袁世凱，結果軍閥混戰了十幾年，搞得國窮財盡，民不聊生，方給予共產黨可乘之機。

由於道家以思想為主而少流於形式，所以道教的章典制度儀軌不容易建立，即便勉強建立，也往往流於畫虎不成反類犬，變成鬼神膜拜的民間雜教信仰。民間寺廟供奉的往往是神話小說裏面的人物，如封神榜，西遊記，狐仙等等牽強附會的想像神仙，完全和老子莊子的道家哲學拉不上關係。可惜世人不察，以為一些江湖術士神棍裝神弄鬼，利用占卦求籤斂財就是道教，不但冤枉了我們的道教，而且白白糟蹋了我們祖宗的寶貴精神遺產。

中國文化在夏代之前還是屬於神話部落的蒙昧狀態。周朝伊始，周公「制禮作樂，封建宗親諸侯」才開始有了文化建設的規模。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人才輩出，因諸子百家爭鳴而成各種思想學說，孔子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大成建立了以人為本的儒家思想。儒字拆開就是「人」和「需」，代表了「人的需要」。儒家也談易經，但是在三才之中，更重視的是人「才」，孔子認為天地之氣以人而通，陰陽之道以人而和。「致中和」才能達成宇宙萬物和諧平衡，離開了中，就出問題了。所以儒家很提倡「中」與「正」。何謂「中」？就是不偏不倚，猶如射箭，靶心為中。對物的存在而言，欲求其穩固，其位置必須適中；對事而言，欲求其妥當，必須中規中矩；對人而言，心平氣和的狀態就是中；對社會而言，人人有禮有節的和諧狀態就是中。也就是道家的「率性」之道。簡而言之，中國文化精神就是中道的文化。中道之始，首為舜傳禹的那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在個人的修養上首先提倡的就是「誠意正心」來修身，然後才涉及用「中庸」之道來「齊家，治國，平天下」。談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儒家提倡的是一個「仁」字。這個字拆開就是「二人」，表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這也就是人和宇宙萬物達到絕對和諧的一個關鍵；把推己及人，仁民愛物作為實踐對宇宙人生終極關懷的綱領。所以儒家要把這個「仁」學發揮到極至就是大公無私；天下為公。這就是我們先民對民主群治，主權在民的最早領悟；孟子所提倡的「民為重，君為輕，社稷次之」也就是在當時的體制下，仍然顯示儒家學者們對民主群治的呼籲。對作為統治者的君王們的要求是「施行仁政」，仁就是不殺人，不虐待人，也就是佛家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儒家道德最高的境界就是仁，從此衍生其他的具體細節，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怕被殺，就應該對別人被殺的痛苦感同身受，因此也就不應該去殺人。「不殺」為佛教五戒之首，漢傳佛教主張吃素就是為了這個戒（注：印度佛教、南傳、及藏傳佛教並無吃素的習慣）。儒家的仁德僅僅推己及人，而佛家將之更推前一步，推己及動物了。至於佛家最高人格的表現，是在於捨己為人，甚至在緊要關頭還得「成仁取義」，這個「成仁」是殺身成仁之義。歷代忠臣烈士在國族危難當

頭，若抗敵失敗，往往走這條路，他們不光是忠於朝廷或君主，更多的是忠於自己的天地良心。佛教有地藏菩薩，爲了拯救超度陷落在無間地獄受苦的眾生，他發慈悲立下了：「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偉大誓願，因此倡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犧牲精神。

從中國儒道兩家的立場來看，都認爲宇宙萬象是一大聯合的整體，是個統一的力場。每樣事物都息息相關，有你就有他，有了他才會有我，互動互生，生生不息，破壞了其中一個個體，其他的也會受到牽連，因此特別講究群體的和諧。易經的六十四卦的旁通交感，生克演變，相生相剋，正是儒道兩家對生命哲學的說明。儒道思想出於易經，易經思想是前無始後無終的自然法則的演繹，與佛經所說的「佛法」同出一轍，都是指宇宙本來自然的運行法則。歷史上，淨土宗的九祖藕益大師用禪宗來解釋易經，著有「周易禪解」十卷，紐約聖嚴法師也說：「如果不懂易經，就無法學好默照禪」。佛經講的宇宙萬物有由因緣而生，易經講的宇宙萬物有由陰陽而生；因緣的根本在於由主觀能認識外物的識體與客觀被認識的名色相接觸互動，而形成宇宙萬有。易經認爲陽代表宇宙能量及人的精神意志，陰代表有形的物質構成的人體及萬物，通過這兩者的結合，才有宇宙萬物的昌盛。儒家所說的四維（禮義廉恥）和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維繫人類社會的基礎，若四維不張，則國之將傾，八德不立，則天下危；和佛家的修十善世間法大致類同。儒家在提倡從個人的修養出發，到兼善天下，列出的順序步驟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世界和平」。而佛家的修養從五戒十善到「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然後可得明心見性，證悟成佛。如果人人成佛，自然天下太平，不起刀兵煩惱災禍了，這和儒家的天下爲公，世界大同殊途同歸。

所以，總而言之，儒，佛，道理體一致，毫不衝突。儒家講道，佛家也講道，道家那是理所當然地講道。道最早出於易經，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道就是自然本性，自然法則。所以孔子說：「道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因此他終身也就「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佛家所說：「萬法因緣生」這個「法」就

是宇宙自然的法則，就如地心引力一樣，非人所創造，佛陀只不過用智慧發現了它而已。道家始祖老子也說：「道者，先天地而生，先天地而存，複生天地及萬物，爲人之本，心之本也。唯道是守，唯道是從，與道偕行，與道同化，進而與道合。」老子以法天地，法自然爲實踐功夫，以天人合一爲最終歸依。他們是我國數千年立國之道，也是人心之所維繫不墜的基礎。我國雖然歷經改朝換代的巨變及災難，甚至也嘗亡國的悲慘及痛苦，但是人心還有個「世道」及「天理」作爲一線希望，總認爲只要世道人心還在，總有雲開見日的一天。也就是說，雖然亡了國，但是沒有亡天下。但是，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一些患了躁鬱症的知識分子，基於恨鐵不成鋼的憤恨，將對滿清政府遺留的腐敗落後之不滿，轉嫁到本國的傳統文化及儒家思想。於是，饑不擇食地大量引進西方各種功利學說，企圖一夜之間，就改變了中國的精神面貌，有那些過激者在仰慕西方船堅炮利之餘，轉而全盤否定中華文化，更有甚者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引進鼓吹暴力革命砸爛一切制度的共產主義。他們不但否定了中國的一切，同時也否定了他們自己的根本，變成國際共產帝國的走狗，最後引狼入室，釀成赤浪滔天，神州沉淪，讓中華民族在這場浩劫中至今不能翻身。雖然說改革開放以後「走了資」，「開放了市場」，暫時地和局部地紓解了經濟問題，可是人心敗壞，當權者不但貪汙腐敗甚於前期，主持意識形態的部門仍然敵視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繼續著否定自己祖先的道路，甚至有意抹殺民族歷史，篡改民族文字，有意不讓人民接觸祖先的根源，要我們遺忘我們本來的精神面貌，形成無根無本的一代……等到社會上完全看不到正義是非公理及人心麻木的時候，那麼，我們中華民族就真的變成行屍走肉，變成了沒有靈魂的一群奴隸，這就是亡天下了。爲了不讓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必須找回民族失落的靈魂，那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那個大「道」。



中國歷史的

文明價值

陳致平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都有它的價值；不過一個歷史悠久而文化豐富的民族國家，其歷史價值當更值得重視。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價值，也往往就是這個民族國家的歷史特徵。中華民族歷史，有四個值得重視的特徵：一個是幾千年來中國有一套好的史官制度，一個是中國史料的豐富與綿密，一個是中國歷史本身的獨立性與完整性，一個是綿亙在中國歷史中，成為中國學術思想中心的儒家思想，它所表現的人道精神與民本觀念。

一、中國悠久的史官制度與史官精神

中國自有歷史文化，便有了史官。唐朝劉知幾的史通，有一篇講「史官建置」，內容詳述史官制度的緣革。據史通、古史世本、漢許慎的說文序，與唐杜佑通典，都說：史官之制始於黃帝而「倉頡沮誦實居其職」。在四千幾百年前的黃帝時代，是中國歷史的

傳疑時代，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文化開端時期。根據傳說，倉頡沮誦既是黃帝的史官，卻又是創制文字的人。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史」字說：「史，記事者也……」古史（）字，便象徵一人手中執策而記事就是古代的史官。上古史官記錄的不過是帝王的言行、祈禱、戰爭、狩獵一類大事，用最簡單的文字符號記載下來。上古史官也就是最早創制文字符號與懂得使用文字符號的人。所以文字、文化與史官，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是同時開始的。尚書裏許多原始資料，都是出自上古史官的記錄。到了秦前三代，史官的故事漸多。據說孔甲、終古是夏朝的史官，尹逸、向擊是殷朝的史官。這類故事，還都是來自傳說，不能算做信史。

可是自從發現了殷墟甲骨文，我們得到了商殷直接史料的證據，證明了在商朝確已有了史官。經甲旨文學家的研究，研究出為殷王作卜辭的「貞人」，大都是史官。在卜辭中所見殷代官名，以史官為最多。如「尹」「荀」「工」「史」「卿史」「御史」都是史官的官名，說文裏的「史」，周秦的「御史」，早在商朝的甲骨文裏已經有了。原來在上古時，巫、祝、卜、史這類官職，其職務往往不分，分工是越往後才越細的。當時的巫也可以稱巫史，祝也可稱卜祝，而太卜也可稱太史。史官都兼通天文、氣象、占卜之術，他們一方面為帝王作簡單的言行記錄，一方面也為帝王占卜祈禱，和觀察天文曆象。這就是司馬遷所說：「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這也和古埃及巴比倫歷史之出於「祭司」者，其意義相同。

這種卜祝史不分的上古史官，演進到周朝，逐漸脫離神職而人事化，而專業化。史通稱：「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周朝王室的史官，見於記載的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左史、右史，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御史掌萬民之治令，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左右史經常跟隨在周王左右，記錄周王的言行，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牘。周代王朝的史官，不僅完備，而且職掌範圍很廣。除了紀錄史事之外，有些史官還要管理國家的文書法令、檔案文獻等。王朝之外，各國諸侯也都有史官。春秋時齊太史、晉董狐、楚左史倚相，都是聞名國際的史官。孔

子所著之春秋，便是根據魯史官的資料寫成，就是左傳所根據的資料，也是出自魯史官。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出使到魯國，參觀魯太史的藏書，看見易象與魯春秋，感歎說周禮盡在魯矣，足見魯史官藏書的豐富。西元前二七九年秦昭襄王與趙惠文王相會於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間頭叫史官記下：「某年月日，趙王為秦王鼓瑟。」接著藺相如請秦王鼓缶，也叫史官寫道：「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鼓缶。」孟子說：「晉之乘、楚之籌杙、魯之春秋」，都是各國史官所記國史的別名。後來晉太康二年（西元二八一年）在汲冢中所發現的古竹書紀年，就是戰國時魏國史官所寫的編年史，從夏朝開始記到魏安釐王時，前後一千多年。不僅列國的諸侯有史官，就是諸侯之下的卿大夫也有史官。晉國的趙鞅有史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齊國的田文，每逢坐對賓客，有史官站在屏風後作記錄。

到了秦朝，統一中國，設置了太史令一官。胡毋敬曾為太史令，與李斯共同修定文字，作博學章。漢朝沿用秦制，仍設太史令，秩六百石，屬太常卿。漢武帝用司馬談為太史令，談死，子遷繼之。司馬遷在史記中所作自序，自稱其先世在周室為太史，世典史職。漢制天下獻書，都要送與太史令參考。司馬遷之所以能作史記，正以他身為太史，能看到國家保藏的大量史料。到了王莽的時候，又仿照古制，令史官站在殿庭柱下，聽政事，作紀錄，稱為「柱下五史」。東漢初年置令史於蘭台，從事修史，稱蘭台合史。章和以後集中圖書於東觀，集中史臣於其中，從事著作。到魏晉時，正式設置「著作郎」，從事著史。南北朝時，著作郎外又有修史學士。從元魏開始，又設置起居舍史，修「起居注」，專記天子的言行。傳到唐朝，特設起居舍人二員，起居郎二員，每逢天子臨朝，站在階前柱下，郎居左，舍人居右，延首而聽，退而縮錄成為起居注。

從唐朝起，開館設監，由官家集多數人的力量，合修國史，遂開史館之制。史館由宰相作監修，吏官除著作郎、起居郎、起居舍人外，又有修撰、直館等職。著史通的劉知幾便做過修撰。唐代修史的程式繁重，尤其在貞觀到開元的這一段時間，制度最為嚴密。從武後時起，宰相要撰「時政記」，又據「起居注」與「時政記」合撰為「日曆」，詳記某年某月某

日之事。到了一朝皇帝死後，再根據「日曆」編為「實錄」。最後再合幾朝「實錄」，整編為國史。史館到宋朝更加擴大，分國史院與實錄院，史官有提舉，有監修，有修撰，有編修，有檢討，有校勘等。其起居注、日曆、實錄的制度，都緣襲唐朝。這種制度後來歷遼金元，一直相傳到明清之末。這以上是約略說明，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套史官制度，從四千幾百年前的黃帝傳疑時代，歷經商周秦漢魏晉隋唐，一脈相承，綿綿不絕，一直傳到近代。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徵。

在中國的史料中，能有一套綿密而有系統的正史，這與中國的「史官、史館」制度，有密切關係。但是這種御用的史官和官辦的史館，他們會不會包庇帝王專代政府發言，而歪曲了歷史，使歷史知識與歷史本身發生了遠大的距離呢？這種情況是勢所難免，可是在中國古代，另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與制度，來糾正這個偏差。

原來在上古的史官，鄉是專門職守，終身事業，而且父子兄弟相傳。史官必須忠於他們的職責，必要時須以身殉職。這種精神，可以稱為史節。史官不能徇私情，或為金錢勢力的利誘威脅而改寫歷史，這種觀念，可以稱為史德。史官要有史節史德，才能保持歷史的獨立性，使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擾。史官是直接對歷史本身負責，而非對君主權貴負責，縱以天子之尊，亦不能干涉史官。關於這個問題，歷史上有幾樁故事可做說明。

在周靈王二十四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齊國的權臣崔杼殺死他的君主齊莊公，齊國的太史便將這事據實直書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便將太史殺死。太史的弟弟繼承兄職，依樣直書，崔杼又把他弟弟殺死。太史的第二個弟弟，還是一樣，崔杼再把他殺死，於是一連殺死了史官兄弟三人。那知輪到了太史的第三個弟弟，依然不怕死，依然照實直書，崔杼莫可奈何，終於屈服在正義之下，不再干涉。這時齊國還有一家史官南史氏，聽到這個消息，唯恐歷史失傳，手持簡筆前往紀錄。行至中途，聞知太史的四弟得存，歷史紀錄未改，遂欣然而返。又一樁事是在周匡王六年（西元前六〇七年），晉國發生內亂，趙穿殺死晉靈公，時晉國當權者為趙穿之兄正卿趙盾。靈公被殺後，趙盾迎立晉成公為君，也沒有追究殺君

之事。晉國的太史董狐認為這事應由趙盾負責，乃在史冊上直書「趙盾弑其君」。趙盾見了不服道：「我又沒有害死君主，怎麼說我弑君？」董狐遺：「你身為正卿，事變時你藏起來，事後又不追討殺君之賊，則弑君的責任你不負誰負？」後來孔子讀史至此，歎道：「董狐古之良史也！」宋朝殉國的文山公，也特別稱頌這兩樁事，就是他正氣歌中所謂：「在齊大史簡，在晉董狐筆。」另外一段，是關於起居注的故事。唐置起居郎與起居舍人，記錄天子的言行，謂之「起居注」。主持起居注的史官，稱知起居注事。唐太宗貞觀十六年（西元六四二年）諫談大夫褚遂良兼知起居注事，太宗詢問褚遂良想要看起居注。褚遂良道：「史官書寫人君言動，向例人君不得自取觀看。」太宗問道：「朕有不善之事，你是否也記下？」褚遂良遺：「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在一旁說道：「即是遂良不記，天下人亦當記之！」太宗嘆道：「誠然！」後來宰相房玄齡監修國史，太宗問他：「前世規定史官所記不許人主得見，是什麼道理？」玄齡遺：「史官的責任是不虛美，不隱惡，恐人主見而憤怒，干涉史官。」諫議大夫朱子奢道：「恐開後世史官之禍，如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之下，還有可靠的歷史麼？」在唐文宗的開成初年，有一天文宗和宰相議事，看見起居郎鄭朋執筆站在一邊作記錄，文宗要索取觀看，鄭朋拒絕，並引述太宗與褚遂良朱子奢的故事，文宗說：「朕恐平日言語不合治體，想要參看起居注以便改正。」鄭朋不得已而獻之。後來到開成四年，魏謩為起居舍人，文宗又要索閱起居注，而魏謩堅持不許，文宗乃引鄭朋之例論：「朕曾經看過。」魏謩說：「這是史官失職，若陛下常閱記注，從此史臣執筆，必有回避，後世何以能有信史！」文宗只得作罷。

這幾段歷史的記載，並非孤立的例證。我們從這些故事的後面看出一個長時期的觀念和制度，在這個觀念和制度中，表現出中國史官的獨立精神。我們不能說中國過去的史官，都不受帝王的干涉；也不能說中國過去的歷史都靠得住；但起碼有這樣一個觀念，這樣一種制度，已經多多少少保持了我們歷史的相當正確性。僅止這個觀念制度本身所代表的意識價值，已值得我們非常重視。

二、中國史料的豐富與綿密

中國的歷史悠久，而史料綿密。從黃帝傳說到民國紀元約四千六百多年，自甲骨文發現，以商殷為中國「信史」的開端；據甲骨學專家董作賓先生的推算，從商湯建國（西元前一七五一年）到民國紀元是三千六百六十二年；從盤庚算起（西元前一三九八年）到民國紀元是三千三百零九年；從周武王伐紂（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到民國紀元是三千零二十二年。再根據史書的記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記周召共和元年，為中國歷史紀年之始（西元前八四一年）到民國紀元是二千七百五十二年，明白有年可考。從孔子春秋編年，始於魯隱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西元前七二二年）到民國紀元是二千六百三十三年，明白有年有月有日可考。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四〇三年）封韓趙魏為諸侯，是戰國的開端，也是資治通鑑編年的開始，到民國紀元是二千三百一十四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二二一年）是中國真正統一的開始，到民國紀元是二千一百三十二年。幾千年來，史料密切銜接，一絲不斷，一部廿五史，歷歷如貫珠，在全世界的歷史上，真是少有，這是史料的綿密。至於史料的豐富，古人所謂汁牛充棟，一部四庫全書，可以說都是史料。章學誠說：「六經皆史」——尚書不用說，那是上古史料；春秋是魯史，詩經是上古歌謠，自然也是史料；禮經包括上古禮儀制度政治思想，也是史料；易經雖為卜卦之書，而易傳中亦包括很多史料；樂經有無，成為問題，但樂章與詩相配合，也算做史料，這是經部。子部包括歷代哲學家的著作，集部包括歷代文人學者的著作，章學誠說：「集者一人之史也。」我們知道，要研究歷代的學術思想與文藝，必須要從子部集部中找資料，所以經史子集四部的書，廣義說來，都是歷史。所以章學誠說：「盈天地之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我們現在單看史部的書籍。唐劉知幾史通把史書分為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等六家；六家之外，又列十類。隋書經籍志，分史書為：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等十三門。清修四庫全書分史部為：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載記、詔合奏議、職官、政書、傳記、時令、

地理、目錄、史鈔、史評等十五類。按體例來說，則有正史的紀傳體，如二十五史；有以時為綱的編年史，如春秋、通鑑；有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加通鑑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有以國為綱的國別史，如國語、十六國春秋；有以人為綱的傳記，如孔子編年，高士傳；有專記朝典的，如漢宮儀、唐六典；專記地理的，如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水經注等；有專記風俗的，如荆楚歲時記；有專記職官的，如歷代職官表；有專講姓氏的，加古今姓氏書辨；有專講金石的，如集古錄、金石錄；有專講名物的，加茶經、酒經、廣群芳譜；有大規模的政書，如三通九通、與各朝會要；有專講史法的，如史通、文史通義；有講歷史批評的，如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其他如古史、雜史、別史等，更是種類繁多，還有「地方誌」「家族譜」「公府檔案」「碑帖遺迹」等，則不勝列舉。他們的份量，舉例來說：如清乾隆間所欽定的二十四史是三千二百四十三卷，加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而成二十五史，恰為三千五百卷；一部資治通鑑是二百九十四卷，續資治通鑑是三百二十卷；七紀事本末是二百九十七卷；歷代名臣奏議是三百五十卷；大清一統志是五百卷；至如九通則為二千二百三十七卷，真是汪洋浩瀚。這所舉還是自清代以前的舊史書，近代的著作還不算。當然這些書，其中不免蕪雜重復，有好有壞；然而它總是幾千年來文化累積的資本，我們要認真去探索，真是如入寶山，目不暇給，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份資本的雄厚。這中國史料的悠久豐富與綿密，是中國歷史的第二項價值。

三、中國歷史本身的獨立性與整體性

由於中國歷史的特殊背景，使中國歷史文化本身，自成一個體系，自成一個單元，而構成中國歷史的獨立性與整體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分為種族的、區域的、與文化的三項背景。

先說種族的背景。中國人種實在是淵源於本土的，絕近代考古學與民族學的研究，已經證明，從幾萬年前中國人就居住在中國的本土上，中國是中國人的老家。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到銅器時代的文化，都是中國人在中國本土上演進的。中國人雖然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但是以一個主要的民族為中

心，搏合其他種族而成。上古的中華民族是以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夏族為中心，搏合同化其附近種族，而構成一個龐大的漢族。以後兩千多年，以漢族為中心，再不斷的吸收同化其他種族，這樣前後經過長時間血緣文化的交流而構成現代的中華民族。所以除了極少數的邊疆民族之外，中國人的體形、膚色、語文、風俗、習慣，都大致相成（參見下節）。而這個龐大的民族，又是始終居住在同一個自然區域之內，遂形成這一個民族的獨立性與整體性。

其次講到區域背景。中華民族與其文化，是以黃河流域為中心，擴展到長江流域，再擴展到珠江流域。從黃河流域到珠江流域這塊區域，居東亞大陸的北溫帶，氣候適宜，物產豐富，山環水繞，地靈人傑，正是一個文化的溫床。就在這個溫床裏，培養出中華民族的高度文化。圍繞在這塊區域的四周，東面為大海所阻，東北一帶高山，西北是荒寒沙漠之地，西南是橫斷山脈和一片古稱蠻煙瘴雨之區。散居在這些邊區的鄰族，都是文化落後的民族，於是天然地形成了一個文化隔離圈。中國人就在這個隔離圈的中心，自我發展成一個獨立的文化。中國人自以為居天下之中，故很早便自稱為中國。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中國人視四方民族皆為戎狄蠻夷之邦，而與遠域的文化相隔離。直到滿清中葉，海運開闢，才正式接觸到西方文化，而打破了這個藩籬。

這個種族發展的背景，加上這個區域環境的背景，而產生了個自成系統的中國文化。而又以這個文化為背景，互為因果的促成中國歷史的獨立性與整體性。這其中，有三個主要的文化因素：一是文字，二是行政制度，三是學術思想。

中國文字在世界上是獨具一格，它是一種單音獨體，而具備有形、音、意三種符號的文字，這種文字從創制到現在已有幾千年的歷史，這種文字的特性是運用靈活而結構優美。以這種文字所組合成的中國文學，特別具有發揮人類情感與思想的力量。因之這種文字不僅為漢人所珍愛，亦為邊疆其他民族所羨慕。所以許多入主中原的異族，如北朝的鮮卑人，金朝的女真人，清朝的滿洲人，他們都不惜放棄了他們自己的文字而採用了中國的文字，結果遂與漢人同化。中國人就憑藉著這種文字的力量，統一了中華民族，使中國民族文化成為一個獨立而整體的單元。

中國自秦漢時脫離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國家，所建立的一套行政制度，後來雖時有變革，但在原則上是始終一脈相承，一直沿襲到近代。在這套行政制度中，促成中華民族團結與統一的，有兩項最重要的制度。一是從秦漢後所實行的郡縣制度，一是選舉制度中從隋唐後所實行的科舉考試制度。郡縣制度變封建為流官，將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直接貫徹於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擴張而統治了整個的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則打破了一切貧富貴賤的階級，憑才學而取士。用統一的方法，統一的標準，統一的文字，統一的教材，來為國家選拔人才。在這種科舉考試制度下的中國知識份子，在思想意識上自然地殊途同歸，使龐大而複雜的中華民族的領導階層，自然地走上一條共同的文化道路。

第三項因素是學術思想：在中國的學術思想中，白漢武罷黜百家表彰儒術之後，儒家一直成為中國兩千年來的學術思想之中心。它不僅影響了漢族，並且影響了邊疆種族，成為在精神上團結與發展中華民族的一個極大力量。這在下面再加以說明。

四、潛在在中國歷史中的人道精神與民本觀念

儒家思想，始終是中國歷史裏的一個潛在力量，它支配了兩千多年中國知識份子的意識，儒家思想並非完全創自孔子，不過到孔子而集其大成，孔子的儒家思想實以周代的禮教為其背景。所以孔子之前的儒家可以說是儒家的前身，孔子之後的儒家，可以說是儒家的後身。在孔子之前的一部份歷史經驗與歷史觀念，常被提供為儒家思想立論的根據，如春秋中的微言大義與孟子中的種種歷史引證，這可以算做儒家思想之因。在孔孟之後兩千多年的中國學術思想又順著孔孟的思想而發展，成為儒家的後身，可以算做儒家思想之果。這其中的種種因果又互為循環，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我們綜合前身的儒家思想與後身的儒家思想，認為其中與歷史影響最大的，是儒家思想裏的兩項基本觀念，一為「人道觀念」，一為「民本思想」。這兩項觀念綿亙在幾千年中國的學術思想之中。

中國的歷史演進，從殷人尚鬼進化到周朝的禮教制度，已由神道社會進化到人道社會。我們分析周朝

禮教的內容，完全以人為本，是一個高度的人倫秩序人文文化。這個人倫秩序，人文文化，也就是孔子思想的基礎，所以孔子說：「郁郁乎文哉！余從周。」而孔子的學術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就是一套人道思想。所以我們的祖先，早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就已經脫離了神權社會了。從周朝以後，中國的社會，尤其中國的知識份子，對於宗教觀念，物權觀念，都很淡薄，而重視人道，重視倫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儘管有政權的戰爭，有種族的戰爭；（此世界各國皆有之）但卻沒有宗教戰爭，也沒有掠奪奴隸的戰爭。在中國歷史上，政治的演變，儘管有光明的時候，也有黑暗的時候；但在政治觀念上，時時不忘人道的價值。人就是人，既不是物，也不能依賴於神，所謂「萬物之性人為貴。」「人定勝天。」所以在中國歷史中所表現的社會形態與民族性，是特別富於人性與人情。歷代學人的著述，詩人的歌詠，也是特別著重於人道與人情的發揮。

其次，是中國歷史上所表現的「民本觀念」。從尚書泰誓中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到管子的牧民，到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一直到明末清初黃宗羲的原君，這種民本思想，是幾千年貫徹到底。在歷史經驗的例證中，則從堯舜的禪讓故事，到周太王的遷幽，到周曆王的止謗，到陳涉吳廣的起義，漢光武的復興，朱元璋的革命，在在為這個觀念做說明。在政治制度方面，如前述的選舉考試制度，與監察制度、諫議制度，都能發揮政治的功能，表現民本與自由的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打破貴族平民的階級，和君權神授的學說。我們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很長的時間，是一個「君權統治，而充滿民本觀念」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人民常能享受很多的自由，君權有時反受到很多的限制。

這人道精神與民本觀念，在中國歷史上的潛在力量，是我們讀中國歷史時，所不容忽視的一項歷史價值。

讀 史



一對精緻和麻木的

“大師”

再說錢鍾書和楊絳

伍 國

現在的一些人們，已經很自然地把錢鍾書和“大師”這個稱謂聯係在一起。中國人一旦成為“大師”，仿佛就領了免罪符，假若有人敢在寫滿大師名字的陳年流水簿子上踹上一小腳，就即刻人神共憤。本來，任何學者、作家、藝術家都需要經過他人，後輩、尤其是時間的評判，海德格爾與納粹的關係，薩特的左傾，都如此，後代原諒不原諒是另一回事。早早就戴上“大師”的帽子，奉著“文化昆侖”的頭銜，當然免不了別人要來懷疑一下，究其根源，是盲目崇拜者在先，才有挑刺者於後，修築神壇在先，才有請下神壇的必要。

錢鍾書毫無疑義的是一位有成就的學者。他原本生活在個人的學術世界中，在上個世紀 90 年代，自人們仿佛在一夜之間，因一黨的獨家傳媒而發現了他，他晦澀難懂的著作便被看成了學術的高峰，他的小說也成了暢銷書，他的生存方式尤其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與其說是錢鍾書的學術和文學造詣征服了大眾，倒不如說是“大眾”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亦真亦幻的流行化的偶像。人們內心中對於“大師”總是難免崇拜的，然而，幾十年的風雲變換，能稱得上大師而又能為人們熟知的人畢竟寥寥無幾，而嚮往大師的人又如此之多。在這樣一個時候，錢鍾書博古通今的學養，書卷氣的幽默，非政治的學術和小說的藝術，便讓讀厭了擁有宏大主題文學作品的人們，有了一種頓然開朗的感覺。和其他在政治風潮中東倒西歪的作家學者們相比，錢鍾書的走紅，正以那種非政治的、超然的

學術追求和個體獨立形象，契合了厭倦形形色色的政治，甚至是著意要“躲避崇高”的社會文化心理。

作為一個學者的錢鍾書誠然是合格的。但是假如真要以知識份子的“昆侖”來看，似乎他又不那麼經得起推敲。楊絳回憶文字的字裏行間勾畫出了一個錢鍾書的輪廓，可是這個輪廓似乎缺少點什麼，或者說，並沒有人們期待

的一種鮮明的精神力量。

那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呢？

我以為，這種精神力量應當來自對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群的深切關注和擔憂，對現實苦難的敏銳感覺。當我們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的時候，就會明顯地感覺到作者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對下層民眾的深切同情。在《罪與罰》中，陀氏塑造了一個大學畢業生拉斯柯爾尼科夫內心的困惑，犯罪，逃避，最終獲得愛情和救贖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有親情，友情，愛情，有窮人的困窘和絕望，社會的不公，也有忠誠，而最大的忠誠，卻是來自最下層的妓女索尼婭的愛情。另一位文學家托爾斯泰則一生都為自己的貴族生活和下層民眾的差距而痛苦，尋求社會改造之道。晚年因為內心的煎熬放棄遺產離家出走。這種力量更應當來自內心的激情。魯迅是以冷嘲和毫不留情的諷刺著名的，但在許廣平 1925 年致魯迅的信中，卻說魯迅的缺點是“太敏感，太熱情”，太容易憤怒。魯迅是太熱情的人——我以為這才是對魯迅的真正瞭解。《圍城》的結構有問題也好，作者幽默過多，干預情節也罷，都掩蓋不了它最大的缺陷——它所沒有的，正是名著應有的深沉厚重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價值。當我們讀《阿 Q 正傳》的時候，是笑中帶淚，最後是要引起深切的同情和思考的。魯迅的《在酒樓上》寫呂緯甫，從一個曾經的熱血激進青年蛻變為一個“無可無不可”的落魄文人，呂緯甫悲劇的根源之一就在於個性軟弱，但這一蛻變過程通過對話、回憶的步步揭示，卻

讓人逐步體驗一個時代大背景下的個體幻滅過程，並感到痛惜和酸楚。《祝福》中的祥林嫂，也是在一個不斷追求而又不斷幻滅的過程中才豐滿起來。又如張愛玲的《金鎖記》，同樣是一個完整的女性性格和心理逐漸壓抑和扭曲的蛻變過程。而方鴻漸這個人物缺少的正是這樣一個心理和性格發展的邏輯與縱深，從一開始到最後，儘管經歷了喪妻，出國，留學，回國，工作，結婚等等重大的外在變故和時間的延續，他似乎都是一如既往的怯懦，玩世，麻木，得過且過，不真正快樂，也不真正不快樂，無所謂追求，也無所謂不追求。這樣，作者似乎不是意在深入剖析一種現象，賦予它社會意義，而是在單純地，平面地展覽和把玩一個灰色人物的種種弱態，並襯以一群灰色人物的醜態，供作者自娛，如楊絳回憶的，錢每寫完一章，她先看，“他笑，我也笑”。如果如魯迅所說，悲劇是把美毀滅給人看，那麼《圍城》之不能從通俗諷刺小說成為具有悲劇意義的作品，正在於既沒有展現美，也就無從展現美的毀滅。不少讀者在方鴻漸身上看見知識份子的患得患失，自命清高，但是如果把買假文憑也看成是知識份子的普遍性格悲劇，是不是太離譜了呢？一個連文憑都敢造假的人，談何清高？方鴻漸的人生是有荒誕意味的，這似乎也是錢鍾書著力想強調的一點，但是方鴻漸的荒誕卻又沒有同時期西方存在主義文學中關鍵的，關於理性與對抗，以及對意義的探求的成份，沒有加繆的《局外人》中的那種啓迪。那麼，塑造這樣一個既無能又沒有基本道德底線的角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象徵人生的普遍困境呢？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圍城》完全沒有同時代中國作家如沈從文對女性的尊重和同情，甚至違背了明末清初文學，如《牡丹亭》，《紅樓夢》，《鏡花緣》，《三言二拍》中對女性進行正面塑造，並以此來反諷男性社會的傳統。除了對唐曉芙稍留情面，從鮑小姐，蘇文紈，孫柔嘉，范小姐，到孫的姑母，個個女人刁鑽狡猾，詭計多端，看不到真心和真性情。楊絳竟還解釋說，“鮑魚之肆是臭的，所以叫鮑小姐。”如果一個男性作家對自己並非刻意否定的女性角色都採取這樣一種不屑的態度，小說能否真正打動人，實在是成問題的。從社會階級角度看，《圍城》

也看不見《儒林外史》裏那種對下層人民進行的正面塑造，所有人一律都是受嘲弄的對象。委瑣和醜態，固然也是人類這種“兩足無毛動物”根性的一部分，但也不是全部。從語言技巧上看，《圍城》是精緻的，但恰恰犯了後現代犬儒主義的毛病：“過度精緻化而麻木。”（徐賁語）儘管寫的是一群知識份子，小說卻始終不過是一本通俗作品而已。人們之需要文學名著，並不單是為看到個個角色都委瑣，陰暗，俗氣，然後被連篇累牘的俏皮話弄到“我笑，他也笑”，最後感歎人生無奈，還是要找到真切的愛與恨，找到一點美與力量，找到一點點的理想主義……否則，何以需要托爾斯泰，喬伊絲，海明威，斯坦倍克？

楊絳文字中的錢鍾書，仿佛就是一個沒有激情也沒有憤怒的人，再大的變動，只要不殃及自身，便可得過且過。值得注意的是，楊絳說，錢鍾書讀書看到可笑處就癡笑個不了，“可是我從沒見到他看書流淚。”而錢瑗手書的回憶中，提到錢鍾書在她幼時竟教她說法文粗話，令客人大笑。這些都似乎無意間解釋了《圍城》不能打動人的真正原因——作者自己不會感動，而且“幽默”到連自己的孩子都可以拿來尋開心，作品中怎麼能有打動人的力量，“教粗話”之惡俗比起魯迅的對待周海嬰，實為天壤之別。錢楊二人以讀書和著述試圖超越政治活動，固然也令人欽佩，但也似乎放棄了對周遭一切的承擔和關注，僅以自身的境遇作為標準。讀《幹校六記》讀到二位老人被下放幹校，從事自己不習慣也不適宜的體力勞動，不免讓人有歎嗟歎惋的感覺，但自始至終，卻看不到楊絳有超出對自己和自己家人的興趣。他們還有高工資可領，有回北京的希望，而周圍的農民們呢？楊絳除了輕描淡寫地提到幾個鄉間的少年男女，根本沒有去注意過農村的狀況，看來五七幹校真是辦得失敗，用楊絳自己酸不溜秋的話說，“分明是國家虧了。”

在這種自我關注發展到極至的《我們仨》中，楊絳寫到他們二人在反右運動中，“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沒有說錯話，免去了厄運，從個人的角度看，自然是好事，但是，這就算不上是楊絳所稱的“癡。”錢鍾書假如真是又狂又癡，何以能不說半句錯話？而中國歷史上自古至今真正又狂又癡的文人，哪個不是非自殺即被他殺，基本上都“非正常死亡”了。

想到那幾十萬因爲一兩句癡言就獲罪半生，“三十萬言三十年”的人，錢鍾書的“先見之明”真是諷刺：誰讓那些傻瓜不象他們這麼絕頂聰明呢？楊絳在寫到“三年自然災害”時，是這樣說的：“‘三年困難’期間，鍾書因爲和洋人一同爲毛選英譯定稿，常和洋人同吃高級飯。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應。我們還經常吃館子。我們生活很優裕”。我當然不是主張他們一家也應當去挨餓，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但是在幾十年後，當年的慘況都不再是秘密的時候，還強調“高級飯”，“我們生活很優裕”，對挨餓的人沒有一點同情，一點憂慮，這種心態究竟算是中式傳統文人，還是西化知識份子？都不像。錢鍾書的學術成就之所以突出（編按：是否真是如此地突出，恐怕還不可以下結論太早），很大程度上其實也因爲大量有才華有學問的人沒有他那樣相對穩定和安全的環境，錢四十年代在儲安平辦的《觀察》雜誌上發表過文章，可是，儲安平去了哪里？但是當楊絳遺憾女兒錢瑗的天份沒有充分發揮的時候，就算成時代的不公了：女兒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後下放四清。”

楊絳筆下的錢鍾書，似乎個人生活能力極差，1972年才“生平第一次劃火柴”，是一個典型的舊式白面書生，他們兩人的生活中，在上海淪陷時期的生活算是刻骨銘心的一段艱苦日子，再加上舊社會工作不穩定，驕傲如錢鍾書，也得巴巴地等大學的聘書，而楊絳還得去當家庭教師。可以想見，能夠在新中國的一個國家級研究機構中拿不低的固定工資，還能因專業水平和老同學關係去翻譯毛詩毛選獲得政治庇護，已是個人的大幸，自然不會在1957年去冒傻氣，提什麼與自己無關的意見。楊絳的文字中一再地標榜他們是超然的。但是，既然錢鍾書都說了不用非要拜訪下蛋的母雞這句“名言”，楊絳又何必專門著文來解釋《圍城》，爲什麼不能超然地對待自己的著作？好比非要把這只雞蛋代爲剝開，一一指點蛋白與蛋黃，講解下蛋的過程。錢鍾書的高深莫測和楊絳的喋喋不休倒是配合默契。

他們的超然的確裝得不象。在《我們仨》中，楊絳把文革後期江青如何一再邀請他們夫婦去住釣魚臺講得非常之詳盡，兩頁之內，竟出現好幾次“江青同志。”結果自然他們又是不去應江青之邀的，其實當時

當地，就是去了也無過錯，但既然不去，又很“超然”，那也就不必念念不忘拉著“江青同志”的大旗了吧。否則我們也可以質疑，爲什麼橫掃一切的江青對他們夫婦如此禮遇？是不是因爲他們一向只幫忙幫閒從不搗亂，所以值得信賴呢？楊絳寫到胡喬木，就更是親熱有加了，“喬木同志”如何一次次來作客，幫助出版書。楊絳在回憶中直言：“我們受到庇護，心上感激。”承了別人的情，感謝是應當的，否則就不是不通人情世故了。但是，看到這裏，我立即想起了章詒和寫聶紺弩提到胡喬木爲他的詩集作序後的反應：“媽的個B，我的書本來好好的，就讓那篇序搞壞了！”我去找來了聶紺弩的《散宜生詩》，發現胡喬木的序寫得很好，評價也很高，真不知聶爲何如此憤怒，爲什麼不知感激，但是一想到聶因“反革命”罪被判了無期徒刑，又似乎可以理解他的情緒。反過來想，這樣直率，不會保護自己的人不坐牢，誰坐呢？章詒和說，“聶紺弩對腐朽、污穢、庸俗的事物，有著超乎尋常的敏感和憤怒。”又是敏感，又是憤怒，這竟然是魯迅與聶紺弩這兩位知識份子一脈相承的共同特性！這種內心的憤怒和張力，敢於蔑視權貴的勇氣，既能進研究所，又不怕進監獄的膽量，才是知識份子獨立精神和道德力量的一部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錢鍾書的清華校友，當時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在“反自”，“清汗”的運動中大舉整肅知識界，王若水，周揚，王元化等人都成爲他的靶子，然而，在他批評作家王若望的時候，卻讚揚了錢鍾書，說，王若望沒有象錢鍾書那樣看到現在是一個好時代（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2004年）。錢鍾書的原話是在訪問美國的時候，以政府代言人的形象教訓夏志清的，“儘管我們國家有缺點，但蒸蒸日上，前途非常好。你夏志清寫了那麼多書，許多事實都沒搞清楚，要多看看，少說話。回到香港、美國不要舉行記者招待會。”（顧驤《晚年周揚》）這一席居高臨下，官氣十足的話哪里像是兩個上了年紀的學術泰斗間的對話，哪里有一絲一毫幽默感，分明是一位統戰官員在告誡一個流亡的反動文人。錢鍾書當然知道夏志清的政治立場，也當然知道話會傳到胡喬木耳中。可是，如果夏志清的思想是他希望的層面上，又怎麼可能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

給予《圍城》如此高的評價，他應該專選現代小說中歌頌“蒸蒸日上”的文學作品才對，哪里還有錢鍾書的位置。對於錢氏夫婦來說，只要自己能離開幹校，能領高工資，能住部長樓，什麼時代不算“好時代”呢？魯迅說真正的知識階級“所感到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固然是一種不易達到的理想狀態（尤其對中國知識份子），但也不至於因為自己受到“庇護”就去做衛道士。任何用客觀環境的惡劣來為錢鍾書辯護的理由在這裏都顯得無力，這種投其所好乃至助紂為虐的“大師”，已經不再是“鴛鴦”，而是喜鵲甚至魚鷹了。受表彰者和受批評者的結果自然是高下立判：錢鍾書去世時享盡哀榮，王若望孤苦零仃老死異國。

據說，錢鍾書曾針對中國作家未能獲得諾貝爾獎一事，當面斥責瑞典漢學家馬悅然，他罵馬悅然是靠中國混飯吃，還說，“把巴金的小說譯得這樣爛，誰會給獎？”中國古典文化屬於世界，為什麼一個嚴肅的外國研究者就是混飯吃，該受他教訓，而錢鍾書自己研究就不叫混飯吃，而叫“大師”？翻譯錢鍾書作品的美國學者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就不是混飯吃，而是“美國友人”？錢鍾書先前參與翻譯過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後來靠胡喬木賞賜一個參與翻譯毛選的飯碗，又算不算靠當門客混飯吃？說巴金的小說翻譯得差，錢鍾書的英語既如此高超，又有沒有責任呢？把中國文學得不了諾貝爾獎推到評委會，翻譯水平，馬悅然的頭上，擺出一副受迫害的樣子，是否公平，不言自明，但是這樣的指控又是多麼深得人心啊。中國人原本就因為諾貝爾獎的事惱了幾十年的氣，這下終於有“大師”出來，先是貶低了諾貝爾獎本身，再把責任一舉推倒翻譯，推倒評委，推倒馬悅然頭上，讓大家頓時明白，中國人之不能得諾獎，不是因為中國的作家在“混飯吃”，乃是因為馬悅然在“混飯吃”，更何況諾獎還有那麼多錯評和漏評，一顆酸葡萄而已！這一發現是多麼地解氣，多麼地振奮人心，又是多麼的“政治正確”啊。而魯迅卻說過諾貝爾獎誰也不配，最好不要頒給中國人的話，相比之下，魯迅是多麼讓人掃興，多麼讓人喪氣！然而，還是這個混飯的馬悅然，年復一年地推薦北島，高度評價山西作家李銳，後來又親自動手把高行健的《靈山》翻譯成瑞典文，為高行健在 2000 年獲得諾獎起了重要作用。而《靈山》中又有一個《圍城》裏所沒有的，一個當代中國

人的靈魂自我放逐和掙扎的過程。不知錢鍾書若在世，又當用什麼樣的俏皮話來嘲弄，該怒斥誰？

錢鍾書總是善於在不同的場合恰如其分地說出種種讓人聽了如沐春風的話，而在內心，他看得起的人又極少。因此他的讚揚也是打折扣的，因為你無法知道他內心的真實評價。錢鍾書嘲笑陳寅恪去為一個妓女立傳，但從人格上，錢鍾書真的沒有任何資格批評敢於提出“不宗奉馬列”的陳寅恪，甚至也沒有資格嘲笑柳如是。博學如錢鍾書，不會不知道柳如是是一個什麼樣的“妓女”，她不幸而為妓女，卻是一個有政治操守，懂民族大義，有勇氣和傲骨，敢於以死抗爭的“人”，不是一個不管面對任何大人物都可以“隔江猶唱”的奴婢。精通法國文化如錢鍾書，也不會不明白莫泊桑為什麼偏偏要為羊脂球這樣一個妓女，而不是為那些出賣羊脂球的上等人“立傳。”陳寅恪要為之立傳，正是認同一種骨氣，一種抗爭精神，但在錢鍾書的眼裏，柳如是的剛烈和愛恨分明恐怕正是他不屑、也避之不及的。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錢鍾書對同輩學人和前輩學人的苛評多半都是在“專業”或者說一些瑣碎的事情上，但他從來不敢於從大節上批評別人，因為從大節上說，錢鍾書只能說比別人更聰明，更世故，混得更好，卻決不比別人更有良知，更有勇氣。對於胡喬木，錢鍾書就從來不敢“怒斥”，就連不小心書生氣發作，應邀改了胡的詩，也要摧眉折腰地去信道歉自責，乖巧極了——自己的美學判斷比起胡喬木的權勢來，又算什麼。林非先生和楊絳關於“錢鍾書打人”和“楊絳咬人”的爭論本是家務糾紛，各說各話，但林非和肖鳳筆下的錢鍾書與楊絳，與我心目中的錢楊的確更為接近，印象最深的是，錢鍾書平時很“超然”，但用木板砸林非時，下手非常之重——這大概是他的另一次無情的憤怒，也可算是大師的“老夫聊發少年狂”吧！說穿了，錢鍾書們對於民瘼，對國運，對大是大非，對認為不如自己的人“超然”的，對私利，對權貴，一點也不超然。他們的生存哲學，無非是在學者外表下的小市民心態，如孔子雲，“鄉願，德之賊也。”

有人呼籲我“不要滅大師。”我等庸人，斷斷不敢否認錢鍾書的巨大成就，也斷斷不敢否認他們仨的巨

大溫馨。我得承認錢鍾書先生是古籍大師，翻譯大師，外文大師，西洋典故大師，哲理大師，俏皮話大師，還是人情大師，世故大師，父愛大師……就象用牙齒咬繩子拉動汽車，創造了吉尼斯世界記錄的人，總是做到了別人做不到的事，我怎麼“滅”得了，但還是不至跪下去山呼萬歲，不覺得中國文化出了救主，知識份子找著了燈塔。有上面的事例在，我倒更願意相信，既然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都想混得好，都怕當官的，都趨利避害，何不對同你我一樣“兩足無毛”，只是更為精緻和麻木的“大師”、“昆侖”們多保持一點清醒。

靈岩山上， 我向林昭訴說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馬太福音 10:5

今天，05 年的 12 月 26 號，將會是我一生中最為難忘的一天。今天，我看望了我心目中的自由女神——林昭的墓地，我將用文字把這次朝聖之旅忠實的記錄下來。昨天，在杭州參加一個聖誕聚會，突然想到了就在不遠的蘇州，那一塊我心中的聖土——林昭墓地。看望林昭，是我自從認識林昭後就一直有的一個願望，我決定利用聖誕假期，完成這一願望。聚會結束，我隨即趕往蘇州，蘇州城區已是深夜。

今天起的很早，收拾好東西，出來找到一家花店，說明來意，年輕的店主幫我挑了黃、白兩色的菊花，搭配成漂亮的一束，我要來紙和筆，寫上『林昭不朽』，『自由必勝』八個大字，放在花束中。一切準備就緒，叫上一輛 TAXI，直奔靈岩山而去。途中，我心裏時而有一種感動的感覺，眼眶會不自覺的濕潤，爲了不讓它流下來，我必須仰視片刻，從沒有過

這樣奇妙和持久的情感反應，實際上這種情緒伴隨了我整整一天。過了半小時左右，車開到靈岩山腳。靈岩山位於蘇州西南的木瀆古鎮，這裏是蘇州的旅遊一景，假日雖已結束，仍能看到不少的遊客。我在較為醒目的韓世忠墓下了車，根據從網上查到的信息，林昭墓距此祇有幾百米之遙了。

我手拿花束，向西行走，前面的山脊上看得出一個墓場，在通向墓場的路口，有兩間小平房，幾個提著藍子的老婦坐在房前。看到我後，她們向我走來，我知道，這一定就是那傳說中的吃『人血饅頭』的村姑了。『來看林昭的嗎？』，『是的。』我回答到。『我給你帶路吧。』我注意到這時候圍上來的熱情『導遊』們已增加到 10 餘個之眾。『林昭的母親是被氣死的，他們向她要 5 毛錢(應是 5 分錢)的子彈費』，一個臉黑黑的男子還向我介紹起了林昭，這個唯一的男性『導遊』爲了這份差事，看來還專門做過一些功課，就讓這個黑臉幫我帶路吧，雖然我一再強調祇需要一個領路的，老婦們並沒有理會，一行人就這樣浩浩蕩蕩，沿著一條窄窄的山路向山頂走去。向上行走兩百米左右，黑臉停了下來，山路的右側，茂密的樹木之間，這裏就是林昭的墓地了。

這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墓地，雖然在網上我已多次看到過林昭墓的照片，當親眼看到石碑上『林昭之墓』四個字的那一刻，仍感到有一種強烈視覺衝擊的效果，我的心在顫抖。可沒想到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竟讓我憤怒了。那群村姑們爭先恐後的擠到林昭的墓前，拿出掃帚香火，掃的掃，擺的擺，我有些不知所措，一股怒氣從我胸中猛然迸發出來，『滾開，你們都給我滾開！』我向她們咆哮著吼道，她們顯然被震懾住了，都退到了一邊。這是一群可憐的中國農民，大多都上了年紀，身上還穿著帶有補丁的衣褲，眼神是空洞和麻木。他們在貧窮和無知中度過一生，林昭，對於他們，是那麼近，又是那麼遙遠。我可不想在這群愚昧人的注視下祭拜林昭。我抓出一把零錢，給了黑臉。村姑們聚攏過來，很快分了錢走了。我把黑臉叫住，我需要一個人幫我拍幾張和林昭的合照。林昭的墓前已擺放有一些花草，花還沒有凋謝，黑臉告訴我不久前有人來過，『這裏差不多每天都有人來。』他說。拍完照，黑臉離開了。四周安靜下來。我清理了一下墓台上的雜物，在石梯的台階邊坐了下來。

來，注視著林昭的墓碑。在這塊墓碑下面，是一個如詩的生命，一個高貴的靈魂。我點上一支煙，慢慢疏理著我的思緒，感知著我眼前的景象。

兩年前，胡傑先生的記錄片讓我認識了林昭，之後閱讀了大量有關林昭的文字，和很多人一樣，我驚嘆近代中國竟有如此勇敢、如此深邃思想的女性，她為這個國家流盡了她的最後一滴血。三十多年前，這位北大的才女，在監獄中渡過了她生命的最後歲月，

在那裏，她用自己的鮮血記錄下在獄中所受到的肉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她用自己的鮮血記錄下對這個吃人的體制和專制惡魔的控訴；

她用自己的鮮血記錄下對自由的追求和堅定信念；

她用自己的鮮血記錄下她對慈悲、公義的上帝的愛。

幾十萬血寫的文字啊，三十多年後的今天，讀起來是怎樣的一種感動和震撼！

煙已在我的手指間熄滅，除了輕風吹拂樹葉偶爾發出的沙沙聲，四周一片寂靜。『林昭，我來看你了。』向著林昭訴說，這聲音有些顫抖，但是很清晰。

『你不會孤獨，這裏每天都有人來看望你。你的名字，你的事跡今天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

『你寫的血書我看到了。一個叫胡傑的拍了一部關於你的紀錄片，那上面有你寫的血書。你的觀點，你的思想我知道，今天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們知道你在獄中受了太多的苦難。』我終於沒能控制住我的眼淚，淚水在止不住的流。

『我恨殺害你的那個體制，我恨那些殺死你的兇手。』我開始哭的很厲害，情感如火山般噴發出來。

『但是，他們需要懺悔，就像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

『他們做的事，他們不知道。』』『林昭，你不是孤獨的，今天，你的文字正在這個國家廣為流傳，你的名字已成為自由的同義詞。我堅信總有一天，你的事跡會被所有的中國人所熟知，你的豐碑會在這片你深愛著的土地上巍然屹立；總有一天，自由的空氣會吹遍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那一天不會太遠，那一天，我們會和你一道歡呼慶祝。』平時笨嘴笨舌的我，似乎在這裏找到了靈感，思路也逐漸開闊起來。『你知道

嗎，林昭，我的網名叫自由戰士，是為了紀念你。我的簽名是你血寫的詩：

生命似嘉樹 愛情若麗花
自由昭臨處 欣欣迎日華
生命巍然在 愛情永無休
願殉自由死 終不甘為囚

你是我的偶像，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我是你最忠實的 FANS。』我試圖用一些較為輕鬆的話，緩和一下我的情緒。

心情平靜了一些，我想了想，還應該告訴林昭些什麼。

『林昭，歷史已經宣告了你無罪。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壽終正寢，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在全世界範圍內已經破產。今天的中共雖然仍在統治著這個國家，但這個黨早已放棄了共產主義的追求。

『就在前幾天，在最保守的阿拉伯世界，伊拉克的人民參加了大選，有了自己的憲法和民選總統。獨裁者正坐在被告席上，接受歷史和人民的審判。

『新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正在席捲全球。現在的美國總統，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在他的總統任職演說中，表達了要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自由民主的決心，並把消除所有的極權體制和奴役現象作為美國政府的終級目標。在短短 30 分鐘的演講中，就有二十多次提到自由——FREEDOM 這個詞，他在演講中表示，自由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強大的力量，對自由的渴望深植於每一個人的心中。這讓我想起了你血寫的文字——自由必勝！』

靈岩山，在一篇紀念林昭的文章中，作者把它比喻為中國的耶魯撒冷，中國民主和自由的哭牆，在這裏，我完成了一次對林昭的訴說。

臨走前，我在墓碑前三鞠躬，以表達我最深的敬意。願你在天國快樂平安，上帝與你同在。

回到住所，已近黃昏。

寫於 2005 年 12 月 26 日深夜



抗戰初期的北京大學校長

蔣夢麟



辛
明

一、不是八年抗戰，而是十四年抗戰

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始於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關東軍對瀋陽北大營的偷襲，止於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前後歷時凡十四年。中國共產黨恬不知恥地自詡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其書籍、檔案和歷史教科書中宣稱抗日戰爭為期八年。在其自吹自擂的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冠冕堂皇地唱“它堅持了抗戰八年多”，在無意中正好暴露了在中國人民的十四年（1931-1945）偉大衛國戰爭的前六年（1931-1937）裏，它根本沒有打過日本鬼子。在隨後的八年（1937-1945）裏，它的所做所為充其量也不過是其內部指示中所說的“一分抗日、二分宣傳、七分發展”。[1]

本文討論抗日戰爭初期（前六年）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與北京大學師生為抗日戰爭作出的貢獻。蔣夢麟（1886-1964），原名夢熊，字兆賢，別號孟鄰，浙江省余姚縣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 年（光緒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讀書，12 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在家鄉參加

科學考試，中秀才。後就學於浙江高等學堂（浙江大學前身）和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大前身）。1908 年 8 月赴美留學。次年 2 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1912 年於加州大學畢業。隨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攻讀哲學和教育學。1917 歲 3 月，蔣夢麟獲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旋即回國。1919 年初，蔣夢麟被聘為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後任總務長。在蔡元培校長離職期間，曾三度代理校長。1930 年冬，任北大校長，直至 1937 年北京大學南遷長沙，與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合辦聯合大學。他的北京大學校長任期（1930-1937）正好覆蓋全部抗戰初期（1931-1937）。

二、在與日本特務謹慎周旋的同時，大力支援抗日戰爭

作為全國最高學府，日本人把北京大學視為反日運動中心，經常派偽裝為學者的特務來此造訪。偽裝為地質學家、經濟學家、生物學家等形形色色的“學者”來北京大學，都一致譴責北大的反日運動，都一致爭取北大的對日“友好”。蔣夢麟校長和他的朋友和得力助手胡適（適之）、丁文江（在君）和傅斯年（孟真）等總是告訴他們，我們並不反日，我們反的是日本軍國主義，因為軍國主義份子一心想滅亡中國。在日本學者對北大教授誇誇其談地吹噓中日文化關係之際，蔣夢麟等北大教授卻告訴他們，除了日本的軍事野心之外，我們看不出中日之間還有什麼文化關係。“只要你們肯放棄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兩國自然就能攜手合作的。”[2]

1933 年，中國軍隊在長城一線組織了一系列抗擊日軍的戰鬥，史稱長城抗戰。在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冷口等長城關隘，國軍用低劣的武器和血肉之軀抵抗日軍的進攻，給日寇以重創。傷兵絡繹於途，醫院人滿為患。北京大學教職員成立了傷兵醫院。蔣夢麟校長的夫人陶曾谷女士親自主持院務，教職員的太太和女學生充任職員和護士，收容和救助了大批傷員。蔣夢麟本人也過問醫院的事務，與作戰部隊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軍政部長何應欽（敬之）親自來平指揮作戰，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蔣夢麟校長與何部長過往密

切，兩人都希望能搭成停戰協議，以換取備戰時間。蔣夢麟校長親自出馬訪晤英國駐華大使藍浦生，探詢他可否充任調停人。1935年7月6日，《何（應欽）梅（津美治郎）協定》達成。中國人贏得了喘息的時間，日本人卻得到了中國政府取消在河北的黨政機關，撤退駐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撤換日方指定的中國軍政人員和禁止一切抗日活動等承諾，並佔據了河北省北部地方。

日本人得寸進尺，在河北省北部成立“自治政府”之後，又緊鑼密鼓地以“華北民眾”的名義開展“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自治”運動。在此國家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師範大學校長李蒸，北平大學校長徐誦明及胡適、張奚若、蔣廷黻、吳文藻、傅斯年等20餘位著名大學教授於11月23日在銀行公會聚餐，以聯名方式發表宣言，否認所謂華北民眾要求自治或自決。宣言原文稱：“因為近來外間有偽造民意破壞國家統一的舉動，我們北平教育界國人鄭重宣言：我們堅決反對一切脫離中央組織特殊機構和陰謀舉動，我們要求政府用全國力量維持國家領土及行政的完整。”宣言充分表達了中國知識份子的愛國熱忱和凜然正氣。

三、隻身夜闖日軍駐防軍司令部，冷靜面對綁架威脅

對於蔣夢麟校長的反日活動，日本軍方恨之入骨，密謀把蔣夢麟綁架到他們治下的大連去。宣言發表後不久的一天下午，日本憲兵到北京大學來找蔣夢麟，請他到東交民巷的駐防軍司令部去談談。蔣夢麟毫不含糊地答應一個小時之內就去。在通知家人和幾位至交之後，他在天黑以前隻身一人去了東交民巷的日本兵營，進了河邊將軍的辦公室。房門立即在身後鎖上了，一個日本大佐和他交談，一個日本士官握槍站在他身後堵住門口。

大佐指責他進行反日宣傳，誣陷他寫作反日著作，攻擊他在反對自治運動的宣言上簽名，最後圖窮而匕首現，說：“關東軍對這件事有點小誤會，你願不願意到大連去與板垣將軍談談？已經給你準備好專車。你願意今晚去大連嗎？”

“我不去。”蔣夢麟義正詞嚴地回答。

“不要怕，日本憲兵要陪你去的。他們可以保護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會單獨到這裏來了。”蔣夢麟不亢不卑地說：“如果你們要強迫我去，那就請便吧——我已經在你們掌握之中了。不過我勸你們不要強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東京在內，知道日本軍隊綁架了北京大學的校長，那你們可就要成為笑柄了。”

大佐的臉色大變。他認識到他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只能尷尬地重複，“你不要怕呀！”

“怕嗎，不，不。”蔣夢麟抽著煙，很平靜地對他說：“聖人說過要我們臨難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這句話。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決不會損害一個毫無能力的人。”

蔣夢麟就這樣軟硬兼施、機智勇敢地使日本鬼子左右為難。這時，電話鈴響了，顯然是更高層的幕後指揮者一直在監聽他們的對話，現在給大佐發來新指示。大佐接完電話以後，對蔣夢麟說：“好了，蔣校長，司令要我謝謝你這次光臨。你或許願意改天再去大連——你願意什麼時候去都行。謝謝你。再見。”

門鎖從外面打開。大佐幫蔣夢麟穿好大衣，把他禮送到汽車旁，恭敬地給他打開車門。這時，夜色已經四合。蔣夢麟懷著勝利的喜悅，坐進汽車，返回家中。

這就是蔣夢麟隻身夜闖日軍駐防軍司令部，冷靜面對綁架威脅的全部過程。引號中的對話全部引自蔣夢麟的自傳《西潮》[2]，筆者連一個字都沒有更改。蔣夢麟為我們作出了中國知識份子臨危不懼、威武不屈的典範。他告訴我們，窮兇極惡的敵人不是不可戰勝的，浩然正氣是戰勝一切邪惡勢力的最強大的武器。

在一定意義上，現在高智晟律師和中共專制政權的鬥爭與當年蔣夢麟和日軍駐防軍司令部的鬥爭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共專制政權與日軍駐防軍司令部一樣窮兇極惡。但是，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高智晟律師的浩然正氣最後必然會戰勝中共專制政權的邪惡勢力。

四、堅守崗位，直至最後時刻

日軍駐防軍司令部的綁架陰謀震動朝野。當時就有許多朋友說蔣夢麟不應該獨身闖虎穴。多年以後還有人評說他“書生氣質很重……萬一給他侮辱或加害，這種不必要的犧牲，豈不很冤枉。”[3] 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將軍派來一位少將勸蔣夢麟離開北平，說他恐怕沒有能力保護他。不久後，蔣中正委員長又借陳誠（辭修）將軍北上之便，請陳將軍為他代致問候。

蔣夢麟對於勸他離開北平的忠告深致謝忱，卻仍然留在北平堅守崗位。校園裏偶而闖入一些朝鮮浪人（為虎作倀的亡國奴！）來尋釁鬧事，但是日軍駐防軍司令部卻再也沒有來找過麻煩。他們改變了對蔣夢麟校長和他領導下的北京大學的策略，派來松室孝良將軍當日軍的特別代表。對蔣夢麟禮遇有加，甚至和他變成了私人朋友，經常到他家做客。蔣夢麟總結，“這就是日本人對付中國人的手段。程式大概是：先來一套甜言蜜語，繼之挑撥離間，然後威脅恫嚇，接著又是甜言蜜語，最後施行閃電攻擊。先後次序可能有所改變，但是從來不離征服中國的基本方針。”[2]

蔣夢麟在北京大學校長任上一直堅持到 1937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當時，他正在廬山參加蔣委員長召集的與著名知識份子共商軍國大事的會議。在會議過後，與幾位朋友飛到南京，想立即乘津浦線列車趕返北平，繼續領導北大校務。但是抗日戰爭的第二階段——全中國的全面抗戰已經展開，北上的火車全部停開。他沒能回到北平，卻開始了籌辦在長沙成立北方三名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的聯合大學的新工作。

參考文獻

[1] 辛灝年：《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黃花崗》第十四期，2005 年

[2] 蔣夢麟：《西潮》，磨劍堂出版，1960 年

[3] 孟玉：《一本值得閱讀的書——西潮》，《函校通訊·新書評介》，1960 年 4 月 1 日



寬鬆時期的成就

王希聖傳記：第五部

上海的回城風

一九七八年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走向開放與寬鬆的轉捩點，會議公報否定了華國鋒的“凡是”派路線，華的權力，也由鄧小平取而代之。可是在人們的心目中，胡耀邦卻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寬鬆的表現首先在“西單民主牆”打開一個缺口，為言論自由爭得了方寸之地。

追敘西單民主牆的興起，經歷了曲折和有趣的鬥爭，不妨說，是汪東興催生了“民主牆”。“四人幫”扼殺了團中央辦的《中國青年》月刊，“四人幫”粉碎後，《中國青年》有理由復刊，該刊編輯人員都是胡耀邦的部下，並參加了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第一期刊出了“天安門詩抄”，汪東興文化不高，在他那裏收容了為四人幫服務的筆桿子，其中有人將復刊第一期的《中國青年》送到汪東興那裏，他下令禁止該刊的發行。編輯人員就用化整為零打遊擊戰方式，將第一期《中國青年》拆開張貼在首都西單牆上，“西單民主牆”就這樣誕生了。胡耀邦卻支持民主牆，設法將民主牆上討論的重大問題反映到中央工作會議上來。民眾就這一事件張貼大字報批評汪東興無權干涉言論自由，這時批汪的大字報已不限於西單，而且向其他街道擴展。大字報所涉及的問題，如要求平反冤錯假案，不管是不是反毛；更大膽地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

西單民主牆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直至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張貼矛頭針對鄧小平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和“第五個現代化”，正好與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唱對台戲。不僅扼殺了可憐的西單牆方寸自由之角，而且把魏京生重判十五年。鄧小平一朝權在手，第一個動作便是製造冤錯假案。胡耀邦面

對鄧、汪聯合把西單民主牆扼殺的行徑，束手無策。彭真跳過胡耀邦，將起訴魏京生犯有洩密罪的判決書直接交給鄧小平，等到胡耀邦想插手干預，冤案已成定局。所謂“洩密罪”也很離奇，判決書上預先造了謠，說魏京生講過越南戰場上中方指揮官的姓名。此事報紙早就揭曉，何來洩密？從此司法部門給持不同政見者定罪，大多襲用“洩密罪”。

北方的民主牆事件擴散到上海，南京，慢了一個季度。上海響應西單民主牆，在淮海中路，人民廣場南京路一面的大樓，貼出了長幅的大字報，第一回合的語句比起魏京生的幾張還要激烈，我趕熱鬧前往觀看，至今尚有印象的大字報，是在淮海中路中百二店對面。

“毛澤東不是神，是人”！

“四人幫倒了謹防新的四人幫重來”！

三年以前，黨中央號召大城市青年支持邊疆經濟建設，分配上海人前往的是雲南、青海和新疆三省，由於近年來黨的政策表現了寬鬆的氣象，所有支邊青年再也忍不住了，便成群結隊回到生活過的城市。帶頭發動第一波回城風的，便是上海的青年們。

當第一批回城青年達到了目的，第二天便前往上海。在市委所在地康平路，聚集約兩萬餘的人群，真叫做波瀾壯闊。

這場運動與八九天安門的群眾運動有相似之處，它是自發的，支邊青年皆從新疆、雲南省回來，所以又是集中而有秩序，市委領導找不到什麼藉口動武鎮壓；不同之處，回城風只有一項要求：准予邊疆回歸故鄉的中青年落實戶口。

讀者有所不知，中共對城市戶口的管制極端嚴格，幾乎到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步。敢於衝擊城市戶口制度，首先發難的就是上海人。參與回城鬥爭的還有支邊青年的家長們，他們向聚集在馬路邊上的群眾宣稱：當年街道幹部如何用車輪戰逼迫子女非支邊不可；有的則用威脅的手段，如果不鼓勵子女支持新疆，就要敲掉家長的飯碗。我聽過白髮老人在馬路邊聲淚俱下的控訴，才知道所謂“車輪戰”，是發動老頭老媽一批一批輪流到某人家中，如家長點頭，當場畫押，並通知派出所今後不得將其子女列入城市，於是這家門口便貼上“光榮人家”的告示，車輪戰的部

隊才停止戰鬥。有一位老人發狠地說：派出所和里弄幹部要的是無賴手段！不過只有極少數家長被迫上鉤。

三天以後，集合在康平路上的回城青年人已有五萬七千餘了。並且選派出代表應雄耀、喬中林等五人，提出了要和市委領導人對話的要求，在被迫之下，上海市委只得低頭，恢復支邊青年原有的城市戶口；只有一條例外：男、女青年已和當地的對象結婚者，遷出的戶口不能恢復。

這場回城風的鬥爭以完全勝利告終！勝利的喜訊傳至四面八方，當年奔赴青海、甘肅、新疆等處的支邊青年乘著勝利的東風紛紛趕回上海。這幾個地方加起來的人數在十五萬人以上。“回城風”的勝利引起的連鎖反應，幾乎是在全國範圍衝擊了城市戶口制度。

從此，城鄉男女婚姻制度自動取消；農民進城做買賣，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對付員警的干預。

“回城風”的鬥爭，還有一個特點，新疆回歸的上海青年，大多是高小、初中文化程度，他們從小出了遠門，生活閱歷比較豐富，正如毛澤東所說：“社會是很好的大學校”，生活的艱苦鍛煉出不屈不撓和近乎狡獪的性格，比如說，“回城風”的鬥爭沒有知名的領袖，他們學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也用車輪戰術與市委領導軟磨硬撐。上述王輔臣、傅申奇、張先樑等，開始似乎沒有什麼，但他們的命運並不美妙，沒多久當他們回應西單民主牆，到街頭貼大字報，就遭到逮捕。

在以後的捉捉放放中，這幾位久經考驗的民運戰士表現出堅定和圓滑，始終不改初衷，他們於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與我協力同心，發起成立“中國人權協會”，（最初命名“中國人權研討會”）我本人任顧問，主要骨幹王輔臣、張惠康、傅申奇、溫定凱、喬中林、龔星南等。公然面呈市府民政局，要求登記註冊。民政局並未拒絕，只是說：按規定社會團體必須與某個單位掛鉤，事實上所有的官方機構見到“人權”就怕，誰也不肯與這樣的社團沾邊。“人權協會”每週在復興公園舉行座談，公安人員站得遠遠的，用攝像機拍下在座的英雄好漢。在座的神態自如，只當沒這回事，引得公園的遊客們向他們伸出大拇指。

“中國人權協會”也引起了黨中央領導人的注意，鄧小平就在八七年底的一次報告中曾提及：“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中間有的人要求到外國去‘政治避難’，有的甚至秘密同蔣特機機構發生關係，策劃破壞活動”。（引自《鄧小平文選》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按最後一句看來，他又在捏造虛假的罪名，準備採取鎮壓手段，只過了半個月，即有喬中林、李慶榮、應雄耀、董紹平、王輔臣和傅申奇等被捕。

胡耀邦仗義執言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任命胡耀邦為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兼秘書長，意識形態領域出現比較開放寬鬆的局面。這種寬鬆在知識份子中間形成兩種反應：極左分子覺得這是個捲土重來的機會；民主派的知識份子認為根絕產生“四人幫”的社會基礎，必須進一步與極左思潮作鬥爭。前一階段極左思潮曾把華國鋒的“凡是”解釋成“反右”，如上海作協的劉金和唐鐵海一夥混淆“左”和“右”，表明極左思潮常常依附於“四人幫”，二者是形與影的關係。

一九七九年極左派的反撲先在文藝刊物上露頭，六月號《河北文學》刊出“歌德與缺德”一文，認為作家的任務是“歌頌現代中國人並無失學失業之憂，也無無食無衣之慮，日不怕盜賊行兇，夜不怕蒙面大漢上門。河水泱泱，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豔陽高照，當今世界上如此美好的社會主義為何不可‘歌’其‘德’”？誰指出社會主義有陰暗面者，就是“缺德”。

此人還以惡毒的語言辱罵揭露林彪、四人幫種種惡行的文藝是“善於在陰濕的血污中間腥的動物只能詛咒紅日”，後面一句是罵反對紅太陽毛主席者是動物。明顯露出此人原是四人幫的僕從、餘孽！

我立即撰文進行反擊，題為“春天裏的一股冷風”（1979年7月20日《光明日報》、同月30日《人民日報》轉載），以下簡稱“冷風”。

由於《人民日報》轉載，“冷風”的作用非同小可，各省市黨報紛紛轉載，幾個省的作家協會、文聯發表書面談話，聲討“歌德派”，“歌德派文學”在文化界成了流行的貶詞。

這一下嚇壞了極左派頭頭胡喬木，他不便正面反撲，而是運用組織力量，打電話通知各省市文宣部門不要一哄而起，不要趕浪潮，對“冷風”卻沒有半句肯定。《河北文學》主編田間對“冷風”一文也不以為然，乃寫信給胡耀邦，信中指責王若望的文風太刻薄了，不注意文藝界的團結。胡在百忙中邀請田間和編輯——即“歌德”的作者赴京面談。

胡耀邦發話安撫田間和那位編輯，指出“冷風”還是符合大方向的。我從中宣部內部發行的《宣傳通訊》看過胡耀邦的談話摘要：

“王若望是我黨的老近衛軍戰士，他的批評失之於尖刻，你們不必計較，而《河北文學》的那篇文章是確實不符三中全會的大方向”。

那個時候，“老近衛軍戰士”的稱謂是很高的榮譽，當年列寧贊許功勳卓著的近衛軍戰士，就是這麼說的。本人不想借列寧和胡耀邦之光來炫耀自己，對誰也未透露過。直到十年以後胡耀邦逝世，適值《百姓》的主編陸鏗兄來訪，我才跟他講了胡耀邦的談話。我說：當年由胡耀邦跟《河北文學》編輯談話的那本《宣傳通訊》，上海地區的文教幹部沒有看到，原來是陳沂部長做了小動作，因為我在四屆全國文代會上公開批評他“左”得離奇，他對我心存報復，竟將耀邦稱讚我的那期《宣傳通訊》扣留不發。感謝安徽宣傳部長贈給了我一本，使我知道耀邦講話的原文。

從這件小動作上暴露出這位陳沂是小人肚皮雞肚腸，他想一手遮天，結果是自欺欺人。

《紅旗》論壇第一篇

一九七九年是我多產的一年，“冷風”引起國人和耀邦的注目，刺激著我旺盛的創作欲，大有“語不驚人誓不休”的雄心。

如果說“冷風”是針對一個刊物，一篇文章，往下要批判的便是黨中央的文藝領導。

接下來的一篇題為：“談文藝的無為而治”發表於九月號的《紅旗》上（以下簡稱“紅無為”）。

《紅旗》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這就提高了它的身價。“紅無爲”敢於批判《文藝座談會的講話》，而此文歷來認爲是老毛的經典文獻。此文一開頭對“文藝講話”強調作家世界觀的改造，似乎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就寫不出優秀的文藝作品，“紅無爲”提出相反的論點：“文藝工作者改造世界觀，往往是通過自己深入群眾的體驗，藝術的感染，榜樣的示範等途徑逐步實現，並由此獲得創作的題材和靈感。而那種採取行政手段把作家趕下鄉，開學習會討論，或採取批鬥方式，送幹校勞動之類，都不會收到什麼好效果”。並批判了“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之類“無法分工的分工”等荒唐的領導方法。往下，羅列了所謂黨領導文藝，其實是外行領導內行，給予作家開出“不”字當頭的許多條戒律，計有“英雄人物不能寫缺點和動搖；寫愛情就是小資產階級請調；英雄人物不能失敗，也不能死，死了就是悲觀失望；用兒童的心理和語氣寫少兒讀物，就是資產階級童心理論；暴露我們工作中的毛病就是攻擊社會主義；中間人物不能寫；歷史上黨的錯誤路線碰不得；代表這個錯誤路線的人物寫不得；悲劇、諷刺劇要不得……”

《紅旗》犯下的錯誤驚動了黨中央，《紅旗》主編熊復請示胡耀邦如何善後，胡看了我的那篇“紅無爲”，據說提了幾條意見：“不必公開批評，不要作者檢討，《紅旗》是我黨的機關刊物，由黨中央的機關報認錯沒有先例，影響也不好。作爲一家爭鳴，讓他去‘鳴’，好在問題不大”。

耀邦並未指出一家之“鳴”錯在哪里，熊復感謝胡耀邦衛護了《紅旗》的面子，他當然照辦，只是把向我約稿的柯藍作了替罪羊，株連他丟了飯碗。

冤家路窄

陳沂原是軍委文化部長，下面兩個副部長，一位叫劉白羽，另一位叫魏巍，三個“左”王組成的領導班子鬧不團結，據說副部長劉和魏拿得出響噹噹的作品，魏有一個記述長征的劇本，劉有幾篇歌頌內戰的小說，而陳部長卻沒有一篇文藝作品發表。

部長受到兩個副部長的排擠，這種情況在軍內並不稀奇，幾十年來，軍隊是個獨立王國，外來幹部等於異己分子，只有個別忍氣吞聲的外來戶才能混得下去。

陳沂把自己的苦惱向胡耀邦報告，他想離開文化部，至於受排擠的內情他沒有說。胡耀邦是個好好先生，他提出：中央的部長不當，當市里的部長，行不行？陳沂問：是哪個市？當他明白是上海市，便覺得挺好。胡耀邦只注意陳的級別是軍委文化部長，他可不知道，把一個“左”王派到上海領導意識形態，其後果比軍隊左了一大片要嚴重得多。

陳沂從出發前電告吳強和我到機場迎接，承他看得起我，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四十年間相互碰撞，想不到又在上海相逢！

陳沂剛上任不久，按理應會見文教、宣傳、衛生部門的專家和領導，他把這樣的會見改爲大家聚集在“文化廣場”聽大報告，簡單省事做到了，卻把與各條戰線的領導與專家瞭解下情和親切交談的機會錯過，勢必成爲首長教誨，居高臨下的格局。這且不去說它，他在台上所講的內容令人大爲洩氣，我是聽眾，他忽然講到白樺的“苦戀”是不愛國的，將軍們和耀邦同志很有意見；他還說，市委宣傳部就是要強調思想改造，就是要捍衛社會主義……。我在台下替他捏一把冷汗。他的大報告在技術上也很差勁，講得重複，冗長，教條，枯燥，言談之間聽得出此人淺薄，不學無術，人們擔心他怎麼擔當得起宣傳部長的重任。

在這以前，我的黨籍已恢復，重新回到《上海文學》任副主編，領導我的是老成持重的鍾望陽，爲著發稿用與不用，難免發生衝突，我信任陳沂，在相持不決的情況下，有時把可用的稿件請部長作最後決定。爲著一篇很精彩的作品，被鍾排斥，我告到部長那裏，陳沂沒空看，我並不怪他，可是他同樣否定了這篇佳作。我相當惱火地當面批評了他，沒想到在一次宣傳工作會議上，參加會議者大多是各區宣傳幹部，他舉王若望的例子，批評我自作主張，黨性不強。

這一場衝突，我沒有感到有什麼差錯，退一步說我真有錯誤，應當當面提出，趁我缺席而大扣帽子，豈不是一種缺席裁判？這一年正好在北京開四屆文代會，出席會議的作家名單，須經市委宣傳部審核，這樣的手續體現了黨領導一切，民間團體沒有任何獨立性可言，部長陳沂發現上面有王若望的名字，本打算將王若望刷掉，後來還是保留。

我在赴京路上就設想了爭取公開發言的機會，這次文代會由胡啓立代表中央致詞，他的祝詞強調創作自由不容侵犯，如有誰干涉作家創作自由，可以向全國文聯、作協或中宣部提出申訴。這對我的公開發言又是一種鼓勵。文代會的程式中有一項各地代表自由發言——以前文代會以及其他會議，從未有過，“自由發言”一項，實因“自由”二字是中共的禁忌，四屆文代會實屬“首創”。

我代表上海作家發言，前半段熱烈擁護胡啓立承諾創作自由，接著舉上海宣傳部長為例，批評他便是窒息文藝的領導人，至今記得我還舉出若干事實：話劇“布穀鳥叫了”，“洞簫橫吹”以及白樺的“苦戀”等，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涉，有的禁演。黨中央的文藝政策已經公佈了，傳達到下邊如果頂著不執行，你們說怎麼辦呀？我和陳部長的友情已有半個世紀，曾當面對他提出忠告，他不願接受，反而干涉的情況多起來了。我們的宣傳部長還在繼續犯錯呢。最後，我又回到胡啓立的祝詞，我說：“真正兌現創作自由，不要怕得罪領導，胡啓立授予作家們有權上告，今天我的自由發言就是第二次使用上告的權利唔！”

我的這次發言，會場上激起多次鼓掌。

回到上海，便碰上陳沂軟硬兼施對付王某的動作，他找我去談話，當然沒有好面孔，陳要我承認我是一種報復心理，還要我發表文章，挽回在文代會上肆意攻擊陳的影響。

我說：話都講出去了，如何挽回？如要我發表文章，我或許有更多事實證明我的發言並非惡意攻擊，報復心理或許有，先是在宣傳工作會議上，你點了我的名，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上，雙方是平等的，你既然點我的名，我也可以在你缺席的情況下指出部長的缺點，高明的領導人聞過則喜，不高明的領導人才會指我是報復。

陳想不出反駁之詞，一時語塞。我動之以情誠懇勸說他珍惜我們之間已有五十多年的友誼：想當初你通知吳強和我到機場接你。我和文藝界的同志對你抱著多高的期望，你也以為上海有兩名老朋友可以更好地協助你的工作。想不到會有今天這樣的對立。

我進一步說：“你不妨反思一下，你剛到上海，下車伊始，第一次在文化廣場跟上千名專家和領導見

面，你輕率地把幾位有成就的知名作家批了一通，完全是從極左的角度做的大報告，人們挖苦這是新官上任放的第一把火。我曾通過馬楠同志（陳的妻子）反映一些作家對你的粗暴作風有意見，我的用心良苦，卻換回了你如此恨我，難道這是我的責任！”

陳沂只能列入“不高明”的領導人之類，對我的推心置腹的進言依然無動於衷，上一節曾講到他扣留內部刊物《宣傳通訊》，因為那上面刊有耀邦稱讚王若望的話，他就全部扣發，借機報復。如果通過這次交談，他表示願意改進的話，彌合我們之間相當緊張的關係還是做得到的，可惜他始終耿耿於懷。他在六年後寫的一篇文章——副標題為：“從王若望被開除黨籍談起”一文中，曾這樣講到這次交談：“我萬萬沒有想到，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王若望針對我作了不實事求是、不與人為善的發言。這個發言，不僅在上海幾百人的代表團中造成不良影響，也在全國文藝界造成不好的影響。回到上海後，我向市委作了彙報，但我們並沒有對王若望進行公開批評。我只是個別找他談話，指出他的錯誤，對他進行了批評。最後問他：“你這樣做，考慮後果沒有”？他說：“沒有”。（參看《自傳》二卷附錄422頁）。上述引文提到“我們並沒有對王若望進行公開批評”，從這句話裏，可見市委並不同意他準備嚴懲王若望的意見。

陳沂部長手中有權，他怎肯善罷甘休，於是又想千方設法把我調離《上海文學》編輯部，這麼做未免太露骨了，便轉了個彎調我到黨校去學習。我剛剛恢復黨籍，既然他用冠冕堂皇的名義調我去黨校學習，不服從也不行。

進黨校受洗

我歷史上兩次被開除黨籍，兩次進黨校進修，記得一九四三年我頭一次進入山東分局黨校，因我得了個“山東王實味”的美名，分局組織部長李林同意調我至黨校，那時我對李林部長的決定，感情上並不抵觸，不像第二次進黨校那麼勉強。記得老根據地流行兩句順口溜：“叫你洗澡，請入黨校”。“洗澡”在這裏不是真的洗澡，指的是思想改造，或者像天主教徒受洗，這兩句口訣說明進入黨校的學生多半犯了這樣那樣的錯誤。結合我的遭遇，當時覺著到那裏洗掉

“山東王實味”的美名，洗得乾乾淨淨，一舉兩得，所以我第一次進黨校的心情是愉快而滿意的。

第二次進黨校，同樣也有洗去思想上污垢的含義，在陳沂眼裏，王某喜歡“抗上”的污垢夠嚴重的。我心裏明白，進黨校不過是一種過渡，他的計謀最終是撤掉我的《上海文學》副主編職務。

在這段時間裏我開始注意喜鵲的生活，黨校設在郊區，觀察喜鵲比較方便，引起對喜鵲的研究，多半是法國昆蟲學家法布林著的《昆蟲記》使我對動物發生了興趣。七年後我寫成《喜鵲王》的科學小品，是我進黨校的“博士論文”，也是意外收穫。我還寫了“上海一霸”，評論上海市委書記，一手提拔四人幫的柯慶施罪惡的一生。（發表於一九八零年《民主與法制》）。

我的處世哲學：自我感覺良好。儘管有權的人左右逢源，背後捉弄我，打擊我，我處之泰然，自求多福。

既然來黨校的同學大多是犯了這樣那樣的差錯，得罪了上級，他們的自由化思想比較嚴重，與我可算是臭味相投，這就使我聯想起當年在“五七幹校”中的一段自由開放的生活，在這裏，我悄悄地做了兩件有意義的事：一是記下各人受打擊遭迫害的經歷；二是出了幾個問卷調查，請求同學寫下自己對某些現實問題的意見。

學習結束時，我的調查研究贏得了雙豐收，兩本筆記本記得滿滿的，可惜這兩大豐碩成果在一九八七年抄家中被公安人員抄去。好在我用拉丁字編碼記下各人的名字，沒有株連同學。此處只能以苦思冥想記下問卷答案的幹部思想調查：

（一）最不滿領導體制中的何人何事？（二）何項制度？（三）有哪幾件好人好事過硬的？大多數答卷：

（一）政治部主任，黨委書記，組織部長，人事處長；（二）開會忙，向党交心，公車、房屋、補貼上的等級森嚴，不斷搞政治運動，報表弄虛作假，黨委干涉個人婚姻自由……；（三）最不過硬的是學雷鋒，學大寨，學焦裕祿，學楊懷遠，好人好事大多是弄虛作假，吹肥皂泡吹出來的。少數答案比上述答案更徹底，報上大字標題表揚的模範人物，沒一個經得起考驗，標題越大越不可信，那個單位挑選的模範人物，本單位的群眾最討厭。

關於拉丁字密碼速記法，我是在一九三五年漕河涇獄中發明出來的，這裏順便補敘一下：原是爲了寫作安全，用密碼寫下禁忌的雜文或通信中防止官方偷檢而製作。當時，除了羊子能解讀，無人知道底牌。直至一九七八年，有一位中國通美國人林培瑞先生，漢語已到了能說相聲的水平，我曾教他自編的“拉丁密碼速記法”，林教授一學就會，當場使用密碼與我筆談。這並不是他特別聰明，實因這個速記簡單易學（林教授曾于一九八七年協助方勵之進入美國大使館），讀者如有興趣學習，參看附錄（四）中文，代數公式對照例句即可。

自羊子的媽媽介紹羊子與我認識，在定情後整整蹉跎了十二個年頭，即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九年，起初是摘了右派帽子，頭上還有一頂現行反革命，後面這頂帽子壓得我好苦，直至一九七八年年底才宣告廢除，幾乎同時，原有的右派帽子，由上海市委公佈的二十四位著名的右派，由廣播電台宣告右派“改正”，其中王若望排行“改正”名列第四。

這可以說是雙喜臨門，我和羊子的愛情延續了十二年，也應該到了劃句號的時候（有關詳情，請閱當時轟動全國的、由上海夏晝先生主編的《青年一代》一九八五年第一期“第二次結婚”）。

新婚之後，羊子趕回湖南株洲田心機車車輛廠上班，正如杜甫“新婚別”中所說：“暮婚晨告別，無奈太匆忙”，我捨不得離開她，半年後就去株洲探親。我利用那個簡陋而又甜蜜的小屋，寫出了《饑餓三部曲》（發表在一九八零年第一期《收穫》，後編入港版《王若望選集》，並有美國駱基南（Kyna Rybin）女士譯成英文，由倫敦、紐約同時出版。）

這篇報告文學引起了文化界普遍的重視，（《收穫》又增印三版發行三十四萬冊）。讀者認爲是寫出了中共治下黑暗生活的第一個作品，系“大牆文學”的開山之作。

不過，當時的中宣部長王任重看了並不滿意，他通過黨組織作了口頭指示：不介紹，不擴散，不轉載，“三箭齊發”。中宣部內的朋友告訴我：部長看過饑餓三部曲，他批評作者將國民黨的監獄與我們的監獄作對比，讓讀者覺得共產黨監獄的黑暗還超過國民黨。造成的影響極壞。

我在一篇雜文中批評“朱子家訓”，宣示我的治家格言：“長幼平等，民主治家，婚姻自主，睦鄰友好”。

我跟李明有七個子女，李明亡故，撫養孩子的重任就由做父親的一人承當。

我崇尚民主自由，總不能出門喊民主，關了門依然實行家長制。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從小就受到民主精神的薰陶。上述治家格言便是貫徹民主精神的身體力行，在舊家庭中，真要做到並不容易，比如說：不可打罵孩子，這是低一級的標準，高一點的要讓年輕一代敢於批評長輩，真正體現“長幼平等”，由於家長多次挨鬥，在學校裏黑五類的子女都抬不起頭，養成了挨打挨罵不還手的馴順的受氣包性格，我和李明真正做到了不打罵子女，只是要求他們敢於批評家長，很難做得到。

有一篇《談情趣》的短文中，我介紹自己如何跟孩子們一同戲耍，體現了“長幼平等”的家庭樂趣：“我寧願要童心，不要野心和小人之心。我有七個孩子，他們尚在幼年時，我愛跟他們一起跳採茶撲蝶舞，我手裏擎起紙做的蝴蝶，誘他們來撲打，這時，我完全忘卻了‘嚴父’的身份了。由童心發出來的情趣是最純潔而又有趣的”。（刊於一九八六年第四期《青年一代》，編入港版王若望雜文集《棱棱鳳骨》一三六頁）

封建味道濃厚的家庭，父母包辦兒女的婚姻，幾乎是歷史傳統賦予的特權，在前一節《林昭之死》中，曾提起社會上流行的兩句話：“遂使天下父母心，有女不嫁黑五郎”，是“門當戶對”的復活與延伸；林凡與徐建的婚姻悲劇，並非政府官員搞株連，倒是自己的媽媽破壞了這一對美滿姻緣，林凡的母親卻是五四運動獲得婚姻自由的過來人咧。

再舉我自家的例子：我的大兒子看中了近鄰高家的大姑娘，只因他的父親屬於黑五類，女方的母親百般阻撓，我的兒子差一點要跳樓。這時我不能再袖手旁觀，只得代兒子向高先生告急，高先生本人也因被“三五零辦公室”當作揚帆的同黨，吃盡苦頭，多虧他以感同身受的實例批駁“不嫁黑五郎”的政治標準第一，才使親家母回心轉意，終成眷屬。

對其他幾個孩子的婚事，同樣受著“有女不嫁黑五郎”的影響，他們可沒有老大那麼幸運，這種社會性的歧視，誰也沒法抗衡。必須等到父親頭上脫了帽

子，找到物件的喜訊紛至沓來，半年之內我家接連辦了三次婚禮，兩代新娘聚到一起的時候，相互解嘲曰：“遲到的愛情”。

雖則我無法抗衡社會性的“政治標準第一”，然婚姻自由的原則還是可以堅持的。在孩子們找物件的問題上，我只做一個觀潮派，成與敗考驗他們的能耐，自生自滅。只是在定情之後，讓他把確定關係的物件讓我看一下，我不加評語，完全尊重子女的選擇。聯想起我的妹妹對她子女的婚姻，一切都得聽她的，結果幾個兒媳，不是鬧離婚，就是躲在娘家去避難，我替她總結孩子們鬧婚變的教訓，說：“青年人自己找物件那麼專注，可以說全身心投入，她（他）所瞭解的愛人總比只見一面的老娘瞭解得全面和周密，戀愛自由產生良性反應，我家孩子就經得起時間考驗，不僅沒有鬧離婚，或接納第三者，連反目打架的事也沒發生。只有小兒子的婚姻偏離了中國傳統習俗，查明責任在女方，而小兒子至今還癡迷地愛她”。

此處再補敘“四人幫”的另一條罪行：在七四年九月，突然宣佈凍結五類分子的存款，只因我曾創作的兒童文學《阿福尋寶記》改編為電影；另有《無罪的女囚》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共得一萬七千元，還有一千五百元是羊子的存款，在活捉四人幫以後，如數發還，還加上兩千元的利息，分配使用也是通過民主方式：已婚子女兩人各得一千元，未婚子女五人各得三千元，這就給他們辦起結婚筵席來很有氣派了。在我的名下，只收利息就滿意了。

上海解決房子可不那麼容易，我採取的計策是迂回曲折，逐步佔有陣地。比如說，我從復興路遷出，房管所調撥萬體館對面的高樓房子，我提出以大換小，復興路的房子面積大，萬體館的面積小，希望考慮分兩套，房管所只得同意。我與羊子在萬體館大樓裏住了一年，又遷入香花橋路四層樓的一小套居住，萬體館的房子便讓給兩個兒子成家。

羊子對我們住房越住越小，毫無怨言，她也喜歡孩子們，誇獎他們的倫理道德水平是上好的。我多次搬家，意外的收穫也像我坐牢那樣換了好幾處，周遊列國結交了親如家人的鄰居，俗話說：遠親不如近鄰，直至我們來美國頭兩年，當年的鄰居還捎信來遙致問候。

大躍進中 到底死了多少人？

魏紫丹

我從前在國內時，在一份資料上看到，說是在高舉三面紅旗期間中國一共死了 4600 萬人。來到美國，大多說是 3000 萬。近來從互聯網上又看到，有人大罵 “3000 萬說”，說是當時中國有 6 億人；3000 萬將占到 1/20，那將是到處死熱成堆；如何`如何的不可設想！也有說死了 20 萬的。總的架式是，說死的 “少” 就是熱愛黨`維護黨，說死的 “多” 就是給黨的臉上抹黑，好像這成了主觀上擁共`反共，愛國`賣國，革命`反革命的分際，而毫無客觀根據的一筆歷史糊塗帳似的。

最近，中共官方解密了當時的檔案。不過資料不太完整：1959 年只有 17 個省級地區，60 年是 28 個省級地區，61 年`62 年是全國各地區的資料。我們可以根據這些資料作出科學的推算。下麵是解密檔案資料：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〇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長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長率為負百分之二點四；一九六〇年為負百分之四點七；一九六一年為負百分之五點二；一九六二年為負百分之三點八。

全國十二個縣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一百萬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肅省、貴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個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饑餓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點五。（摘選自 2005 年 11 月爭鳴雜誌）

總計死亡人數為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其中一九五九年少統計十二個省級地區，按當年的省級地區死人的平均數是三十萬七千人算，本年總計當為八百九十四萬四千人；同理，一九六〇年當為一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人。這樣算下來，全國總計的準確數目該是四千一百六十五萬五千人。

古稀抒懷

朱執中

臉憔悴不堪照病日連連 問其故藏深因古稀零始
憶此生讀書少根基淺薄 貶離京下邊陲口啞耳聾
大一統一個聲陷我政盲 說錯話做錯事老百姓漸

飄泊地處自由急究其源 退不休志不墮心懷故園
尋覓覓擴視野去吧盲從 面世事浩茫茫假話多多
按事實與之辯追求真相 立新願從零始哪懼艱辛

毛立國行共產選錯方向 標共和 不平等新壓倍增
騙民眾 謊言盛行不同 抗美帝護北韓美無侵意^註
徒犧牲 眾青壯損失慘重 悲神州政災頻國殤民損
滅私有 三紅旗後患無窮 大救星 何其有千萬冤魂
道新國 實鳥籠自由喪盡 沒人揭 不敢批謊言成真

說改革總設計新的偉大 究其實改謬政向民賠罪
道立功主為黨挽於危亡 經濟改 松民綁民生稍善
政治上頑不變一高一低 似跛鴨 政難新新弊叢叢

仁者憂義士憤奮而挺身 漂海外自由談掀起輿論
似立壁豎明鏡直照妖魔 求民主業艱辛須有梯隊
前者撲後者繼眾志成城 日為文夕創作日夜不分
跋涉難 積累多微染小恙 少動筆靜靜養康復再戰

註：據載，江青曾告某美國記者，中國志願軍在朝鮮犧牲 70 萬人，傷亡超 100 萬；美軍犧牲 3 萬多人。誰勝誰負，怎樣評價。

二零零五、二、二十四

抗日漫畫家

麥非的命運

——發自美國的報告——



八十九歲的麥非

辛 然

下篇

五、反美反蔣大功臣，天山腳下座上賓

上海虹橋機場的上空。

藍天之下，一架銀白色的飛機，正在漂浮的雲朵之間，攀升，攀升……

麥非帶著他的家人就坐在這架飛機上，此刻，正望著機窗外的藍天白雲，非但浮想聯翩，而且心潮起伏。

真是“新社會”啊！他不由感慨地想。要不，他怎麼能夠如此地幸運，如此地幸福，如此地受盡尊重，如此地前程似錦……他知道，等待著他的，雖有雪山美景，綠草牧羊，和金色沙海上叮叮當當的駝隊，還有維吾爾姑娘那浪漫的歌舞，可是，不也有八百里瀚海，茫茫的戈壁，和牛羊肉那令人難耐的腥羶嗎？這對於許多同他一樣生長在南國的人，或許只能令他們望而生畏，思而卻步，可對於他——名畫家麥非來說，卻像是天堂似的在吸引著他了！因為，他還夠年輕，還湧著一個藝術家滔滔的激情，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那一份感情……他已經不用想，就能夠知道自己又將會創作出幾多瑰麗的圖畫了！就不說請他進疆的，還是那位來自南泥灣的大名鼎鼎的將軍呢！當然，那個時候的麥非，還絕然地不會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將軍，可不是因為在南泥灣開荒抗日才出的名，而是因為在南泥灣大種鴉片準備內戰，才成了共產黨打天下的豪傑！

麥非望著機窗外的藍天白雲，一時間，心中不

覺生出一番得意又一番感慨來。是的，兩年前，如果中統不把通輯令送到台灣，如果他不是不得已才逃到了香港，那他還會有今日嗎？

……………

或許，真的是造化弄人。麥非，作為一位畫家，他在台灣畫自己的畫，畫台灣的山水美景，畫台灣的地靈人傑。他將自己對祖國寶島的愛，凝聚在他的筆端，猶如他曾將對倭寇的恨，展現在他的畫端一樣。再說，他本不是共產黨，對政治，既不懂多少，也不感興趣，他在青春時代對共產主義桃花源的那一點景仰，怕也因為人生閱歷的日漸豐富，和抗戰血火的熔煉，而漸漸地淡然下去了罷。在他那個時代，不是有一位偉人曾說過這樣幾句名言嗎？“一個人，三十歲前便要拒絕共產主義的誘惑，怕也不是一個好青年；倘使三十歲以後，還要為那個虛無縹渺的共產主義去拼命，怕就更是一個無知的庸人了……”而能夠讓三十歲以後的麥非在意的，珍惜的，怕就是那一番自由的生活，就是讓他永遠都能夠自由創作的生活了。而這，在 1945 年以後的台灣，恰恰是能夠讓他得到起碼的滿足的。更何況，那時的他，並非不知道，大陸上的內戰已經打得血肉橫飛，一個親身歷經過長期抗戰，一個曾在敵後出生入死的畫家，又怎麼能夠不珍惜“和平”？所以，如果在大陸的殘酷內戰中已將敗北的國民黨，不是因為心驚肉跳，而亟欲為自己保留一座能夠賴以重生的島嶼；如果國民黨不是因

爲被共產黨欺騙得過於刻骨銘心，神經已經被捉弄得過分地緊張；那麼，中統既沒有必要將對麥非的通輯令送到台北，麥非也同樣沒有必要非逃到香港不可。何況，麥非的此番逃亡，既使台灣從此少了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又使正在大陸節節敗退的國民黨，增加了一位文化上的勁敵。因爲，及時地逃到香港的麥非，轉眼之間，就被共產黨統戰了！因爲，麥非確有被統戰的思想和感情基礎，他心中那一塊殘存的共產主義桃花源，新添的那一番對國民黨的不滿甚至是痛恨，還有，就是那些曾跟他患有同樣時代病的“左派知識分子”們，就更是要讓他在香港“歸隊”。

麥非果然“歸隊”了。雖非必然、卻又是十分積極地“歸隊”了。

麥非還是因國民黨內友人的幫助，似乎也並沒有歷經何等的風險，便安然地逃到了香港。彼時的香港，正是所謂進步文化人，也就是左派文化人，或者說白了，乾脆便是還沒有“露出真相”的共產黨文化人，紛紛赴港開闢“反美反蔣第四條戰線”的大好地盤。以麥非在抗戰畫壇的成就和名氣，和他實際上曾工作在共產黨操縱的抗日漫畫隊的經歷，特別是他因爲遭遇國民黨中統追捕才從台灣逃到香港的“落難”歷史，使他立即就成了共產黨網羅的重要對象。1948年春天，麥非剛剛抵港，就被共產黨的統戰大報大公報聘爲特約政治漫畫作家，四九年春天，他甚至已經兼任共產黨的另一張統戰大報文匯報的美術主編。彼時，與他同時擔任文匯報各大欄目主編的，都是著名的共產黨文人學者：茅盾——文藝主編，千家駒、陶大鏞——經濟主編，翦伯贊——文史主編……。

這一張名單自然標明了麥非的身價，這一張名單也自然能讓麥非對共產黨鞠躬盡瘁；於是，這一張名單，自然也就煥發了麥非卓越的漫畫才能。彼時，在黨

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戰爭”摧枯拉朽的攻勢之下，在美帝國主義反動派已經被不需要它的毛澤東罵成爲“紙老虎”之後，特別是當國民黨反動派，在他們的眼睛裏，已經惶惶如喪家之犬的時後，爲了新中國，爲了社會主義，爲了使洋人的桃花源夢能夠在中國實現，在麥非的筆下，豈但是中國的蔣介石、李宗仁、孫科、陳誠、何應欽、閻錫山，具已成了歷史的無恥垃圾，而且連美國的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麥克阿瑟都成了歷史的可恨笑料。麥非，猶如創作他的抗日漫畫那樣，終於將自己的一懷才情，化成了對“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無窮憎惡，和對“美帝國主義以及一切反動派”



的無限嘲弄。他在這一時期的政治漫畫，何止像他後來懊惱時所說的那樣，“是爲中共打天下出過力”，它的作用可是了得！因爲，共產黨自己曾一再地承認，一是槍桿子，二是筆桿子，幹革命靠的就是這二桿子嘛！而筆桿子的卓越功能之一，就是欺騙，欺騙、再欺騙……在這個世界上，受過共產黨騙、上過共產黨當的人，包括大畫家麥非在內，真是“蠶不知其幾千萬落”也！而且，能夠騙得別人死心塌地地也幫著他騙，共產黨也實在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所以儘管麥非在彼時的香港，爲反蔣反美賣足了力氣，有力地配合了中共的“人

民解放戰爭”，但是，二十世紀初，在中共大陸出版的第一本中國現代漫畫史上，麥非爲共產黨打天下的功勞，卻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毫無蛛絲馬跡可以尋，而他的那些遠不及他的“無產階級畫友們”，卻一個個被捧得高高。原因，自然是說到底，麥非究竟只是個“階級異己分子”，只是個統戰對象，只需要暫時被利用利用而已！

然而，1950年夏天，當麥非一家五口應鴉片將軍王震的邀請進疆時，他可沒有這末想。在飛機上，面對著新中國的藍天白雲，他對“黨”，可是一往情深……因爲，黨把他當作民主進步人士接回了廣州，黨又因信任他，才讓他爲著名華僑辦的短命報紙擔保，擔保者必須是師級以上的高級幹部才行呢！雖然他遇事磋砣，常常因陰錯陽差而失去好的機運，但是，在解放後的廣州，它居然還是能夠做著香港共產黨報紙的名記者名畫家，靠稿酬吃飯。並且，未出一年，他就因無產階級畫友葉夫做了杭州美院的院長，而舉家去了西子湖畔。不久，只因斗大的字也識不得幾籮的“剃頭將軍”（王震因在新疆殺人太多——當然不是日寇，而得此名），就是“鴉片將軍”，又要附庸風雅，一心想網羅幾家名士到新疆去，麥非因爲動了心，而舉家受邀，又舉家被接到上海住在高級飯店的總統套房裏，當然，那時後，大約只能稱作“主席套房或領袖套房”罷。直到在那個還沒有幾個人能有命坐過飛機的時代，一家老小五口，都坐上飛機進疆了。這份光榮，到了今天，老麥非回憶起來，還都是有滋有味的。

六、風光猶如煙雲去，轉眼已是階下囚

飛機雖然能夠帶你上天，卻也還是要帶你落地。待到麥非真的落到了新疆的大地上時，除掉“王鬍子”親自到他家裏做了一次客，使得麥非一家歡喜不盡以外，就是他畢竟以自己的才華還了王鬍子的情，他赴克拉瑪依油田畫了一幅巨幅水彩，歌頌了油田那一片建設社會主義的美好景象。這幅畫至今仍然藏身在北京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裏，大約就算是共產黨對麥非的最大恩惠了吧。

麥非在新疆的大地上，就這樣地得意了幾天，然後便被送去參見土改了。從此，他便開始從地上往地下蹭去了。但好在開始，麥非也真是一心在革命，也一心

想革命，不好名，也不要利，所以，當新疆軍區只把他這位被王司令請來的大畫家，當作沒有革命歷史的新參軍畫家，竟只給了他一個正營級的官階時，他倒是毫不在意，在他，反正能夠畫畫就是，管他什麼級不級的呢！再到後來，當他被送到鄉下參加土改工作隊時，他又從營級被降到了連級，他還是不在意，反正他還是土改工作隊的副隊長嘛，黨還是信任我的！直到有一天，爲了一個在他看來不夠劃地主的農民，給他帶來了麻煩時，他也還是感到，那個共產黨的土改隊長“水平太低”了些。但是，那水平太低了些的隊長，卻對他這水平夠高的大畫家，提高了階級鬥爭的警惕性——你麥非畢竟在國民黨的漫畫隊裏面幹過，甚至還到過反動派盤踞的台灣，父母又在世界反動派的老巢——美國，你自己如今還要爲地主老財反動地主階級說話……？！

此後，麥非便莫名其妙地被召到北京農墾部報到，卻不知何去何從。這個時候，當他請求見一見部長大人王鬍子時，鴉片將軍已經不待見他了。

此後，麥非很快就被農墾部下放到了廣西農墾廳，轉臉又就被下放到了桂林一個農場，緊接著又被分配到臨桂縣文化館當了一名打雜的幹事。

麥非，這個曾被共產黨從香港請回來的“反美反蔣大英雄”，這個又曾被剃頭將軍王鬍子請到新疆當過座上賓的大畫家，如今雖然已經落魄到了這步田地，共產黨還是不想放過他。待他熬到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時，麥非終於被不清不白地被抓了起來，然後又不清不白地被送到農場去“勞動教養”去了！這一教養，就是八年，抗戰不也才八年嗎？待他好不容易又熬過了這八年，當此時的麥非已決然不再是彼是的麥非，臉上已經爬滿愁苦的皺紋時，只因他是共產黨的階級敵人，黨爲了寬大他，就又將他遣返會鄉，讓他回自己的台山鄉下“修地球”——接受監督種田去了。對麥非，雖然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稀”，但是，就連兒童，也非但知道“客從何處來”，而且還知道他是一個要被自己監督改造的“階級敵人反動派”！

此時的麥非，除掉每天必須下田繼續接受勞動改造以外，他的精神生活，卻只剩下了兩樣。

第一樣，就是一閉上眼睛，他就去數落那些同他一樣，也做過反美反蔣大英雄的朋友們。這當中，有哪些早就當了大右派，勞教、勞改、自殺和家破人亡的，他便藉他們來安慰自己。尤其是只要他一想到翦伯

贊，這個在香港曾與自己平起平坐的大歷史學家，居然就在文革一開始就死於非命，他便禁不住會暗自慶幸。他畢竟還活在生他養他的台山故鄉——他的心裏面就要好過得多了……

另一樣，就是在他已經喪失了畫畫的起碼條件之後，他每天在農田水邊的勞作，竟然使他對水塘裏的活蝦，產生了若大的興趣。他憑著一個藝術家的敏感，居然一心鑽進了河蝦的天地裏面，在幾乎已經喪失了做人的全部自由之後，卻在河塘裏的群蝦中，獲得了另一種精神甚至是美感的自由……在那些天天都有人在造反革命、批判鬥爭、保衛紅太陽的日子裏，他幾乎每天都要蹬在河塘邊上，與自由快樂的蝦子們一起敖游在它們的世界裏，而忘卻了自己身處的非人世界……直到有一天，當他陡然發現了蝦子的秘密，發現那個畫蝦子的大師居然將蝦子畫錯了時，他心裏居然惡作劇似地顫抖起來了！他猛地站起身來，卻又倏然扒下身去，幾乎就要將鼻子浸到了水塘裏面，用眼睛左右前後地梭巡著，直到他盯得眼睛發直、發痛了，他才陡地站起身來，欣喜若狂地奔回家去，卻又呆立在徒有四壁的家中，“無筆四顧心茫然”……

他忘記自己早已被剝奪了作畫的權利，忘記他不再是一個大畫家，即便是他曾創作抗日漫畫而贏得過歷史的光榮，如今，也因為他早已是共產黨的階下囚，而被掩盡了起碼的光彩。就像曾為抗日勝利而流下了無量鮮血的數百萬國民黨將士，只因他們後來慘敗在共產黨奪取天下的內戰戰場上，於今，非但毫無光榮可言，甚至還要讓自己和家人子孫背負著“歷史反革命”的可怕包袱一樣——至於被當成“歷史反革命”而被共產黨所處決的千千萬萬抗日將士的冤魂，他們如今竟然只能成為麥非們在夜深人靜之時安慰自己痛苦靈魂的“工具”……

然而，在麥非就要枯竭的心靈中，畢竟還有著一顆未死的“畫魂”，而如今伴著他這顆畫魂的，就是那些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河塘裏的小蝦子們了……

可愛的小精靈們，終於成了畫家麥非無望生活裏的又一個夢。

七、美帝老虎今何在，六四之後畫真章

紐約的中央公園，是紐約人最愛的所在。在一排

排、一行行高樓大廈幾乎望穿雲天的曼哈頓，當年的淘金者們居然能夠不顧寸土寸金的地價，開闢出這樣一塊若大的公園，豈止是綠化了美麗的曼哈頓島，而且為這塊浸透了銅臭的商業之都，帶來了一塊猶如世外桃源般的優美境界。無論是紐約人，還是來自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遊客，他們都會來此一遊，在一叢叢綠樹托映著的高樓身影裏，或忘情在水邊花叢之間，或臨街眺望著第五大道華麗的街景，甚或還會在馬蹄的得得聲裏，望著遊覽馬車上各著異裝的他鄉遊人，而別添一番生活的情趣。

當然，這塊寶地，毫無例外地也吸引了麥非，吸引了他那一番藝術家的情懷。雖然，此時的麥非，已非當年那個在南國花都裏高喊著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年輕麥非了，當然就更不是那個曾在香港做過“反美反蔣大英雄”的革命畫家麥非同志了！此時的麥非，自然也不再是廣東台山鄉下那個天天都必須接受勞動改造的階級敵人……他，頭髮自然是更加的亂蓬蓬，還閃出了根根的銀絲；臉上卻閃現著紅泱泱的光澤，雖然一條條皺紋已經像刀刻下來的一樣。



滿街警察 十分自由

然而，他就是那個麥非，此刻正坐在紐約中央公園外面的人行道邊，靠近地鐵車站的進出口，爲一位長得頗有幾分姿色的歐洲女人畫像。他不時地要抬臉看那女人，卻對那女人臉上的嫣然一笑無動於衷。但他手中的碳筆，卻只在三下兩下之間，便將那線條勾勒出來，那個歐洲女人，便在他的畫紙上微妙微肖起來，唇邊的嫣然一笑似乎也更動人了些……



他一番！於是，在他的筆下，不見了蔣介石和杜魯門，現卻出現了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們……——麥非，把他們仨畫在一起，又添上了鄧小平、李鵬、楊尚昆這三個劊子手，用一個他自己起的名字——“批著革命外衣的惡魔”，將他們一溜兒釘到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然後，就像是出了一口冤氣，不，已經絕不是爲了他自己，不是。

他最新創作的漫畫，一出手，就在海外抗議中共大屠殺的隊伍裏，掀起了一片呼天喚地的吶喊聲；一上報，立即就爲各地抗議遊行隊伍所臨摹放大，被高舉在一支支隊伍的前面……威脅的電話又打來了，混進華僑隊伍裏的特務也開始誣衊他麥非才是中共的特務，要大家跟他劃清界限，可是畫家雷雨卻打電話給他，稱贊他才是一個真正的漫畫家！一個有良心、有思想、有藝術的中國漫畫家！

麥非的感慨是一言難盡的。他從畫抗日漫畫開始了畫家的人生，也因此而成名；又因風雲際會、命途坎坷，而成爲中共打天下的幫凶和功臣；他雖也曾短暫地做過中共的座上賓，卻轉眼之間，就成了中共的階下囚，和無數曾遭遇共產黨迫害的同胞一起，渡過了數十年非人的生活。於今，年屆“而稀”之年，卻能夠真正地拿起畫筆，爲自己，爲歷史，爲民族，也爲這個美好的大千世界，畫出幾幅人間的“真章”來，他的感慨，大約也是一般人所難以領略的。

是的，老當益壯的麥非，終於因八九年中共屠城，而完成了此生最後的覺醒，並重新拼殺在爲著自由和民主的戰場上了。當他終於在世界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舉辦起自己的個人畫展時，那洶湧的人群和太多的讚揚，將他感動得老淚連連。

是的，他沒有掩藏自己，沒有爲自己人生中的歧途作任何的遮掩，美國佬也像抗戰時期的國民黨一樣，更沒有來審查他那些曾把“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畫得又可恨又可怖的作品，而是將它們和今日麥非筆下的毛澤東、鄧小平們掛在一起，讓觀眾一起來沉思我們所經歷過的沉重歷史，一起來從歷史的欺騙和歷史的陰霾中覺醒過來，從“感慨人間多少痴”的喟然一聲長嘆裏，去尋找歷史和人間的真諦，去追尋自由和民主那至真至貴的價值……

年將八旬的麥非，你是否至少圓了你要作一個真漫畫家、好漫畫家的人生之夢呢？雖然這個夢裏，曾記

錄著太多的苦難生活，浸染著太多歷史的血影……

八、水墨贏得蝦王名，老來指點白石蝦

麥非當然沒有忘記他在故鄉魚塘邊上發現的秘密，更沒有因爲到了洋人的世界，就將他對中國蝦的深情執愛拋到爪哇國去。那些活蹦亂跳的小蝦子，在他被迫接受批判鬥爭和改造的歲月裏，在那個兩眼望不到一丁點光明的日子裏面，曾怎樣地陪伴過他的孤獨，更爲他在心裏保留下了藝術創作的靈感。這靈感，如若沒有它們，怕是真的早已被那個惡黨滅絕罄盡了。

老來的麥非，就因那些爲他所永不能忘懷的活蹦亂跳的小蝦們，又重新迸發出了他藝術創造的激情。好在他如今生活不愁，既積蓄著做街邊畫家時掙來的辛苦錢，又享受著美國政府按月給他的養老金和種種老人生活補貼，用一句中國的話來說，已然是“快活似神仙”了。而用他的話來說則是：“當年在香港真是把美國佬給畫慘了，沒有想到，老來卻領的是美國佬發給我的養老金，活得有滋有味的。”他和許多正在美國安度晚年的中國老人一樣，都在教訓他們的兒女時說：“誰最孝順，美國政府才最孝順！這才叫社會主義呢！”

他心無旁騖，把老來的全副精力都投入到畫水墨蝦的藝術創作中去了。好在他依然手不抖，臂不酸，照舊是一筆下來，那線條都不稍稍地顫抖一下……

他亦心有追求，只因他在家鄉的魚塘邊上早已經把蝦子研究得透了，所以，一旦揮筆畫起這些小精靈來，就像是自身也游入了水中一樣，與他們嬉鬧不捨，於是，小蝦子們，也就成了精靈，一個個將自己游到了他的畫紙上，與他老麥非溶成了一體……

他自然也還是心有不甘。因爲，他正是從生活之中，才發現了蝦的秘密，發現了畫蝦大師齊白石——這位被世人和黨人捧了一輩子的畫蝦大師，居然把蝦都畫錯了。用藝術界的行話來說，就是脫離了起碼的生活真實。因爲，凡魚塘河蝦，頭帶尾都是八節，蝦身六節，蝦頭蝦尾各一節，撥水翼五對，前舵兩片，觸鬚六根，蝦鉗長在前足之前，蝦節之下的撥水翼向後彎……然而，仔細觀察齊大師的蝦圖，其蝦身多爲五節，有些蝦還多長了一根前鬚，有些蝦的撥水翼竟然畫反了……，這就逾越了藝術誇張的尺度，從而脫離了藝術真實和生活真實的和諧標準。

也談《走向共和》

王伯年

麥非對蝦的發現，是長年累月觀察的結果，也是在那些不見天日的黑暗歲月裏，生活對他心靈的啓示。何況那曾是他唯一的快樂，唯一的生活感知和藝術感受，既維繫了他的生命，也為他的藝術生命留下了那一丁點火種——這才是麥非之觀蝦和畫蝦的大不同之處。

所以，麥非才不僅把魚塘河水裏的蝦子畫對了，更賦予了它們一身的精靈之氣，將它們在自己的世界裏面嬉鬧游玩的千姿百態，全都深深地映照在他自己的心靈裏面，然後才從心底將它們導引至他的筆下紙上。於是，墨非的蝦，才會活靈活現，活蹦亂跳，才會蕭灑風流，而不循規蹈矩，才會得人意而現物行……難怪他老來雖遠離故國，卻還是贏得了蝦王的美譽。因為，只需要將麥非的水墨蝦和齊大師的墨蝦圖一相對照，大師的那些永遠只朝著一個方向前進的活蝦們，就頗顯不出麥非蝦的那一股“游上潛下、東去西來”的精靈古怪之氣概了！

藝術來自生活。所以，它永遠需要的是活生生的感受，哪怕這活生生的感受，竟只是一種痛苦，一種難以忍受的人生之重。然而，一旦藝術被冠上了任何人間的名份，一種無形的拘謹，便會接踵而至，剩下的便只有循規蹈矩，雖然仍可以招搖，等待著的卻只能是藝術生命的窒息。

或許，麥非並非是要有意識地永遠保持住藝術創作的真“靈性”，但他作為一位抗日漫畫家的命運，作為一個當代中國畫家的命運，歷史和生活恰恰用磨難為他保留、也為他創造了這一份可貴的靈氣，因為他在藝術上的靈氣，是與他苦難的命運聲息相通的。這，可不是誰都可以擁有的。

結語

八十九歲的麥非老人站在美麗的異國校園裏面照了一張相片，我們凝視著老人安然的模樣，凝視著他依然富有激情的神采，還有臉上那種永遠也不會對生活撒謊的表情，我們還能夠說些什麼呢？也許我們的心底，只是在壓抑著這樣的一句話吧：啊，麥非老人，你要是能夠回到我們的中國，那該有多好！

可是，中國容得下你，容得下你的畫，容得下的你那些活蹦亂跳的小蝦子們嗎？

誰能夠回答我們？

看了辛灝年先生對電視劇《走向共和》的評介，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於是到市面上買了一套光盤，六張碟，共 59 集。連續看了幾個夜晚，僅看了九集，確實很受感動。劇中人物都是歷史上的真實存在，但與我們在傳統宣傳中所形成的印象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李鴻章、袁世凱、康有為、孫中山等。我對中國近現代史鮮少研究，所有的一點印象又都是來自共產黨教育方針指導下的課本，故看該劇有耳目一新之感。雖難作確定判斷，但不管怎麼樣，該劇把每個人物都演得有血有肉、有情有淚（辛灝年先生語），使你不能不為之震撼。

劇中的袁世凱，在我們的歷史課本中，是一個奸險小人，戊戌變法似乎就是因為他的兩面三刀而被葬送。可是，客觀地推究，還是辛灝年先生說的對：變法的失敗乃是一種必然。因為它所變的不是專制制度，故並未能真正推動社會前進。即使變法成功，也祇不過是變慈禧為光緒而已，並不是像日本或英國那樣，建立一個君主虛位的共和政體。因此，不能也不應該將變法的失敗歸咎於某一個人。

看清這一點非常重要，它不僅有助於我們釐清歷史發展的真實脈絡，亦有助於我們反思今天的現實。換句話說，換湯不換藥的變法，並不能挽救一個已走向末路的腐朽政權。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中，徐庶初見劉備時，曾自編了一段歌辭：「天地將沒兮，火欲殂。大廈將崩兮，一木難扶。」清廷的腐敗，既非康、梁等人所能挽救，也絕非袁世凱一人而能逼其退位。從另一方面講，袁世凱能周旋於當時已百孔千瘡的末世，如果沒有一點舊官場的歷練，恐怕連最基本的「生存權」都將難以維持（這裏並非為袁辯解）。

在劇中，李鴻章是以正面人物的形象來刻畫的。這一點與我們傳統的宣傳又恰好相反。在傳統的宣傳中，李鴻章這個名字，幾乎成了賣國賊的代名詞。而在劇中，作為一個舊官場中老練的官員，作為一個百孔千瘡行將倒塌的房屋“裱糊匠”，李給人的印象確實有「大廈將崩兮，一木難扶」的感覺。他的歷練，甚至連

慈禧這樣專橫的人物，都對他禮讓有加。可是，在他主持的談判中，卻又不得不簽訂了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究其根本，同樣也不能歸咎於某一個人。條約畢竟是事後的、紙面上的東西，真正導致喪權辱國的並不一定是條約的談判者，而是導致國家衰落的專制體制。辛灝年先生所說的「弱國無外交」，這乃是一條千真萬確的道理。試想，當今的美國，誰會異想天開地去要求它來割地賠款呢？兩次海灣戰爭，導致了薩達姆政權的解體，美國兵是開著坦克和飛機進入巴格達的。在國際舞台上，它的任何一位外交官，都不會有人敢對其藐視。在這種情況下，他絕對不可能背上喪權辱國的罪名。腐朽的政府，專制而又無能，祇會關起門來做皇帝。李鴻章縱有管、樂之才，也難有回天之術。所以，對於劇中的李鴻章形象，還是借用辛灝年先生的話來說，：「不是為其平反，而是還其歷史本來面目。」我們今天評價歷史人物，往往自以為是居高臨下，鮮能設身處地地去進行考察和研究，再加上某些人故意閉上眼睛，用所謂階級分析的方法胡批亂砍，把自己設想為所謂「最先進」的代表，殊不料自己早已落入後人評價的小丑之列，使自己臉上被貼上「羞恥」而字。與其口誅筆伐的歷史人物——如李鴻章——相比，更不知要渺小多少倍。

孫中山先生在劇中以極其平凡的面目出現，據說有人亦對此大感不快，認為是醜化了中山先生。我想，祇要是看過本劇的人，都會產生一種莫名其妙之感：哪裡醜化了中山先生？在該劇中，孫先生祇不過是太沒有架子，說話、做事和老百姓太接近了一點而已。所以，這個莫須有究竟是如何出來的，倒真的是使人有點莫名其妙。中山先生出現在該劇的開始，就已明確指出：要改變國家落後的命運，別無他選，祇有「走向共和」。我在觀看該劇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感受是心中突然地一熱，仿佛於黑夜中看到了光明的所在，知道了天亮的不遠，激動的眼淚立即充盈了眼眶。試想，以李鴻章的歷練，卻不得不接受外國列強的凌辱，牙打掉了往肚裏咽；憑康有為的博學，卻難有起死回生之術；而譚嗣同的慷慨激昂，亦無法挽回大廈將傾的頹勢。我們今天講起來，固然是輕飄飄的一句話，可是，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國人在當時，真是走投無路了啊！中山先生一句「走向共和」，確實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遺憾的是，在中山先生開創共和近一百年後，仍有人在中國搞獨裁專制。而且，這樣的人居然還能指責別人在醜化中山先

生！正因為他不能理解孫先生為什麼會受到人民由衷的愛戴；正因為他本人亦是專制制度的產物；正因為他自以為是地居高臨下，所以，他才根本不可能接受平民形象的領袖孫中山。反過來，他可能認為，劇中的孫中山沒有頤指氣使的氣派，沒有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權威，所以就不具有領袖的形象。殊不知，正是他自己在企圖醜化孫中山先生。他和孫先生可說是道不同，不相謀。和偉人相比，他祇能算是異類和小丑而已。

旋風讚

澳洲 古今

激情揚抑頌共和，聲音頓挫揭謊言；
風行美歐越大洋，精彩一路辛灝年。

縱橫東西列史實，往來資料陳來源；
踏破鐵鞋考真相，案頭證據有毛選！

共和之路本艱險，專制復辟非寡鮮；
妖共反逆惡滿盈，盜用共和謀私權。

馬列日寇侵中華，民國折腰蒙奇冤。
血寫事實撼人心，掌聲雷滾傳天邊！

縱有党棍再文革，奈何鬼魅已驢滇。
中華兒女立新志，重建共和祭先賢！

（網上詩選）



紀念詩人楊春光



東家房頂上的烏鴉

豺狼與狗和人

在一個豺狼統治人的年代
狗是最堅決反對豺狼統治的
可每當狗去咬狼的時候
人不是護住豺狼不讓狗咬
就是幫助狼狠狠打狗
美其名曰這叫好好教訓自己不聽話的狗

我問人為什麼這樣對待狗？

這時人非常理直氣壯地回答說
因為他已受豺狼統治習慣了
他就不再當狗的統治者了
雖然他知道狗的反抗是為了恢復人的統治
可是狗一時是打不過狼的
況且有的狗也不比統治者的狼好多少
有的狗餓急了連人屎都吃
人家狼現在是沒肉都不吃飯哩

我又進一步反問人
那你就甘心永遠被豺狼統治嗎？

這時人又長長歎了一口氣
好半天才說了點實話來——其實
他打心眼裏也不願意接受豺狼的統治
可人這個小胳膊腿怎能擰過狼的大腿呢
人已從大腿變為小胳膊了，何況狗乎？
如果狗再不知趣，那下場還不是被狼吃了
那樣也不是咱人想看到的結果
那樣最起碼使人失去了狗這位忠實的朋友
弄不好人的奴才沒有了，人就更加奴才化了
所以人正在想辦法和豺狼搞好這三者關係

想方設法保護好狗的存在，這才是根本

我聽了人的話，就不用再聽狼的話和狗的話了。

三個老鼠的圓桌對話

三個老鼠湊在圓桌上對話
一個老鼠說：這幾天我總不得勁兒
有好長時間不吃耗子藥了
二個老鼠說：這幾天我也總鬧中國心
有好長時間不去咱們老鼠夾子上走了
三個老鼠說：我這幾天就更寂寞了
因為好長時間沒操貓的B了

這時，圓桌女顧主給他們送來三件東西
第一件東西是一包耗子藥，第一老鼠吃了
吃完反倒沒死，它哈哈大笑：我說的沒假吧？
第二件東西是一副老鼠的夾子，第二老鼠去踩
結果那個夾子是一種仿真的肥皂泡，踩者無恙
它捧腹大笑曰：我說的當真了吧？
第三件東西是一個老母貓，第三老鼠拿過就操
那個老貓一個勁地發情說：好受！好受耶
原來那老母貓是裝好語言程序的電動機械貓
它更是得意地狂笑道：我說的確實好玩吧？

等三個老鼠撤離圓桌的時候
不僅沒付顧主一分錢
而且連三件東西都拿走了

原來，那個顧主是沒裝收錢和管物程序的
女機械人——而那個圓桌是這一切的採訪記者
最後圓桌在媒體上祇被批准講了一句主題之話：
這個年代，就是創造這樣的小人和君子——
都同樣好玩、好笑、好整的年代……

東家房頂上的烏鴉

從前有一個地球村
一個村祇有兩戶人家
村西頭叫西家

村東頭叫東家
這兩戶人家的草房頂上各站著一隻烏鴉
西家房頂上站著的是公烏鴉
東家房頂上站著的是母烏鴉
這兩隻烏鴉一天到晚亂喊亂叫，吵鬧不停
烏鴉喊什麼，叫什麼
人家就幹什麼，做什麼
喊你給他送水，人家就派人送水
叫你給它飲食，人家就挑人送米
喊你去種莊稼，你就去種莊稼
叫你去做飯，你就去做飯
喊你去睡覺，你就去睡覺
叫你上廁所，你就去上廁所
如果哪個人膽敢不聽
就立即吃了你的眼睛，挖了你的心
還說再不行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或粉了你的骨頭，揚了你的祖墳
所以，兩戶人家誰也不敢不聽
如此，日出日落，刀耕火播，臉朝黃土背朝它
春夏秋冬，循環反復，接受它的統治已成定規
稍有人自由的的時候，也祇是趁著這樣的間隙
即西邊的烏鴉跑到了東邊的烏鴉那頭做愛
或東邊的烏鴉跑到西邊的烏鴉那裏做愛
其餘時間就沒有人的任何選擇權利了

一年過去了
一輩兩輩還是如此
一天，來了一個海盜
這個海盜沒聽烏鴉那一套，祇顧我行我素
還把這一切不用懼怕烏鴉的決勝心理和想法
都教會了西家，然後就走了
西家的烏鴉當時就被海盜轟走了（跑去東家）
海盜走了，西家的烏鴉又飛回來了（氣勢洶洶）
這回西家團結一致，沒費力就又轟走了它
從此，西家再也不聽烏鴉的亂喊亂叫了
西家的日子越過越好，兒女雙全，子孫也滿堂
還把一間大草房翻蓋成一間大瓦房
不久一間大瓦房又翻蓋成一座大樓房

可從此，東家不僅加劇了兩隻烏鴉亂喊亂叫的

統治，而且那自由的間隙也幾乎沒有了
在生活上，東家越過越苦，窮得連稀飯祇有烏鴉喝了。東家孩子生出一大流，卻都穿不上布
那間大草房因沒錢修繕，就改成了一間小茅屋
孩子們成天到晚就住亂草垛，東家已風雨飄搖
後來烏鴉們沒辦法就批准了一項改革計劃
允許長大的男孩子們外出打工
這樣老大、老二、老三便離家出走了
老大、老二去了他村，杳無音訊
祇有老三冒險偷去西家，成了西家的上門婿

一天老三接到了烏鴉的批准
批准了他拖了三年才允許回家探親的申請
條件是：帶回的彩禮足以能蓋一棟大瓦房
烏鴉們也在老三探親期間收斂了吵嚷與干涉
老三趁機先是幫助父母蓋一間大瓦房
為東家添置了農耕所必需的工具與吃穿生活品
後是好生勸說父母兄弟姐妹們把烏鴉趕跑
可家裏哆哆嗦嗦不同意，更不敢去做
父母還把聲音壓得如蚊子似的怕烏鴉聽見地說
咱們不能那樣，那樣它們會重新跑回你們西家
那樣不就重新破壞了你們西家的好生活了嗎？
咱東家不是那樣壞下水的人！再說，也不能忘本，沒有烏鴉它們的批准，你能回家嗎，上哪去蓋新房、穿新衣、吃新米呢？
老三說，你們別怕，烏鴉不敢再去我們西家了
父母又說，那樣讓烏鴉沒處去這不是咱們對烏鴉的殘忍嗎，它們兩個打的天下而不能坐江山還行？這種天下不公，會引起老天爺發怒的
如果雷劈下來，最後倒楣的還是咱家
也一樣決及到你們西家，所以
咱們窮就窮吧，窮有窮的志氣
也不能窮得一是對不起烏鴉瞧得起咱家的善心
二是對不起你們西家苦海相救的良心
父母及家人的一片「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癡心之話
說得老三最後祇好哭笑不得地
準期回了西家

在老三走之後
東家房頂上的烏鴉叫得更歡了，嗓門更大了

兩隻烏鴉高高吹虛著蓋了新房的東家的優越性
東家人在底下也不斷捧場喝彩著他們自己的
今非昔比的有吃有穿的幸福新生活
如此這一切又都歸功於烏鴉的好領導
感謝烏鴉批准他們老三回來探親的好政策

打此以後，烏鴉的聲調越唱越高了
雜音越來越使西家睡不著覺，也長不好莊稼
西家就在自家樓頂上安了一個全能消音器
烏鴉又叫罵著這是西家干涉了東家內政了
東家人也跟著罵西家的人太缺德了
如此一來，東西兩家關係又一陣緊張起來
如今東家反西家的環境汙染新浪潮突破了冷戰。

碎 詩

聖 兆

晚間一切光芒隱落
我骨中的歌復活
四周飄滿神韻
我的一個神態在頃刻之間永恆
我的光芒伸向你
不容你向美後退半步
有一句話必須對你講
要很好地活 活出自己
滿地飄來淒涼
與你偉大的意念相斥
在白雪橫跨的大陸
固守這片林帶——
頌揚我骨中之魂……

1992/10/21



瀏陽故里杜鵑泣

謹以此文獻給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先生



陳 少 文

今天下午3點十分，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壯士的二位英雄余志堅和魯德成的妻子分別給我打來電話，其聲如杜鵑泣血，哀絕難鳴！

余志堅之妻，我稱其為阿桂，湖北人，大名舒桂，嫻慧文靜，對大事和小事皆處驚不變，擅長國文英語寫作，詩歌文章皆能。魯德成愛人之性格正如其名：夏玲成，玲瓏活潑不乏天真，其情其性則剛烈凜然。她們二位，自我出獄後，數次交往，給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電話打來的時候，夏玲成那玲瓏的聲音立即震響了我的客廳：“陳大哥，我的卡上沒錢了，請你打過來！”接著就攔了電話！我在來電顯示上查看了電話：0 7 3 1—3 6 3 0 8 4 7。我立馬打過去，却總是忙音，打了數遍，無法接通，出鬼了！

我把關了很久的手機打開了，等待他們的電話，過了很長的時間，我的電話又響了，號碼又換了新的：0 7 3 1—3 5 3 0 8 4 1。我有點納悶了，難道我們對付中共國安偵探的辦法，這些娘子們也學會了？

“陳大哥，請你用這個電話打我們，舒桂和我在一起！”

電話立即打通了，是阿桂接的電話。“大哥，余志堅被捕了，昨天發了正式的刑事拘留書。”聲聲泣，我沒有看到汨花，但我仿佛看到了那晶瑩的淚珠子在雨中發出的鏗鏘的聲音……

“大哥，我去看了他，但他們不讓我去見……”阿桂忽然停住了說話，我也無法猜測她在那邊的形容，但我却清楚地聽到了山林中那聲聲的杜鵑啼哭。大丈夫最聽不了女孩子的哭泣聲，或者說我的心底裏還殘留著女性那種多情善感的基因，我也在幾百里外陪著她流淚了。當然，我最會掩飾自己的表情，誰叫我是男子漢呢！

“陳大哥，真不好意思，讓您取笑了，昨天是志堅姐姐接的通知書，他們全家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對於我

來講，真的不好去面對這突然的事情！”是的，阿桂，孤身一個女人獨闖江湖，憑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與余志堅相識相知。儘管她們還處在相依為命的生存裏，沒有賞盡春花雪月，更沒有世俗的婚姻觀，却在當大事面臨時，其身份很是尷尬！

為避免觸及她那敏感的情絲，我打斷了她的話語，仔細地問了辦案單位的情況及涉及的罪名，並詢問了關在何處，在整個通話過程中，我腦海裏始終浮出一個高大英俊的漢子，耳裏充訴著一個磁性很強的聲音，那就是余志堅，我們的英雄！

我與余志堅最後見面是在冬雨紛紛的長沙，正月初九湖南省的民主精英聚會星城，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宴席裏，余志堅冷嘲熱諷地面對門口的國家安全局便衣，更激進地朝外面的警車揚起青筋暴烈的雙拳。正月初十，由我提議去岳麓山上為中華民族的大英雄們掃墓。在山上，余志堅一言不發，總是默默無聞地陪同我上山，在下山到岳麓書院時，湖南大學正門樹立的毛澤東那尊巨大的石像，立馬吸引了余志堅的目光，他拍了我的肩膀說：“這歷史的垃圾要有人來掃，可能又是我一個來肩負著這個重任罷！”

夏玲成一直在旁邊，但我絲毫沒有感覺她的存在；阿桂在泣血中，我也忘記向這位英雄的夫人問好！魯德成先生現在泰國漂泊，雖說是逃出了中共的魔掌，但由於泰國政府懼怕中共壓力，被囚於泰國難民拘留所。我去過夏家，見過魯先生的兒子，大家把魯鵬稱為“小黑子”，魯太太對德成的血脉真是犧牲了青春和精力，一個人獨守那孤孤單單的空房子，在那裏，從來沒有傳出一聲歡笑，從來沒在回蕩出一陣溫馨的話語，只是在“小黑子”放學的時候，才勉強地能聽到魯鵬那童稚未脫的歌聲。我去魯先生的房間時，裏面全被灰塵統治了，只有懸挂在正面的德成相片被擦拭的明亮明亮，夏玲成告訴我：“陳大哥，我一定要讓小黑子記得他老爸的樣子，一定要讓他老爸的英氣鼓舞著小黑子！”

“陳大哥，阿東今天上午回了家！”夏玲成接過了電話。阿東是喻東嶽的外號，其實，在我寫“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壯士”長篇紀實報道時，余志堅、魯德成、喻東嶽三位壯士與我從未謀面，後來我因言獲罪，被中共迫害入獄三年，也許是天意，或者說是一種緣份，我被分配在湖南省第一監獄（即沅江市赤山監獄）服刑，自入獄始，我就常常聽到犯人談到監獄醫院裏有一個政

治犯，被政府打得成了瘋人，失去了自理能力。當然，也有人說他是當代的“華子良”——紅色小說《紅岩》中的一個革命者！由於我是監獄裏最為重要的犯人，我身邊總有四個身強力壯的大漢看管我（稱所謂的互監組，實則是強制我的行動和言論），無法與那個人見面，但我心裏總惦記著這個神密的瘋子！

去年的五月十日，我因為不認罪，被管教辦的政治幹事劉海湘毆打致重傷，由於在醫院搶救，我破天荒地在醫院的走廊裏呆了一個晚上，在那裏，我終於見到了那個瘋子——可憐的喻東嶽先生，我心中真正的民族英雄！但是，喻東嶽先生那失神的雙眼，總在黑暗的天地裏遙望著燦爛的星空，那是何種的悲哀，何等的淒慘！

有一個河南犯名叫賈新海，是他陪我上醫院的，因為他是外省人，又是搶劫犯，與我一同進監，一同分配在一個隊上，關係處得非常好，他患有嚴重的肺結核，住在醫院。所以，自我看到喻東嶽之後，我時常把方便麵、法餅、豆腐製品之類的速食品送給我那尊敬的英雄，但總被賈新海原封不動地帶回。賈新海說：“幹部講政治犯可以不吃任何東西的，他有的是豐富的精神食糧，如果再送，就送你進小號子！”

阿東回來了，能撿一條命回來，那是喻家人的造化，更是阿東命大如天，我記得有一句名言：天道賦於人則命比天大！我想，既然阿東能够活著命回到瀏陽故里，則是瀏陽故里的福音，何止，應該是我們神州大地之福音！

電話在我們的祝福中擱下了。“陳大哥，請千萬多保重！”阿桂和玲成的泣血聲音仿佛漂渺在我的空中……在這樣的天地裏，我能自保嗎？余志堅、魯德成、喻東嶽，還有千千萬萬掙扎在社會下層的老百姓們……。



中華自由論壇

本欄文章不代表本刊立場

大中華民國 正是一個中國

比利時大陸學人 子口

中華古語云：“始亂終棄”，指的就是自亂制始而以毀制終。“九、一八”後，中共在蘇聯直接指揮之下，爲了顛覆大中華民國，開了另立國號的先例；接著溥儀就在日本的保護下立了“滿洲國”；待到抗戰相持階段（一九三九年），汪精衛另立中央，賣國求榮，毀我中華民國大制。以上這些才是中國十四年抗戰中“漢奸史”之一部分，正直學人不應回避。大中華民國好不容易在全民浴血抗戰後得到統一。台灣得以光復，從日本人手上回歸我抗戰勝利後之大中華民國。中共是抗戰後最大的漢奸，繼續其篡國進程，一九四七年在延安與蘇共帶領前來的外蒙共魁喬巴山私簽秘約，互相承認獨立，爲今後“兩黨兩國”的“革命友誼”背書；中共一九四九年宣告“建國”，五星血旗肅利中土，又拿“國家大制”開玩笑，才有今日“一個中國”之兩岸政治困境；全因原本“一個中國”之“大中華民國”被中共分裂所致，中國軍民抗日成果——台灣光復爲中共所棄。沒有完整的主權繼承是不言創制“建國”的，當得起國家整體“中華創制”的，近現代中華政治家祇有孫文一人而已。溥儀、汪精衛全是“毀制”的漢奸，毛澤東是叛裂民國的匪首，李登輝、陳水扁妄想篡奪中國人抗日成果——光復之台灣，更是“毀制”的政治小丑。

世上之大問題皆爲政治問題，故政治問題當然不會小。解析政治問題，必須堅持大原則，乃至更大的原則。用原則做交易，祇能亏本。中共匪首毛澤東在用國家主權大原則與蘇共做交易的同時，卻堅持其自己“實用的原則”：第一、誓死滅亡中華民國；第二、突出運用“人民”（“人民”即毛本人）；第三、死握中共黨權。直到現在，中共歷任黨魁在政治上還在按毛之“既定方針”辦事。但中共這幾十年給中華“國家大制”造成的災難，卻要現今兩岸政治人物同擔。

何有“一國兩制”？

鄧小平比匪首毛澤東懂得“更大原則”的存在，想到“一國”的重要，並且清楚用“解放台灣”實現“一國”不易（“兩蔣”在台打下一黨行憲的基础，厚植經濟、國防），且名不正而言不順，怕引發中共國內亂；但“兩制”必須堅持，這是中共的底線，是中共的“豐功偉業”；但他卻不想，從現今“兩國兩制”到其幻想之“一國兩制”，才真正是牽涉到了“更大原則”的根本問題。有一個中國大陸的小孩子問道：“中國是誰先分裂‘一國’的呢？”童言無忌，但卻說出中共犯罪集團造下的中華政治惡果。香港、澳門租界期到，當然無法再還給滿清王朝，因捍衛中華民國之政治家蔣介石內戰失敗，民國先總統蔣經國雖有堅持，但終不敵國際實用外交，祇能看著中共用“一國兩制”與英、葡交易，但他決不允許這種交易做到中華民國領土台灣頭上來。筆者希望在台的中国國民黨記住民國先總統蔣經國先生的堅持。“一國兩制”的出籠，可看出中共之愚頑“毀制”慣性：一可口頭吞並中華民國，二可與洋人做主權交易。中共如再不從“毀制”中醒悟，祇會因“一國兩制”而造成中華多國多制之現實，再難成“一國良制”之願景。

何有“終統論”和“台獨選項”？

中國國民黨先主席、民國先總統蔣經國先生對兩岸問題祇留下一句政治遺言：“三民主義統一中

國”。全球華人殷盼今日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永遠謹記。

“終極統一”和“台獨是台灣人民的選項”祇能是台灣省民主選舉的語言。中國國民黨主席不敢堅持抗戰後大中華民國憲法，甚至不敢承認大陸同胞為中華民國公民，這實在連“兩蔣”的憲政骨氣都沒有；把“統一”弄到“終極”去，把“台獨”變成“台灣人民的選項”，這樣曖昧，並非民主政治之真諦，而祇能是與中共一樣的民粹毀制。“人民”是誰？在大陸就是中共。在台灣，“人民”在政治上不就是“黨派”嘛，“台獨黨派”在民國是違憲的，中國國民黨必須挺身而出堅持中華民國憲法的尊嚴。於今尚未“亡共在共”，倒先有中華民國在台灣葬在中國國民黨手上之憂矣！難道要叫“中國人民解放軍”來保衛“中華民國憲法”不成？台灣政治人物是否想步中共毀制裂國之後塵？

何有“廢統論”？

民國現“總統”陳水扁提出“廢除‘國統綱領’和‘國統會’”，比“李登輝式台獨”走得更遠。陳身為民國“總統”（一省選民中當選，因民國大陸選民已被中共“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公然違反民國憲法，置我大中華民國之“一個中國”憲法於死地，與當年中共匪首毛澤東有何兩樣？陳水扁正要完成毛澤東未竟的“滅亡中華民國之偉業”？筆者想，可能胡錦濤也許會說“不”，他現在也不敢再拿這個做“交易”，因為他也是突出運用“人民”的，且這種“交易”不是與洋人做。

縱觀中華近現代政治人物，稱得上“政治家”的太少，除了會玩“人民”和“選民”外，對世界上各種政治制度均“不求甚解”，以至“國家大制”屢遭勦害；缺乏人道法制憲政深思，置個人名利、一黨私欲於“國制”之上；棄“選民”與“人民”根本權利於不顧，斷我中華公民社會之民主均富理想。政治人物不守“制”，“選民”和“人民”能守“法”嗎？中華不缺科學，但缺遵制的政治操守。

世上沒有所謂“亂民”，祇有“亂黨”和“亂國”，這在非公民社會是不敢承認的，但值得兩岸年輕政治人物深思。

堂堂正正地掛 中華民國國旗

著名報人 李勇

台灣民進黨的官員——中華民國新聞局長姚文智與台北市長馬英九發生爭論，姚指責馬英九每次舉辦國際活動，無論是足球賽與最近的溜冰賽，都不掛中華民國國旗，卻掛出中共那面猩紅的五星旗。

姚文智對馬英九的批評，海外不少人均有同感。問題在，民進黨的人對中華民國國旗也不尊重，他們舉辦任何活動絕不掛中華民國國旗。去年國慶之後，民進黨人把國旗當作垃圾丟棄，印有國旗的白色小便帽也棄之如敝履，今日為了批鬥馬英九才肯為國旗抱不平，這是典型的「打著國旗反國旗」的表現。

如果分析台灣政壇藍綠陣營對國旗的態度，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藍因恐共而不敢掛國旗；綠則因厭惡把國旗當垃圾。這兩種表現，不僅使中華民國面臨覆滅的危機，也陷台灣於就要被「解放」的危險中。

對中共來說，他們對台獨並不耽心，原因是他們反台獨是利用中國人普遍不希望國土分裂的民族感情，去達到他們併吞台灣的目的。他們不需要費太多的力氣就可以把台獨瓦解，把台灣置於共產制度下。

中共最懼怕的是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國旗，這個國號與這面國旗，才是他們真正的和致命的「克星」及致命傷。面對有九十四年歷史的中華民國，中共不但是叛亂者，也是分裂國土的罪魁禍首。中華民國存在一天，他們就無法成為正統，也沒有資格說他們代表中國。這就是中共要消滅中華民國，要把中華民國國旗拉下來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中共想要消滅中華民國，想否定中華民國國旗，不但對外發生不了作用，對內也無法說服大陸上所有受過教育、略知現代史的中國大陸人對中華民國國旗的眷戀，可以從大陸拍的「血戰台兒莊」電影及「走向共和」的五十集電視劇中找到證據。

海內外瞭解現代史的中國人都同意，中華民國，是國父孫中山推翻中國五千年帝制建立的亞洲第一個

民主共和國；而中共的「人民共和國」則是當年蘇共卵翼下建立的國際共產黨的分支部門，他們代表的是蘇共為首的國際共產黨，而非中國人的中國。這就是大陸知識分子到了海外高喊「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現代史學家辛灝年教授語）的原因。

這樣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這樣美麗莊嚴的中華民國國旗，今日在中華民國的台灣地區遭到輕蔑、忽視、唾棄，有人因恐共不敢掛出來，有人因政爭棄之如敝履。他們忘了，若非這個國號與這面國旗，台灣早就在一九四九年落入中共魔掌中，不但沒有今天的政經成就，甚至連身家性命也保不住。台灣地區的某些中國人如此忘恩負義，如此善惡不分，憑什麼可以享受半個多世紀安和樂利的生活？

台北市長馬英九也許不承認他的表現是恐共，他的理由大概是基於國際禮貌對中共的敷衍，否則，足球賽與溜冰賽沒有中共參加就不具代表性，甚至不可能舉辦。

其實這種理由是不正確的。既然中華民國是足球賽與溜冰賽的主辦國，中華民國國旗沒有理由不懸掛出來，也沒有理由限制觀眾帶國旗入場。恐懼共產黨到這種程度，太不像馬英九，難怪姚文智說：「這樣的人可以當中華民國總統嗎？」

我想，假如馬英九不恐共而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中共幹部及黨員選手可能退出比賽，可能高聲抗議，這樣一來，自然成為新聞，這些比賽必然受到舉世矚目；為了怕中共不參加比賽而不敢掛主辦國的國旗，不但是國際上的笑話，也成為海外華人的傷痛，因為今日海外愛這面國旗的人數超過愛五星旗的人數。

就以紐約地區為例，每年雙十國慶及元旦日，中華民國國旗在華人社區到處可見，尤其是在慶祝國慶的遊行中，華埠一片旗海，幾千人的遊行隊伍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華埠幾條街道穿越，甚至進入親中共人士集中的「解放區」（即紐約華埠東百老匯大道一帶），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從前，中共對紐約華人這種表現誣指為被國民黨收買，受國民黨唆使，並造謠說國民黨控制中華公所及其所屬的六十僑團。但自從公元二千年國民黨在中華民國政黨輪替中變成在野黨，從此對海外華人的立場不再關心，而執政的民進黨更是沒有興趣。但是紐約華人的雙十國慶大遊行不但繼續，而且比往年更熱

烈，人數也較從前多，因為支持綠營的台灣人士也加入了遊行隊伍，甚至被中共迫害的民運人士與法輪功會員也走入遊行隊伍中，他們也都高舉國旗，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多年前，大陸湖南電視台到紐約華埠做一個「華人在美國」的節目。首先到中華公所訪問，當電視台的攝製人員進入中華公所所在地的勿街（Mott Street），一仰頭就看見中華公所大樓頂端掛著一幅大型中華民國國旗，大門上各掛一面美國旗與中華民國旗，攝製人員嚇得立即退出來，不敢進入公所。於是為首的共幹立即入內找中華公所主席交涉，希望中華公所把門外的兩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取下來，因為他們要訪問、錄像，拍攝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不大恰當。

記得當時的中華公所主席是老僑領譚中平先生，他立即義正詞嚴地對湖南電視台的共幹說：我不拒絕你們的錄像訪問，也不阻止你們在中華公所採訪，但你不可以移動中華公所任何東西，尤其是中華民國國旗，這是我們心目中的真正中國國旗。

湖南電視台人員已來到紐約華埠，既不願放棄採訪工作，也不敢再提拿走國旗的意見，只好迴避局部拍攝。但據大陸來美國看過他們的訪問中華公所錄像的人說：影帶上見到部份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現在的中華公所主席陳玉駒，最近成為中共方面拉攏的對象，任何風吹草動，他們都派自己的電視台「記者」到中華公所訪問他。而陳玉駒座位背後就有兩幅大的中華民國國旗，每次那些「記者」都請他把國旗移開，陳玉駒回答很簡單，「什麼都可以移動，只有這兩面國旗不可移動！」

陳玉駒是從大陸移民來美國不久的廣州人，他六〇年代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來美國後經商成功，加入僑團為僑胞服務，深得僑胞擁戴，兩年前被選為中華公所主席。他說，他這樣做是尊重中華公所九十四年的傳統，也是他的選擇。

中共駐紐約的幹部並不因此排斥或誣譏陳玉駒，相反隆重邀請他去大陸訪問，由胡錦濤「總書記」接見，並招待他在大陸遊山玩水。但陳玉駒在去大陸之前，卻是先去台灣拜會中華民國總統。

再以香港來說，大陸淪共五十六年，中共既頑強又兇暴，接近大陸的香港人並不因此對中共有所畏

懼，在港英統治時代，每年雙十國慶港九許多地區一片旗海。

筆者來美之前在香港教書，每年雙十國慶除了在自己住所掛出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並帶領學生在各高樓大廈掛旗。某次有一個學生爬上二十二樓掛旗，我囑咐他要小心，不要跌下去。該學生告訴我：「老師，不要緊，掛國旗跌死是光榮的！」

九七之後，董建華御封為特區長官，他為了討好中共，不准雙十國慶掛旗，並派員警到港九各地拔旗，惹火了我的一個學生，他自掏腰包出版一本雜誌印了好幾萬本，封面就是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散發在港九的報攤上。我的學生在封面上寫了幾個字：「請董建華取締這面國旗！」

維護中華民國國旗、懸掛中華民國國旗，在香港有悠久的歷史，也發生過許多悲壯的小故事。一九五七年，石硤尾徙置區發生過以生命保護中華民國國旗事件，令我印象深刻。

我少年時曾在香港的調景嶺鳴遠中學讀書。調景嶺難民營平時就一片旗海不在話下，我與同學們甚至在國慶日高舉中華民國國旗到港九各街頭遊走，並得到附近商民一片掌聲。

恐共是一種很普遍的現象，過去半個世紀來共產黨在亞洲所製造的「解放浩劫」，共產災難令人色變。赤柬的屠城流血，越南的投奔怒海，共產黨的威脅超過任何恐怖組織集團，如果有人說不怕他，那絕對是假大空話。

我說馬英九「恐共」沒有要貶斥馬英九的意思，事實上中共的確可怕。且不說他們五十多年來在中國大陸種種苛殘暴行，就以海外來說，中共在華人社區留下恐怖的印象無人不知，再加上他們整肅海外反共華人的手段惡毒，更是令人不寒而慄，就是在台灣疾言厲色、橫行無忌的龍應台、李敖等人，只要一到了海外或進入中國大陸，便一個個垂眉斂目、三緘其口。

記得李敖到大陸在北京大學首場演講，即使小心謹慎「打擦邊球」，最後還是面有悻色。當他站在講台上放言高論時，不斷回頭看他的「衣食父母」劉長樂老闆與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的反應與臉色。演講完之後，他轉身到後面與閔維方握手，並向閔說

「剛剛我講的時候沒有看見你的笑容，害得我好緊張！」（他沒有想到這句話被電視台錄了下來）。

李敖天不怕地不怕，但就是怕中共，而且怕中共幹部的嚴肅面孔。他深知共產黨不好惹，也知道惹火了共產黨，「去不了長城，卻可能入了秦城」，由此可見他對秦城監獄的恐懼。他不怕坐台灣的牢，卻怕坐大陸的牢。他深知一入了秦城就很難活著出來，連毛夫人江青地位這樣高、這樣厲害，最後也只有上吊自殺，自絕於「人民」！

不過，中共黨人及幹部雖可怕，但他們卻都很有「原則」，而且堅持「原則」，甚至被他們統治欺騙了幾十年的大陸老百姓也像他們一樣，與中華民國勢不兩立，對中華民國國旗深惡痛絕。我有一個來自大陸的同事，雙十國慶隨我去華埠參加大遊行，回來後我問他有什麼感覺？他說：他很害怕，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多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使他膽戰心驚！

最早公開與中共決裂的大陸留學生王炳章（現已被中共囚禁），當年是新聞人物，不少人邀他去參加宴會，儘管他反叛中共，但不認同中華民國。某次他參加一個宴會，發現請客的主人在台上掛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他二話不說站起來就要走，後經主人苦勸，同意把旗子拿下來，他才回到席上來。但是，後來，他卻真正接受了中華民國，並向海內外民運人士發出了「重建中華民國」的號召。這，大約也是他之所以會被中共於境外將他綁架回去判處無期徒刑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我之所以舉了這樣的例子來談掛旗子的事，不外是想告訴馬英九，中共儘管在大陸及海外胡作非為，但到目前為止還不敢在台灣撒野。因此奉勸馬英九不必懼怕、不必恐共！何況，中共幹部裡面也有不少有良知、有原則的人，因此他們對有良知、有原則的人還是尊敬的。



龍應台的膽量

著名報人 李勇

文化明星龍應台最近在中共黨喉舌「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揭露國民黨五十年代在台灣的實行白色恐怖殺人記錄的文章，她引經據典、旁徵博引，把國民黨人如何濫殺無辜，如何把對共產黨有崇高理念者囚禁，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學校抓匪諜，然後把匪諜槍殺在龍應台就讀的小學操場上。

龍應台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有名有姓地把受害者的身世、背景公開出來，她的公正客觀，她的悲天憫人，令人肅然起敬，的確是二十一世紀最有良心、最會生氣的中國台灣人。

有一個尚未被證實的傳說指出，龍應台這篇文章發表後，聲名遠播，大陸上人人都知道龍應台是當前兩岸文化界的大人物。可惜台灣去大陸的人沒有注意，一個與龍應台在北京碰面談天的台灣人，知道龍應台久沒有回台灣，於是就對她說，我們台灣人現在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了，我們可以當著阿扁總統的面大罵政府當局，大罵民進黨，甚至可以向國民黨人盡情揭批國民黨早年的白色恐怖與兩蔣欺壓台灣人的敗行劣跡，罵完之後，民進黨與國民黨都不敢對我怎麼樣，相反還要討好我！

龍應台聽了不以爲然說：那有什麼了不起，今日中國大陸言論自由的尺度更寬廣。我可以在中共黨政主持的宣傳機器上，對著「胡總書記」、「溫總理」大罵阿扁政府、民進黨，更大肆揭批國民黨人五十年代禍國殃民的昭彰劣跡，結果胡總書記、溫總理也討好我，並付我高稿費。可見中國大陸言論自由與台灣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

的確，看過龍應台在「中共青年報」所寫的長文，果然體會到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自由舒暢”。難怪，過去龍應台責怪台灣的中國人，問他們：「中國人，你爲什麼不生氣？」現在，她在大陸就不會再問大陸的中國人：「你爲什麼不生氣？」理由很簡單，大陸的中國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人幸福、個個安樂，大家享受著李敖推崇的「漢唐盛世」，還有什麼氣可生，他們高興還來不及呢！

其實中國大陸的安和樂利並非今日才有，漢唐盛世也非改革開放才出現。早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打敗國民黨佔據大陸就開始了。那一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頭，向下面萬千百姓，用湖南土話鄭重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從那天開始，中國人抬頭挺胸，感到「中國已自立於強國之林」、「列強欺負我們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接著，毛澤東發動“大躍進、三面紅旗”，高叫“超英趕美”。果然，在大煉鋼之後，中國大陸鋼產量穩居世界第一；大鍋飯開始，老百姓吃飯不要錢；到了文化大革命，更爲發達，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中國大陸頓時成爲石油大國、鋼鐵大國……可惜，那時候龍應台正窩在台灣被白色恐怖折磨得女性嬌柔無存，變成一個高顴方臉短髮的男人婆。因此，她生氣了！於是她寫出「野火集」，質問「中國人，你爲什麼不生氣！」這一番疾言厲色之後，問出了一個朱高正。這個「台灣第一戰艦」，跳上議壇，叫打叫殺，把台灣議壇其他民意代表惹得跟他一齊生氣。於是，台灣進入了政治民主的“亂象”中，看得中國大陸人士膽戰心驚，他們午夜驚迴，發現還是共產黨統治好，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人不會生氣，也不敢生氣，人大開會一片祥和，提出法案百分之一百舉手通過。

就以「反分裂國家法」來看，四百人投票，三百九十八票通過，只有兩票棄權，原因是棄權的兩人因感冒嚴重沒有出席盛會，沒有投票，並不是因生氣而拒絕光榮、正確、偉大的共產黨「籠召」。

龍應台爲了怕大陸同胞誤會台灣遍地是黃金而偷渡台灣去打工，更怕女同胞被人口販騙到台灣做娼妓，因此不惜把台灣當年的白色恐怖盡情揭露，接著就要把民進黨政權「綠色恐怖」讓大陸人知道，於是偷渡絕跡，人人以偷渡到台灣爲恥，台灣海峽就風平浪靜了。

台灣的白色恐怖，除了龍應台親眼目睹「匪諜」老師被國民黨特務槍殺在學校操場上外，還有許多白色恐怖的照片，這些照片「是五〇年代國民黨政權在台北馬場刑場大肆槍殺共產黨員與左翼人士的歷史」，由曾經做過台北中國時報記者的徐宗懋蒐集。

徐宗懋何許人也？一般人也許不知道，有必要在此公開。他是台北中國時報記者，一九八九年六月到

天安門採訪大陸青年學者要求民主的運動。當中共開出坦克車，用機槍屠殺學生的時候，他也在現場挨了一槍，打中後腦，幾乎因此喪生成為反革命，幸虧搶救及時保住性命。復原後性格大變，開始為台灣中共地下黨——煽動二二八暴動的謝雪虹伸冤，出書描寫她的「英雄事蹟」，至於謝後來潛逃去中國大陸被中共整死則一字不提。接著他再接再厲把從國民黨特務機構流傳出來的檔案買下來，並把其中血淋淋的圖片交給那時做台北市文化局長的龍應台，由龍應台安排在二二八紀念館揭幕公開展出，轟動一時，再次證明了國民黨在白色恐怖時代處決共諜的不當。

龍應台對國府在五〇年代的保密防諜深惡痛絕，對老蔣當年在大陸的剿共不以為然。她認為那是國府國家恐怖主義，也是國府治台的昭彰劣跡，因為那些共諜都是有理想的英雄烈士。

龍應台的說法與「狂人」李敖大同小異。李敖在鳳凰電視台的節目上大罵老蔣率五十萬大軍保衛台灣不當，他說那是老蔣頑固抗拒統一，才培育了今日主張國土分裂的台獨分子，否則中國早就在五〇年代達成統一，台灣也就不會有今日的亂象了。

龍應台知道她「公正」、「客觀」地為匪諜張目，為國特殺人不滿的表現，會遭到「衛護國民黨」與「支持民進黨」的人兩面夾擊。前者認為，她「用過去醜惡的歷史來打擊已經失去政權的國民黨」；後者認為，「故意強調外省人在白色恐怖中被殺之眾多，來淡化二二八事件中國國民黨殺害本省人的相對罪責」。

事實上龍應台多慮了。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罷，他們對龍應台都無可奈何，既不敢指責，也不敢加罪。不但如此，國民黨人繼續為她加官進爵、財源不斷。虎踞大陸的中共政權更對她大為嘉許，認為她為中共辯護。於是共產黨人容許她在黨控制的喉舌上發表長文，奉上優厚的稿費，為她在中國大陸遊山玩水給予方便，使那些被中共迫害或痛恨中共禍國殃民的海外反共人士瞠目結舌、咬牙切齒，這大概出乎龍應台意料之外。

左右逢源、兩岸爭捧的龍應台，自己也知道她的作為會招來什麼樣的批評。果然，她在二二八紀念館展出「國民黨殺匪諜」殘忍照片招來指責。她說，有人稱她是「劊子手」、「加害者」、「文化希特

勒」、「共產黨同路人」、一個形男實女的「正義之士」，突然戴了這樣多帽子，大概會興奮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她超然於黨派之外，求仁得仁。

於是龍應台更進一步迫使政府給「政治遇難者」補償，並惠及「共產黨滲透到台灣來的匪諜」及當年潛伏在台灣本土的土共（中共地下黨人）。在龍應台的標準下，他們都是為國犧牲的死難同志，因此她在精心謄寫的詩句中這樣稱讚他們：「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指引我們向前走。你是民族的光榮，你為祖國而犧牲。冬天淒涼的風，卻是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同志，別再為祖國擔憂，你流的血，照亮的路，我們繼續在向前走！」

龍應台繼續向前走吧，在中共以「非和平手段」、「不排除以武力解放台灣」的豪情下，為中共設計下解放台灣的計劃，定下統治台灣的方向，讓台灣同胞得享「社會主義幸福」；與李敖同志分享台灣被中共解放的「果實」。照推想，縱使中共再發動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對李、龍兩人不但不會影響，而且他們會活得更是風光、更加快樂、更幸福！

被龍應台「平反」的受害人之中，有陳明忠、柯旗化、李荊蓀、陳映真、柏楊、獨缺一個「李敖同志」。這不是龍應台偏心，而是李敖在大陸對國民黨及兩蔣的撻伐力道凌駕龍應台之上，因此龍應台省卻了不少替李敖主持公道的筆墨。

不過，最令人費解的是「受冤人」陳映真，是被龍應台形容為「關切勞苦大眾的」作家。在我們一般讀者的心目中，陳映真關切的大概不是什麼勞苦大眾，而是屠殺逾千萬中國人的屠夫毛澤東與禍害中國半個多世紀的中共政權。他把毛澤東奉為神祇，把中共政權形容為「父祖之國」；他痛恨美國帝國主義，罵他們以經濟殖民台灣，侮辱中國女性；他攻擊國府頑固反共立場與走資政策，甚至認為，早年台灣經濟繁榮是奠基於女性出賣肉體貞操，這種墮落政權，早就應該解放。而中共在大陸屠殺愈億中國人，乃是革命必需，千萬知識分子被迫害蹂躪，乃是淨化革命陣容。因此，他九〇年代進入大陸，與在文革中以紅衛兵身份整死無數「敵我矛盾」的知識分子譚立夫稱兄道弟，一同暢遊神州大地，相見恨晚、互相吹捧、惺惺相惜。

陳映真是天生共產黨種，他用他的文學筆法攻擊兩蔣時代的國民黨，醜化保護台灣的國軍將士。他之被國府拘捕入獄，是由於被同志出賣。原因是，六〇年代中共在大陸發動文化大革命，弄得神州動蕩、民不聊生，但毛及他的爪牙仍不滿意，決定把文革輸出，讓毛思想遍及第三世界，然後影響歐美，完成他朝思暮想的世界革命。於是，他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唆使香港「匪諜」、「土共」起來造反，製造了香港的暴動，導致數十萬港人外逃，香港陷入動亂蕭條之中。

接著，他們又唆使台灣土共學習毛澤東思想，陳映真首先響應。他透過香港土共，把毛澤東選集中的「精彩內容」化整為零地以郵件寄到台灣，然後由他裝訂成冊，聚集其他志同道合的地下黨同志及極端左傾毛派分子成立「讀書會」，一同研討「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尋找聯合共產黨解放台灣的大計。沒有想到，他的同志裏有一名窮途潦倒的楊某，爲了貪圖國民黨所懸的高額賞金出賣陳映真，向當時的警備總部檢舉，終於被國民黨特務查獲，判了他七年徒刑，而楊某卻領到七萬圓台幣的獎金，風花雪月了好一段時間。陳映真因此坐牢而成爲「知名文學家」，所寫「報仇雪恨」，諷罵國民黨的文章，卻成了不朽的文學作品，使陳映真求仁得利，樂不可支。現在更被龍應台吹捧爲關切「勞苦大眾」的作家，更是一登龍門身價十倍。

陳映真對毛共的熱愛與吹捧，略似郭沫若，直追巴金、老舍，只是才氣及知名度仍有不及。唯一不同的是，陳映真在台灣被反共的國府捉放而成名；郭沫若則因兩個兒子被整死而對毛共卑躬屈膝，終於保住地位壽終正寢；而巴金則在向共軍歌功頌德之後被抄家、批鬥，受盡屈辱，十年浩劫中更是苦不堪言；老舍更是爲中共吹噓十幾年後在文革中被迫害而自絕於人民，提前去見他們的祖宗馬克思。以次對比，不知陳映真如何評價他的「偉大領袖」與「父祖之國」。

龍應台在中共機關報上痛罵國民黨，揭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其文字技巧之高明、用詞用句之精煉，令大陸同胞印證了中共當年形容台灣在水深火熱中的慘況，符合了中共妖魔化老蔣的描述。因此他們慶幸自己在危急存亡之秋選擇了留在大陸，沒有跟隨老蔣逃去台灣，不像龍應台、李敖那樣誤搭賊船到了台

灣，被老蔣欺瞞、被國民黨矇騙，直到垂老之年才發現一失足成千古恨。不過，愛國不分先後，此刻李、龍兩人才被中共「寵召」進入中國大陸到處演講，在傳媒上發表談話或文章受到十三億幸福的「黨和人民」注意，說得上是名滿天下。

但在大陸受苦受難的老百姓與被中共監管拘禁的異議文人則不被龍應台重視，當然更不敢爲他們的人權被侵犯、自由被剝奪、生命被威脅而生氣。她很清楚，目前可以批判甚至攻擊的是中華民國執政的民進黨與阿扁總統，然後再加上已成落水狗的國民黨（在野政黨）。尤其是已經去世的兩蔣更可罵得百無禁忌，何況只要這一罵，既可證明她公正客觀，還可以符合中共的言論尺度，只要拿捏好分寸，龍應台就可以在大陸中共宣傳機器上發表文章、領取稿費，還可以接受「黨和人民」控制的電視台訪問，侃侃而談、不受約束。

看完龍應台在「中國青年報」上的長文，再看親共刊物對她吹捧的文稿，我也開始埋怨當年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也不滿老蔣率五十萬大軍保護台灣，當然更不滿意兩蔣把潛伏台灣的土共、匪諜肅清，使台灣失去被中共解放的良機，從而讓龍應台、李敖等人在台灣吃香喝辣、享盡榮華富貴。面對大陸上逾億中國人被中共屠殺，四千五百萬中國人被活活餓死，再看看唇紅齒白的龍應台、意氣風發的李敖等人，不禁仰面問蒼天：爲什麼這些中國人可以避開“解放”，不被中共“統一”，這是什麼天理？爲什麼他們還可以置身在中共統治不到的地方張牙舞爪？

不過也有人告訴我，龍應台批判白色恐怖的國民黨，頗有「指桑罵槐」、「指著禿驢罵和尚」的作用。因爲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其紅色恐怖舉世無雙，史所罕見，絕非白色恐怖可以比擬。龍應台不敢直接罵中共，故意轉一個彎，用罵國民黨去影射共產黨或那個什麼「他媽的黨」，這樣做才可以在大陸「曲線反共」，符合李敖的「打擦邊球」，因爲中共有坦克、機槍。

說龍應台「曲線反共」，並非胡謔，更非諷刺。不久前中共當局下令關閉了發表她文章的中國青年報出版的冰點雜誌，龍應台好像生氣了。於是她鬥膽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中共黨頭「胡總書記」。她知道不能用鞭撻兩蔣的手段和辛辣文句。因此公開信的題目用

得十分得體：「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副題是給「胡錦濤先生」公開信。

從公開信的發表來看，龍應台即使批共，也用「請」及「先生」這種溫和的口氣，即使中共抓人封店，龍應台也只是認為中共還不夠文明。其口氣之謙卑，用語之柔和，姿態之低下，果然使胡先生大為感動，終於讓冰點有限度復刊，這是共產黨人寬大、文明、開放的積極表現，也證明了龍應台的曲線反共已經有了出初步的成效。

其實，中共對待冰點，只是「懲罰自己黨內不守家規的同志」，並沒有禍延黨外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與過去毛式政治運動不同。龍應台質問胡先生，給人有狗拉耗子多管閑事的感覺。俗語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龍應台只不過是台北市一個下台的小小文化局長，即有資格去過問中共黨內的家務事嗎？

中共政權過去半個多世紀在中國大陸發動的每一場血腥鎮壓的政治運動，都比此刻查封冰點嚴重，對比之下，此刻中共政權已經「被迫」文明到了極致。龍應台居然還要求胡先生以文明來說服她，明顯地是在強人所難。想當年大陸的人隨便說一句與共產黨不一致的話，寫下一個與共產黨相違的字，輕則囚禁勞改，重則家破人亡。有時甚至是株連十族。其例之多，不勝枚舉，舉世皆知，龍應台豈有不知之理？要生氣，龍應台早就該生氣了。

照猜想，龍應台與台灣李敖等大多數文人一樣，對中共政權不敢非議，更不敢批評。畢竟共產黨不是國民黨，也不是民進黨。這一點，龍應台們是十分清楚的。這次中共查封冰點，並非是對龍應台們有意見，而是因為廣州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發表了一篇「婉轉」批評中共歪曲事實的文章，使「黨和人民」不快，因此禍延編輯，導致中共黨團自家辦的雜誌暫時關門。

說到歪曲史實，在共產黨統治的地方早已司空見慣。過去五十多年來，中共不但不正視事實，還塗改史料，編造史實，所作所為，映證了英國作家歐威爾「一九八四」大作的描述，「他們把謊言當作真理，把醜惡當作美善，把和平當作戰爭，看他們的歷史書和歷史劇，就知道他們是多麼厚顏無恥，多麼胡說八道」。這種種令人不恥的德性，龍應台既不敢有所非

議，更不敢有所批評。今日只為了一個冰點，就發公開信，明顯是矯揉造作而已。

龍應台不是超人，更非神人，只是一個普通、聰明的人。她必需欺善怕惡、揚共貶國，才可以在中國大陸著書立說，並避開老舍、巴金等人所受的災禍。

千古一江山

從龍應台的一篇文章說起

張儒和

一江山戰役五十週年了，作為這一慘烈血戰的見證人，我是誓難忘懷的，但兩岸的表現怎麼樣呢？

去年龍應台女士在世副（世界日報副刊）的弘文《冷酷的盤算》中作了很客觀的報導。雖然『一江山戰役』只是她文中的一部分，但我拜讀再三，潸然淚下。為使讀者對一江山戰役的慘痛能有所瞭解，特節錄以下片段，未經原作者龍女士的同意，尚請見諒。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日，是一江山戰役五十週年，一江山是浙江外海大陳列島中的一個小島，面積只有一點五平方公里。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中共首次以陸海空三棲作戰方式，派七千名兵力展開全面攻擊，而國民政府的島上守軍只有七百二十名，在歷時六十一小時十二分鍾狂烈戰火之後，四千多名中共兵員戰死，七百二十名國軍官兵全部陣亡，指揮官王生明和大陳長官處的最後通訊是：『現在敵人距我只有五十公尺，我手裡有一顆給我自己的手榴彈。』」

「一江山戰役迫使美國加強了與台灣共同防衛協定，保全了其後五十年台灣的安定與發展，七百二十個年輕人的生命犧牲，還有因他們的犧牲所造成的妻離子散，不能下說是令人肅然的捐軀，可是五十年後，政治氣候變了，權力換手了，在一江山戰役五十週年當天，台灣政壇一片冷漠，一江山戰役被籠統打包，歸諸於國民黨不合時宜的歷史廢料。而同一天，共產黨卻大張旗鼓的紀念，大大小小的各界領導熱鬧聚集，紀念解放一江山島五十週年，共同追憶難忘的光輝歷史，重溫偉大的『一江山精神』，緬懷革命先

烈豐功偉績，擴建『解放一江山島烈士陵園』，使之成爲一個集歷史文化、愛國主義教育、市民休閒活動爲一體的紀念性主題公園。』」

「五十年前的一場血戰，使將近五千個年輕人死在那幾個足球場大小的孤島上，五十年之後，這一邊是刻意地輕蔑淡忘，那一邊是刻意地大吹大擂。對死者的哀憫和感恩？對殺戮的反省和懺悔？對歷史的誠實和謙卑？對未來的深思和警惕？我只看見冷酷的權力盤算。」

這些悲天憫人的話語出自一位現代學者之手筆，是發自良心的血性宣告，我再次含淚讀著，想起五十一年前當時的情形。浙江戰場共產黨兵力佔絕對優勢，大陳列島對面的共軍陸軍以炮兵爲主，但射程僅及一江山，海軍艦隊亦強，且有陸戰隊，空軍有米格十五機，常炸射大陳諸島。國軍大陳防衛司令劉廉一將軍以寡敵衆，一江山島孤立突出，距敵近離我遠，乃設『一江山守備區』，派王生明爲司令，王曰誥爲參謀長，率一加強支隊兵力，構設陣地，其炮火可射及對面敵軍，共軍甚懼。

不久，發現米格機多次臨空騷擾，守軍曾用機槍擊傷其一架，共產黨老羞成怒，不惜用『三棲作戰』方式攻打一江山，一月十八日起登陸一個師兵力，用『一點兩面戰術』猛攻守軍陣地，打了三天三夜，於二十日下午四時，才在守軍全部陣亡之後佔據這一小島，共軍宣傳說『一江山島完全解放，「蔣軍」一千多人被打死了。』至於死了多少解放軍則只字不提。後來證實共軍戰死者約四千多人，這是共產黨解放一江山島所付出的代價，我也不禁替這麼多的年輕人喊冤。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是黃埔軍校十二期畢業十七週年紀念，我們二十幾個同學正在台北聚會，會中驚聞一江山當日被共軍攻佔，我守軍七百二十人全部犧牲，最後是王生明、王曰誥在手榴彈爆炸聲中與大陳長官部失去了連絡。

大家默哀追念犧牲的烈士們和王曰誥同學，會中並題聯：

『千古一江山，王曰誥千古。』

王曰誥是我們同學中極傑出的一位，當年在北平與我一起投考中央軍校，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抗戰時參加無數戰役，政府遷台後，被老長官派去大陳列

島中的『一江山守備區』作王生明司令的助手，任參謀長，竭智盡忠極獲倚重。大陳列島離台灣遙遠，補給和支援極不易。王曰誥事先曾有信給我和薛延齡同學(大陳駐台連絡官)，信中早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這是我們畢業典禮時，蔣中正校長對我們的訓示。

黃埔建校六十週年專集中，每期列成仁烈士一位，王曰誥是十二期代表。專集中簡述王曰誥烈士傳略，充分顯示一江山精神：王烈士曰誥，字文朴，山東泰安人，世居泰安夏張鎮，父學禮，母高氏，妻楊清謹，家庭美滿。烈士於民國廿四年畢業北平師大附中，投考本校十二期，畢業分發第一軍第一師任排、連長，繼考入陸軍大學十九期。畢業回軍任第一師營、團長及第九十軍參謀長等職。民國卅七年冀北之役有功，奉頒忠勳勳章。四十四年元月，共軍進犯大陳一江山，烈士適任一江山守備區司令部參謀長，精明幹練，足智多謀，對王生明司令贊助良多，故能從容應敵，血戰三晝夜，殲敵甚衆，終因衆寡懸殊及勢無可爲，乃自戕成仁。

(轉自世界日報古今上下)

新教宗請看：

中共手上的宗教領袖

劍光

中共自稱是無神論者，實際上是迷信馬列主義洋教的，中共的土神就是毛澤東，他的話就是一句頂一萬句的毛經。按照共產主義的教義，宗教是要被消滅的，中共統治下的人民只能信仰共產主義。中共在奪取政權之前已經預謀打入各宗教，爲以後控制宗教做準備，企圖掌權後再逐漸消滅各個宗教。

“解放”後大陸的佛教協會主席趙僕初就是打入佛教的共產黨，黨安排他先從小和尚做起，後來做了佛教頭頭掌了實權，就給人以科班出身的假象。

大陸天主教的第一把手傅鐵山主教，原出身於山東沂蒙山區革命根據地的地主家庭，他參加共產黨後被派打入天主教，革命成功後理所當然的出掌天主教了。

同樣，大陸的基督教也逃不出中共的魔掌，僅舉二例：

文革時，上海著名的國際禮拜堂牧師李儲文博士，是從美國留學的老海歸，當紅衛兵小將們批鬥他，打得他受不了時，他說你們別打了，我是共產黨派來的假牧師，你們去調查好了。後來一查，果然如此，總算保住了命，否則也會像有的真牧師那樣被打死。李儲文暴露後不能再當“牧師”了，被黨中央派去香港當了新華社駐香港分社副社長，官階不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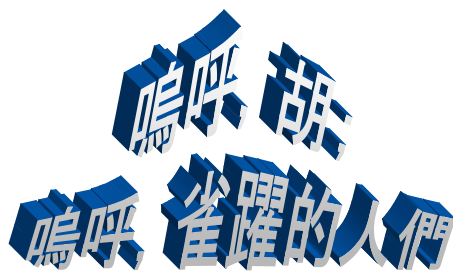
在北京的基督教燕京協和神學院，是一九五三年中共將大陸北方各神學院合併而成的北方唯一的神學院，（另一間為南京金陵神學院，全大陸僅此兩校）掌實權的是教務長趙復三牧師。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共關閉了所有的基督教會，神學院也沒用了，全體教職員工全部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而趙復三卻搖身一變，當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和黨委副書記。此時中共以為經過“解放”後的歷次階級鬥爭和洗腦，人們的政治覺悟提高了，不會再信仰上帝了，所以趙復三可以去掉畫皮了。趙教務長後來還負責過中共對法國的特務工作，不過他在派到中共駐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當組長時，正趕上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趙復三叛逃了，不再當中共的爪牙了，可能與在基督教裡受了一些影響有關。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血的教訓，多數大陸人民再也不相信馬列主義邪教了，開始尋求和接受新的信仰。中共獨裁政權為了在國際上樹立形像，不得不開放各宗教活動，但是中共的心裡是懼怕宗教的，特別是對天主教和基督教，因為那裏面有共產黨從不具有的真理、正義和道德。尤其在蘇聯和東歐各共產國家的獨裁政權，在一夜之間就被人民推翻之後，中共意識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宗教因素，這些國家的人民很多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他們的信仰和共產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如波蘭有百分之九十是天主教徒）。這一變化給中共打擊不小，所以中共對宗教問題很敏感，需要更嚴格控制各宗教了。

文革後，中共對各宗教組織和各“民主黨派”，還是採取打敗國民黨的那一套行之有效且事半功倍的作法：打入內部核心組織，竊取領導權，表面上是各宗教組織內有信仰的主教、神父、牧師、阿訇、法師、喇嘛等掌權者，是各宗教內部的自己人，而實際上卻是中共的特務。中共又選派年青人安插到國內各宗教學院和國外的一些宗教學院充當學生，將來進一步掌控各宗教組織。甚至連北美的華人教會都派人監視，收集情報，早已發現地下教會的某些領袖也是共特。他們大搞違背教義的事來破壞和栽贓正統宗教，善良正直的信徒們，你們可要警醒，提高識別力！

看，中共就是這樣通過掌控宗教領袖和有實權的人來掌控各宗教組織的。從中共內部的文件看，是“外鬆內緊”，是儘量限制宗教的發展，更不允許各宗教介入政治，以保“黨天下”萬世長存。

在此，我請天主教新教宗本篤十六世深入瞭解中共宗教領袖的真面目，更請多多關懷苦難中的中國大陸信徒，抗議中共對天主教、基督教教徒（包括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要求無條件釋放被關押神父和信徒等，要求實現真正的宗教自由。我相信教庭是不會拋棄台灣的天主教徒和人民，以換取和中共獨裁政權建交，因為這個政權是魔鬼政權。



國際流浪漢

一個泱泱大國的姓胡的主席從地球的那邊來了，於是，就冒出一批歡呼雀躍的人們，在機場在賓館門口，表演着他們的愛國熱情。

當姓胡的變成姓溫的，或姓江的，這些人們同樣要雀躍一番。這種程式套路在當地華人中已成為一景。

這幫人有一個美妙的的稱謂：當地愛國僑胞。

同樣還有一批華人，他們永遠銘記着那個叫作共產黨的政權數十年來對他們的民族，對他們的家庭，甚至對他們個人的殘酷迫害，在這有限的場合表述他們的抗議和他們的訴求。

這批人也有一個稱謂，曰之，「國外的反華勢力代表」。這兩種人已經成為全球華人的一景。

不管姓胡的還是姓江的主席來到地球的哪一個角落，這兩批人都會同時出現。

這兩批人的共同點是，他們都離開了那塊叫作神州大地的故土，遠走他鄉。

這兩批人的相異之處則太多了。

第一類人最顯著的難解之處就是，他們的腳和他們的嘴是由兩個不同的大腦操縱着。

他們的腳選擇了離開。到更好生活的地方去，他們不會放棄對自由、財富的追求。身份，金錢，房子一樣不會少。但他們的嘴卻會彰顯出極大的「愛國熱情」，這種愛國熱情的表達方式，就是對共產黨當權者的獻媚，和對第二類人的「義憤填膺」。但是如果人們問他們：你這末愛國，為什麼不回去愛，在這裡蠅營苟苟搞綠卡，轉身份，是何道理？他們無言以對，或是無賴式的胡攪一番。當然這批人也會回去一番，搞生意，搞錢，搞種種種種有好處的事情。他們會得到中國平頭百姓得不到的好處，那叫民脂民膏，是對效忠的犒賞。於是乎，這幫人還有一個響亮的名稱叫：愛國賊。實在是甚為精妙，準確。

第二類「反華勢力的代表」，活得便沒有那末瀟灑。他們無法割捨那維繫着他們血肉和靈魂的故土。縱然是故土難離，他們中很多人卻是有國難歸，被迫流亡他鄉，甚至有客死他鄉的。

他們忘卻不了那些國內仍在苦難中煎熬的骨肉同胞。但他們的真誠，他們的勇氣，還有那種精衛填海般的種種微小而不懈的努力，在感動着一切良知尚存的人們。

胡上台以來，曾經引起人們的期盼。幾年下來，應該說，對其是看得越來越清楚了。簡言之，他沒有留住那九天攬月的嬋娟，而只是套上了一條越拉越緊的吊索。

他當不了戈爾巴喬夫，因為他沒有那種認知和膽識。他也當不了金正日，即使他想當，他也沒有那份本錢、魄力和權威。他只是一個謹小慎微多年，才熬

成了婆婆的小媳婦。就是掙掙一下，也無力回天。那末未來他會是什末呢？

筆者認為，他會是宣統，就是溥儀——如果他能自動終結這個長期殘害中華民族的惡黨。他能自我終結這末世的獨裁者。但願他不要成了齊奧塞斯庫或墨索里尼。

需要多說一句的事，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今天這幫縱情表演雀躍歡呼的人們，這幫精妙的愛國賊們，會照樣平靜地過著他們安安穩穩的小日子，像什末都沒發生一樣，間或有人更會義憤填膺於那失勢的獨裁者，阿門！但願這並非是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我崇尚 真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郭永豐

作為一個真正屬於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功利對於他們來說僅僅只是過眼雲煙，如果在不受任何束縛，不傷害其本真的情況下，可以說來者不拒去者也不留。否則，則一概拒絕之或急於規避之。若避之不及則逃之，逃之不及則堅決反抗之。因為，自由是他們的本性和基石，本真是他們的目的，只有時刻擁有自由，才能真正奔放、暢快而真言。固然，任何俗物絕不可輕易撼動他們，除非是良善的、正義的和人道的。

如此境界，乃是至高無上至善至美的，非常人所能及。此類人物，至少都是智者、勇者、剛毅者，如果沒有高超的智慧，又怎能洞穿人生，把人生真諦全部悟透？如果不是勇者，又怎能面對世事諸多誘惑與干擾，絲毫不留戀、不心疼、不牽掛、不耿耿於懷呢？如果不是剛毅者，又怎能承載常人所能承載的萬倍重壓，甚至拼出生命，拿犧牲做賭注呢？

真正屬於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決不媚俗，也不為世事所擾，他們超凡脫俗，巍然屹立於世，哪裏有真理那裏就有他們的身影，哪裏有邪惡那裏就有他們的呼籲、吶喊或詛咒。他們生是為真理所生，活

僅僅只為弱者而活。他們扶貧濟弱，打抱不平，伸張正義，痛斥邪惡，絕無絲毫含糊或模稜兩可。

作為人，他們同樣喜歡升官發財以及窮奢極侈的享樂生活，但他們發現，這是由極少數權貴所為的，是不正義的，乃真正邪惡之源。尤其當他們洞悉勞苦大眾的艱辛不易和無限苦難時，他們就會立刻與權貴劃清界限，徹底決裂，而勢不兩立，只為弱勢奔走呼號，而追逐真正屬於人世的真理。

如果世道清明有序，真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喜歡參政，但是，一旦他們識破作為結黨的營私與邪惡，尤其是其內在的齷齪與爾虞我詐，他們便會迅速脫離政黨束縛。因為，作為黨派，即便在號稱最健全完美的民主社會，就一定有黨系之爭，有黨系之爭，就一定有明槍暗箭的不斷來往，而此根本不屬於真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秉性。

當然，作為真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往往在邪惡制度下，他們才是時代進步的真正急先鋒，是歷史不斷向前發展的真正舵手和導航者。在歷史上，雖然他們在導航的過程中，經常被自私者所利用，被別有用心殘暴兇惡的暴君式英雄人物所利用，尤其是當一個時代變革結束之後，他們竟然發現這時代又回歸到原來位置上時，於是他們便會迅速投入到新一輪的抗爭。但他們作為急先鋒的開拓與導航的巨大作用豈但功不可沒，其影響和作用也不可估量。

關於這類人物，如果在中國近代尋找，胡適先生應該算一個。雖然他還不太完美，但與真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比較，應該最接近。這裏，我把他稱之為較為柔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因為，畢竟他最終還是在威權政治之下不悅至死。但他的那份倨傲與不馴，以及始終嚮往自由追求民主的苦心，卻從來沒有改變過。當然，他在實踐中貫徹自由民主的行為，也從來沒有間斷過。

還有一個人應該就是魯迅，雖然有人罵他不懂民主，但他至少也替真正屬於弱勢地位的人民羣眾呼籲、吶喊、助威了。雖然他在理論上對自由民主從來沒有明確的言說，或者他對自由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還沒有吃透，但不能就此否認他的骨子裏的那種與生俱來的倨傲與不馴。應該說，他的風範是被作為又一個獨裁者的毛澤東充分利用了。而實際上，如果魯迅真正活到中共建國之後，他肯定是第一個被毛政權鎮

壓致死的極右分子。我認為魯迅應該是屬於剛烈性格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編按：但他還是接受了延安中共中央的決議，做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偉大旗手；後來接他的班的，則是高唱“斯大林是我們的父親”的郭沫若；再後來，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旗手江青同志了……），當然他的知識結構或智慧是比較短淺甚至是狹隘的。

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或正在出現一批又一批有可能成為真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人。說他們是真正的，是因為時代正在錘煉他們；說他們有可能，是因為考驗就在眼前……。

自由，本屬於人之天性，是天賦人權，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終生具有的，絕不可輕易剝奪或削弱之。而為自由絕不妥協毫不畏懼地而鬥而抗而爭而戰在最前線的人，這便成為屬於真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典範、榜樣和先導。因為自由就是他們真正的使命和神聖的職責。也就是說，只要專制和黑暗存在一天，真正屬於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就會永遠抗爭下去，並堅持不懈，絕不氣餒，除非他們在抗爭中捐軀。

固然，我最崇尚真正屬於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但願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人越來越多越好，因為只有越多才能具有真正震撼的力量，也才能迫使專制政權不得不順迎民意，還大陸人民真正的自由與民主。



編 後

本期出版之時，將臨黃花崗忠烈獻身中國共和革命九十五週年紀念日。為了紀念先賢和先烈，我們發表了一組紀念圖文，並針對百年中國前後兩度改良和革命的“歷史之結”，熱情地肯定孫文共和革命，明確地批評“保清改良”和“保共改良”。本刊站在歷史的立場上，舉凡是對我民族、國家、人民好的，我們就肯定；反之，我們就反對。我們雖然以歷史文化作為本刊的主體內容，但我們也不屑於去做所謂的“清客相公”：心有所私却標榜公正，志有所怯又要號稱自由。我們勉力地去說我之所願說，做我之所願做。願天下的中國人，皆能如此，便是我國我族我民之大幸。

黃花崗雜誌

敬告讀者

自創刊以來，本刊就一直堅持向海外各地很多朋友寄贈雜誌，贈閱數量和所需郵費均相當可觀，迄今已經四年多了。鑒於本刊的種種條件，特別是資源和人力的限制，自下期起，本刊不再寄贈雜誌。願意繼續閱讀本刊者，則請訂閱本刊，或上網流覽，本刊網站擁有大量的海內外讀者。對此，本刊僅表示歉意，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黃花崗雜誌社董事會

第16次財務報告

(11/1/05 - 01/31/06)

總收入 (雜誌銷售回收、訂閱及捐款)	\$5180.19
--------------------	-----------

總開支	\$14629.69
-----	------------

雜誌印刷、打字、郵寄、稿酬、運輸開支、郵政信箱等	\$8251.02
研究中心及雜誌社房租	\$4800.00
電話費 (含寬頻上網及網站月費)	\$593.29
辦公室用品及雜費	\$489.08
購買資料書籍	\$81.50
雜誌社差旅費 (包括邀請人員)	\$368.55
雜誌社招待費	\$127.75

說明:

- 1、主編回捐稿酬\$315 美元。
- 2、謝辭稿酬的有: 魏紫丹、徐沛、張育明、鄭文英、黃建民、王雍罡、子口、易丹軒、鄒翔
- 3、黃花崗雜誌社董事長周光亞核定 (02/25/06)。

敬請訂閱歷史文化季刊 — 《黃花崗》雜誌

一年四期

本刊新電話: 718-898-9100

榮譽訂戶 (包括寄費) 為 \$100.00

本刊電子信箱: hhgang2001@hotmail.com

普通訂戶 (包括寄費): 美國為 \$ 22.00; 加拿大為 \$ 44.00; 其它地區為 \$ 55.00

____ 是的, 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榮譽訂戶

____ 是的, 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普通訂戶

附上支票 \$

我的郵寄地址是

支票抬頭請寫:

(姓名)

(中文名字)

(街名)

(城市)

(州名)

(郵編)

(電話)

(email)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縮寫: MCHS)

《黃花崗》雜誌 地址是: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此四蝦齊翁無也！ 抗日漫畫家 麥非

愛國愛族的華僑們 敬請支援海外這本
沒有任何背景 沒有任何資源
完全沒有工薪 全面義務奉獻
只願依靠民間 財務徹底公開
的歷史文化刊物 黃花崗雜誌



訂閱《黃花崗》
就是對孫文革命的深情緬懷
就是對三民主義的嶄新理解
就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公正澄清
就是對中華優秀文化的重溫和傳承
就是對大中華民國民主統一的竭誠追求
就能夠幫助你將陸 島的命運緊密相連
《黃花崗》得之於手

應之於心會溫暖更會堅定你那顆熱愛中華的遊子之心！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P.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NON - PROFIT
U.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PERMIT NO. 619